

張
漁
東
文
集

张 澜 文 集

四川师范学院《张澜文集》编辑组
主编 龙显昭
副主编 谢增寿 康大寿 胡孝章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年·成都

(川) 新登字005号

特约编辑：蒲家驹
责任编辑：赵泰白
封面设计：陈万福
技术设计：盛寄萍
责任校对：赵泰白 解励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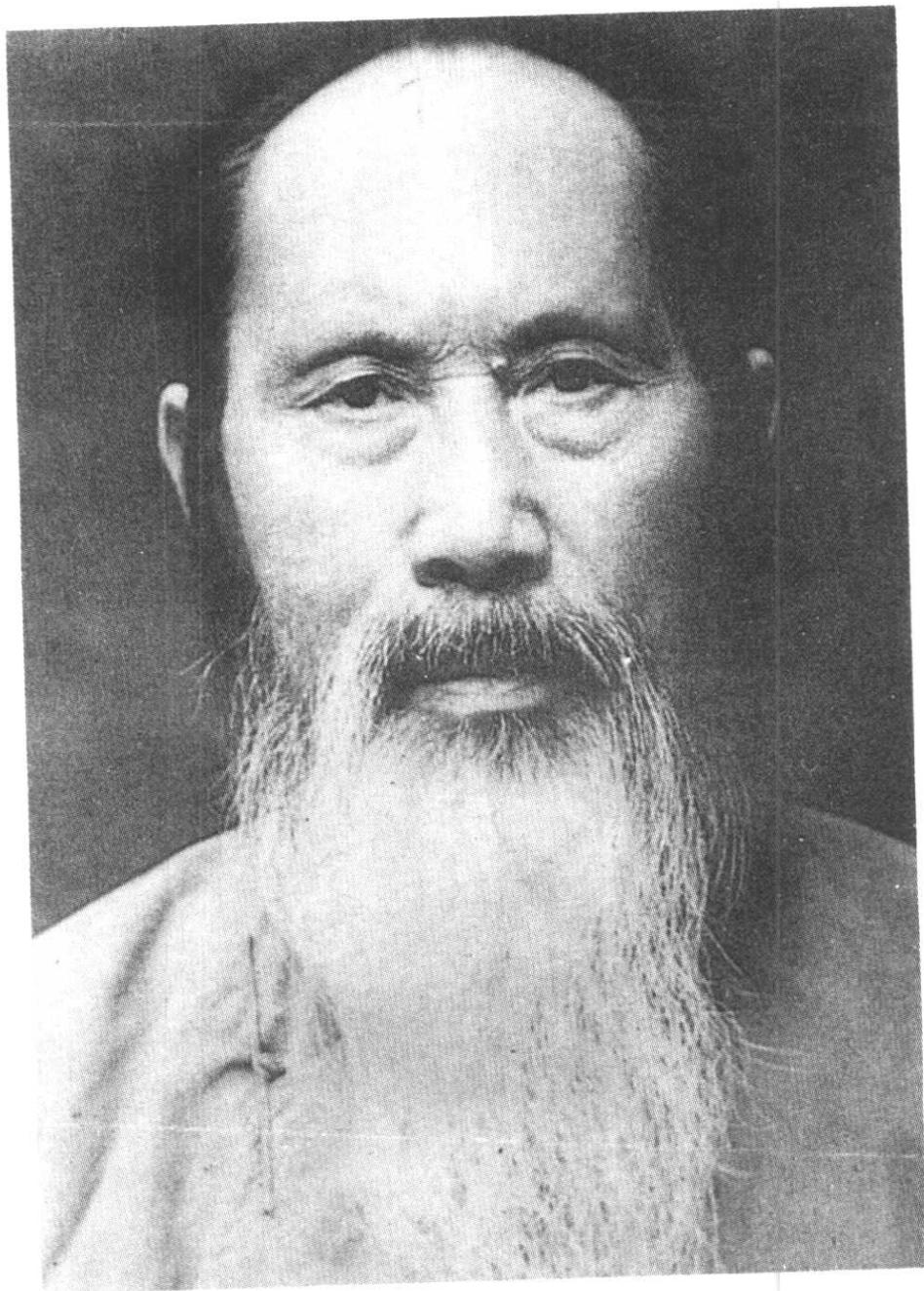
张 澜 文 集

四川师范学院《张澜文集》编辑组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125 插页8 字数350千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408-1606-6/G·1553 定价：9.20元



张澜先生(1872—1955)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张澜等到机场迎接时合影。



1949 年 9 月,张澜与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亲切交谈。





1949年10月1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张澜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张澜与朱德、罗瑞卿在北京合影。



1951年3月3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主持为张澜80寿辰祝寿，张澜致答词。



1941年9月，张澜和他的好友沈钧儒、鲜英、李公朴在重庆“特园”合影。



40年代，张澜经常寓居
鲜英的住宅——重庆上清寺
“特园”。

民國八年在北京時與湖南深山晤談彼告我以集產主義而
共產主義我遂寫文一篇登於晨報友人邵明叔見之倉皇而做
我曰東方客又來放火共產主義刊登報章以我此文為創始也

中國需要真正民主政治

張瀾

1943年9月，张澜写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流传甚广，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右上为1919年张澜与梁启超讨论“社会主义”，事后张澜写的回忆这次讨论文章的手迹。

必有名世者。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要平治天下。而以名世自居。謂舍我其誰。是何等自尊。但其平時內則浩然之氣充於體。至大至剛。何等雍容。外則非仁不居。非義不由。何等行為。其所以能矯然自尊者。實由養成之浩氣能配乎道義。而助其行也。自尊者必先有可尊之實。觀於伊尹孟子而益明矣。要之在己無可尊之實。無論以富貴驕人。貧賤驕人。均屬於惡德。若已有可尊之實。即詢窮乏。或貢版版。以自收愈見其謙光。吾儕當知所自勵也。

自強

自暴者不足与有言。自棄者不足与有為。此等人當然不能自強。好勇力近於自強也。而乖亂則非自強。進競近於自強。而退遠則非自強。自強必有真知。在能為善。自強必有毅力。在能不怠。中庸謂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有弗

张澜《四勉·一戒》手稿中的一页。

编辑说明

一、近年来，我们收集了张澜的著述、演说、函札、文电、公牍和杂著等400余篇，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共186篇编辑成册。其中，不少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或鲜为人知的重要著述及手稿。

二、收入本书的文章均以手稿或最初的版本为基础，以保持原貌，并参照其他不同版本校补或订正讹脱。手稿中或无标点，或仅有标志符号，由编者进行了点校。

三、收入本书的文章一般采用原标题，演说、函札、文电、谈话和部分文章节录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四、文章使用的特定时期流行的政治术语、外国译语及称谓，均未改动，以保持原文风格。

五、选入文集的著述，一般按写作时间或最初发表时间的顺序编排。部分手稿或文章只能考订出年、月，其顺序编排在当年、当月末尾或适当位置。

六、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各篇均作了题注；对正文涉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作了必要的简注。

七、少数函件开首有不少受文者的头衔，凡与正文无关者，则或省或略。

八、原文所据的版本有明显排校错讹者，手稿有明显笔误者，迳直改正，不出校记。有残缺、脱落或污损，则考证复原；无法复原者，以□代替。

九、有的文电是张澜与他人共同署名的，为与其个人的著述区别，用仿宋字体排印。

目 录

在四川保路同志会全体会员大会上的演说（节录）

（1911年8月2日）	1
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上的演说（1911年8月5日）	3
呈赵尔丰请代奏川路仍归商办文（1911年8月上旬）	6
请赵尔丰代奏纠劾盛宣怀李稷勋文（1911年8月10日）	10
呈赵尔丰为休会恳请查办文（1911年8月26日）	13
呈四川省军政府文（1912年）	15
电贺陈宦宣布四川独立电（1916年5月26日）	17
致中央政府告川局危急电（1917年4月15日）	20
请北京政府迅速解决川乱根源电（1917年4月28日）	21
致某公电（1917年9月4日）	23
致政府请拨赈款电（节录）（1917年12月21日）	24
一致拥护约法电（1918年2月16日）	25
致川中各将领电（1918年2月17日）	27
告川人书（1918年12月22日）	29
致熊克武肖德明（1919年1月7日）	31
答梁乔山先生书（1919年4月28日）	34
附录：梁乔山先生致某君书	

为李霖杨械赴法事致沈仲俊函 (1919年6月12日)	39
与熊克武论四川自治书 (1920年)	40
主张裁兵电 (1921年4月16日)	44
主张裁兵以维护教育经费电 (1922年6月29日)	46
致袁诗尧 (1922年7月3日)	48
为成渝备战谣传致杨森刘湘邓锡侯赖心辉电 (1924年11月14日)	49
南充之实业自治 (1924年)	51
为根本解决川事办法电 (1925年5月25日)	55
对召开善后会议之主张电 (1925年9月9日)	57
致成大学生会 (1925年9月)	59
致蔡松佛 (1925年9月)	60
致沈与白 (1925年9月)	61
致赖心辉 (1925年9月)	63
在四川善后会议上的发言 (1925年12月17日)	66
致何光烈 (1925年)	69
致邵从恩 (1925年)	71
致成都高师学生会 (1925年)	74
促袁祖铭撤兵回黔电 (1926年4月22日)	75
致刘文辉邓锡侯辞成都大学校长函 (1928年2月19日)	78
自行解除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函 (1928年2月19日)	81
复国立成都大学校长职演说 (节录) (1928年3月12日)	82
对筹备国立四川大学的意见 (1928年9月19日)	84
怎样研究经济学 (1929年4月)	87
中国学生底出路 (1929年5月23日)	91

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1929年）	99
致四川省政府函（1931年5月26日）	104
呈行政院文（1931年5月26日）	107
致刘文辉等（1931年11月7日）	109
关于抗日战争问题的部分论述（节录）	
（1936年12月——1937年9月）	110
四川的救灾与息谣（1937年5月7日）	112
希望于整军会者（节录）（1937年7月5日）	115
祭刘湘（1938年2月）	118
应该从速决定的两件事（1938年4月5日）	119
讨汪通电（1939年1月3日）	122
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1939年2月）	124
就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发表谈话	
（1939年9月3日）	126
建设川康川人应有的责任（1939年10月17日）	128
先考秀才公先妣王太夫人墓碑文（1940年2月）	131
致张茂延（1940年4月9日）	133
致郭子杰（1940年12月9日）	134
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	
（1941年11月）	136
请政府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	
（1942年11月）	139
说仁·说义（1942年1月26日）	141
附录：《说仁说·义》跋	
自传（节录）（1942年）	169

附录：黄任之先生诗

四勉·一戒（1942年11月5日）	172
谈慈惠堂工作（1943年2月20日）	182
致蒋介石书（1943年7月6日）	183
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1943年9月18日）	185

附录：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
与《华西晚报》记者谈国民参政会

（1944年8月17日）	200
关于民主的谈话（节录）（1944年8月28日）	201
关于当前政治问题的谈话（1944年9月5日）	202
和成都各报记者谈民主运动（节录）	
（1944年9月27日）	203
在成都华西坝五大学十二个学会主持的国是座谈会上的 演说（节录）（1944年10月7日）	205
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节录）	
（1945年2月26日）	207
谈赴渝任务（1945年7月4日）	210
与邵力子谈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1945年7月8日）	212
致蒋介石（1945年7月14日）	213
为韬奋先生逝世一周年题词（1945年7月19日）	215
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的谈话（1945年8月3日）	217
对抗战胜利结束发表的谈话（1945年8月11日）	223
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1945年9月10日）	227
对中国民主运动目前阶段的五点意见（节录）	
（1945年10月1日）	229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问题的谈话（节录）	
（1945年10月22日）	231
致国共代表函（1945年10月28日）	233
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的谈话（1945年12月1日）	235
致国共双方请速即停止内战函（1945年12月30日）	237
附录：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复张澜主席函	
挽昆明“一二·一”死难者（1945年12月）	239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1946年1月10日）	240
附录：政协会议前夕答《新民报》记者浦熙修	
关于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1946年1月16日）	245
为暴徒捣毁《民主报》及《新华日报》致蒋介石书	
（1946年2月23日）	247
就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发表谈话（1946年3月21日）	250
慰问马来亚侨胞电（1946年3月28日）	252
复李璜函（1946年4月13日）	253
致中共中央悼“四·八烈士”电（1946年4月13日）	256
致美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吁请重视中国严重局势函	
（1946年4月18日）	258
挽“四·八烈士”（1946年4月19日）	260
致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女士（节录）（1946年7月16日）	261
致闻一多夫人高真女士（1946年7月17日）	262
致潘大逵（节录）（1946年7月17日）	263
致蒋介石（1946年7月18日）	264
就国民党当局破坏民盟发表谈话（1946年7月21日）	267
就孙中原被特务绑架事致梁漱溟（节录）	

(1946年7月30日)	269
哀挽李公朴闻一多先生 (1946年8月18日)	270
分函答谢各方慰问 (节录) (1946年8月)	271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召开国民大会事致蒋介石电	
(1946年9月30日)	273
在渝与记者就时局发表谈话 (1946年10月14日)	276
在重庆四个团体欢迎会上的讲话 (1946年10月25日)	278
与记者谈民盟对一党国大的态度 (1946年11月14日)	281
赴上海前在重庆机场答记者问 (节录)	
(1946年12月12日)	282
抵沪时在轮船上发表的书面谈话 (1946年12月18日)	283
谈民社党 (节录) (1946年12月20日)	285
在沪十一个民主团体欢迎会上的讲话	
(1946年12月23日)	286
为外资和官僚资本压迫民族工业发表演说	
(1946年12月27日)	291
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开幕词	
(1947年1月6日)	293
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闭幕词	
(1947年1月10日)	297
为《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题词 (1947年1月11日)	299
对莫斯科会议的意见 (1947年3月12日)	300
七十六岁自勉集语 (1947年4月)	304
为中央社发表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致行政院长函	
(1947年5月8日)	305
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 (1947年5月23日)	308

对国民党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及蒋介石七月七日广播演说	
发表的书面谈话（1947年7月8日）	312
致范朴斋（节录）（1947年7月12日）	314
为民盟盟员被捕事件致行政院长张群函	
（1947年8月24日）	315
为促释放民盟盟员再致张群函（1947年9月1日）	316
为促释放民盟盟员三致张群函（1947年9月13日）	317
致函民盟马来亚支部代表大会（1947年9月19日）	319
贺民盟马来亚支部代表大会召开电	
（1947年9月23日）	322
对杜斌丞被枪杀案的声明（1947年10月7日）	323
在民盟总部解散后的声明（1947年11月7日）	326
墨子贵义（1948年）	327
附录：张表方《墨子贵义》序（周善培）	
评蒋介石元旦文告（节录）（1949年1月6日）	353
关于上海解放的声明（1949年5月28日）	354
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电（1949年5月29日）	358
附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复电	
为祝贺上海解放致毛泽东朱德电	
（1949年5月31日）	360
复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电（1949年6月1日）	361
附录：沈钧儒等致张澜电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949年9月21日）	363
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9年10月5日)	367
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 (1949年11月7日)	369
针对现实为人民解决问题 (1949年12月5日)	370
在民盟四中全会上的讲话 (1949年12月7日)	371
致张乔啬 (1949年12月14日)	374
致王恩洋蒙文通 (1950年2月10日)	376
致伍非百等 (1950年2月10日)	378
致王兆荣 (1950年2月10日)	379
致鲜特生 (1950年2月11日)	380
致王泽丰 (1950年2月11日)	382
致蒲跃文 (1950年2月12日)	383
就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发表的谈话	
(1950年2月16日)	385
欢迎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归来发表的谈话	
(1950年3月6日)	388
致郑定竹 (1950年3月28日)	390
发挥高度积极性与共产党员团结合作	
(1950年3月29日)	391
附录：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文件	
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谈话	
(1950年4月12日)	395
致郑兴亚 (1950年4月20日)	397
致胡子昂 (1950年4月20日)	398
给川康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 (1950年5月18日)	399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1950年6月17日) 410

在北京各界庆祝“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

示威大会上的演词(1950年8月1日) 414

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开幕典礼上的讲词(1950年9月25日) 417

国庆题词(1950年10月1日) 419

庆祝国庆(1950年10月1日) 420

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50年11月21日) 423

致邵慈云(1951年2月22日) 426

在中央人民政府祝寿会上的谢词

(1951年3月31日) 428

致沈自强(1951年6月30日) 430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

(1951年7月1日) 431

国庆日致词(1951年10月1日) 434

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致词

(1951年11月7日) 437

在民盟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951年11月13日) 440

致张默生(1952年1月3日) 443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致词

(1952年2月12日) 444

致贾子群(1952年4月15日) 447

致李正鼎李正立 (1952年4月15日)	448
致邓小平 (1952年)	449
庆祝成渝铁路通车 (1952年7月2日)	450
更广泛地把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 (1952年9月7日)	452
继续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 (1952年11月3日)	456
悼斯大林 (1953年3月10日)	459
致张志和 (1953年3月26日)	460
就周恩来总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的谈话 (1953年4月3日)	461
在民盟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 (扩大) 会议上的开幕词 (1953年5月27日)	463
就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书面谈话 (1953年7月28日)	466
为完成伟大的国家建设计划继续深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而奋斗 (1953年10月1日)	468
示张晓岩 (1953年10月24日)	471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的 发言 (1954年6月14日)	472
为祝贺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的讲话 (1954年7月25日)	473
拥护周总理兼外长的外交报告的书面谈话 (1954年8月15日)	475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宪法草案和报	

告的发言（1954年9月16日）	478
青年们，迈开矫健的步伐，勇往直前吧	
（1954年9月）	480
庆祝建国五周年（1954年10月1日）	485
拥护周外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的谈话	
（1954年12月11日）	488
附录：张澜生平活动大事年表	
后记	

在四川保路同志会全体会员 大会上的演说（节录）

（1911年8月2日）

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1]以保路^[2]，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事固起于盛宣怀^[3]，今则不止在一盛宣怀，有障碍吾等破约保路者，非盛宣怀亦盛宣怀。吾股东代表等与同志会诸君同一爱国，同一破约保路，是一是二，是二犹一。果有障碍吾等破约保路者，远处之盛宣怀吾等固誓死仇之，近处如有盛宣怀吾等亦誓死仇之。果盛宣怀今悔而赞吾破约保路也，吾等亦转而亲之。

注 释：

[1] 破约 指破除清政府于1911年5月20日同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清政府通过该约将原为商办的川汉、粤汉两铁路干线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2] 保路 清政府出卖川汉、粤汉筑路权后，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

*根据《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二十八号整理。清末四川保路风潮起后，各地川汉铁路股东代表赴蓉。1911年8月2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全体成员大会接洽股东代表，本文是张澜作为股东代表在会上作的演说。

强烈反对，四川更为激烈。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各县保路同志会也先后成立。在革命党人推动下，保路运动发展为罢课罢市和抗捐抗粮的群众斗争；9月同盟会员在各县组织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

〔3〕盛宣怀（1844—1916） 江苏武进人。1870年入李鸿章幕。1880年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2年创办北洋大学堂，其间极力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900年参与英、美策划的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1911年授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成立后，任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后亡命日本。

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上 的演说

(1911年8月5日)

适才赵大帅^[1]演说，大致谓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赵大帅的话我们股东是很明白很感激的。但是大帅所说，我们股东究有不解之处。

如说川人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试问所谓川路的界限若何？川人所修的路本自宜昌起手，即谕旨收路为国有亦只言鄂境。何以盛宣怀定约将我们夔府数百里的路凭空攘去，抵补与四国？所谓川人筹款来修川路，如只修成夔的路，则我们四川的路算得是完全的川路吗？如仍照川人从前所修的路来修，则当兼修宜夔。宜夔已被盛宣怀卖与四国，既要保路，安得不说破约（拍掌）！

又谓因民间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此回因收路国有而借外债，因借外债而有用人用钱查帐悉归外人之约。在朝廷一面不可谓无深意苦心，但其停止租股^[2]而借外债以为是深恤民艰似矣。然试问：朝廷于租税之外取于百姓的如新常捐输、肉厘、

*根据《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三十号整理。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在成都召开。会上，清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训话，对保路风潮颇多指责。张澜当即发表这篇演说，针锋相对予以驳斥。

酒捐、油捐、糖捐种种，皆有加无已，何不一恤民艰（众大拍掌，声震瓦屋）？独于租股一项要恤民艰（众大拍掌，声震瓦屋）？明明夺我们百姓的权利，反以为恤我们百姓的艰难，有此谓吗（大拍掌）？至将修路的用人用钱查帐之权悉交外人，此策我从前曾闻某巨公说过：今日修路定要借外债，且中国官绅对于公款多半侵蚀虚糜，既借外债，便要把用人用钱查帐之权悉交外人，方免侵蚀虚糜诸蔽。不料今日竟实行其言！我们中国官绅之坏，诚多侵蚀虚糜。试问朝廷操用人大权，何不选任贤者（大拍掌）？今乃不信中国人而信外国人（大拍掌）。譬如有肉于此，因防鼠子窃食而使老虎守之，此肉有能存在的理莫有（大拍掌，声震瓦屋）？以这样失败的约都叫我们不说！假使明年我们股东为朝鲜的人，如朝鲜与日本结的约，我们大家也可以贪生忍辱的不说吗（众大号哭，掌声震屋）？

至谓川人筹款困难，此语尤不然。如湖北路款，竭鄂人數年之力，只筹得一百余万，这才叫做困难。我们四川股款现已筹有一千五六百万，安得说筹款困难（拍掌）！况我们川人并不是莫有钱，并不是不出钱，请以一普通的事明之：如我们四川各府厅州县的百姓一有词讼，虽极贫之家，必费钱三四十串或六七十串不等，至一般官吏之明罚暗拿，少则数百金，多则数千金，百姓不敢少一分文。犹说我们川人不出钱吗（众大拍掌，声震瓦屋）？总之，我们四川筹款并不困难。只要朝廷以至诚之心待百姓（大拍掌），一般官吏不揩克人民（大拍掌），我们的公司总理举得其人（大拍掌），信用能立（大拍掌），则莫说七千万修路之款，即使再筹七千万，亦莫有筹不到的（众大拍掌，声震瓦屋）。

但是现在又有人说，川人能筹款，川人能保再不倒款不？这

话尤无见识。这回政府收我们的路，固以倒款为我们川人的罪。殊不知川路倒款由于总理不得人。使总理为我们股东所公推，倒款我们任咎。倒款的总理为奏派，安得归过于我们川人（大拍掌）？且倒款之害比较盛宣怀所定的约丧失国权之害，孰为重大？倒款之罪便以归诸川人，丧失国权又是谁人的罪（大拍掌）？总之，我们股东只知道路当保，约当破，纵使将来不幸路款再有亏倒，我们四川的股东宁肯含辛茹苦，再吃倒款的亏，断断不能附和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来吃亡国民的苦（众大叫拍掌）！

我们四川股东，我们四川人民，大帅的话了解不了解？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又说陈叔宝全无心肝。如使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尽是心死，尽是全无心肝，大家可以回去对孺人，弄稚子，享安逸的福罢了。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心死，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众大拍掌）！

注 释：

〔1〕赵大帅 即赵尔丰（1845—1911），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清末曾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1911年任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屠杀请愿群众，激起四川各县人民的武装反抗。武昌起义后，成都宣布独立，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都督，赵尔丰仍以办理边务名义从中操纵，煽动兵变。后民军入城，赵尔丰被杀。

〔2〕租股 系当时商办川汉铁路公司凭借官府、依靠士绅强制性按租抽谷之股，当时人们称为“铁路捐”。租股从1905年开始征收，是川汉铁路股本的主要来源。

呈赵尔丰请代奏川路 仍归商办文

(1911年8月上旬)

四川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会长颜楷^[1]、副会长张澜暨全体股东等，为谨遵先朝谕旨，声明四川川汉铁路仍归公司自办，呈请电奏事：

窃维四川川汉铁路，遵奉先朝谕旨，设立公司，定明商办，不招外股。经历七年，集今招派各股至壹千陆百余万。宜归十段，节节动工，已经行车运料者三十余里。正在进行，忽奉朝命：据给事中石长信奏，收全国干路为国有。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订借四国借款合同，竟将宜夔一段，本非干线之路，强横牵连，划入鄂境，使四川川汉铁路，原定全线。割去四分之一。公司投资施工最剧最多之地，猝遭没失。股东等集腋沥血之资，受此意外亏损。揆国家倡导商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新政，实属难称吻合。

然使如盛宣怀所定政策，果丝毫无益于大局，无损于国家。则股东等虽营商业，固亦国民，即将公司利益完全弃掷，岂敢有私。惟现经特开股东总会，痛矢天良，反覆筹思：若非凛遵先朝谕旨，声明四川川汉铁路仍归公司自办，则公司瓦解，资本折蚀，

*据《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原题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呈赵尔丰请代奏川路仍归商办文》。

其害在商民者犹小，而为患于国家者甚大无穷。前经四川绅民及四川咨议局先后沥陈，并签注合同，呈请代奏皇上，于此次借款收路之有害无益，是祸非福，业已涸泪剖心，宛转竭尽。然而未蒙明察者，殆由盛宣怀自知建策不善，罪无所逃，遂益为恬过之谋，多为邪说，上以荧惑圣聪，即下以钳制舆论。计其为说，不外两途，请得概举而辞辟之：

一说则谓路权授人，固于国权有损。而此次合同，外国人仅司建造，不任管理，且并无以路作抵字样，实未尝以路权授人也。不知路权授人与否，当于事实定之，不能仅以掩映之文字涂入耳目。此次合同于铁路之用人，则总工程“司”指定国籍，指定地段，不能于此范围外，任意选择，而其合宜与否，四国银行等皆有干涉之权；下至专门人员之进退，一一须与总工程司商酌，于铁路之购料，则以英公司、德华洋行包揽经理，即全路造竣后借款未还清以前，此两路所需材料，仍须尽先由该公司、洋行经理购买。于铁路之财政，则更开从来未有之恶例，明明使四国银行为我财政监督，其所设之查帐员，不但得随时稽查我铁路一切帐目，甚至我欲提用款项，必须向该查帐人声明缘由，应否开支皆惟彼命是听，虽度支部之监督各省财政，其严厉犹不至此。夫所谓路权者，不过用人、购料、理财三者而已。举三者尽畀外人，而犹曰外人仅司建造，不任管理。皇上试问盛宣怀：必如何而后可谓之外人管理？除用人、购料、理财外，我所能自由管理，不受牵掣者更有何事乎？既以路权授人矣，则虽不以路作抵，其危险固已甚于以路作抵。况合同第七款明明白：“此借款未还清以前，不得将各该铁路及其收款抵押他人”。皇上试问盛宣怀：如路既未作抵，何以不许抵押他人乎？股东等窃见此次合同，实系断送

路权，毫不容疑。特盛宣怀巧于欺君，或予以实而避其名，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正如禁体诗文，字面虽不显露，而题蕴则已刻削无余，故皇上仓猝不觉其奸耳。

又一说则谓瓜分之谣，轰传已久，惟外资输入渐多，则我与列国关系渐密，彼虽不我爱，不能不自爱其财，即不能不互相防制，而维持我之治安。此次大借四国债款，乃所以抵制瓜分，两害相形取其轻，则借款虽受损害，不足恤也。不知列国以均势主义相持，远非一日，其不遽瓜分我者，非心有不欲，特以势均力敌，各惮于初发；其难在彼，自有互相防制之情，实不因我借债而始互相防制，则我抵制为无谓。列国果能协议实行瓜分，则吾土皆其土，即吾财皆其财，丧借款而得国土，孰多孰少，外国人岂不知之，而谓能因此数十百兆之金钱，弃其瓜分之大利乎？则我之抵制必无效。且瓜分之祸所以旦夕未发者，徒以列国均势相持，协议未谐耳。今我一举债而使数强国同财共利，与以亲密协议之机，则此合同非抵制瓜分也，直媒介瓜分而已。抑瓜分者非必割裂顽然之土地以为快，其所重固在于事权与利益，今因借款而尽送路权，使四国各得均等之事权与利益，骊领已探，何必更事有形之宰割，则此合同非抵制瓜分也，直承认瓜分而已。闻有遇瓜分而抗拒者，未闻有明订合同而签押承认，如盛宣怀之奇想者。盛宣怀实以国为孤注，以遂其借债收路之愚策，乃复谬托苦心。危词耸听。皇上试问盛宣怀：举两铁路之用人、购料、理财，悉受成于四国银行等，此非四国瓜分我路权乎？防未来之瓜分而先自就于受分之地，岂必待瓜分土地乃为国亡，而瓜分铁路不可以亡国乎？不知盛宣怀又将何说以自饰也。

要之，借债修路，本列国常有之事，不足为病。而如盛宣怀

此次之借债，失败太甚，实必不可行之策。股东等不敢为一公司计利害，不敢不为国家计存亡，即不敢不凜遵先朝谕旨，使四川川汉铁路成于中国商民之手。

查宜昌总理李稷勋〔2〕接邮传部六月歌〔3〕电，欲将公司现款七百余万，一并接收入股，内有“宜归一段既已勘定开工，如有此七百余万，则不动借款，权自我操，尽可由原定路线之华工程师一手办竣”等语。是一动借款，权即不自我操，已为盛宣怀所自承不讳。而自款自办，既可行于宜归，即可行于宜夔，此次合同并非坚不可改。计公司股本现存七百余万足敷宜归工费。股东等惟有死守宗旨，多方筹措，集足全线资本，勉力进行。但使路权可保，今日虽沥青注血以供给建造，异日或限年还款，收归国有，俱所甘心，不敢怨尤。惟望我皇上奉先思孝，体创业垂远之心，毋为盛宣怀所误，仍许四川川汉铁路照常自办。股东等感激微忱，必当改良公司，督促建造，益整益速，以图报称。若有虚饰，不应所言，愿伏斧锧。为此冒罪泣陈，谨请据情代奏，伏乞督部堂查核电奏施行，不胜屏营感激！

须至呈者。

注 释：

〔1〕颜楷（1877—1927）字雍耆，四川华阳人。1905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政，二年后，回国供职翰林院，授编修加侍讲衔。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时，颜楷主动承担保路同志会干事长职务。8月5日，在成都召开的各地股东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会长。9月上旬，被赵尔丰逮捕，11月15日获释。

〔2〕李稷勋，时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

〔3〕歌 5 日。

请赵尔丰代奏纠劾 盛宣怀李稷勋文

(1911年8月10日)

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暨全体股东等，为部臣弊通分公司总理违旨盗权，应行分别纠劾撤销，恳予电奏事：

窃维四川省川汉铁路公司，拮据创办，于今七年，路工正在进行，忽传将收归国有。股东等血资所聚。万命是依，不能不遵据律章，特开股东会议。譬如临危将死，召家人为久诀之词，兼部署其身后之事。此即使暴客操刀，刑官决犯，恐亦不忍不贷以须臾，俾得从容尽意。

乃开会以来，连日腐心呕血，上为国谋，下为民计，方苦索万全之策。忽于今闰六月十四日由总公司奉督部堂札开：“准邮传部咨开‘六月廿一日准四川川汉铁路驻宜总理丁忧本部左参议李稷勋呈称：‘该路既收归国有，应俟将从前支出各款，安定归结办法，始由官局订期接收，恐非仓猝所能完竣。嗣后关于工程、材料及工程“司”去留各事项，应如何办理，统候裁夺施

• 据《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原题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请赵尔丰代奏纠劾盛宣怀、李稷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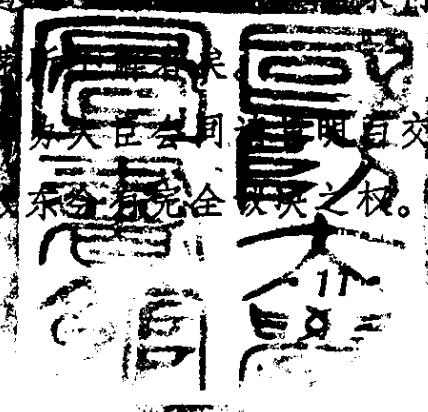
行。”并据该京卿（李稷勋）来京面商，宜归工程，照常办理，每月工项仍由川款开支，现用之副总工程“司”颜德庆，甚属可靠，即责成一手办理。本部覆按所论，均属正当，所有宜归路工，应责成该京卿悉心主持，督同副总工程“司”颜德庆认真办理，仍将办理情形，随时呈报本部及督办大臣等由；准此。札仰该总公司即便查照办理。毋违！此札”各等因，奉札之下，不胜惨栗！

查四月十一、二十、五月初六、二十一等日，叠奉谕旨，均明白宣示于路国有办法，着度支部、邮传部、督办大臣会同湖广、四川各总督、湖南巡抚悉心筹画请旨办理。是此次收回商办各路，假即筹无遗策，群情咸服，至于接收路工，亦必经部臣、疆臣、督办大臣，会同定议请旨，乃能实行。断非一分公司之总理所得专辄作主，尤非邮传部之任意一咨可以恭代纶音。

今驻宜总理李稷勋，无总公司之知会，无股东会之决议，并无四川总督之命令，有何权能可以达部交涉？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亦复不知有谕旨，不知有度支部，不知有四川总督，更不知有总公司全体股东，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一尘不惊，赵帜已拔。以没覆用间之术，施之于朝野交际之间，为国民者能不惧乎？

且谕旨明言：“川路现存七百余万，愿否入股，或归本省举办实业，并听其便。”则此事应由股东议决，更无疑义。乃部咨不问股东愿否，辄定宜归工程仍由川款开支。收路不已，更夺其资。凡朝廷体恤商民一线之恩，亦必使~~遏绝不行而转地~~国家何负于盛大臣，必欲使人心解散，此尤草莽所~~深害~~。

要之，本路一日未经部臣、疆臣、~~督办大臣~~公司~~通~~明白交涉，则事权一日不能脱于公司之手，即股东~~各~~完全~~解决~~之权。



李稷勋以有主之牧，敢为牵羊之献，实为公司罪人。

查奏定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条：“总理、副理于任期内如有失职等事故，得以股东总会决议辞退另举，其罚例悉照‘公司律’一百二十六条办理”等语。今李稷勋专擅害公，并于路外现款强股东以所不便，显悖谕旨，实属失职之尤。本日已由全体股东议决，照章辞退。应请督部堂奏明行知该京卿，于十日内将所有经手关防、款项一切事宜，交会计局长杜成章，责成暂行管理。照奏定公司章程，总理本止一人，该京卿既退之后，应勿庸再举总理。或另选副理到宜接办，或以成都总理移驻，应俟随再开会议决公举，照章执行。

至邮传部盛大臣秉行国家大政，应如何雋伟光明。此次借款收路，其根本得失，即姑置不论。在朝廷固当昭示天下，至再至三，应由部臣、督抚会同请旨办理。此非盛大臣一家之私事，有何不可告人？乃与一分公司总理私相授受，取接收路工之实，而阳避其名，并强据公司现款，行同狙侩，事同局骗，损朝廷之威信，辱内阁之政策。此件咨案，实属违背历次谕旨，现经全体股东决议，断难承认。应请奏明撤销并严治盛大臣以违旨害民之罪。

股东等生命财产，与本路息息相关，不远千里而来，固当逐日开会议论，统筹全局，力求归墟，不敢鲁莽毕事。惟议情方始，即来此意外之部咨，四川川汉铁路公司一息尚存，实不能斯须忍受。

所有部臣弊通分公司总理，违旨盗权，应行分别纠劾撤销各情，理合具呈。伏乞督部堂查核电奏施行，不胜屏营感激！
须至呈者。

呈赵尔丰为休会 恳请查办文

(1911年8月26日)

窃维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因邮传部卖路夺款，特开股东总会筹议一切。开会以来，所有言论宗旨，均经督部堂亲临并委派行政官莅会监督，实未敢有暴乱行为。乃昨闻邮传部奏请钦派李稷勋为宜昌总理，不待公司议决交路，蔑弃出资股东至于极地；并指股东等为少年喜事，并无明白绅士；甚至指为反抗，并有“严行弹压，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等语，直以全川股东，悉为乱民。股东等果有不法举动，督部堂监临在近，即执法相绳，岂敢怨。若只以议及路事，遂诬为反抗，谓为乱民，则股东等随时随地可以横死，实所不甘。

现在川路无论仍归商办与否，以事经七年，款逾千万之巨业，一旦求其归宿，非郑重详密，从长筹议，断不能服人心而清缪揭。今开会两旬，重要事件议未过半，邮传部辄以反抗乱萌相目。股东等欲仓卒散会，则恐贻误无穷；欲继续会议，则恐横被恶名以取罪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督部堂澈予查办，此次赴会八百余，究竟有无不公不正，喜事肇乱情形，以分虚实。否则

• 据《辛亥四川路事纪略》。原题为《四川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暨全体股东等为休会恳请查办文》。

不惟股东等不敢承此恶名，即全川数千万人，曾经出资入股者，皆当寒心屏足，不知死所。贻害大局，实非浅鲜。

为此暂行休会数日，驻省静候查办，明白宣示，不胜皇急待罪之至。伏乞督部堂核办施行！

呈四川省军政府文

(1912年)

窃查设官分职，原有专司，若虚设一官，而无所事事，尸位素食，何补时艰。况今大汉光复，首重政治改良，凡满清时代之冗官冗缺，亟当一并裁汰，以符名实。查各府经历一缺，空拥典狱之虚名，毫无佐治之实际；又查各府厅州县教谕、训导，科举既废，久成闲曹，在公家无此闲款津贴冗员，在该员等啼饥号寒，亦属有失观瞻；复查各府听差人员，久已无事可司，留之殊嫌无谓；更有劝业员一职，各州既有农会、商会，复有行政长官为之监督，再设此职，无异骈指，均应一并裁汰，以符名实。其向有府监者，归并附郭首县之典史，经官府州县文庙奉祀一切，由各州县视学敬谨承办，裁缺印信文卷，缴存府州县衙门。府经差员，旧有经费拨作地方办公之用。教职公费，改归劝学所扩充学务。劝业员公费，归入实业学堂。除饬顺、保、潼三府分别饬属一体遵照并分咨民政、学务实业各部外，理合呈明军政府察核备案。须至呈者。

• 据《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时张澜任川北宣慰使，驻节顺庆（今南充市）。

注 释：

[1] 军政府 辛亥革命后，11月27日在成都建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都督。12月8日赵尔丰策划兵变，大汉四川军政府解体。后建立了以尹昌衡为都督的四川军政府，22日处决了赵尔丰。

电贺陈宣^[1]宣布四川独立电

(1916年5月26日)

为驰伸贺悃请示祇遵事。本军前此于川北宣布独立，体道^[2]等首事主旨，联陈悃衷，早蒙钧鉴。顷读我都督通电，于本月二十二号宣告四川独立，义声所播，全蜀欢腾。本军将士，尤复感励激发，奋跃万状，遥望义旌，何胜顶祝。即于当日谨率所部将领官佐士兵同申庆贺，敬候指挥，于战事未终以前，应同戴我都督兼领四川总司令。所有前此权置川北总司令部，仍否暂时适用，抑另有如何分别组织之处？均恳钧座明示办法，俾有遵循，以取进止。惟今尚有协请者，当兹袁氏未去，和议未成，停战期满，将来战事变态难测，未谂当如何戒备。即目前地方纷扰，已成乱势，又应如何收拾。远虑全局，近忧川事，危机险象，叠起未消。心所谓危，不敢缄默，就其大者，略陈四端：

一、请善遣驻渝曹军^[3]，为长顾却虑之计。夫义军主旨，在逼袁氏退位，并无南北畛域，川中此次独立，想已得驻渝曹军之赞同，果联袍泽之谊，自无主客之嫌。但万一和议决裂，川人纵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相继宣布独立。时张澜为川护军政部长。

与相安，而对于滇黔之师，难保无再与交绥之事，境上之战祸未已，则境内之波及，亦在在可虞，于此于彼均非两利。在今日我都督之所以处曹军与曹军之自处，似均当有明白确实之计划迅予解决。但使川人得免兵灾之祸者，虽馈赆有仪，惟力是视，地主之谊所不敢辞也。

二、请亟谋各道各军独立军之统一纳并，以弭纷乱。盖自滇黔倡义，川邑均有响应：其真具有拥护共和之热诚而直行之者有之；其以维持地方之故而赞同者有之；至于误会宗旨，行之不以其道，更或假冒名义，乘时图逞者亦有之。是在抚慰得其人，操纵得其势，纳并得其方，而抉择去留得其要领也。

三、请安辑地方，以苏民困，而开饷源。值此需饷孔亟之际，既不能鬻减税之虚名，又不能行加税之秕法，司农仰屋，自系实情。然按之四川财政，本足供四川之用，无待外求者，亦无待于新加。如果使纷乱者各归统一，流亡者群得安辑，上忙报解，应时供给，自形裕如。否则现当农忙枯月，又多流亡，何从责以纳赋，即纳也而随收随耗，徒供不逞者之纷擾而已，更遑言新筹乎。辛亥之役，当局者不知亟谋地方统一，予人民以安辑，用浚财源，惟株守成都一隅，以事征求。征求之无效，乃惟妙手空空，滥发纸币，遂致坐受窘困，而遗害于无穷。前车不远，当引为殷鉴也。

四、请除腐吏，裁冗官，而规置临时要职，为维持现状之枢机。诚以官吏良恶，为民心向背所属。变乱之时，尤资干济之士，是勿问其新旧，区其省籍，而要以其才不才衡任用之大公。至若冗费机关，平时已无信仰，一遇事变即全失其作用。骈枝之病，微论有碍政体，且因此而启人民轻视一般官厅之心，则纲纪益隳

废而不可问矣。如各道道尹，其最甚者，应照民国元年官制即行裁撤，若欲济变一时，宜照辛亥反正时及滇黔近例，各道权置宣抚等使，隆其事权，专其责成，庶目前得实收戡戢之功，而事平不致碍行政之系也。

以上四端，是否有当？合并随文申达，统恳钧鉴，明赐复示
祇遵，无任切祷，此详。总司令官钟体道总〔3〕参谋长罗纶〔4〕
政务长张澜同叩。

注 释：

〔1〕陈宦 号二庵（二安），湖北安陆县人，生于1869年。少时离家，就学武昌自强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下武昌，经副总统兼参谋总长黎元洪推荐，担任参谋部次长，到北京代行总长职权，成为袁世凯的军事幕僚长。1915年2月，袁世凯任命陈宦为毅威将军、会办四川军务。护国战争开始后，陈宦于5月22日发出宣布四川独立电。6月18日，陈又通电取消独立，表示服从中央，后来流寓天津，晚景甚不称意，卒年不详。

〔2〕钟体道 川军混成旅旅长，驻防顺庆（今南充）在护国战争中，张澜联络钟体道，于1916年8月28日宣布顺庆独立，设立了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钟体道任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罗纶任参谋长。

〔3〕曹军 曹锟率领的北洋军阀部队。

〔4〕罗纶（1876—1930） 字梓卿，四川西充县人。1906年春，与张澜创办顺天府中学堂。1909年10月被选为四川咨议局副议长。1911年6月被选为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兼交涉部长。护国战争中，与张澜、钟体道等人在顺庆举义，组织川北护国军，任参谋长。

致中央政府告川局危急电

(1917年4月15日)

罗督军〔1〕裁兵失平，至激川军全体抗议，势成水火，同器
岂容。罗督军请假入京，忽又中止，对于川军既深怀仇嫉之心，
川军各师亦隐抱不安之虑。风潮冲荡，衅隙日深。近闻罗督军调
兵索饷，备战益急。川军各师地处危疑，力谋抵抗。祸发在迩，
人心惴惴，千钧一发，莫喻危险。川省治乱，动关全局，欲奠中
国，断难漠视。矧蜀经三次革命，民坠涂炭，衽席之安，至今未
复。我大总统、总理〔2〕仁厚为怀，早蒙恻念，若再陷之水
火，必将益劳神明。澜谬膺道尹，身负地方之责，睹兹险象，迫
切陈词，曲突徙薪尚犹可及，断弦离柱一逝难追。

注 释：

〔1〕罗督军即罗佩金，云南人，1915年参加护国运动，任护国军第一军参谋长，随蔡锷率军入川，时署理四川督军。

〔2〕大总统、总理 指黎元洪、段祺瑞。

• 原载《晨钟报》1917年4月15日第三版，时张澜任四川嘉陵道尹。

请北京政府迅速解决 川乱根源电

(1917年4月28日)

万急。北京。

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

川变奉明令后，川滇两军，均迁驻省城外，乱事似可止息。但风潮震撼，日甚一日，危机险状，势将蔓延。静推致此之故，皆由疑惧而生。疑惧之原，厥有数端：一因绵阳、潼川等处滇军，及自流井、资中等处滇军，向成都集中，泸、叙滇军亦闻西上。川军疑惧，以罗前督军将对川军大施攻击。一因云南唐督军〔1〕有出兵由昭通趋蜀之宣传。川中军民以为滇人将实行以武力并川之策，一因滇军用石油将督军署皇城垣外民房焚毁，延烧万余家，死伤数千人，无论军民闻之，皆痛心切齿。一因戴省长〔2〕未宣布就兼督军职，群龙无首，纷乱益滋。有此数端，祸胎尚伏。川军既怀疑挟恨，滇军亦逞忿寻仇。时危事急，较前尤甚。如稍纵弛，恐星火燎原，更劳廑系。应恳我大总统、总理，迅催戴兼督军就职；并令滇军仍驻原防，不准向成都前进；再明令编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

制，以安其心。一面严令罗前督军及川滇各师师长旅长等，管束所部，勿再寻衅，违者即从严治罪。水懦火烈，玩畏攸分，军纪国纲，岂可陵替。道尹就诸方面观察，非此无以解乱息纷，非迅请明令解决，亦恐后时无济。心所谓危，故迫切上陈，是否有当，迅请钧裁。四川嘉陵道道尹张澜叩。勘〔3〕。

注 释：

〔1〕唐督军 指唐继尧。

〔2〕戴省长 指戴戡，贵州人，时任四川省长，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督军。

〔3〕勘 即28日。

致某公电

(1917年9月4日)

川局难危，生灵涂炭，为国为乡，曷敢告劳。惟近日四川治乱根本，有一解决问题即对于在川滇军有无一定之办法是也。滇军一日不出川境，匪独后患无穷。而目前川军无从收束，财政无从整理，纷纭牵掣，有何民政可言？故必确定滇军出川之前提，而后川局乃有治安之可策。一切苦困情形，具详辞职电中，要之此时任川省长，无异身入地狱，徒为自寻苦恼，实无救于众生。尚望进言极峰，代恳收回成命，另选贤能以纾川难，不徒川民感激，澜亦实受其赐。

• 原载《晨钟报》1917年9月4日第二版。是年8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澜暂行代理四川省长，张澜曾致电婉辞。随即又致电某公（其人不详）诉其苦状。

致政府请拨赈款电

(节录)

(1917年12月21日)

滇军败退后沿途劫掠，地方多受摧残。顷接富顺县知事报称，
赵化镇被灾尤重，恳请政府拨款抚恤。

• 原载《晨钟报》1917年12月22日第三版。

一致拥护约法电

(1918年2月16日)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各部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湖南谭总司令，上海岑西林先生，广州孙中山先生，李协和先生，武鸣陆巡阅使钧鉴：窃民国根本，基于约法。法之不存，国于何有。溯自护国师兴，厚、澜等不自揣量，首于川之南北，分举义旗，拥护民国，战血殷然，当为国人所共鉴。不意共和复活，内讧横生。滇黔在川军队，适因主客情感偶伤，致启兄弟阋墙之衅。屡经竭诚调解，不获见原，以致兵连祸结，瞬将一载，干戈满地，井邑为墟，言之至为心痛。然实系省界猜嫌，于南北主张，初无服从反对之可言。而论者，直从川滇问题，牵入南北漩涡，故区区此心，惟冀大局早日解决，川祸即可早日减除。无如中央政府对法律既不毅然主持，对于和战又复茫无一定，酝酿日深，川祸愈烈，长此纠纷，大局敉平未知何日。而四川省人民实已不堪再罹兵燹，今惟有与西南各省一致进行拥护约法，共维国本，既可解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约法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公布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有进步意义。后为袁世凯撕毁。1917年7月，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废弃约法；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8月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孙中山任军政府大元帅，发动护法战争，率领滇军、粤军及桂、黔、湘、川部分军队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军事进攻。

除川省之战祸，并可促进大局于和平。特此宣言，诸希谅解。四川督军刘存厚，省长张澜，师长徐孝刚、钟体道、舒荣衡、刘成勋，旅长刘湘、陈能芳、陈洪范、汪可权、杨肇锡、张鹏舞、陈经、吴震、邓锡候、廖谦、赖心辉、田颂尧叩。铣〔1〕。

注 释：

〔1〕铣 即16日。

致川中各将领电

(1918年2月17日)

〔衔略〕 钩鉴：顷通电北京各行省暨滇黔两省督靖国军各将领，文曰：窃民国本根基于约法。法之不存，国于何有？溯自护国师兴，厚^[1]、澜等不自揣量，首于川之南北分举义旗，拥护民国，战血殷然，当为国人所生鉴。不意共和复活，内讧横生，滇黔在川军队适因主客感情偶伤，致启兄弟阋墙之衅，屡经沥诚调解，不获见原，以致兵连祸结，瞬将一载，干戈满地，井邑为墟，言之至为心痛。然实系省界猜嫌于南北主张，初无服从反对之可言，而论者直以川滇问题牵入南北漩涡。故区区此心，惟冀大局早日解决，川祸即可早日减除。无如中央政府对于法律既不豫然主持，于和战又复茫无一定，酝酿日深，川祸愈烈，长此纠纷，大局敉平未知何日。而四川省人民实已不堪再罹兵燹，今惟有与西南各省一致进行，拥护约法，共维国本，既可解除四川省之战祸，并可促进大局于和平。特此宣言，诸希亮察等语。厚、澜等以川人苦兵祸久矣，曾经通电熊使^[2]，愿以军民政权交付，俾免兵连祸结，糜烂桑梓。而熊使复电坚不承受，仍以同心护法相劝勉。日昨召集军政各界筹商，金谓欲解目前纠纷，舍与南方一致进行别无他策。

• 原载《晨钟报》1918年3月12日，第三版。

前电征求诸君意见亦复相同，兹将去电特达，希即照录转致前方
靖国军各将领，并转谕所部一体知照。存厚、澜铣印。

注 释：

〔1〕刘存厚（1885—1960）字积之，四川简州（今简阳）人，举人出身。
1912年任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1918年任四川督军，与滇、黔军阀进行长期混战。
1927年后，归附蒋介石，任第二十三军军长。1960年6月病死于台湾。

〔2〕熊使 指熊克武。

告川人书

(1918年12月22日)

敬启者：

川局云扰，偏劳诸公维持，天涯羁人，无任感佩。比来政局不变，南北渐趋和平，政府提倡于前，人民赞和于后，重以欧战告终，外交益加紧迫，以大势度之。战争断难继续，和平终必有望。惟南北繆轢双方自有办法，而地方问题同时须求解决。吾川与滇黔之争，本属于地方问题，国人所共知。将来地方安危，与和议大有关联。此时川人宜有正当表示，以蕲永久之和平，不可迁就隐忍，再伏将来之恶果。窃念川中之祸，自辛亥叙府、自流井之争，癸丑重庆王陵基、黄毓成之斗，以及去年全川之战，无一次非滇黔军人野心侵略之所酿成。而客岁彼此战争，亦及一年，川人生命财产之损失，宁可以数计！然推原川军出于战争之故。如果由少数人所能操纵，则去此少数人即可以长治久安，则亦已矣。然试问今之主持川事与今之在川各将领、兵士暨全川七千万人民，返躬自问，谋之良心，谁不欲滇黔之军出境，谁不知滇黔之军久不出境。将来仍不免于战祸耶？即使幸免于战祸，而试问自丙辰滇军入川占据川南，凡用人、行政、征收税款、川军民长

• 原载《晨报》1918年12月22日第六版。

官有能过问者乎？川南人民之受其蹂躏、劫夺，家破人亡，举目皆是，有敢申诉者乎？使客军而不出境，吾川之军民、长官，将来其又何法以又安全境，而使人之不纵暴于吾民耶？既欲客军出境，既知不出境而祸未已，而川政不能统一，乃于此南北调和之时，委蛇不言。客军果能始终与川军协和不再参商，则同属国人何嫌共处，于此多言。宁异杞忧。无如屡有阋墙之衅，绝难望水乳之融。前者曲突徙薪之未遑，既已焦头烂额矣。倘再不趁此南北和议之时，亟求补牢之计，是仍厝火于积薪之下，而冀其不爆发有是理耶。然滇黔军同是中国人，同知中国极弱有载胥及溺之祸，律以善邻之道，亦岂不愿和衷共济，挽此沉灾，想滇黔军亦必肯退让出境，以释干戈日寻之仇，再联辅车相依之谊。若彼辈不改悔其侵略之野心，遂欲永据川境，川人既怀积恨，加以猜防，小触必发，怨不在大，一朝决裂，两败俱伤，不独糜烂川境于不可收拾之地，必且牵动大局于永难统一之日。而邻国责言群起干涉，又在意计中。斯时彼此皆将负大咎于中国，不徒祸中于自身已也。近来川人之所以隐忍未发者，徒以南北交哄，各图进取，当戎马仓皇之际，非折冲樽俎之时。今则释争言和情势一变，凡因战争而起之谬辑，皆将取决于和议，此正川人据理直争之时，故在京川绅士均有论议。诸公老成硕望，念切桑梓，望速合词吁恳中央并致电和平会议，将滇黔军妥为安置，勿使久驻川境，以贻国家地方将来之大患。滇黔不乏明达之人，必能以国家为前提，而无所争议，若失此不言，自贻噬脐，川局泯棼将永无就理之日矣。

致熊克武 肖德明^[1] ^[2]

(1919年1月7日)

顷见四川公报载四川财政厅为查明前嘉陵道尹张澜、代理道尹卢廷栋违令吞款，呈请通辑一案。细阅全文，不胜骇异。查川北一道，自五年五月起，至七年二月代理道尹卢廷栋去职时止，前后收入共计约三百一十万元。其支出之数：拨给三师二百八十八万元，垫支顺渝^[3]安设电线费三万元，垫解成都赈款二万余元，解交财政厅二十万余元，拨给管金聚、罗团长在顺庆时兵饷各费二万余元，道公署历年经费四万余元，合计支出之数与收入之数约略相当。虽变起仓猝，未及正式造报，而一切簿册印据，无不俱在。不特帐目丝毫无误，可以对全川父老而无愧。而财归实用，款不卢糜，扪心自问，并可以质鬼神而对天地。执事不加细察，罔事稽求，竟自五年九月起算至六年二月止，以为其间卷逃吞握至九十七万四千余元。揆之情理，岂可谓平。查执事之所以致误者，厥有两端：一由于不审当时实在之情形，一由于仅据不完全之案档。自五年五月十二日迄于是年八月，为响应西南反对帝制，独立及收束军队之时期。当其始，成都政府尚存北军，又进驻合

• 原载《晨报》1919年1月7日第三版。1918年10月，四川靖国军司令、省长熊克武与四川省财政厅长肖德明，谓张澜在嘉陵道尹任上违令吞款，呈请通辑，张澜为此特致函驳斥，澄清事实。

州，川北势力尚弱。欲求达护国之目的，不能不广集枪枝，添招军队。其时，又改编各县警备队，又收纳省城模范警备队，又收拾川北各地之护国军。其后，又收束周、王溃散军队。迨收束周、王军队后，地方渐次宁静，兵额稍嫌过多，于是一面遣散旧式枪械之兵，一面又归还各县警备队。是时兵额之多，尚超过一师有余。观是年十个月内以数营拨归第一师后，而川北尚足一师之数，可以见当日之兵数也。此四个月中，兵数极多事变复杂，所需经常军费、招集费、编练费、设备费、遣散费、补发欠饷费、恩饷费及其他之临时费共去六十余万元，虽均由第三师领支，而鄙人目击情形，无一不实归实用，不然以如此剧变，而川北二十余属闻阎无恐、鸡犬不惊，则其保全者亦已大矣。西南起义以来，用过经费号称千万，即萧君在大竹一县，据闻所用亦数十万，乃竟于川北二十余县之保全必要经费六十余万一概抹煞，此由于不审当时实在情形而致误者一也。又三师军费及临时费自五年九月以后，每月预算共十三万数千元，有钟师长呈报督署之正式预报及饷薪表可证。至罗督军之仅准拨给八万元者，盖由敌视川军故意克减兵额，并将其特科军饷一概削除以薄川军而自厚其势，遂激成五师长联名反抗之举。如当时照其批准数目实支，不特川中各师有不能成军之势，而饥兵哗溃，又将糜烂地方，故当时不得已仍照实数拨给，直接以顾全川军，即间接以保持秩序，此中不得已情形计，为全省人所共谅。至当日联名通电之各师长，尤当深悉其苦衷。试查当日各师，曾有一照罗督批准之数目给发者否，即可以知当日之实在情形也。且罗督办理不善，五师长联名陈诉之电，中央并未不以为然，则川北之照实数拨给，即不得指为违令。执事乃仅据罗督批准之案，遂以为违令吞握之证，此由于仅

据不完全之案档而致误者二也。至三师五年九月以前所用各款，在罗督与川军水火后虽故意刁难克减数目，犹不能不承认有此用项。而执事则举九月以前之事一概抹煞，其考核之不精，则犹不待辩也。总之，川北款项各有正当用途，各有确实取据。当黄前厅长奉戴省长训令转咨来道时，正预备与财政厅结算，以清繆竭，而省城战祸猝发，兵事延长，遂致搁置，拟俟川中有正式任命之大吏时即当归办交代，和盘托出。即钟师长用出细数亦当由该师详细造报，事关国家财政，人民膏血，断不受无端之诬毁也。鄙人平生日无一长，惟不贪财一节，差堪自信。执事今乃以为吞握巨款，呈请缉封。鄙人家产，所值不过千金，既处公等权力之下，祇有惟命是听。南北统一，川局平静，鄙人当自归，亦无劳通缉也。

注 释：

〔1〕熊克武（1884—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早年留学日本东斌学校，曾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历任四川军政府第五师师长，重庆镇守史、川边镇守史、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川滇护国联军总司令。护法战争中，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1949年策动川西起义，迎接解放，建国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2〕肖德明（1880—1946）字静轩，四川大竹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被推举为国会议员。在护国战争中，任护国军川东总司令。1918年任四川财政厅厅长。

〔3〕顺渝 即南充、重庆。

答梁乔山先生书

(1919年4月28日)

〔上略〕数年以来，常觉人类之至不平等者，莫如以少数人垄断权利，而役大多数人如牛马，鞭笞割剥，日取其骨髓膏血以供其淫奢逸乐之资，而视为当然。若以为智识阶级之故，大多数人何以缺乏于智识。此其咎固不在彼，而不能不责此少数号称有智识自居上流之人，未尝实施其普及之教育也。去岁至京，颇闻人言社会主义，欲一知其底蕴而苦于无书可读，刘南陵君谓英文书中多有之，又不能读，以此恒用怅惘。先生乃一旦示之以正鹄，导之以条理，牖启愚蒙，正如行五里雾中，忽得晨曦之照射，快何如也。

窃意吾国社会革命之祸，为时必非甚远。吾国产业犹未发达，尚无大资本家之肆虐，诚较欧美为幸。然频年变乱，地万不宁，百业凋弊，民众生计之窘苦十倍于欧美工人，此足以促起社会之革命者一也。俭朴自足，则鲜生争心。近来奢靡之风日盛，渐由

• 原载《晨报》1919年4月28日“自由论坛”栏。时张澜任《晨报》常务董事。是月25日，梁乔山（湖南人，生平不详）在《晨报》发表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张澜以此文作答。他事后曾回忆说：“民国八年在北京时与湖南梁乔山晤谈，彼告我以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我遂写文一篇登于《晨报》，友人邵明叔见之，仓皇来微我，归：‘表方，你又来放火’。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

都邑商埠施于乡僻，消耗既大，物价益昂，个人经济恒不足供其费用，此足以促起社会之革命者又一也。欧美财产阶级悬殊，致起社会之不平。然其政治良善，尚足缓和一部分不平之心。吾国新起之资本家，无一非政治当局，资本与政治合而为一。民众既对于政治之恶劣而积怨毒，更对于财产阶级而生其不平，此足以促起社会之革命者又一也。国中游民繁滋，一部分化而为兵，一部分流而为匪，扰乱治安为害甚酷，非亟发展实业，不足以安置游民，已成普通之论，而亦当轴者之所稔知。故民生主义，亦尝见于某巨公之煌煌大文，然一察其实，则今之兴办实业者，盖可名之为贵族实业，强权实业，其实无与于民众，不惟不求所以利民，而反夺民之利，此足以促起社会之革命者又一也。夫果真能以社会主义而为社会革命，忍须臾之痛，能得长久之安，虽痛亦何害。

为今之计，政府所执之政策，应急倾注于社会方面，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毋使不均。并须速求教育之普及，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自由发展。而先知先觉诸人，则将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著为书报，发为演说，介绍于我国民，使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非同于强盗土匪之掠夺。盖必先求避去无意识之社会革命，使社会秩序不至大破坏。而民众之智识足以赴其途，则公平正确之社会主义自可徐见于事实。今之执政诸人能否如吾所云去其官僚政治敷衍之积习，及其营私网利之心，而为民众谋福利，应不待智者而后知，而此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何法能使输入于国民之脑海。而企图秩序之进行，则先知先觉诸人不能不速负其责任。要之恶社会主义之名而欲加以遏绝，堙洪水者徒增滔天之祸，羨社会主义之善，而欲骤见实行，揠苗长者必有立槁之忧，斯则鄙人所为鰥鰥致虑者也。

附 录：

梁乔山先生致某君书

(1919年4月25日)

(上略) 今日之所谓社会主义，其制有二：一曰无政府主义，即三无二有主义。三无者，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二有者，各尽其力，各取所需。某尝谓人为一种喜竞争，好安逸之动物，假使毫无国家与社会之制裁，而欲其免此二者之弊，尚待研究。是故此种主义，能否有实现之一日，尚在不可知之数。如必欲实现此主义必先问民德至如何程度，方可望此主义之实现，此实一重要之问题，某于此敢下一断语，以为实现此主义之标准，即露积其财货而无人窃取，与美女同宿而不起淫心，能如是则此主义有实现之日矣。否则恐徒乱社会之秩序，率天下为禽兽而已矣。一曰国家社会主义。此主义数年前某每以口头倡导之，其大要即以国家为资本者，以民众为劳动者。所谓以民众共同生产者，仍以民众共同消费之，极端排除其独占，而求其生活之平均，即总统与车夫，其所取于国家者，恐亦不甚相远。且权利既为国家所公

• 原载《晨报》1919年4月25日“自由论坛”栏。

有，则义务亦为国家所共担，如病院学校养老育儿等事，均国家所当公任其劳，无可疑者矣。此主义之公明正大，已为吾人所深倾服矣。吾人所应研究者，在其进行之方法，及私产之制限，是为必要耳。

窃尝思之，欲达此主义之目的，由君主政治而达之，或由共和政治而达之，初无难易之区分。惟以财产论，私产制最发达之国，其达此也难。反之则稍易。以知能论，其民众之知能完备而普及者易反之则甚难。吾国私产制之范围极小，而大工场大实业尚未创始之际，无须经社会革命，直以国家一种政策达之可也，此其较易于欧美各国者也。然民智榛狉，不知此主义之公平正确，或误解而生嫉妒，致与拥有私产者为难，而或肆行其掠夺杀戮之惨，且毫无知能，不能自食其力者占十之七八，此其较难于欧美各国万万者也。且军阀财阀，互为梗阻，欲此主义之实现也更难。是故吾人于此最难解决者，即国家之法律如何能生效力，而使民治主义，迅速实现，及民众之知能如何能使普及。某谓此系一治标治本之问题，铲除军阀刷新政治治标也，图强迫教育之普及治本也。由标而本，事实一贯，无所用其更张纷扰也。惟实行此主义之时，有应先决之问题数端，亦极待斟酌者也。一、国内财阀用何法吸收其财产，使与贫民稍有平均之倾向。二、私产制最低限度之规定。三、家族制之破除（兹之所谓家族与民法上之所谓家族异，民法上之家族，指六亲等言之，此指宗法社会言也）。四、废除财产承袭制。凡此皆应先决者也。迨此主义实行之后，生产与消费之供需适合，民众生活之苦乐□□，劳心劳力之苦乐平均，皆须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求之，盖非于平时研究有素者，必不能得社会精密之观察，则将来措施必难免谬误。

某以为欲生产消费之供需适合，必先有精密之人口统计。生产与消费之精密统计，方能使财货之供给适合乎人口之需要，盖旧经济学上之供需竞争，自国家社会主义实行，必完全打破而改用平均分配，财货过供则必致委弃而徒耗人工，过少则不足应民众之需要，是则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之急须研究者也。欲窥测民众生活之苦乐实现，则地理气候之比较，各地生产与业务之比较，及民众嗜好之特性考察，是则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之急待研究者也。若夫求劳心劳力之苦乐平均，则劳心劳力之生理研究，及各种业务之劳逸比较，而生理学及各种科学又不可不知其大概者也。而其尤要者，吾人须以身作则，自居于劳动者之地位，每日除劳心外，必执行劳力之业务。托尔斯太〔1〕判一日间之理想生活为四分，以一分为智的及想象的活动，以一分与他人交际，其余一分筋肉及手指活动。吾辈即不能如此，然平日须人为吾衣食起居之服务者，改而躬亲其事，亦无不可者云云。

注 释：

〔1〕托尔斯太 今通译托尔斯泰。

为李霖、杨械赴法事致沈仲俊函

(1919年6月12日)

仲俊〔1〕先生执事：

川省学生李霖、杨械有志赴法勤工俭学。据京中华法教育会所规定，到法后待工费每人应预备四千佛郎。李霖、杨械各由家中筹备一千佛郎，由省款津贴该生等各二千佛郎。前日已函谓华法教育会通知尊处，计达左右。惟顷接该生来函云，因川乱，家款无法兑出，恳请向尊处保证，该生等家中将来必能筹汇一千佛郎到法，作为待工费用。而请予先行介绍买船票赴法。查该生等所言尚属实在情形，敬恳执事俯念该生等滞沪日久，先为介绍买船票，俾得于此次法船开时赴法。所应有筹之一千佛郎，将来该生等父母必能如数筹汇，不至使贵会在法发生困难。

执事乐育青年，素所钦仰，特此代陈，即希荃鉴，敬叩道佳不一。

弟张 澜再拜

六月十二日

注 释：

〔1〕沈仲俊 即沈梁，时在北京华法教育会供职。

• 据《顺沪起义》（中共南充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时张澜任四川省省长，在京述职。

与熊克武论四川自治书

(1920年)

熊锦帆先生执事：

梗〔¹〕电敬悉。远承唁慰，至感。并辱以川事善后见询，澜数年在外，川中情事，不甚了悉。此次奔丧归来，乡居偏僻，外间消息，隔绝无闻，川中近况，尤为茫昧。善后之件究竟应如何，未敢妄答，备承明问，亦不敢匿其所知，致辜雅意。川省迭次祸乱，无一非受北政府影响，故欲解决川事，必先明瞭大局情形。年来南北之争，变为徐世昌派与段祺瑞派之争，岑、陆联徐，孙、唐联段，南方势力已随北方为转移。陈炯明得浙、闽之助而攻取广东，积之回川而滇、黔军迅退出境，其明征也。秋间直皖战争，段派在京势力虽被铲除，而西北之川、陕、甘三督，东南之浙、闽二督，湖北之张、吴旧部，安徽之倪氏旧部，皆段派势力之所在，其欲报徐世昌之心，未尝一日忘。段氏新败，暂屈以待时机，有隙可乘，战乱必起，乃徐、段两派将来之战争也。徐世昌倚张作霖、张勋为左右臂，一味助长其势力，张作霖现据有东三省察哈尔地盘，又以重兵屯驻北京，野心实为不小。直皖战后，奉直已有意见。直军势力全在吴佩孚，吴氏主张民治，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三辑刊印。原文无日期，据考此文写于1920年张澜奔丧回川后。

废督裁兵。其所抱主义，与张作霖极端相反，并与徐世昌之官僚政治不相容。段派又从中挑拨，窃料奉直之战，如南方无争，则其为期必非甚远。此张作霖与吴佩孚将军之战争也。北京政府年来为亡清之滥官僚、洪宪余孽、复辟罪魁所盘踞，而二三武人相把持，藉其大权，违法乱政，民心尽失，而于威信扫地无遗。总统命令，非得督军同意，则其效力不能出于京门。总理组阁，非有数省督军拥护，无论贤否，皆不能登台，政府根基脆弱之极。而民治之说日张，群众亦多觉悟，人民自决、省区自治之潮流，勃不可遏。窃计不出三年，中国必将起政治革命之大变。此军阀官僚之政府与人民将来之战争也。

大局情形，既如上述。回顾川省，则滇、黔军虽已出境，而某军、某师、某旅、某支队，仍然为破碎乖离之割据。就现在形势观之，无论谁为督军，皆不能收拾川局。其故有三：（一）川军势力显分两派，以川军年来之活动，朝方从甲，而夕已就乙，今日事乙，而明日又归丙，欲收拾川局，必先收束军队。两派对峙，逃墨归杨，欲加收束，势必不能。（二）川军名虽二十余帅，实力无不单薄，而且各怀意见，内情乖离。无论谁为督军，其确实可靠之军队，皆属无多，不足以心膂而制裁一切。（三）川省军人欲望过于发达，往往才任团长，更想做旅长，才任旅长，更想做师长，才任师长，更想做督军。人怀觊觎之心，各自扩充其势力。为督军者，实力单薄，不足以相制裁。于是只有敷衍迁就，一听其所为。夫川军情势既如此，而大局之危险又如彼，乃今之谋川事者，无非欲定某人为督军，某人为省长已耳。其为督军省长者，又无非欲结援于北政府某要人以图自固已耳。无论川局纷乱难于收拾，即使各师旅勉强就范，地方苟且相安，一朝大

局变动，则川省必受其影响，而乱事立起。故就鄙见言之，不求根本解决之法，而徒争督军，又徒倚赖北政府，皆不能为川人造福，而亦非其个人之利者也。

所谓根本解决者何？即四川为独立自治省，废督裁兵，实行民治是也。盖四川为独立的自治省，则无论或南或北，或徐或段，两派再有若何之事，不致牵连受祸。废督军，则内争之目标失。裁兵，则民困可以渐苏。实行民治，则地方实业既可发展，尤不受全国政治革命影响而复起变乱。若有致疑于鄙言之不能实行者，试问此次重庆会议不曰督军省长，而改称四川军政总长、民政总长，是否含有独立意味？况中国统一，早为北政府所破坏，川省自治，理极正当。予见数月以来，或称督军，或称川军总司令，或称兼总司令，其权力所及，皆不过直接所部少数之军队，是否尚有四川督军之可言？又况民治之说日张，督军岂能长久存在？至于实行民治，今日断无不可能之疑难，且不急行民治，则主张社会主义之过激者，必将起而先之，地方将不免愈增扰乱。故与其拖泥带水，贻误川局，何如快刀斩乱麻，使所谓繆葛纠纷一齐立解也。

执事心地光明，治军识大体，尤素爱护地方人民，鄙人夙所钦佩。今后如能训练所辖各师长，使凡官兵皆知我亦是人民，而成为扶助民治之军队，则民治之基础既赖以固。其军队为有主义之团体，方可以靖乱克敌，而不至再有骚扰之事与夫叛变之虞。此时则宜一面联合川军将领之同志者，通电全国，主张川省废除督军，民选省长，实行地方自治。一面督率所辖各师旅，为地方清匪安民，就其力之所能及者先行之。如此则一朝名震于全国，川人亦无不归心，不徒扩张势力于军队而必求其拥于人民，不争

督军省长暂时之虚名，而务为将来收拾川局实行之准备，执事其亦以鄙言为然乎？率意乱书，罔识忌讳，幸维亮恕。张澜再拜。

注 释：

〔1〕梗 即23日。

主张裁兵电

(1921年4月16日)

[衔略] 钩鉴：今日欲言善后，其先决问题，首在裁兵。川北三年以来，军队之搜括财产，除正副税外，有所谓预征，而到时不准抵纳者；有所谓款垫，而从未见归还者；有所谓有奖储蓄券、有奖公债等；变名巧取，而实强夺者；有估提附加税项，使地方各行政停废者；有变卖官产公产，并定高价勒人承买者；有变卖常社各仓库积谷等，使数百年备荒储蓄，裁尽一空者；有临时勒筹军饷，每次数十万或数万，每年十数次或数次者；有藉端勒索，倾人之家，逼人至死者；有强种烟苗，先征重税，一县逼纳至百余万者；有所谓亩捐、门户捐、粮秣捐，并不分别贫富，而只令按亩按户出银者。其他种种刮钱之法，更为难数。此其非正式军队而为匪也。乃匪去兵来，费仍不可已。今日方来一令，饬筹八万，明日又来一令，饬筹十万。一县之地，数师之军队争驻，一日之税，数师之委员争提。驻在本地之旅团营长尚未取足，而在远之军长师长又复严征。近又于遂宁征局成立川北筹饷处，十年、十一年等粮税已经预征抵垫者，作为悬案，乃从三月一号起，重征十年粮税。养兵不清乡，又令各县加筹清乡费，以川北最瘠之区，犹尚如此，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三辑。1921年4月1日，“全川自治联合会”在重庆成立，张澜对此极为支持，遂与川北24县代表召开“川北善后会议”，张澜被推为会长，卢廷栋任副会长。

则其他道可知。川北现驻有良好之军队，因兵多之故，尚犹不免如此，则其他道更可知。然则征敛之重，由于兵多，非实行裁兵，人民断难苏息。查半年以来，全川军队多至二十余师。日言裁兵，实则裁人之兵而增己之兵。日言禁止招匪，实则附我者即不认为匪。日言自治，实则只见军治而不让人民以自治。公民等只有呼天，忍无可忍，今以苦口敬为吾川最亲爱最名誉之军人，作最后之忠告，务恳矜此子遗，各就所部，即日切实裁汰，至多留五师左右，或先尽快以枪为标准，以符前日宣言裁兵之本意。若仍拥众自大，以人民之生命财产供军队之刀俎鱼肉，是军队既不以人民为人民，则人民固不当以军队为军队。自今以后，不惟一切估派勒捐之款，概不承认，即我人民应纳一切粮税，久已预征，勒取无余，当然不能重纳，即将来扣还清楚时，亦各截留各县各乡，以为振兴团练之用，必俟军队裁减之后，始能继续完纳。此言既出，誓必实践。今再为我地方父老兄弟告，军队之向地方勒筹款项者，以我人民散漫，愚弱而无抵抗力，故得以饥兵哗变相恐吓耳。试问今日不变之兵，其横征重敛，人民所受之损失，究与变兵之扰害地方者何异。人民长此柔弱，将皆不知死所也。今日惟有不裁兵则不纳粮税，以促起军人之警悟，而激发其天良。养兵本以卫民，至兵为民害，则弃绝之而不之养，于理至为正当。以袁世凯、段祺瑞权力之大、挟兵之多，一朝人心不附，立见败亡，则川中军人，更何能长作武力万能之迷梦。愿我地方父老兄弟群起而实行此言，则前途尚有一线之生机也。川北善后会议二十四县代表张澜、卢廷栋^[1]等数十人同叩。

注 释：

[1] 卢廷栋 字子鹤，张澜好友。曾任嘉陵通尹，时为川北善后会议副会长。

主张裁兵以维护教育经费电[•]

(1922年6月29日)

〔衔略〕钧鉴：川省教育，年来以经费不定之故，屡频破产。此次刘兼省长〔1〕，划拨全省肉税，作为教育经费，俾其独立，本甚正当。乃省议员暨各军师旅，多有因肉税现充军饷，复主张改拨盐款作为教育经费，款虽不同，其赞成教育经费独立之心固无二致。乃因肉税、盐款之争执，始而酿成学界与省议会之冲突；继而酿成学界与军人之冲突，风潮激荡，前途步步危险。鄙意以盐款作省教育经费，实不如肉税之确定而能永久。缘盐款系国税，南北统一，国税自当收归中央。如以盐款作省教育经费，则南北统一之日，即为吾川教育根本动摇之时，此理之明，无庸繁赘。惟各军师旅，兵多饷绌，亦系实情。读刘甫澄先生号电，谓其任内总部所拨自井盐税，计共岁入五百余万元，曾经填还；前各军联合办事处用款一百八十万元，又支给援鄂军临时战费，及拨陕军陈总司令等费云云。查自井盐税，岁入五百余万元，现在刘总司令已经辞职，以后便无填还。各军联合办事处用款，以及援鄂援陕等等费用，则尽可将盐款划拨与肉税相当之数，分配各军，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三期。张澜在南充发此通电，声援四川教育界倡导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使无饷绌之虞。而以肉税作教育经费仍遵刘兼省长前令作为定案。各军师旅即行令饬防区各征收局，限日将肉税交出，由劝学所收解，则教育经费既得稳定，而目前一切纠纷亦可立解矣。再有进者，川中兵满为患，民不聊生，凡百事业，皆遭阻废，故今日之四川，非裁兵则一事不能就理。迁延酝酿，祸患终有爆发而不收拾之一日。军事当局诸公，不乏明达，尚望瞻顾前后，实行裁兵，兵少则饷易足，将领之忧危可释，人民之痛苦亦苏，更何至对此本具同情之教育经费，辄生争执。至省议会暨教育界诸先生，尤应知教育经费之生障碍，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兵多。苟能大众一心，奋起而督促各军师旅实行裁汰，则教育经费之独立，宁生问题？惟教育经费之争，已觉其难终恃，而况省议会与教育界，乃先自为敌也。敬请诸先生消失误会，一致进行。兵诚能裁，川庶有豸。以上所陈，未知当否，伏候尊裁，并颂时祉！张澜叩。艳。

注 释：

〔1〕刘兼省长 指刘湘。

致袁诗堯

(1922年7月3日)

诗堯〔1〕先生，呈下所嘱之件，勉强成篇，请大加修改，能请人另作尤善。下期开学为时不远。务祈就近催同东之、秘书、啸谷、世泽、尔康、孝长诸先生早日到校，以免临时悬望为感为荷。专此敬颂，旅安！

张澜再拜

7月3日

注 释：

〔1〕袁诗堯（1897—1928） 四川盐亭人，五四运动后曾在成都办《四川学生潮》、《新四川旬报》宣传新思想，时应张澜聘请在南充中学任教。192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成都“二·一六”惨案中牺牲。

* 据《顺泸起义》（中共南充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为成渝备战谣传致

杨森^[1] 刘湘^[2] 邓锡侯^[3]

赖心辉^[4] 电

(1924年11月14日)

成都杨督理并请转大邑刘甫澄督办、内江赖德祥师长、重庆邓省长钧鉴：数月以来，常有成渝两军准备作战之谣传。此次大局变动，我川难免不受影响。人民既未堪再受荼毒，各军转战频年，亦应厌苦。环念收拾川局，自有途径，凭恃武力，为能扫除异己，终必失败。前年二军摧挫，昨年锦帆溃亡，殷鉴非远。假使今兹再起战事，徒益纷乱，以后更无办法。联乙倒甲，甲倒而乙又成敌，祸乱相循，已亦奚利？澜以为诸兄今日实为川局安危所系之人，急宜约定地点时间，会面协商，矢忠川局，尽泯诈虞，力遏目前之战机，共筹善后之良策。欲纾川难，首宜客军各回原省，次即实行裁兵，裁兵当从诸兄所部始。诸兄能开诚合作，则重心立成，召集各师旅长官及人民代表，定一裁兵公约。诸兄能先裁所部，其他师旅谁敢不遵？客军出境，川军大裁，民政财政，次第整理，方有统一可期，自治可言。甚望诸兄能弭川乱，安川民，以树不朽之功德。个人权利地位，浮云泡幻，何足竞争。佳兵不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三辑。

祥，民言可畏。诸兄高明，自早见及。掬悃陈词，敬希垂察。张澜叩。寒〔5〕。

注 释：

〔1〕杨森（1884—1977） 四川广安人，字子惠。1909年在四川陆军学堂毕业。民国成立后，曾任护国军第一军总部参谋、川军第二军军长、国民革命第二十军军长。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保卫上海之战，后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以后又改任贵州省主席、重庆市市长。1949年去台湾。

〔2〕刘湘（1889—1938） 四川大邑人，字甫澄。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18年任川军第二师师长。提出“四川自治”的主张。1925年出任四川善后督办，1934年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西安事变时，曾通电支持张学良、杨虎城。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国民政府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1月在汉口病逝。

〔3〕邓锡侯（1889—1964） 字晋康，四川营山人。1909年夏由四川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1924年被北洋政府委为第三十师师长、四川省长。1926年12月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八军军长。抗日战争中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1947年任四川省主席，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起义。建国后，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

〔4〕赖心辉（1884—1942） 字德祥，四川三台人。曾任边防军司令，1925年2月北京政府任命他为四川省长。

〔5〕寒 即14日。

南充之实业自治

(1924年)

南充在川省州县中，特立的实行地方自治已经有了三年。因为国民学校有四百四、五十校，模范国民学校有四十余校，高等小学有十一校，男女中学各一校，规模并且很大，大家就说南充自治全是注重教育，只有教育算是发达以外，就无甚可观了。其实不如是，南充近几年来的教育，不能不说 是进步。但是，南充教育的根本计划，不专是注重教育，实在是倾向实业，是要把教育的基础建筑在实业上面。要使一般人的富力增加，才可以求教育的普及，地方自治事业也才有钱有人去办。所以，南充的教育可以说是实业的教育。因而南充的自治，也就是实业的自治。

今当首先说明，南充自治所以注重实业的原因：（1）鉴于中国历史上的盗贼大乱，靡不起于生计困穷。民国以来，地方上无数良民与夫俊秀之士，未久即变而为土匪、为军人、为流氓式的政客，为豕彘式的枝官末员，悉其心志筋骨，徒供二三豪强奸溺，有权力者之驱使，不惮为之牺牲，纷纷扰扰，迄无宁岁。推求其所以然，亦无非为生计所窘，受饥冻贫乏的驱迫。故非注重实业，使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则祸乱将无已时。（2）地方自治事业无论兴办何项，皆非有款不行，且非财力充裕不行，因陋就

• 据手稿刊印。

简的办法，终无成效可期。南通自治能够冠于全国，良由他的实业发达，有雄厚的财力，足以兴办各项事业。南充土地偏瘠，除东路产米稍多，人户较为殷实外，西北两路多山田少，食常不给，又无大宗特产足以卖入巨资，要兴办地方事业，筹款的方法最大的不是加抽契底，就是附征亩捐，款有限而怨易滋，在这样财力薄的地方来办自治，终不能有所发展为积极的进行。故非注重实业，使地方富力增加，则款项无法筹集，自治不过是徒挂招牌。

(3) 前此中小学校授之普通科学，专为升学的准备。苟使小学毕业后不能再入中学校，中学毕业后不能再入专门学校，则其所学殆全归于无用。所谓学生者，亦遂成为废材，为商不能，学工不可，除勉强充当小学教师外，大多数流为无业游手之人，甚而不是杂入匪徒，即去缘附军队以求生活。故现今的教育，尤其非注重实业不可了，使多数青年得有谋生的智识与技能，否则地方智识阶级以后将悉变为游民，社会愈益不得安静。

根据上述之三因，南充的自治所以必要注重实业，南充的教育也就不能不倾向实业。近两年来，关于实业的计划与进行要考查南充的实业，当分实业所与中学校之二部。南充多山地，颇宜于栽种桐树。川省桐油为出口大宗，价值甚贵，实业所曾经极力提倡，并于城外官山荒土先行种植。惟以人户稠密，柴草缺乏，桐苗容易为人畜所摧残，一时不能见效。县中西南两路的人，向来多半养蚕，近年东北两路的人亦转于仿效。养蚕缫丝的劳力费时不多，所获的利益比较别项产物独厚。南充地上又最宜于种桑。详细考查南充的出产，只有蚕丝业可望发达。因此，实业所首先从推广桑株入手，函请各乡场农会就附近地方租地来作苗圃，专于培养桑苗，俟长成时用极低廉的价发售与该场农人，款项不

足就由实业所设法补助，并且播种接条的时候，也由实业所分派技手前往各处苗圃指导，一切帮同经理。开办的头一年，已有四十几场把苗圃办成，桑苗的发育都很茂盛。实业所又因乡间养蚕人家的蚕种不良，容易受病，就认真检查蚕种。又因此前的缫车不合式，做了百十架新式缫车，发交各乡场，叫他们照样改良。又因有许多人户把丝缫不好，复计划组织代缫处，并拟倡办售丝协会，以期便利一般养蚕的人。这就是实业所两年来所办理的情形。同时，中学校方面也大大地改变从前教育方针。因为南充农蚕业指导人材的缺乏，遂于十一年春季特开农业班，使他们得着农蚕业较高的学识和技术，将来在社会上去作农蚕业的指导者。又因南充产丝渐多，机房墨守旧习，以致丝织物不能畅销，后于十二年春季特开工业班，注重染织，准备将来改良机织业旧有之贫民教养。工厂亦后增筹款项，极力整顿，派人到杭州染织工厂学习并购入新式铁机，期与学校取联络。县中原有乙种实业学校，所授的专是蚕业，历来学生虽不少，但是教的程度很浅。将就养蚕所出的茧子来学缫丝，因为茧少，缫的时间很短，技术亦遂不能精熟。现在南充城内的丝厂将近十所，乡间亦往往有集合资本收茧缫丝的人。他们又是纯用工徒，因此缫出的丝大率粗糙，运到上海销售价值常比他处厂丝为低。据此情形，目前急切应该讲求的就是制丝法的改进。今年冬间既议决实业学校并入中学职业部办理，以后办法决定逐年开一两年毕业的蚕业速成班，为社会上广造有栽桑养蚕缫丝的普通智识和技能的人。更于十三年春季特别开一蚕丝班，四年毕业，注重制丝，造成精良技术，为地方丝业界储备专门技师，以求制丝的改良进步。因鉴于此前实业学校的学生缫丝时间太短的缺点，所以中学校又决定明年在职业部附设一模范

丝厂，收茧缫丝，使学生得以充分实习，免致成绩不良。这就是中学校两年来所办的关于实业的情形。总前所述，南充实业的计划虽有种种，其实专在发展蚕丝业。至其对于蚕丝业的进行，简括言之，就是以实业所努力图全县生产量的增加，以中学校极力为蚕丝业人才之养成。

吾人对于县中实业，苟依此计划不断的进行，预期十年以后，南充全境将无地不见有桑，无户不事养蚕，制丝的精良在本国中最低限也当与杭产比并，南充俨然成为蚕丝业的著名产区。其时地方富力增加，从前贫苦小户无有不充裕的，家里的儿童都有力量去进学校，教育可以普及了。因为地方富力增加，筹款也很容易，学校由中学更进而设立专门学校，并且旁及育哑学校，宏大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均渐次成立。其他地方应办的事业，亦无不一一兴办，臻于完善。南充自治到了这个时候，才算是有成效可言。记得前年有一位朋友闻我在南充办自治，就写信来恭维我说是南充将来一定可以与南通媲美。我下细一想，他的话如其不是滑稽，就是不明白南充的情形，尤其不明白南通的情形。张季直⁽¹⁾在南通经营实业已经有了三十多年，南通的实业在中国要占第一位，因为他有钱，所以南通的自治才办得异常的好。像现在的南充拿什么来与南通比？但是南充人已经知道办地方自治是必要注重实业的了。从今发大心愿，努力前进，长江浩浩始于滥觞，南充将来一定可与南通媲美的。一句话，谁人能够阻止他的实现呢！

注 释：

[1] 张季直（1853—1926）即张謇，江苏南通人，1895年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后又办垦牧公司、轮船公司、面粉公司、铁冶公司、实业银行等，还举办了一些教育文化事业，把实业、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

为根本解决川事办法电

(1925年5月25日)

〔衡略〕钧鉴：顷闻省军、联军^[1]双方均已停战，消息传来，咸庆更生，澜独不无过虑。川人非有彻底觉悟，川事不求根本办法，即云停战，不过休息一时耳。川祸相寻，实由人民对于每次战后川事之处理，从无意见参加。从前战后，必有一度会议，然列席者皆为军人，争位置，划防地，等于分赃，稍不满意，即酿成第二次战祸。战祸迁延，无力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北京政府。曹吴时代之汉厂买械，滥加官爵，执政府先后对川之轻率处置，徒长川乱，益难收拾。川事专听有命于执枪之军人及不悉川情之北京政府，人民咸蛰伏而无言，则祸乱安有止日。目前战事既停，亟宜由甫澄督办召集全川人民代表，每县各出一人，职业团体如成渝总商会、省教育会、农会、工会等酌推代表，及各军将领公开会议。（一）议定裁兵标准及办法。公推裁兵委员长认真执行。有不遵重者，则声罪致讨。其裁兵费用，即照澜前次宥电所陈办理。（二）议定军饷统筹办法，公推财政委员长执行，绝对废除防区制，不准自由征派。（三）从速组织制定省宪机关，赶于短期内将省宪完成，以后川事，悉依省宪进行，俾入轨道，并免受

• 原载《晨报》1925年6月10日。1925年，杨森为首的各军阀和刘湘为首的各军阀发生战争。

外方波动之害。（四）在省宪未完成以前，各师旅长地位，暂仍其旧，俟省宪完成后，即依照省宪办理。惟其所有部队，只许裁减，不准增添。以上所陈，窃认为解决川事之必要办法。当道诸公，咸抱救川之心，敢请对于鄙言以加以采纳。我全川父老昆弟诸姑姐妹痛苦已深，如不以鄙言为非，亦请起而共同主张，不达不止，主权在民，幸勿放弃。专此电达，不胜翘企。张澜叩。
径〔2〕印。

注 释：

〔1〕省军、联军 省军指杨森率领的部队；联军指刘湘率领的部队，其中有贵州军阀袁祖铭部。

〔2〕径 即25日。

对召开善后会议之主张电

(1925年9月9日)

〔衔略〕公鉴：目前川战已告结束，甫澄督办、德祥省长，皆亟亟为善后之图。报载：渝中由军民两长所组织之川事善后讨论会，其所决议之件，诚多可取。顾澜窃有不能已于言者。（一）于战事终了以后实行统一之前，中间以三个月为期，有所谓过渡费者，议决发行盐税公债八百万元。此八百万元之过渡费，究系作何用途，应请甫澄督办将过渡期间之办法明白宣布，使全川人民共见共闻，既可收集思广益之功，尤足杜滥用浮支之弊，并得以取一般人民之了解与信托，而减少募款之困难。往年发行此类公债或他项统筹之款，参差难得，所得者乃又多所变迁，于事鲜济，卒使政府与人民一同为之失望。况今之八百万元为数甚巨，民困已深，筹款匪易。在甫澄督办之意，此八百万元之过渡费，即将于此三月之中，用以实行统一，意至善美。然殷鉴不远，苟非确定此过渡费之用途，并明白宣布过渡期间之办法，诚恐此宗巨额难募，而尤难于集中之款一度告终，而统一仍然未达，后此更难乎为继，既违甫澄督办之初愿，复重累全川人民，则深为可忧者也。（二）善后会议，澜前此径电主张：一县推举一人，意在为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四辑。

大规模之全川会议，俾民隐尽达，民气发皇，以引起民众协进之精神与实用。军民两长，即可藉此而收拾纷乱破碎之局。乃川事后讨论会所议决之善后会议组织大纲，每道只选一人，徒鉴于国、省各会会员过多之患，而昧于今日时势之所需，则又不无失当者也。（三）澜前此径电主张从速制成省宪，诚以四川今日已成为无法可守之世界，暴力滋蔓，纪纲荡然，人民固饱受军人之摧残压抑。试问，由督办以及师、旅、团长，能有几人得免于其部下胁制与叛离？非速将省宪制成，则人民无所挟持以为保护及发展之具，当道亦何所依据以为统御之资。上下同苦，交受其害。此则深望握兵者之觉悟，对于省宪，毋生障碍或漠视，而切予以相当之扶助。吾侪人民，尤当奋起以图存，勿再因循自误，永陷悲境者也。以上所陈，胥关重要，切愿当道诸公暨我全川父老昆弟一为垂听而加察焉，则幸甚。张澜叩。佳〔1〕。印。

注 释：

〔1〕佳 9日。

致成大学生会

(1925年9月)

成大学生会诸君鉴：

易、周^[1]两君远道来迎，感愧无似。澜之不能来就贵校校长，已向两君具道其详。成大前途之利钝，全视乎经费增加之能否确定。甚愿诸君对于成高^[2]同学消除意气，委曲求全，一致为改大增加经费运动之合作。澜虽在远，亦必竭其绵薄以相助。但得成高改大，基础稳固，正无须强澜来任校长也。

张 澜

注 释：

[1] 易、周两君 指到南充恳请张澜就成都大学校长职的成大学生会代表 易光谦、周维权。

[2] 成高 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 据手稿。

致蔡松佛

(1925年9月)

松佛〔1〕先生大鉴：报载省署照会先生代理高师校长，瀕以衰病不能来，已再向省署辞。目前各校开学已久，而高师独有停搁之虞，敬请先生早就代职，以维现状，而利进行，不胜仰感之至。
专此。

注 释：

〔1〕蔡松佛 蔡锡保，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

• 据手稿。

致沈与白

(1925年9月)

与白⁽¹⁾先生足下：惠书奉悉。所谓庶政公之人民，期人民与政府合作，以制裁军阀之跋扈。当道苟真有此觉悟，川事尚不难于收拾。望常以此旨开陈于当道之前。高师校长，澜以精神衰减之故，不愿任此繁剧。矧其最难之问题，即为高师改办成大已成事实，而成大因增筹之款无着，遂为高师学生所反对，成高、成大之争，目前殊不易解决。四川非有大学不可，早为有识者所公认。我来办高师，而将成大取消，我绝不能冒此大不韪。我欲扶翼成大进行，又非当道允与指拨巨款不可。而当道尚无维持成大之表示。我本闲身，尤不愿陷此困境也。至四川今日万不能不建设大学，此为省长最大之责任。高师改办成大，已引其端，能为之增筹经费，使至于成立，其功德实在不小。澜与德祥一函，请足下阅后转陈，并希向德祥力为主张，指拨盐款。目前，虽若甚难，将来善后会议开后，军事必谋收束，大学经费自易。只要德祥决定方针，高师改办大学，其成功可立而俟也。足下为教育界名宿，对于此事，自应请努力赞助，以嘉惠后生。至于大学经费，庚款⁽²⁾非可常有，肉税系属省款而又不确定，仍以指拨盐款为最相宜，而极可靠，盖此事系国家百年大计也。

• 据手稿。

注 释：

〔1〕沈与白 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2〕庚款 即庚子赔款。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政府于次年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赔偿各国海关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多两。这笔赔款通称庚子赔款。后“退还”部分给中国用于教育。

致 赖 心 辉

(1925年9月)

德祥仁兄省长执事：

九月二十五日惠书及高师校长聘书均奉悉。敦促之殷，相待之隆，至深慚感。澜之不能任高师校长，实以民九^[1]在北京时，即得夜眠不能熟之病，至今未愈，精神逐日衰减。乡居静养，较为安适，一入城市，则不眠之苦顿增。高师责任艰大，成都人事繁杂，皆于病躯不宜。以此，高师校长一职，仍请另聘相当之人担任，俾利进行，非敢矫情，亦非有他意也。惟高师改办大学一节，澜于虞日代电，曾请指拨盐款五万元为经费。大示谓：“当与各首长协商后，再当奉告”。不拒刍言，具见谦衷。兹请再将高师改大情形之必要，一为详陈之。川省地方偏远，文化常逊于东南，非设大学不足以增高文化，早为有识者所公认。年来中学毕业者日多，留学省外各大学，一人一年至少非有五百元不足用。中产之家，其子弟皆有不能读书之叹。四川自立大学，则学生每年用费较少，而得以求高深之学问者，人数必多，于川省今后之文化与人才皆有极大之关系，此成都不可不办大学之必要情形也。高师改办成都大学，仿照南京高师改为东南大学，广东高

• 据手稿。1925年9月25日，四川省长公署以照会方式聘请张澜为成都高师校长，张澜旋致此函。

师改为广东大学之例，本无不合。去年傅振烈^[2]招收成大学生，又已成为事实，第因成大拟筹之款，至今无着，闻近遂发生成高，成大两部学生之争。此时只有增筹的款，依照南京高师改办东大之程序进行，则成高、成大学生争执之问题，自能解决。如只承认成高而不顾及成大，该校内部之争断不能止息，前途纷扰更多，省署终不能不负维持之责任。何如于此时因势利导，早使成大成立，文化既可以增高，纠纷亦不至再起，此高师不可不改大学之必要情形也。顾欲改办大学，必须先筹经费。成大经费，要以指拨盐款为最相宜。查前此成都高师，名为国立，实用省款，以视他省国立高师之用国款者，四川未免吃亏。此次国立成都高师改为国立成都大学，既经教育部门存案备查，即宜趁此时机将其经费确定为国款开支。盐款既为国税，此时又因军用而归入吾川当道之手。如能由执事及甫澄督办主持，于四川省军用之中，每月划拨五万元作为国立大学学款，在中央政府既无辞以拒绝，此后川军渐谋收束，于军费亦无妨碍之虞。俟至将来全国统一，盐税收归中央，而四川国立大学之款则已固定而不生动摇。执事身任省长，兴学为其当务之急，甫澄维持教育经费早为川人所钦。苟得执事协商甫澄，力为主张，则此百年之盛德大业，立见有成，尤堪不朽。至于目前军费艰窘，指拨五万元或有所难，但不妨每月暂拨二万元，五千元与成大，使之筹备进行一切，而以每月五万元定案，盖此系与中央争国款，非与川省争军费也。况乎军事收束，财政统筹，此项指拨之款，为数不多，自可节余，即不然向他方抵筹，亦属甚易。澜之所以再三渎者，以成都大学关系极巨，尤望执事入省之初政，有以发展四川之光华也。

高师校长函聘一件璧还。

再者，前月虞〔3〕日 澜曾有一代电致执事，请为成都大学每月指拨盐款五万元作经费。此电系由重庆川康督办署转陈，不知曾否登览？澜与成大无关系，特因四川省今后文化之重要，不能再有所陈，以成大之前途，惟执事能主宰其命运也。专此。

张 澜

注 释：

- 〔1〕民九 指民国九年，即1910年。
- 〔2〕傅振烈 四川江油人，1924年3月至1925年6月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 〔3〕虞 即7日。

在四川善后会议上的发言*

(1925年12月17日)

这一次善后会议开会已十天，议长选出已五天，一案未议，因政府提案未能交出关系。在自井会议时，总计各军枪支，至多不过十六七万支，现在凭空增到二十二三万支。自井会议提出的军政各费，总计仅二千八百万元，现在又凭空要三千八百万元。各首领在那里争多报谎，所以一时提不出案来。今天我们才来开谈话会，但是我们此次来开善后会议，先要明白善后会议的作用。善后会议的期间很短，要知道历年祸害四川的是军人，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苛捐勒派。我们的人民能够自卫的，就是民团。会议时间既是很短，如把千疮百孔的事件，一一提案，恐怕重要的事情反转忽略。应该把我们大家的精神集中在军政、财政、民团三种详加考究，此应请诸君注意者一。

川省这几年来，纲纪法律荡然无存。军民首长，既无术以统理；全川人民的权利，尤其无法保障。在最短期间，要制省宪万难办到。此时只有先由人民代表与政府协定一种公约，使政府执此以为统驭军民之资，我们人民亦即据此以保护权利、抵抗强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四辑。1925年秋，杨森为首的军阀同刘湘为首的军阀发生战争，秋，杨森失败。刘湘，赖心辉在社会公众舆论的迫使下，于12月初在成都召开有各县，各方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张澜以在野人士的身份出席。

暴。此应请诸君注意者二。

四川连年，人民受莫大的痛苦，全无办法，皆由全川人民莫有联络。甲县受害，乙县漠不相关，所以一般军人把我们一县一县的宰割。今天如其仅仅在会中提议案，结果不过一纸文章，断难生效。我们今天集合一百数十县受苦人民的代表在此开会，实在是最难得的机会，应该赶紧为一种大团结。团结什么？就是要团结全川舆论的力量和民团的力量，我们把这两种力量团结拢来，要是政府依照善后会议所议决的案件实行，人民就积极援助他，要是政府不依照善后会议所议决的案件实行，人民就要严峻地监督他。我前天遇见督、省^[1]两长，我说此次善后会议议决的案件，要请督、省两长首先实行，树立风声，川事收拾，必不甚难。彼时如有其他将领敢于违反此次议决案件，殃害人民者，即请督、省两长宣布其罪，明令讨伐，全川人民，必定联合舆论与民团两种力量起而相助。假使督、省两长不能实行，我们全川人民亦将联合起来，问督、省两长的罪。总之，收拾川局要我们全川人民大团结，拿一种力量来援助政府，监督政府，才能够生效。如其政府真不可望，全川人民也得要团结起来，自己找条生路。诸君要知道处今日的四川，人民必要具有革命的真精神，才能够逼迫政府上轨道，此应请诸君注意者三。

会议期间，转瞬即毕，要是不明白善后会议的作用，会议毕就要过年，大家散回家去，毫无效益，我们代表即是四川的罪人。刚才议长说当此善后会议期间，各处召募新兵的很多，我此次由县赴省，沿途皆遇着募兵委员，议长所说的实在不虚，我们应请刘督办严令禁止。但是目前应该立刻停止的，是兵工厂的造枪。兵工厂是酿成四川战祸之一大原因，人所共知，早就该停

废。况且现在要收束军事，拿裁兵的名义来要人民筹款，又拿裁兵的款去造增兵的枪，骗人以杀人，岂有此理！听说兵工厂已经由刘督办派员接收，应由善后会议咨请刘督办令饬兵工厂立刻实行停止造枪，先以表示刘督办收束军事的诚意。议长又说，各军在此善后会议期间，有好多处非法征派，突加数倍。据我所知道的，确有好多处，不过地方人民慑于军人之淫威，多不敢言。现在应由本会一面咨请督省两长，严令禁止各军一切苛捐勒派，一面就由本会立即发出一种宣言，通告全川人民，叫他们对于临时一切苛捐勒派一致起来反抗。要晓得专靠政府的命令，禁止那种带兵的人，是不肯听从的。只有叫人民一致起来反抗，把民气激发起来，军人的气焰自然可以压抑。我刚才不是说过人民要有革命的真精神，才能够逼迫政府上轨道吗？以上所说，是否可行，请大家讨论。

注 释：

〔1〕督省两长 指刘湘督办和赖心辉省长。

致何光烈^[1]•

(1925年)

前日杜君象谷^[2]来舍下，谈及执事现委杜君等办高级中学。夫高级中学在今日已为必不可缓之图。因各县纷纷成立初中，转瞬学生毕业，即无学校可进，若皆向成渝、省外等处留学高中，则生活程度逐年加高，远道留学用费不轻，恐此后川北之高中一级学生顿时减少。去年罗瑞麟任道尹时，吾兄提倡召集高中会议，彼时南充人士，无不热心奔走，亟望其成。旋因顺防事起，发生障碍；各县人士亦多怀挟私见，难期一致，事遂中辍。南充中学独自筹备开设高级班，而于合办高中之事，后此多不预闻，象谷极道吾兄具办高中之热忱，较去年尤为真切，果能使川北高级中学创造于吾兄之手，则文化可以增高，人才多所造就，大业不朽，其光荣实远胜于今日之长师、长军。即希催促象谷积极进行，俾早观成，无沴感盼。兹有请者，南充中学筹备开设高中班，因川北高级中学停顿未办，而由五师交出指定作为高中开办费之南充肉税，存在肉税经收处未解，所有十三年下半年应解之款，已由南充中学全数挪用。又十四年内肉税全数应解之款亦拟划拨半数留作南充中学开设高中班费用，而以半数解交兄部作为

• 据手稿。

川北高中开办费。如此，则南充中学所筹备之高中既可按期开班，吾兄所创办川北高中亦不碍其进行，一举而两高中皆观厥成，当亦为吾兄之所乐许。如蒙俯允，当再由学校具备正式公函，陈请备案。至省署方面，关于此项肉税拨用，亦当具文申请，以完手续。专此奉达，敬叩大安。

注 释：

〔1〕何光烈 时任赖心辉第五师师长，驻南充。

〔2〕杜象谷 曾多年在张澜身边从事秘书工作，建国后任四川参事室参事。

致邵从恩

(1925年)

[一]

明叔〔1〕三兄足下：

六日函奉悉。伯英〔2〕电所言自救自卫办法，直捷痛快，诚为根本要图。如使各县民团皆能如川西之彭县，川北之安岳，川东之合川、璧山等处，自可依其方案以求解决。但就目前情形而论，尚觉其远于事实。弟主张由甫澄召集军民公开会议者，以所议非仅军人一方面之事，亦非仅人民一方面之事，必双方同齐到会列席，事经大众议决，即当强制执行。出于当轴之召集，情势较为容易。甫澄节制川康，地位亦最相宜，故宥、泾两电〔3〕均如是主张，此系顾虑事实，非故为推崇政府也。当轴苟不能召集军民公开会议，则人民代表自应自行召集。各地痛苦皆深，得全川人民一度之结合，无论所议生效与否，将来必有最大之影响。至此次会议，弟所主张有应特别申明之点，即弟所蕲者为永久之和平，并非苟求一时一隅无有战事，敷衍迁就致复养痈，故根本不反对使用武力。特如年来，诸将私之争人权利而无名蛮

• 据手稿。

斗，荼毒人民，蹂躏地方，则为所极端反对者耳。川中各师、旅长，拥兵自雄，割据防地，磨牙吮血，充量发挥其恶性，以乱和平。诸公但知战时与战区人民所受之惨痛，备极不堪，不知非战时非战区之人民，其所受不堪之惨痛，有时间更久区域更广于战时与战区之人民者。即以北道而论，前月弟遣人赴各县调查荒情，据自某某保宁九县归来者详言，一般鸠形鹄面之人重压于烟捐、军粮捐、勒借、预征种种虐政之下，咸枉其苦痛而不敢呻吟。试一念此情形，吾民受祸之惨，宁独在战区与战时？然似某某九县者，全川正不知尚有若干？故弟主张军民代表公开会议，首先议定裁兵标准与办法，次即统筹军饷，绝对破除防区制，公推裁兵委员长，认真执行，有不遵从者则声罪致讨，人民亦即起而相助驱除。盖肆虐人民者既为一种强暴之武力，则有时非使用相当之武力不足以制止而戡之。今日苟有所谓汤武仁义之师，伐罪吊民，吾人民箪食壶浆，欢迎之不遑，固不吝惜暂时之牺牲也。所恨者，川中将领鲜具远识。如有能依弟所言，奉人民之使命，为定川之准则，军民相助，收拾川乱，不过数月可以见功，或可无待于用兵。即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对于众所共弃之军人，加以挞伐，止如秋风之扫败叶焉耳。如或蕲向和平，而但求一时一隅无有战事，遍地任其纵横，如伯英所诮，徒为分赃者捧场作脸而已。弟乡居养病，不能来渝，将来军民代表召开会议时，或当扶病一行，以备刍荒之询。此复，敬颂，太安。

〔二〕

明叔三兄足下：

九月十七日惠书奉悉。府上遭军队蹂躏，而令侄一铭得病竟以失治而死，令人愤惋无已。川中军人好乱乐祸，其行为比强盗凶恶数倍。为府上悲，更为战区无数颠连无告之人民痛也。川局收拾，如欲望诸目前，未免早计。据弟所知，下回破裂之根亦已潜伏。此时必须甫、晋、德三人〔3〕开诚携手，切实结合。先为彼此权利之协定，务使各得保其生存，而后召集善后会议，参加民意，并将督办、省长等权限划清，共同定一收拾川局之办法，逐渐实行，为苟且治标之计，亦未尝不可以挽救几分。弟曾本上意致函甫、晋、德，详为忠告，并派敝学生王君伯安往见彼等，并疏解其左右，未卜天心已厌乱否？至欲求真能善后之方，则扩张民团实力，使人民有以对抗军阀，而强其就范之具。速制省宪，使人民得有依据大法，以为保障自己与限制军阀之资。此二者外，实无良策。将来善后会议时，能设法使军人有所谅解，不生障碍，并能得其相当之助力，则善之又善者也。要之收拾川局，此时方在种因，其成功与否，视种因者之热心毅力何如耳。

注 释：

〔1〕明叔 邵从恩，四川青神人。曾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兼任政法大学教授，1923年因曹锟贿选登场，愤而辞职。1925年冬，任四川善后会议副会长。

〔2〕伯英 蒲殿俊（1875—1934）字伯英，四川广安人。光绪进士。1904年赴日本梅谦法政大学留学。1909年任四川省咨议局议长。1911年参加宪友会，为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武昌起义后获释，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出任都督，宣布四川独立，后因成都兵变下台。1911年应聘担任《晨报》主编。1934年病逝于北平。

〔3〕甫、晋、德 指刘湘、邓锡侯、赖心辉三人。

致成都高师学生会

(1925年)

诸弟惠函及高师学生会宣言均接悉。高师校长我以精神衰减之故，决不来就。然有不能不向诸弟言者，成高改办师大，我从前亦如是主张。惟自去年以来，改办成大已经成为事实，今日在校学生亟应消弭内讧，而一致请求当道增加经费，使四川得以建设大学。但使经费充足，且能独立，则师大所企图之目的，成大亦能达之。傅前校长改办成大，虽有可訾之处，成大学生要无错。成大学生即有不合之处，成大之在四川要当促其成立。年来成都各校以经费不足之故，几无进步可言。今日无论为国立高师，为国立师大，为国立成大，在校学生皆宜团结一致，以向政府争得国款开支，为最急切而重要。如其与成大学生日为内部之争，反失一大部分学生之助力，非计之得也。且已成事实之成大，尚可以不承认，则未成事实之师大，在今日四川政象之下，恐直无希望之可言。成高、成大两部学生能消除意气，而为改大增加经费运动之合作，斯诚学校之幸，亦诸君求学之利也。请以此意转告高师学生会诸君，对于鄙言愿其垂听而三思之，为幸。

张 澜

• 据手稿。

促袁祖铭撤兵回黔电

(1926年4月22日)

[衔略] 钩鉴：顷致袁鼎卿〔1〕督办一电，文曰：川民不堪战祸久矣，频年以来，无岁不战，无一战不与人民以莫大之痛苦，其创痛深巨之像，印入于脑海者甚深。故一闻战耗，举川中无上无下，无老无幼，无不惊心动魄，惴惴于祸至之无日与死亡之无所。人生至此，已大可哀。今者不幸，报章腾载，道路传闻，战衅将开又见告矣。此次事变，实以公为主因，解铃系铃，仍当于公取决，敢贡所陈，尚希垂鉴。去年善后会议，为川人死里求生唯一之穷途开幕之始，公莅会场，曾谓历次战后，毫无办法，循环辗转，至再至三。拔本塞源，贵会是望。是公亦深知此会关系之重也。不期会议未终，公遽率师东下，攀留不得，乘川省军民图治，措手不及之际，霹雳一声，占领渝城。然川人犹不敢仇公也。全川代表，婉词哀恳，乞求见怜，期为川人留一线之生路。乃电发之后，如石沉大海，置不答复。又善后会议，以军财两政为大端，川人以不胜负担之故，于川军各部经费，均有核减。而于公之每月四十万，不敢减少分毫。又以军额过多之故，无法给养，于川军各部军额，均有核减，而于公之军额，未敢过问，盖欲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四辑。张澜时任成都大学校长。

以区区愚忱，冀回公心，以求幸免于大祸。而公仍莫之省，惟日事厚集兵力，侵夺地盘，调贺龙之湘军入川境、令彭汉章率部出綦南，更倾全黔之兵以图川。自此以后，公以兵力占忠、丰，而川军退夔，万；公以兵力迫津、永，而川军退至内、隆；公以兵力攻泸州，而川军只据城自守，未敢以一矢加遗，以至让无可让，忍无可忍。设易地以观，公为川人，当此情形，应将何以自处？川人以减轻负担为急务，而川东财赋之区为公占领，致财政不能统筹；川人以裁减兵额为要图，而公方日肆增兵，日事备战；川人纵不欲增兵，亦何敢遽事裁减。此陷川人于无办法之地位者也。就川军而论，凡为军人，必有人格，为川省军人，尤必有省格。川军纵不如黔，然目击在黔黔军不许滇桂军入境一步，两两相较，岂能无情。即退一步言，川省军人纵不爱人格，不爱省格；黔军夺其食，而川军蒙其饥，火饷只有稀粥，军衣无不垢敝，群情愤激，怒不可支，此陷川军于无法之地位者。语云：“鹿死不择音，免急则走险”。此等情形，抱火厝薪，殆难为喻。设一旦制之不可，受之不能，战祸卒至，全川喋血，追原祸始，谁任其咎？闻公平昔政论，常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心，即就局部言，亦有巡阅三省之计。乃以川省区区一隅，已使之至于此极。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全国观听，其谓公何？以公明达，必宜自反，且事势变迁，稍纵即逝。曩者渝变初起，邓、田，刘诸调人，主张请公不必独占渝城，回复一月三十日以前之原状。彼时公如采纳，则此事已了矣。乃公不从，而时势一变。其次诸调人请公将政权交还川人，实行善后会议各案，彼时公如采纳，则此事已了矣。且可解释嫌怨，与公合作。乃公仍不从，而事势又一变。今则怨毒已深，骤难调协。且黔军侵入川省，为数不资，川民微论如何，

不能胜此重负，川军无论如何，不能忍饥待死。势非公出重庆，撤兵回黔，将所占一切民政、财政、用人、行政之权，完全交回川人，绝无办法。公能翻然出此，则川人鉴公悔祸之忱，对于黔军未尝不可与以相当之协助。比者，国民军与奉直两军交战，其首领鉴于环境之不利，又不忍糜烂人民以自毁其实力，全师而还，以副民望。明者远见于未然终不失大将风概，前车已覆，来轸方輶，孰得孰失，唯公图之。知我罪我，听之而已。等语。敬希一致主张，以弭川祸。无任企祷。四川善后会议张澜、邵从恩、叶茂林、罗纶叩。养。〔2〕

注 释：

〔1〕袁祖铭（1889—1927年） 字鼎卿，贵州安龙人。时任川黔边防督办。1926年2月，袁祖铭因与刘湘矛盾激化，武力独占重庆，后被刘湘、杨森等人驱逐出川。

〔2〕养 即22日。

致刘文辉^[1] 邓锡侯 辞成都大学校长函

(1928年2月19日)

敬启者：吾川之有大学，独后于全国各行省，而国立成都大学之设立，尤几经艰难困厄，而后始底于成。自成立迄今，为时不过数年，而学生至八百余人，科数至二十七班，海内外学成归国及本省耆宿之任讲席者，至七八十人，隐然为西南人文之所萃聚。澜前承川军各将领之推挽，受任于成大、成高纠纷之际，辛苦经营，粗具规模。然定案六十万元中，先行指拨二十万元之款，每岁实收不过一十万元；原拨高等学堂及陆军医院之校址，至今尚未腾出，以致学款为减短之支，学生无寄宿之所，此学校经费之困难一也。年来革命突进，政局屡变，政治无轨道可循，而教育实首其弊。办党者以青年为工具，导学生以革命为工作，于是党争政潮，搅政教为一团，而学校重心，乃不在校内之教室，而在校外之党部。然一党之中，派别既彼此纷歧，主义又前后互异，青年入其陷阱，殊觉进退维谷，办学者虽力持正义，终难敌政派党派多方之恶潮，此学校训练之困难二也。成大虽处此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四辑。1928年2月16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以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杨廷铨之死一案为借口、逮捕并杀害成都大学等校中的中共党员及进步教师，学生多人，张澜愤而辞校长职。

两种困难之下，在澜尚欲竭其心力，以求弥缝于万一。两年之中，幸免陨越。即在去冬，各校罢课，以争教育经费之独立，而成大不陷其漩涡，从容以毕年假之试验。此岂澜个人之力所能致，亦由教职员及学生爱护本校之故也。然大学之权威，端在社会无形之信用。乃二月十六日黎明，突来一团军队围校搜查，教授学生均从睡梦中拽出，露立操场至四钟之久，捕去学生三十余人。是日午后四钟，枪毙成大学生六人。军警团联合处宣布罪状，一则曰与省一中校长杨廷铨被殴毙命有关，再则曰共产反动分子，夫杨案之当严办，共党之当肃清，既属法理之当然，尤为党纪所必出。然办杨案，必先严究该校之主凶，而后胁从之真伪乃分，清共党必以事实为证据而后私人之诬陷方免。今杨案之主凶未获，而成大之学生被指为嫌疑者，乃枪毙于逮捕数钟之内，似非所以服死者之心，在澜尤无以塞其家人之口。然该生等个人之关系，仅属于一命之存亡，而大学事前未获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在澜既不能预教育于前，以出学生于政党之狂澜，在学府复丧失其尊严，以堕教育事业之神圣，此澜所以引咎辞职，以谢邦人。除电刘、赖两军长外，惟有将国立成都大学就近函请地方政府二十四军、二十八军两部接收维持，使西部最高文化之根芽得以保存，八百余学生之德业不致矢所，庶补个人在职之愆，实为学校补牢之计。此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

国立成都大学校长 张 澜 二月十九日。

注 释：

[1] 刘文辉（1895—1976） 字自乾，四川大邑人，刘湘堂叔。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成都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中央委员。1949年12月率部起义。建国后，任林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自行解除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函

(1928年2月19日)

逐启者：澜现因学校突遭事变，教育沦胥，无力办理，业已自行解除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并函请此间二十四、八刘邓两军长，将本校接收维持，开学延期。回溯往日缔造之艰难，与关系西南文化之重大，年来共同维系，仗借实多，一朝别去，能无怅然。此后本校前途，尚希鼎力维持进行，俾至不坠，至感至祷。专此函达，即为查照为荷。此致□□先生台鉴。

张澜拜启 二月十九日。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四辑。

复国立成都大学校长职

演说（节录）

（1928年3月12日）

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此次惨杀学生，固非办杨案，亦非清共党，其真因：（一）由于当道不满意于去冬各校学生联合会之争教育经费独立，罢课游行，殴辱教育厅长，而学潮至今未息，瞬将开学，恐怕学生又与政府为难，遂不能不加以威压。（二）由于成都劣币充斥，凡是工农兵学商，无一不受痛苦，而所谓劣币风潮，日在危险恐惧之中，当局既无法解决币潮，遂亦不能不出于威压。于时适有省一中学生聚众殴毙校长杨廷铨之事变，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的军人，系与成都党务有关的人，就把平日对他们持反对态度的各校学生，胡乱捉来枉杀，他们以为指之为杨案凶手，则教育界对于殴毙校长之罪人处以枪决，当无异辞；并且指之为共产分子；一朝而能诛除大批暴乱党徒，尤当为社会上一般有产阶级之所赞许，而于无形之中，即可将学潮、币潮威压下去，那些被杀之人，还要说是死有余辜，诚不能不谓其计巧而手毒。至我之决心辞职，固因学府横被蹂躏，学生之生命毫无保障，但不只是为成大及成大学生而言，实在见得此次惨案之关系

• 据《四川军阀史料》第四辑。

极为重大。以前军人之横暴，尚不敢公然无故杀人。试问以最高学府之大学，尚且突然派兵围搜，以后更何有于其他学校不可以任意蹂躏；以大学之学生，尚且派兵逮捕，不加审讯，供证俱无，立予枪毙，至今不知其所犯为何罪，以后更何有于一般平民之生命不可以任意草菅而禽狝之。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定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幸好本校教职员先生同学，本大无畏精神，一致出面主张正义，虽未达到圆满目的，就社会上已明白此回惨案的是非，妄杀人的军警团当局亦稍知所警惕，也算是得了几分消极的效果。至于一般的青年学生，现当革命期间，固不能不抱有革命的思想，造成革命的人才，但是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能力，革命才能够成功，才免得走入歧途，才不至于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孙中山先生平生研究中外政治的书籍和社会主义的书籍，各数百种，又积数十年之经验，所以能够创造中国的革命学说与乎伟大的成功，断不象今天说得来三民主义四个字的人，便叫做革命同志；贴几张标语，吼几声口号，发一篇宣言，便叫做革命工作。须知道没有真实的本领去讲革命，去加入党团，结果，激烈的分子固免不掉作了无谓的牺牲，就是稳健分子，亦不过给他人效无聊的奔走，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究有什么益处？此次学生会自行议订公约，次后不再在校内为政治结社，扫除浮嚣气习，只是专心研究实学，造就将来真能改革政治及社会经济的人才，亦深觉可喜。我今天复职，即是有感于教职员先生和学生的奋斗与热忱，不忍成大中途停顿，所以来继续维持。我已经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职，在国民政府新任之校长未到以前，我只好暂负责任，照旧办理。

对筹备国立四川大学的意见

(1928年9月19日)

呈为径陈管见以备采择而策进行事，窃查四川教育厅前奉：钧院训令筹划国立四川大学一案，该厅遵即转函本校推选一人担任筹备大学讨论委员会^[1]委员，当经复函照办，并拟具意见书提付该会在案。兹由该厅函送议决案一份到校，计有七项^[2]，除二、三、四、五、六各项可以同意外，所有一、七两项关系重大，该会议决标准，本校认为不无滞碍，未便苟同，已函知该厅声明理由，特抒所见为钧院一详陈之。

查拟办之国立四川大学所在地虽指定四川，而于西南各省区如滇黔西康之文化均有关系。无论其学校规模将来何如宏大，恐以学制所限，仍难为一省养成适应地方需要之各项人才。因大学在精研学理，阐发微奥，在学殖荒落之区，固应协力促成组织完备、规模宏阔之学府。而职业专门学校如农、蚕、工、商、医等之侧重艺术、期在养成实务专家者，在地大物博、频年苦兵、民生凋敝之四川，亦切感需要。且徵之东西各国，于大学之外，不废职业专门学校，良有以矣。本校主张四川除国立大学而外，所

* 据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一卷。本文是张澜致大学院和教育厅函。1928年8月，四川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与省长赖心辉商议，以三军长名义联衔宣布成立“筹备国立四川大学讨论委员会”。随即“讨论委员会”通过了《筹备国立四川大学的决议案》。张澜在这封信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有省办各种职业专校，仍当并行。尚需尽量扩充，以期实效。此对于该会议决案之第一项所谓先就现有十校校地、校产及一切设备统筹改组划归国立四川大学接收，未能赞同者也。

关于国立大学经费问题，本校以为完全应由国库担负，除前三年应需之开办费外，年有二百万元确定可靠之收入已足敷用，不必牵涉省款。而省款教育经费应予保留，以谋省立各校之发展，方为正当企图。且大学不设预科，应由省办规模完整之高中数校，所需经费约六七十万元。各项职业专门学校经费约需百万元。以四川早经指定作省教育经费之肉税全部加以整理，即可勉资应付。不应忽视省教育之扩张而将所有经费并入国立大学，以求目前一时之苟合。此对于该会议决案之第七项所谓应将以上九校经费全数划归国立四川大学接收，除国税外其余之数仍由省税中之肉税项下开支未能赞同者也。至国立大学现设成都，应即以成都二字冠于大学通名之上，正名为国立成都大学，较为适当。四川名词系代表省区，如大学系省立，冠此二字尚属合理，今以国立大学而加省区之名，殊嫌名实淆混。证以近事，如国立江苏大学之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湖北大学之改称国立武汉大学，即其例也。

综以上各点论之，或为国立大学根本所关，或以四川地方利益所系。本校既切盼规模宏远组织完备之国立大学早日实现，而为国家教育永久计划。一得之愚，窃愿为集思之助，并附呈本校前具意见书及该会决议案各一份。所有迳陈管见以备采择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具文呈请钧院察核，谨呈大学院

代理校长 张 澜

中华民国十七年九月（十九）日

注 释：

〔1〕指1928年8月成立的“筹备国立四川大学讨论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四川省教育厅代厅长向楚为主席，委员有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的代表以及成都大学的几名教授。

〔2〕指《筹备国立四川大学的决议案》七条。

怎样研究经济学

(1929年4月)

今天是经济学会成立的日子。我很感觉到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研究学问，原贵乎自动。教师不过是一个指导研究解答疑问的人，绝不能给我们好多学问的。大学内面，尤其是这样的。因此，今天这个研究学会底成立，才是大学求学问的开始，或者说求高深学问的开始！

但是经济学会成立后，不能说就可以得学问，也不能说只要会内人勤快用功，就可以得到，因为每种学问，都有他特殊的研究门径，单靠普通方法还不成功。

对于经济学呢，据我所想到的，在大体上，应向着这两方面努力：第一是经济学的理论；第二是经济学的实际。

说到经济学的理论，大家必以为就是通常在课堂上所讲那些讲义本子。其实这不尽然。我们应该晓得现在的经济学有两种，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前一种是以亚丹斯密为始祖而发展下来的；后一种是以嘉尔马克思为始祖而发展下来的，研究那一种合乎科学呢？这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但我

• 原载1929年成都大学《经济科学》。1929年4月成都大学经济学会成立日，张澜应学会邀请发表演说。

可以比较的说一个大概。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学在生产、消费、流通、分配各部分中，虽各有其法则，然而不见得正确，且不免有各部分散乱孤立之嫌；实在不如社会主义经济学那样有正确的说明各部分的法则，且又有概括全部分的法则，以组成一个很严整很精密的完全的系统。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学所研究出的结论，一则多属于表面，再则没有紧严地抓着时间性，不象社会主义经济学那样，把我们处的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个深刻的分析，认识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法则，使我们了解资本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帝国主义是怎样长成的。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学是一种静的研究，即是说它惯研究死体。社会主义经济学就不然，它用动的见地，用辩证法的方法，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作横的解剖外，又作纵的解剖。我们因而得了解资本主义底生产发展、衰老，和它给我们所孕育出底新社会形态——大同的共产社会。换一句话说，就是它指出经济制度的新陈代谢，人类生产之进化。

总括起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只能给我们一些经济常识，零碎的经济说明，并不能给我们以整个的生产法则、生产组织的系统知识。在这个见地上说，或者站在科学方法的见地上说，简直可以肯定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还未形成一个很完全的知识，像物理学，化学那样，可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恰恰与这个相反。

讲到这里，我想一定有人要说：马克思底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不会变成共产党吗？殊不知我们是研究学问，不是去加入政治团体。我们研究学问底

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绝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讨经济真理。并且社会主义经济学近来在各大学中，都也有多人研究它了。即如戴季陶先生翻译《资本论解说》，胡汉民先生介绍马克思《经济学入门》，并不能说他们就是共产党。“反共”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拿反共来作为一种遮蔽真理底成见。这是大家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时，应该注意的。

现在我们说经济学底实际。

大凡研究一种学问一方面是为求真理——认识围绕我们底一切现象；一方面是为应用，以企图丰满我们的生活。但无论在那一方面说，我们不能抛弃了当前的实际，而只在书本子里去研究陈说。要把已有的道理深切了解，必定要用实际去对照它，要使已有的道理发展，或者说发现新的原理原则，也必定在实际中去用工夫。要使我们的学问是活的，切于应用，更非研究实际不可。这也是科学所昭示于我们那种不因袭、不保守、要求新、要前进底精神。

实际是什么？就是当前世界经济现象和中国经济现象。因此，我们要分成三步来研究。

第一，研究世界底经济现象。中国是世界上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同时又是世界上的一份子。所以中国和我们个人的一切，都是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因此必须了解：现今世界底经济是何种组织何种制度？它是怎么样到现在这个地位？其趋势如何？——就是说，世界经济在向着那方向的进行？

第二，研究中国底现象。这个问题更复杂了，我们要懂得：何以中国几千年来底经济没有什么变动？何以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现在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在中国底形势怎样？中国资本主义

已到何种程度？又有无发展的可能？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底经济关系如何？要怎样才能发达生产？发达生产又应采取何种经济制度？还有如像民众底经济生活，其受压迫受剥削底状况，都是急需注意的。

第三、研究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关系。那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底状况、程度、方法和趋势。中国是否已在世界资本主义底笼罩下？世界资本主义底崩溃对于中国底关系如何？共产在欧美有了经济基础，中国也是否要跟着一路走？

此外，像俄国底经济情形，也是应该深加研究的。俄国经济过去如何？现在如何？甚么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底性质和趋势，也要同样地弄一个清楚。

若是像这样去研究，对于这些问题都了解，那么，我们所研究底经济学，才是活的，真的，实在的，且非常合用。同时，我们还要知道现在是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最显著而激烈的时代，差不多像到短兵相接的阵势了。我们只有明白上面所说的那些问题，才能够理解它们的曲直是非，世界情形，而决定我们自己的态度和中国底前途，使将来能够在一个光明大道上走，不致误入歧途，或没有进步。倘若对于经济真理不完全知道，对于实际不懂，那就是把经济学古董化了。那种经济学家，只可说是一个经济学的考古家罢了，或者还简直配不上说经济学家咧！

中国学生底出路

(1929年5月23日)

成都大学成立才五年，现在的学生已有一千多人，发皇的气象，很可惊喜，但是我每一念及中国学生底出路，就有些不寒而栗。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曾否把自己的切身问题作一全盘的考察，我今天略就意想所及，以贡献于诸君。

我们知道智识者对于人类底责任，在谋社会进步和文化底发达。学生就是这种智识者底幼年时代，一出学校，便不管程度如何，而客观地成为了成年的智识者。那时，就理论来说，就事实来说，也必不可免地站在智识者底位置上，去完尽谋社会底进步和文化底发达那一个本然的责任。

但考之中国过去现在的事，却都不是这个样子，当他们在学校做学生底时候，志气远大，抱负不凡，大有顶天立地的气概。就他们的行动来说，亦非常讲究，没有恶言恶习，并且心术光明，行为正大。对于军政当局，不骂其争权夺利，残民以逞，即骂其嫖赌骄横，宦气可恼。仿佛自己将来出了学校，必扫除这些垃圾，澄清国家政治，另造一个新世界出来。这真可说是品学

• 原载《国立成都大学五周年纪念会特刊，述论》。该文是张澜为纪念国立成都大学成立五周年而作。

兼优，有献，有为，有守。可是一旦入了社会，却适得其反。他们不独走人家底旧路，而且变本加厉，腐败化老朽化官僚化比人家还快。昔之骂人者，转眼就成了被骂底人。军阀、官僚、学究、士绅，不都是由学生蜕化而成的么？这些人在中国的最近代历史上，虽有新陈代谢的变动，然而总是一脉相承。在军事上、政治上、教育上、社会上都是一样的情形。所不同者，只是新徽章代替了旧徽章，新官衔代替了旧官衔，新八股代替了旧八股。

为甚么成了这样呢？唯心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底答案就是：（一）由于学生底意志不坚强；（二）由于人格的修养不充分；（三）由于古代的道德不讲究。这些解释，都是玄学的臆造。或者失之用现象解释现象。我们若是用科学的唯物见地去分析，便可知道这是由于环境底关系和生活底压迫。学校是一个纯洁的环境，好比处女闺阁一样。生活其中底学生，自然像处女般的纯洁。可是社会就不像学校那样纯洁了，旧制度、旧习惯、旧生活，无一样不污秽龌龊，时时在这里存在着底学生，怎么不会变坏？事实上原来没有到了妓院而还能保持其纯洁底处女。这就是所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人底意志，不能无条件地战胜环境，人格和道德，也根本都是环境底产儿，没有超环境底力量。并且学生在校底生活，完全是依赖他人——父母或亲友。

“衣食足而知荣辱”，自然无须乱干，可以责骂别个。但一出学校过后，就必须自谋生活，而过惯了城市的安逸和丰美，又迫得非去找事不可。然在军事、政治、教育等方面，总括一句，整个的社会都污秽龌龊，充满了夤缘、巴结、贿赂和嫖赌烟酒底应酬，以及贪婪、掠夺、侵吞、专横、屠杀等等，不顺应环境。与旧有的军阀、官僚、学究、士绅同化，便得不着位置，或得着而不

巩固，或巩固而不迁升。只像这样消极的同化还不够，而且必须要积极的造恶，实行剥削民众，抢劫金钱，植派营私操纵把持，狼狈为奸，渔利分肥。社会环境的影响，物质生活的逼迫，有超过人之主观的和精神的道德、人格和意志等等底力量。所以在学校底学生，一到社会，便必然地恶劣化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要阻止这样的趋势，使学生不会有在学校和在社会前后的矛盾，不是改造个人，而是改造环境，并且我们还可这样说：要改造个人，必先改造环境，有了优良的环境，才能有优良的个人。若是改造个人就从个人下手，自然会走到谈说道德夸张智识那一条路上去了。可是物质的势力胜过精神的势力，所谓意志、人格智识和道德等，终久会屈从于生活环境之下，没有作用，结果，所谓改造个人，不过是培养新的军阀，新的官僚，新的学究，新的士绅而已。那又怎么不至改造社会而社会愈糟，愈改造个人而个人愈坏呢？这不是中国底国情不宜于学校，不宜于科学，应该恢复读经，恢复科举，实在属于方法上底错误。这是中国近二十年来痛苦的经验，我们现在应该觉悟起来。

所谓改造环境，就是改造社会。改造社会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呢？这个，我们必须明白造成社会底物质基础是经济，而决定政治思想、道德、风俗甚至性格、感情之命运底因子，也是经济。所以要从经济方面着手，对于社会底改造，才有“纲举目张”、“百度维新”的效力，不至徒劳无功。然则怎样改造经济呢？就是对经济作制度的变更和数量的增进。这不是主观的玄想，而是客观事实底决定。

我们知道学生底生活，是城市内面那种高级的生活。出学校

后，不能劳动，而又必得继续其高级的生活，享受人间底安逸和丰美。可是这就非生产发达不可。就人类底经济历史看来，只有生产发达底资本主义，才能满足今日中国学生底需要。事实上，也只有生产发达底资本主义，才能安插有史以来人类教育最发达底目前阶段中所生产出大批的智识者，因为资本主义出现，则科学发达、教育发达、生产发达、自由职业发达，而后出校底学生，才有很多的教员、律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新闻记者等位置，使他们各得其所。这是学生本来的出路。

但中国资本主义在今天，竟不能应这个需要，然而学生底高级生活又不能低下来，所以只有采军阀、官僚、学究、士绅底谋生方法。换一句话说，就是去当军阀、官僚、学究、士绅。在未得着军阀政界位置底时候，不能不夤缘巴结、贿赂，在已经得着底时候，不能不作嫖赌酒烟底应酬，以维持其存在而企图发展；并且要援引朋辈，排拒异己，以达包办分赃底目的；而又必须贪婪，侵吞和掠夺，以补偿所失而取得高级生活所需底财富。其不能入军政界的，便挤到学校来滥竽。不能到学校的，就回乡村去当团总和绅粮。但他们与入军政界底智识者，实在是使用同样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这就是原来比军政界纯洁高尚的育教事业，也一样的夤缘巴结，植派营私，贪婪侵吞，渔利分肥之所由来。

就现在的趋势看，不论军事也好，政治也好，教育也好，各方面都又已达到人满为患底境地。纵然近几年来，在军事上、政治上、教育上和社会上，俱各添了很多的位置，但仍不能使此源源而来底学生一批一批出校底智识者，各得其所。他一方面，智识者不寄生于资本的经济领域而寄生于封建的政治领域底结

果，提高了劳动人民被榨取底程度，扩大了劳动人民对榨取底反抗，于是智识者底生活门径日益狭小，学生底出路便日益缺乏。这好比资本主义发达，商品加多而市场缩小，必然造成经济危机一样。现在有许多学生，就也投入土匪中去了。至于因生产不发达，使失业工农去当兵当匪，不又是很显著的事实么？可是新兴的微弱的资本主义不能容纳智识者及贫苦者，使游民人口造成相对的过多，而军阀、官僚、资商、豪绅和帝国主义底剥削兼并，又使中产之家化为贫穷，贫穷之家化为兵匪，游民人口产生绝对的过多。这样一来，社会的危机便更加开展。单是兵匪学生，就要构成一个强大的反抗势力。所以革命是必不可免的事情，它将无疑地成为中国社会的出路。

我们要知道造成中国现在生产不能发达底原因，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之侵入。它不仅抢劫了中国，使中国贫穷，没有原始资本，就用大资本底力量来压迫中国底小资本，而且帝国主义底富强是建立在中国底贫穷上面的。假使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则帝国主义便失掉了广大的商品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地带，而扩大其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所以帝国主义为其自身底存在，不能不在经济压迫之外，再用政治阴谋来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它要利用新旧各色的军阀、官僚，以维持它在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得着底特殊权利，并延长中国底内乱。军阀官僚为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又必须尽量来剥削民众，割取地盘，制造战争。于是原始资本更少，统一市场无望，而已有工商业亦日趋于破产之途。如此，不独帝国主义底既得权利非常巩固，中国亦将永为他广大的商品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地带了。这是中国物质生产不能增进底原因，也是封建势力得以维持和腐化环境得以存

在底原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要改造腐化青年学生底环境，要改造构成中国社会底经济，只有扫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资商、豪绅底势力，中国底社会环境和经济，才能焕然一新，而展开一个优良的局面。

这样一来，中国生产底障碍得以解除，物质文明发达，而学生底出路，便找到了。

但问题不是这样的简单，我们应该作进一步的观察。我们不应该是近视眼，而应该把人类历史底趋势和中国社会底将来展望一下。这是对于社会底进步与文化底发达负有责任底智识者，尤其是尚在幼年时代底学生，所应特别注意的。

我们知道有史以来直至现在，生产底发达是与资本主义联成一体的。正因为这样，资本主义才能在人类社会底进化上有历史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纪底现代，它却不是发达生产的而是障碍生产的。世界上一切经济先进国都给我们这个经济落后国指示出来了那样的教训，就是目前帝国主义阻止中国生产底发达，也属于世界资本主义障碍生产底一个证明。进一步说，中国革命底自身，即已宣布了资本主义底死刑。因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后阶段，即所谓“近代资本主义”者，所以反帝国主义运动就是反资本主义运动。而中国底军阀官僚，外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内却是以资商豪绅为基础。于是反军阀官僚运动又成为反资商豪绅运动去了。并且资商豪绅不仅为军阀官僚底基础，而且为帝国主义底基础。他们的经济成为帝国主义底一部分，所以他们的利益也与帝国主义无甚冲突。因而他们站在反革命的帝国主义那方面去了，而革命的民众，几乎全是被剥削受痛苦底工人、农民、苦力、负贩以及一切贫穷者和劳动者。这些人民底利益与资本主义相反，

所以他们在革命过后不会建设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不得世界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国家底援助，帝国主义之打倒，必将成为不可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资商、豪绅后，市场虽然统一，和平虽然获得，既失权利虽然收回，而原始资本底来源，非靠把积聚于军阀、官僚、资商、豪绅手中底及帝国主义在华底财富辱转不可。并且还要求助于并联合于非资本主义国家，而后才得有金融的共通，经济地战胜帝国主义及本国底大资本势力。就是反封建的同时即反资本的那个二重性的革命之本然的特征。其实，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底经济危机，因而也才能解决中国底社会危机。大多数人生活问题底解决，是中国社会巩固和发展底条件。学生底出路，自然不成问题了。因此，中国底发达生产，与反资本主义联成一体。换句话说，中国生产必采非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后才有发达底可能。

从此，可知用革命手段来对经济作制度的变更和数量的增进是中国社会底出路，亦是中国学生底出路。环境改造好了，学生在校底修养才有经久的效力，不致造成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底矛盾。这样然后才有完尽智识者所负着推进社会发达文化那些责任底可能。

但中国学生对于这里改造环境开辟出路底事业，不独应该参加，还须引为自己的任务。因为这个直接关系于学生底生活，间接关系于中国底前途。并且这也就是中国学生完尽其推进社会、发达文化之智识者的天职。

末了更须一言：中国底历史正在脱离旧社会走向新社会底过程中，所以中国底出路是破坏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因而学生底前

途，不在旧社会中，而在新社会中。于是他的出路底方向，也就不在适应旧社会，而在改变旧社会，不在阻止新社会，而在创造新社会。过去现在的智识者，许多不明白这种趋势，所以不知不觉地受了封建底影响而军阀官僚化，或学究士绅化，于是谋社会进步与文化发达底责任，在客观上变成了谋社会复古与文化堕落底行为，直接破坏了从前在学校所修养底人格道德和意志，间接便延长了扩大了中国社会底糟乱贫困。所以现在的学生，必须使用科学的方面，来消极地排除改良主义，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并纠正建设科学发达教育提倡道德那一类偏于精神的改造主张（莫要误会为根本地反对建设科学发达教育等）；积极地研究历史底发展，社会底进化，革命底方向，以造成一科学的思想系统而确定新的人生观，这是学生将来入社会后不致与旧社会生活同化，而反可创造新生活以推进社会发展文化底有效保证。

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

(1929年)

在教育学研究会发行这个季刊的时候，要我写一个发刊词，我想这不一定是必要的，不过我对于教育到有一点意见，在前次教育研究会成立时的讲演，因为时间过迟，很说得简略，现在不妨将就这个机会，概括的写出，一方面作为我对于教育研究会的贡献，他方面又藉以了销作发刊词的责任。

中国的教育，自从兴办以来，虽然有很多的变动，但仍没有甚么进步可言。当批评的地方，实在很多。我想凡是一个热心教育的人，或者要想把中国改造好的人，一定不能置诸不闻不问之列，听其他这样。

本来民主政治，在现在已经不是完美的政治了，然而在挂到十七年共和的招牌的中国，教育方面还是封建的，而没有好多民主气味，五四运动过后，教育本发生了一点新的萌芽，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可是到现在，这种新的萌芽都快要被复古浪潮所湮没了。读经讲经的事实，非常普遍于中小学校，封建道德的恢复，不仅有政治的力量，而且还有社会的基础，从前的开科考试，早被戊戌维新所唾弃了的，现在又已抬起头来，封建时代培养骑士

• 原载1929年《现代教育》第一期。《现代教育》由成都大学教育研究会 编辑出版。此文是张澜为该刊写的发刊词。

的制度，亦已重新开始，最可注意的，连白话文学社去年都生了问题，仿佛非回复到古典文学不足以与思想道德等方面复古相配合一样，现在的教育，除了这些封建的精神和成份外，实在只是一点配盘的A B C D 那些形式的科学而已，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扫地以尽，这实在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情。

还有一种同样的劣点，就是奴隶制度的精神，充满了教育的领域。奴隶原是一种“能言的工具”，所以没有人的自由。我们的教育在没有兴办学校时，完全是奴隶教育，不仅当时所读的书，是叫人法先王，守古训，不要离经叛道，而且小孩子从生下地来，就是贯注以尧舜以来，一个传授一个的学说思想，连教育的方法，也完全是注入式的灌输和循规蹈矩的压迫、束缚他们。总而言之，教育方面，没有一点自由空气，学者不过是思想上的奴隶，为古人当留声机而已，这是文化落后的一个原因。戊戌以后，又加之以五四，这种教育上的奴隶精神，才被摧毁。现在却又随着年来的复古运动，而恢复旧有状态，一切自由，削夺殆尽。读书、看报，研究学问，组织学会，通通不能从心所欲，并且书报学会成为罪状，动辄就要身首异处，不仅异端邪说底名词，居然在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科学的世界，成为反对异己的恶者，而且要用种种力量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定思想于一，而建立新的偶像系统。这种力量，在从前是夏楚，在现在即变成了刀枪。教育的奴隶化，实在是销毁中国文化，阻止人类进步的一种大障碍，这是我们所不可忽略的事情。

自然中国教育在精神方面，缺点很多，而尤其这种封建的成分和奴隶的成分，为害最大，固然我们不要存教育救国的幻想，

把教育的关系说得天样大，海样宽，但是在教育言教育，我们却不能否认封建教育和奴隶教育的劣点，及其在教育上和中国文化上的恶劣影响，这是我们应该大加注意而要求改造的。我们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应该要有天赋的独立自由的思想。人类的历史，早已堂堂皇皇宣布了这种人权，而最后的奴隶制度，反叛者又已揭出了独立之旗，撞鸣了自由之钟，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化事业的人，应该本着教育者的资格，尽教育者一份子的历史的责任。所以我们千万应该发表精神独立的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

其次，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教育的制度，关于形式一方面的。

中国的学校，取法于欧美。欧美国家的教育，仍是一种阶级制度，他们在表面上虽无限制，校门大开，连“学校重地禁止闲人”的牌子都没有，然而实际上，要有钱的子弟才能入学，这种经济的限制，比“学校重地禁止闲人”那块牌子还有力量得多，不过不是禁止闲人，而是禁止穷人。中国的教育，既是从欧美的来的，所以自然亦就带了这种阶级性质，小学以上，至于大学，一切学校，不论国立、省立、县立、市立，总而言之，都是用公共的款项所办。而且这种公共的款项，无论贫富，就是穷到工人、苦力、雇农、贫农，一点财产都没有，也是出了一份的，因为这种公共的款项是从一切直接税间接税抽收而成。但是入学的学生，就限于有财产者的子弟，而且这种由公共款项所办的学校，很普遍的要征收学费，再加之以这样费那样费合起计算，有财产只能维持生活或剩余不多的人，都没有入学的可能。并且学校底等级愈高，用费愈多，于是中学成为小有产者及富农的学校，大学成为大有产者及地主的学校，比小有产者还不如的市民及自耕农，

就只能进小学，工人、苦力及贫农、雇农，他们的子弟，要当学徒和见习的工农，连小学都不能进。这种由欧美传来的虚伪的民主教育制度，实在系真的阶级教育制度，完全是一种依照人民占有财产的多寡而设立的阶梯式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制度，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教育的封建，还名实相符些。

在这种制度下，还有广大的人民，如像工人、苦力、雇农、贫农以及负贩、小商等，出了很多的苛捐杂税，教育附加，而还不能送他们的子弟来读书，这固然是经济制度的关系，但也是教育制度的缺点，一切学校既然是公款办的，为甚么又不注意这个问题？为甚么又置贫民教育于不顾？为甚么又要征收学费杂费？为甚么又不履行义务教育？为甚么又只偏重专门人材的培养？为甚么又用公款送有高等知识的人出洋留学？……举凡这些，都证明了特殊阶级的教育制度只注意特殊阶级的子弟，是一个显然的事实。那么，大多数人出了钱办学而不能读书，尽了义务不能享有权利，这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和最反正义的事情么？

这种建立在多数人出经费少数人享权利的制度上的特殊教育，完全是变相的贵族教育。人民有纳税的义务，应该有入学的权利，一切学校，不仅应该免除学费，而且应该设法使出了很多间接税的工人、苦力、贫农、雇农的子弟能够读书，这也是国家兴学教民的本意。现在能够符合这种要求的，就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来看，只有苏俄，只有他们很努力于这种贫民教育，这是十年来的事，不能否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只有解决贫民的教育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教育制度，从前的平民教育不过是工商业家反对封建的贵族教育的口号。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职司文化与从事革命的教育者，应该提出贫民教育的口号来

反对资本的贵族教育，这是我们把少数人的民主制度教育改造为多数人的民主制度教育之一种历史的任务。

但是怎样才能完尽我们前面所说那个二重性的责任——教育精神的独立自由化与教育制度的贫民民主化？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教育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又是政治的一个桠枝，不能在社会政治之外而独立，所以只有社会和政治的改造，才能完成教育的改造。那么，我们从事教育改造的人，能够不参加社会的改造和政治的改造么？

这是为世界与中国整个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趋势所决定的，从事教育的人，应该顺着这个趋势来尽他推动教育即所以推动历史，改造社会即所以改造教育的伟大责任。

致四川省政府函

(1931年5月26日)

谨启者此次省府改组，观听一新，历史颓弊不振之政务，均得刷理而促进之，教育一端尤关国家大计，自早在筹维整顿之中。窃敝校成立于今六年，虽时局不无纷乱，而校务常得循序进行，实赖省府及各军长维持之力为多，顾基础虽定，完美未由，考其缺陷之因，最要有二，尤不能不望贵政府力为扶助，俾得完成。一则案定之盐款必须拨足也。查敝校经费，系在四川盐税项下年拨六十万元，曾经国民政府、大学院、行政院、教育部、财政部先后核准，并由行政院饬四川省政府，并令军政部转饬驻川各军长，照案拨足在案，第因防区分据，财政未统归省府，遂致每年六十万元之经费，除由各军长迭次增拨外，至今尚有十三万二千元未能拨足。此次贵政府诸公就职，首由二十四军将民财各政交还省府，各军亦相继交还，财政已归统一，所有敝校前此每月拨领之三万九千元，合计年拨四十六万八千元，自应照旧如数拨领，而此未经拨足之十三万二千元，即每月应拨一万一千元，务祈贵政府从本年七月起，即在四川盐税项下，每月加拨一万一千元，俾资发展。盐税既系国有，行政院又早经令饬，此则应请贵政府即与照

• 据国立四川大学档案。

案拨足者也。一则国立之名称，必求国民政府核定也。查敝校于民国十五年成立之初，即经北京教育部承认为国立大学，十七年复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大学院准予立案，并由大学院任命张澜代理成都大学校长，所有成都大学之经费，年定六十万元，即在国税盐款项下拨充，亦经大学院行政院及教育部财政部先后核准。是则事实上，成都大学已成为国立大学矣，惟因前此省府无人负责，未能向中央建言，而旅沪川人，又曾呈请大学院为三大学合并之主张，遂致教育部对于成都大学，至今尚未明令定为国立大学，名称不定，因而办理时生滞碍，此又应请贵政府即予呈请国民政府核定成都大学为国立大学者也。更有陈者，川省幅员辽阔，户口殷繁，使政治稍能就理，为父兄者可以安居乐业，则其子弟之上进求学者，自将数倍于今日，断非一大学之所能容，将来三大学国立省立，分途并进，不合并则已，如须合并，则此一大学者，必当使之成为国立，而其经费，必当请求国府，于国税项下除成都大学已经年拨盐款六十万元外，再行增拨若干，务使其十分充足，方足以发扬西南之文化，而为国家造成多数有用之人才。矧中央对于东南诸省，尝有私人倡设之大学，亦允许其为国立，惟恐优厚之不加，我占西南重要位置之四川，岂宜长此自外而甘自菲薄耶？至于省教育经费，则须完全留出，以多办关于生产事业之高等专修学校，不宜将国、省税并入于一大学之中，苟且敷衍，企图改组，以求新名称之实现，而不计及久远，致将省教育之前途，与夫大多数青年，关于生产事业，欲求高等专门智识之机会，自行减缩，甚而至于断绝之，如十七年教育厅所号集之三大学合并会议之经费混合办法，不能不令人訾其疏失也。贵政府振兴教育，夙具热心，远瞩高瞻，尤异凡近，此亦应请特加注意者也。

所有上述各情，相应函达贵政府，即希查照赐行，至纫公谊。

此致

四川省政府

代理成都大学校长 张 澜

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呈行政院文

(1931年5月26日)

呈为恳请令饬照案拨足经费并确定为国立大学事。窃查成都大学经费，系在四川盐税项下年拨六十万元，曾经钧院及前大学院、教育部、财政部先后核准，并奉到钧院十八年九月二日第二四二四号指令，内开“查该校经费，由四川省盐税项下年拨六十万元，既经财政部及前大学院核准有案仰候如请。令饬四川省政府并令军政部转饬驻四川各军长，照案拨足，以维教育而利进行，仍候行教育、财政两部知照。此令”等由在案。乃因防区割据，盐税亦为各军把持，此案定六十万元之经费，除由各军长迭次增拨，每月已拨三万九千元，共计年拨四十六万八千元外，至今尚有十三万二千元未能拨足。此次省政府改组，川事已就统一，伏恳钧院令饬四川省政府并令军政部转饬驻川各军长，将应拨之成都大学经费实行照案全数划出，交归稽核分所，确定为成都大学经费，尽先拨足。再令财政部令饬稽核总所转饬川南、北分所，依照案定之成都大学经费额数，每月尽先拨足，直交学校，不使再与军费牵混，致有积欠或截提之事。既足以符国民政府教育经费务使充足之旨，亦使学校得以依照计划力图进步也。又查成都

• 国立四川大学档案。

大学当民国十五年成立之初，即经北京教育部核定为国立大学，十七年复经前大学院准予立案并任命张澜代理成都大学校长，所有经费年定六十万元，亦经钧院及前大学院、教育部、财政部先后核准，由国税盐款项下拨充在案，是则事实上成都大学已无异为国立大学矣。惟因四川大学、成都师范大学两校有与成都大学合并之议，教育部至今尚未明令定成都大学为国立大学，名称不定，因而办理时生滞碍。四川为西南重要省份，而成都大学之为国立大学既已久植其基，应请钧院令饬教育部即予确定成都大学为国立大学，既足昭示国家恢宏教育无间于偏远，亦不使人妄疑该部有漠视西南教育之心而敢于自外。至四川大学、成都师范大学两校，将来如必须合并于成都大学，其事固甚易也。以上所陈，事属大学教育，关系国家百年树人之大计，理合呈请钧院，俯赐察核施行。不胜感祷之至。

呈
国民政府行政院

代理成都大学校长 张 澜

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致 刘 文 辉 等

(1931年11月7日)

(衔略)

三大学合并，省去骈冗，极所赞成。惟经费除成大旧案六十万元外，必须增加，且使确定，而能独立，方足以兴起四川教育，发皇西南文化，此关百年大计。须使规模宏远，不宜因陋就简，仅顾目前。特此奉陈，敬希垂察。

张 澜 叩阳

●据手稿。1931年9月底，刘文辉以四川省政府主席名义，分别给省教育厅和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发了一内容相同的训令，提出了三大学合并的具体意见。时张澜已离校返回南充。这封信是他在南充写的。

关于抗日战争问题 的部分论述（节录）

（1936年12月—1937年9月）

〔一〕

我国历年来惧日外交之结果，苟且求安，不敢一言战。不独东北四省坐视沦亡，冀察疆土亦听任残缺。浸假而有使日本不折一兵而吞并我全国之势。亡国为奴，祸在眉睫。

夫日本既早定大陆政策，而以吞并中国为目的，遂挟其强大暴横之兵力为其狡黠毒辣之外交之后盾，而与我周旋，其惯技为在前方以大军威胁，在后方即强迫订立协定。盖自“九·一八”获得意外之成功以后，无论其为焦土外交、水鸟外交，无以非是欲以不战而亡我国，故我国今日而与日本徒为外交之折衷，无论如何于有形无形之中，皆不免于主权之损害，或领土之丧失。盖舍全国一致奋勇，决心与日本作战，断不足以救亡。今之绥边战事特其序幕焉耳，察北、冀东以及辽、吉、黑、热四省失地之收回，实为吾国人永久不渝之决心。对日抗战之展开，殆将如积水于千仞之上，不可遏止矣！

• 张澜多次对抗日战争问题发表论述。本篇是根据他在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的文章和谈话辑录而成，标题系编者所加。

然而兵危事也，日本强敌也。我国军队之劲练，器械之精利，咸不如人，然则何所恃而可操胜利之左券乎：一曰我国人众，宜作全民武装之防卫战争，以数量之长补质量之短；二曰审择友敌，以得援而自固是也。

（节录自《抗日救亡之壮丁训练及外交联合问题》。原载《新民报》1937年，2月16日第二版。此系张澜应《新民报》之请而写，脱稿于1936年12月10日。）

〔二〕

今日中国对日战争，系中华民族争生存战争，中国为争生存，人人必存死之信念。而日本军人缺乏斗志、已为鲜明事实。

在战略上，日本利在速战速决。日本对华贸易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从本年度四个月中统计，日本工人罢工事件六百余起。日本的战时支出年达一万二千万元。如果我们能够长期抗战，则日本的国内恐慌只有日甚一日，从几次秘密的日本小册子中看出，日本军人无论如何是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应抗战到底。

愿出征将士与士卒共甘苦，长官与兵士生活打成一片，抗战力量更能团结与巩固。

（节录自成都《国难三日刊》，1937年9月6日《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纪实·张表方先生致词》）。

四川的救灾与息谣*

(1937年5月7日)

我此回是为了南充的灾荒太重。请求救济而来成都。殊到省以后，川中一百三十余县的灾荒情形，都听入耳里，使我深感不安，不料随着救灾发生的谣言，也一天一天的听入耳里，更使我不胜骇怪，今天特把我的救灾意见与息谣意见略为表示出来。

今年四川灾荒的奇重，为百余年来所未有，去年以来，各地的水灾、雹灾尤其是旱灾，又纷纷见告，旱灾有许多地方，是从去年旧历夏季四月起，一直旱到目前春季三月的，有许多地方，是从去年冬季十月起，一直旱到目前春季三月的，前者计有二三十县，或一县的部分地区，后者则此回报灾的一百三十余县，实为普遍情形。因为去年夏季遭旱，而谷米歉收，因为秋季遭旱，而红薯歉收，因为冬季遭旱，而萝卜与菜歉收。因为今年春季已遭旱，而胡豆、豌豆、麦子皆歉收，于是地主、佃农及自耕农，无一不陷于艰难困苦之境。尤其是小产的佃农、自耕农，占农村的

* 原载《新新新闻》1937年5月7日。1937年四月，张澜被四川省政府聘为赈务委员，并被推为川北赈济会会长，负责四川北路灾情视察。5月初，重庆银行载运现金东下，战争谣传纷起，张澜为救灾息谣，写了此文。但这篇文章的后半篇未能发表。据张澜说：因为我把四川这两年继续不断的发生谣言的背景，说得露骨了。有一位“行营”的朋友，请我不必披露，所以后半篇就以“待续”二字停止了。

最大多数，家无存粮，借贷路绝，一批一批走向流亡饿死之途，食白泥，食梧桐、枇杷等树皮，食桑花，食棕包，食河里浮萍，食胡豆叶，食芭蕉头、苧麻根，皆为我所亲见，亦曾亲尝。老者病者，及一妇人而携二三弱小儿女者，鸿形菜色，日过吾居求乞，必五六十人。听其惨苦陈诉，每每为之泪落。据最近调查报告，最重灾地方占二十六县，次重灾地方占四十六县，轻灾地方也有六十余县，则是四川全省面积人口，已有五分之四以上变成灾区灾民，此境此情，何堪设想。何况目前小春既无收成，水田复皆龟裂，即使日内天降大雨，水田有水得以插秧，干后之田，收成必减，如仍不降大雨，插秧无望，今秋更何所收。又况今春久旱，就所见闻各地，胡豆、豌豆绝对收不够种，将来秋冬之际，种从何来，如不早为筹备，又将影响及于明年小春，故一念及将来，不寒而栗。今天谈四川的救灾问题，第一需要急赈，第二需要工赈，第三需要农赈。急赈是拿来救老弱妇孺及病废快要走近死亡线的一部分人，工赈是以工代赈，拿来救壮健有力，生活不能维持的一部分人。这两种都是救济目前。惟有农赈，是把款拿来贷与最大多数的农民，尤其是小产的佃农、自耕农，使他去买耕牛、种子、肥料，使他能够继续生产，积极地救济他们的将来。并须于贷款之时，一面详细为言农村富力摧毁，实由于日本人倾销私货，把大量的金钱吸收走了，使他们知道用洋货的害处，一面详细为言生产建设的必要，如修铁路公路、兴水利、改良蚕桑、试验棉作、新法制糖、改进稻麦、保育家畜等等，皆所以增加他们的财富，使以后虽过荒年，亦能自给，所以农赈在救荒政策中是极其重大而紧要的。目前统计全川灾民在三千万以上，急赈因有中央发来的一百万元，四川省政府自筹的一百万元，再加以各地人

士的热心捐募，为数虽不算多，濒于饿殍的灾民总可以暂延喘息。工赈则修筑成渝铁路、简渠公路、泸隆公路，俱已赶速开工。独有农赈，除前由省合作金库拨一百万元，分发受灾各县办理农贷外，刘主席〔1〕近来向中央请发赈灾公债一千五百万元，竟以基金未妥，为财政部议驳。农赈为三千余万受灾农民，尤其是大部分的小产的佃农、自耕农所急切需待以作其继续生产之用，非有一千万元以上的巨款，决不足以救济其将来，甚望刘主席及省内外川人士共同设法，再向中央请求。如其生产无法继续，则将来之救济必有时而穷，万一数千万饥民，起而互相争夺，祸害宁可胜言？救灾问题真算是今天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应该有全盘的计划才好。

（待续）

注 释：

〔1〕刘主席 指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

希望于整军会者（节录）

（1937年7月5日）

整军是川民多年来馨香祷祝求之不得者，今中央毅然执行，其给与川民之慰藉至深且巨。中央既然执行整军，川将领亦一致拥护整军，川民更何能不拥护之赞助之督促之，俾能早早完成其使命。

关于整军本身，以数月来川省当轴与中央往复斟酌，及川军各首领一致赤诚接受，以中央权力之稳定，诚意之感召，与乎川将领一致之觉悟与拥护，整军本身当必能获预期之结果。惟与整军相关联者有二事，不能无言以贡献于整军会诸公。兹二事者，关系于川局治乱、川民生计者至大，当于主持者盖筹熟虑之中，管见所及，冀供贤达之参考焉。

整军亦为川军部之官兵所欢迎。盖饱糈有定额，而官兵额数早超过其定数，以一人之饷二人分之，致外兵过粗陋之生活，官佐无仰事俯蓄之资。徒以川乱未已，农村崩溃，无业青年、贫苦农民为生计环境所逼迫，群相率而从军，实出于不得已，乃欲罢不能之事也。整军而汰去冗滥之官兵，乃属必然之事。若此辈被裁汰之官兵能获适当之安插，从事于生产，则个人赖以生活，

* 原载《新民报》1937年7月5日。1937年，蒋介石与刘湘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削弱以至消灭异己势力，蒋介石于七月初召开川军整编会议。为此，张澜撰文阐明自己的主张。

国家亦增加数万之生产分子，编余亦即彼辈之生路也。惟吾川方罹空前旱灾，而多年以来，农村破产，社会不景气，贫困实笼罩全川社会，以军官言，此次被裁，当以万计，而士兵亦有三四万之数。近闻各军中下级干部，颇呈惴惴不安之象，咸恐编余成为失业，复飘游于贫困之社会中。揆之往事，年前川军编遣一次，吾川各地因而匪风大炽，散兵游勇潜聚隐伏，编余军官从而领导之。就我所知，团营连排长皆有，且有曾经在峨山受训者。故川中今日之匪，多半有组织，有训练，清剿綦难。故若对于被裁者不给以谋生机会，则此辈当为未来地方祸乱之源，殷鉴不远，可断言也。闻此次对编余者，将用之于垦殖，或调入学校重加训练。夫垦殖之事，非有周密之计划，长期之筹备，与巨大之经费不为功。而短期训练，将来亦须妥筹安插之道，盖对于编余官兵，必须有彻底之计划，善为安置，使能生产化，有以安其身，然后足以安其心，使目前不为整军之障碍，将来不为地方治安之危险物，化无用为有用，俾此辈青年与农民能发挥其能力，对国家社会有相当之贡献，斯乃整军期中不可忽略之事也。此其一。

川民苦于税重久矣。税重之故，由于兵多，即以一年四征而论。当二十四年春间，因军费不足，行营核准在川省田赋收入项下，附加三年。作为军费，合之一年正税，成为一年四征。二十五年春夏之交，徒以兵多之故，延长至二十六年度预算，田赋收入犹复列为一年三征。当兵祸匪祸之后，继之以凶年，犹复一年三征，是川民之疾苦，实较国内任何省之人民为甚。吾人今日站在国民立场欢迎整军，使化川军为劲旅，以为国用。站在川民立场欢迎整军，一方面望从此化历史相沿之地方军队为国军；一方面望川军既国军化，则其法费全数应由中央以国税支付，不能再使川民

为法外过重之负担，而将一年三征立减为一年一征。川民亦系国民，待遇始得其平。尤以巨灾之后，人民纳税能力十分低减，照常负担已不可能。若整军而后，人民负担并未减轻，名为国军，而实重累川民，使川民无以苏喘息，固非中央爱护川民之初心，亦非收拾人心之善策。川民疲于供亿，流亡载道，人心浮动，危机堪虞。甚望整军会诸公认清川民之不胜负担，力陈中央于整军后，将军费全数改由国税支付，恢复一年一征，以安民心而解其倒悬，有其二。

尤有进者，川军经此次整理而后，额数仍嫌其庞大，屯驻腹地殊嫌拥挤，似宜开赴边区，从事于筑路、造林、垦荒诸事，可将消费者一变而为生产者。则将来可遂行国策，逐渐改为征兵制。此种军队退伍之后，亦不失为生产分子。

总之，整军之事关系于吾川吾国之治乱安危，于军得成劲旅，于民可减轻负担，而编余官兵，尤贵能与以适当之安置，此吾川人国人所翘首企盼，亦为整军会诸公造福于川民于国家之良机也。

祭 刘 湘[•]

(1938年2月)

呜呼哀哉！辛亥以后，川乱频仍，如草蔓滋。公起其间，智勇深沉，卒能定之。俗士识浅，于公行事，或有微辞。论其大节，深堪钦佩，英杰所为。川中将领，皆澜旧好，不少雄奇。惟公对人，具有诚意，择善而师。度量宽大，能容忠直，不拒予违。相交廿载，指陈得失，信我不疑。川政循轨，建设旧国，三年于兹。中间所历，环境多碍，不免谗讥。拥护中央，统一抗日，矢志不移。冀察失陷，沪战复起，江浙频危。一朝受命，督师东来，胆寒岛夷。呜呼哀哉！出师未捷，大星遽殒，江汉流悲。三军痛哭，举国震悼，柱折天亏。呜呼哀哉！忆昔赴宁，国家大事，待公咨询。救亡必战，时论推许，李、白、刘^[1]齐。胡天不吊，丧我元戎，突于此时。呜呼哀哉！国难严急，复兴根据，咸谓川宜。今公之死，国固损失，川亦险戏。为国有川，出群才仗，继公伊谁？呜呼哀哉！

注 释：

[1] 李、白、刘 指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三人。

• 据《文史杂志》1985年第一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于1937年11月，离川赴抗日前线，抱病指挥战斗。1938年1月8日谢世，其灵柩于2月下旬运回成都，安灵后五日，张澜为文祭之。

应该从速决定的两件事

(1938年4月5日)

前日成都报纸载有两件事，令人比较满意。一件是关于川军的事，潘军长仲三〔1〕向中央社记者谈话，说：“国难严重，已到极度的紧张关头，吾川军人，唯有大量出兵，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继续抗战，以争民族生存，任何牺牲，在所不计。”又说：“同时拟再度施以短期抗敌教育，研究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运用。”又说：“积极提高官兵报国杀敌之决心，与牺牲奋斗之精神，排除一切不紧张习弊，做到奉令即可依序开拔，迅赴事机。”潘军长前在刘故主任甫澄部下，素以能指挥军队作战著称，在此“国难严重，继续抗战”期间，更有“任何牺牲在所不计”的坚决表示，实在值得我们钦佩，并且增加我们对于抗战的乐观。但是说到部队还需要一个短时间加以训练，我前几天也曾这样说过。当时旁边有位朋友说，川军从去年整编之后，刘故主任即令饬各部加紧训练，以应调赴前方抗战之用。到了现在，已经历时八月，一般官兵报国杀敌之决心，与牺牲奋斗之精神，实已充满无间，此时只须迅速出兵便得，不必再事迁延。昨天又有一位朋友说，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配合运用，是要军队到了前线，实地经验，自

• 原载《新民报》1938年4月5日。

然知道如何配合运用，不必在后方作教本上的研究工夫。这两位的说法，也不无相当理由，特地把他写出来，以供川军长官的参考。总之一般人在此“国难严重已到极度的紧要关头”，所极度希望于川军长官的，就是“大量出兵”，“迅赴事机”。

一件是关于川政的事，邓秘书长鸣阶〔2〕致各专员县长及征收局长的世〔3〕电说“据近日各方情报，及考察所得，发现三大病态，其一，以政局动荡，讹言孔多，不免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尽量负责；其二，以时局恐有转变，遂畏首畏尾，敷衍因循，以侥幸于无事；其三，以时当过度，民众视线他移，少数意志薄弱之人，或思乘机渔利，对于官吏的苟且敷衍，乘机渔利，加以急切指谪，促其省悟，否则‘法律綦严，不容宽假’，实在是目前应该有的举动。不过要医治这种病态，只有催促中央确定省主席之为何人，早日来川主持，政局一定，官吏自然心安，相勉于为善。我以为川省目前尤有重大危险的病症：第一是省府财政频于破产。闻省府近两三年来，新负之债，约有三四千万元，照预算每日又应支出四百数十万元，而民间则因年来频受兵匪水旱之灾，又担负过重，财穷力匱，愈将困难。以田赋而论，向为收入大宗，计不过四五十万元，每月其他各税之收入，亦不过百余万元。循此以往，省府现状且有不能维持之虑，试问此三四千万元之借债，何法偿还？财政不能整理，人民过重之担负何由减轻？刘故主席所拟具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在此国难期间，极关重要，更有何款可以进行？第二是各地土匪乘机复起，去年清乡之结果，全省地方已告安谧。乃因近来政局动荡，谣言繁兴，遂与土匪以复起之机会。川北及下川东南地方，皆有股匪窜扰。我近日接过两封信，皆有四川邮区劫余清回的戳印，即省城附郭各县，亦有道路不靖

之忧，在此紧急期间，后方治安，不能保持，实在是极大的妨害。上述两点，可以说真是目前重大危险的病症。又要如何才能医治了呢？据友人说，川省财政的破产，除了获得中央财政的救济外，决不恢复原状。要想获得中央财政的救济，则任省主席的人，必须与中央有深切关系，而又是在中央有力量的人，始能运用中央财政的助力，来复活四川将死的财政。至于川省土匪的复起，其原因是由于政局动荡，一时纪纲弛坏，因而地方治安，无法维持。假使川省的纪纲长此弛坏下去，必将再度演成防区纷乱之局，地方治安更无足言。今天要维持地方的秩序，就必先整饬川省的纪纲，要纪纲能够整饬，就必须顾全中央的威信，盖必中央有坚强的威信，而后能整饬川省的纪纲，此点十分重要。

总之，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只有从速出师抗战，立功于国家，才是川中军人的光荣。在保持中央的威信大原则下，催促省主席早日来川主持，使川事不致日趋于败坏，才是川中人民福利。这两件事，都是应该从速决定，如其再拖延下去，就难免不误国误川。

注 释：

[1] 潘军长仲三 即潘文华。

[2] 邓秘书长鸣阶 即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

[3] 世 31日。

讨汪通电

(1939年1月3日)

吾人求尽国民卫国之天职，自始以纯洁之心理，坚决的态度，主张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对敌抗战。对汪兆铭^[1]艳电^[2]曲解敌相近卫声明^[3]，主张接受，绝对反对。尤以其向中央提议之先，遽行向外宣传，一似有意破坏团结，大为诧异。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在领袖指导之下，同心戮力，不断地求进，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谨此宣言。

黄炎培^[4] 张 澜 梁漱溟^[5] 冷 遵 江恒源

注 释：

[1] 汪兆铭 即汪精卫。

[2] 艳电 29日发出的电报。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致蒋介石及中央执委、监委的艳电，要求国民政府根据日本近卫提出的对华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以期恢复和平”。

[3] 近卫声明 这里指日本首相近卫于1938年12月22日按照日汪协议发表的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了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

[4] 黄炎培 (1878—1965) 字任之，江苏川沙人，清末举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1941年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底，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任常

* 原载《新蜀报》1939年1月4日

务理事。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5〕梁漱溟（1893—1988） 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中国哲学家、教育家。曾任《民国报》记者，北京大学教席。2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乡村建设活动。1941年以乡村建设派代表身份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任社长。1948年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建国后，历任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 必须选任人才案

(1939年2月)

现在抗战已入第二期，前方军事，虽极困苦艰难，吾人确信最后胜利之心属于我，绝不悲观。惟详察后方之政治，则令人不胜其焦慮。古语云，为政在于得人心，盖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历史皆然。况在抗战救亡之今日，乃就见闻所及，百职少负责任之人，万事渐呈墮废之象，机关繁多，成效鲜著，法令详密，实行甚寡。知其确当兴办，而徒事敷衍；知其深为弊害，而迄未能除。至于兵役办理不善，壮丁逃亡，土匪教匪无法肃清，日形猖獗。官吏多怀贪私，人民时生怨谤。所以致此，皆由为政之不得人。最高当局虽求治甚殷，而不知已乱机四伏。欲救此失，则各级负政治责任之人急须选任贤能，俾以绝大之实心与努力，以改进后方之政治，必后方之政治确臻良好，方能兴起人力，发展财力，增加物力，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方今人才并非缺乏，要在能集中而用之，国危事急，不容犹豫。如有为政之人，德威智能皆不足以胜任，则不应勉强使之居位执权，致妨抗战建国之大事，并失人心。今日政治上所需之人才，以为

* 据《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1939年2月12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举行，张澜向大会交了提案，并被选为休会期驻会委员。

一、中央大员应能开诚布公，整躬率下，旁招俊义，广纳忠言。

二、主持一省政治之人，必须具有政治常识，措施有定见，言动有威信，有猷有为，方足以领导提振一省之庶政，而无折足覆餗之虞。

三、行政督察专员，区域不宽，职为较高，容易为治，应选任精明廉干之员，加重权责，增其旅费，使之按月亲巡属县，认真督察兵役、治安、建设诸重要事项，以增进行政效能。

四、县长夙称地方官，直接人民，应就资格符合之人，慎选其清慎勤能者而任之，严其考核，明其奖惩，俾政令能切实推行于各地方。

就将召开国民参政会

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发表谈话·

(1939年9月3日)

我觉得对第四届参政会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历届参政会所通过的提案实行了多少？是怎样实行的？检查提案的实行，现在应该重视。我个人对参政会有一种见解，我想开会时间是那样短，需要解决的问题又那样繁杂，因此，提案和讨论应该着重当时几个与民族国家最有关的中心问题，不要把注意分散在零零碎碎无关大局的问题上去。至于这一届参政会，正当国际上处于动荡局面，国内政治财政都发生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时正是中国最需要艰苦奋斗的时候。

抗战必胜这估计，我们在军事上已经完全相信，但在政治方面，总觉尚未达到应有的配合。首先，我觉得各级政治机构，应适应抗战需要，愈简单愈好，这样才能增加工作效率。其次，一般工作人员，必须严厉革除过去的贪污腐化与敷衍塞责的不良现象。我们只有不讲情，选用真正人才来负起非常时期的任务。在选用人才上，又必须大公无私，不存党派成见，这样才能广揽全国人才，拯救国家与民族于危急关头。

• 原载《新华日报》1939年9月3日。

汪逆本身已经是臭得令人作呕了，还有什么值得谈呢？我们除了用电报去打击他外，重要的是另外两个问题：第一，要展开反对妥协投降的谬论，要和受了汪逆影响的分子，作思想上的斗争；第二，我们还要同汪逆作政治上的斗争，要用国内的政治改进，来粉碎汪逆造谣离间的政治欺骗。说到民众运动，首先要解决民主问题，人民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政府有了巩固的民主力量，民众不动是不可能的。再进一步，就是巩固团结，消除派别的成见，相信民众的伟大力量，不是惧怕群众运动，而是大胆的积极的开展民众运动，造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无比巨大的反对日寇侵略的力量，来置敌寇于死地。

建设川康川人应有的责任

(1939年10月17日)

第四次参政会开会时，议长蒋先生^[1]说，我们要达到抗战的目的，必须巩固我们的抗战根据地，必须完成后方各种经济、产业、政治、文化，尤其是地方自治等等的建设，以强固我们抗战的本身，健全我们建国的基础。无论国际变化和时代演进如何迅速，而这是我们唯一的根本问题。我们中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深信必能贯彻抗战国策，粉碎敌人侵略野心，得到最后胜利。但是唯一的要件，就非得从速充实我们自力奋斗的国力不可。

讲到后方建设，当然任何省份都是同样重要，但凡事应有一个重点，我们开始建设的区域，应该是西北与西南各省，而川康为西北和西南的中心地区，更为重要。我们在上次开会的时候，决定设立川康建设期成会，同时组织川康建设视察团，这几个月来，各位参政员同人不惮溽暑，不辞跋涉，遍历川康各地，一面考察，一面宣传，对地方政府和民众给予以莫大的鼓舞，同时搜集了许多很切实、丰富的材料。怎样利用这个宝贵的收获来推进我们后方的建设，是这一次大会所要特别讨论的一个主题。诸位要尽量贡献，我相信政府必能充分采纳。闭会时，蒋先生又郑重

• 原载《新民报》1939年10月17日第二版。

地说：“川康建设期成会必须继续积极地工作，以求达到建设川康的目的”。建设川康重要而且迫切，看了蒋先生在参政会的致词，大家应该是知道了。川康建设方案业由川康建设期成会根据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制定，由议长蒋先生交付参政会讨论，并经大会一致通过，送请政府切实行。查其内容计分行政组织、兵役、财政、民生、治安、经济建设、禁烟、教育、夷务、川康边区司法九部分，所陈建设方法，很详切妥善，可以说是川康的新生命。现在又值蒋先生兼理四川省主席之时，有治法更有治人，改进当然容易。但是川康人民，尤其是四川人民，应该如何奋发起来，结合起来，共同负此建设责任，实在是一个紧要问题。我以为建设川康，四川人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绝不容推诿，而能够负责任的人首先是绅耆和知识分子。不过川省的绅耆和知识分子这十几年来因为受了种种压迫、摧残，大多数的人变成了消极散漫，苟且偷安，即遇有关系重大的事，亦以为事不干己，不肯留心，其意气不平者，亦惟背后疵议，不敢公然主张。川政的败坏日甚，实由于民气消沉。今天时局转变了，绅耆和知识分子们，大家应该立刻奋发起来，结合起来，以建设川康为中心工作，依照川康建设方案，督促政府从速实行，并帮助政府彻底实行，以期迅速达成功方建设，充实我们自力奋斗的国力。其次是军人，川省军人皆具有爱国家、爱四川之心，其出征抗战者，不少功在国家之人；其留在后方者，当尽爱护四川之责。惟年来有因爱川、护川未得其道，而致内外间之怀疑、误解。须知爱护四川，必先问如何可治川，而不致于乱川。此次参政会通过的川康建设方案，即是治川良法，循之则治，不循之则乱。惟能在后方赞助建设川康，乃为爱护四川的正道，本纯洁之心，以拥护事业

的建设为目的，不独有利于四川，且为抗战建国之大助。

总之，今日不能建设四川，即不能支持国家。然苟不以国家为前提，四川亦绝无好望。个人利害，逃不出地方的治乱安危，如其不以地方为前提，个人亦终究不利。我全川的绅耆和知识分子，我全川的军人，在社会上你们力量特别大，赶紧奋发起来，结合起来，认清建设川康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努力前进！须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新时代紧逼而来，不可以再为消极，不容其再有错误。今日只有督促政府、协助政府去实行建设川康。川康建设成功之日，就是四川人的成功。

注 释：

(1) 蒋先生 指蒋介石。

先考秀才公先妣 王太夫人墓碑文

(1940年2月)

先考秀才公为吾祖扶九公之长子，原名文倬，更名本清，别号海楼。世居南充之张观沟〔1〕。少勤学，举秀才。祖父母歿，与先妣王太夫人奉养曾祖父曾继祖母，勤顺如子。兄弟五人析居后，有田不足四亩，乃授徒，藉馆谷以自给。后移居西充之召善沟〔2〕，佃田耕种，亲自督理农事；日仍课澜兄弟读，极辛劳。家中丁口逾二十，岁不丰，尝累月食不得米，未尝向人言穷。终生衣布服，尝着一羊裘，为吾祖遗物，虽敝不肯易。族人多贫苦，乃于族中设义庄会。有老不得养，幼不得教，女无以嫁，死无以葬者，皆厚助之。与乡人处，为子言孝，为父言慈，为贫人言勤勉，为富人言仁厚，恒视其身境之不同而谆谆告以所应知之道。

平生无不检之行，无苟取之财。常教澜兄弟曰：“人虽贫贱，善当为，恶不可为也。”前先妣二十年卒。先妣性甚刚，治家有法，无敢怠惰。澜任省长时，犹督吾媳妇勤农作，诸孙虽幼，或分以饵饼，或给以数钱，必诱之使勤。居贫久，甚俭约，而待人则以刻薄为戒。荷肩舆者至，吾家必款之以酒食，谓

• 据手稿

其同是人子而特劳苦者也。澜先后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家贫如故，但勉以做好官，未尝索一钱以裕家。澜于宣慰使解职后，曾负债钱六百缗，还期将届，欲再贷于人，先妣则允鬻所购置之微产以偿，而以勿轻求人为勖。澜之居官不敢贪污，能自立于世不为夸毗者，实先考妣德行之所陶成。先考生于前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九月八日，卒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闰八月一日，享年六十有四。先妣生于道光十八年（戊戌）闰四月十六日，卒于中华民国九年（庚申）七月九日，享年八十有三。歿皆在召善沟，而归葬于罗家沟之祖茔。有子男四人，长从善、次涛，次澜、次浦。女七人，长适刘，次适陈，次适吴，次适王，次适吴，次适李、次适杨。有孙男十六人、女十六人，曾孙男女若干人。今距先妣之卒又二十年矣，始伐石树碑焉。

呜呼！殖善于贫困者多兴，求安于富贵者自贱，后世子孙其毋忘祖德。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第三男张澜敬谨撰文

注 释：

- 〔1〕张观沟 现属西充县连池乡观音堂村。
- 〔2〕召善沟 现西充县永清乡赵山沟村。

致张茂延

(1940年4月9日)

茂延：〔1〕

你要看大公报，已给你订了三个月。

你要再向前进，免掉女子读书只是为家庭的陋习。立志甚好，但是如何才能够不为家庭所囿，而能为社会、人群及国家尽力？这是要有实际的知识，专门的技能，前进的毅力，才能做得到的，不是空空的有理想，说大话可以做得到的。

时代一天演进一天，社会一天复杂一天，你要再向前进，必须努力求得实际的知识和专门的技能，方足以应用，现在你固然说不到此，但是不可不知道，不可不注意。

我月前由南充赴渝，在路上淋了两天雨，人甚安好。十九到渝二十即开宪政期成会，接连开了十天，又开一天川康设期成会，只有三十一的一天没有开会。从四月一日起，开参政会十天，明天闭会，天天都在开会，成绩实在不好。我于十五前后仍回南充，在此甚平安。

四月九日父手书

注 释：

〔1〕茂延 即张茂延，张澜长女，时就读成都省立女中，并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 据家书手稿。

致郭子杰

(1940年12月9日)

子杰〔1〕先生大鉴：

渝中握手，时念贤劳。澜于近日专返南充，时下榻省蚕丝场。□□实地观察该场近况，该场内之省立高蚕校师生精神颇为良好，新建实习丝厂设备亦佳，学生班次已达八班，内高级六班，初级两班，人数约三百左右，惟该校经费极形拮据，自改组后，经费虽由教育厅、丝公司补助万元，但又为何北衡〔2〕移作川东榨蚕试验经费。为学生真能学得技能计，一切设备必须添置齐全，该校主持人虽力求撙节开支，仍不敷支用，现闻超出数甚多，深苦无法办理，且该校教员多系蚕丝场职员兼任，尚感不敷开支，明年班次再加，则经费更觉棘手。查该校自抗战后，已成为全国之中心蚕丝学校，蚕丝人才胥赖以培育，校内设备亟应力求充实，欲充实设备，自当增添经费，犹记二十七年春，澜在省时，曾与何北衡、蒋养春两厅长协议，南充职中校将来改为省立学校时，其经费由建、教两厅平均担负，今该校既改省立，即希仍循旧议，并予大量增加，以助该校发展俾地方国家，两得其利。专致此函达，敬祈裁复！

• 据手稿。

顺颂
公绥！

张 澜

十二月九日

注 释：

〔1〕郭子杰 又名有守，四川资中人，生于1901年。曾赴法国巴黎大学、英剑桥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在教育部工作，1938年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连续七年之久。

〔2〕何北衡（1896—1972） 本名恩枢，四川罗江人，北京大学毕业，解放前曾任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水利局局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建国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 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

(1941年11月)

同人等盱衡时局，审度内外，默察全国民众心理，窃以抗战尚有赖于长期努力；配合世界民主阵线，必求表里一致；从物质上精神上安定人心，必有基本扼要之措施。因根据本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经最大多数所通过建议政府实行宪政一案之原有精神，并列举在实行宪政前后所必须执行之各事项，再本原案提出，敬请政府采纳施行，藉以求得国际之多助，昭示大信于国人，振作渐呈疲乏之人心，加强团结之实际，以利抗战，而固国基，所拟办法十条，胪列于后，是否有当，敬祈公决。

一、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二、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

三、为节省抗战时财政支出，减轻民众负担，并预防青年依赖心理，增加其对国体之主义或主张之纯洁信仰，任何党派不得

* 据提案油印稿。1941年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澜于11月25日向大会提出提案，由董必武等23人联署。由于蒋介石拒不接受，因而未能提交参政会讨论。

以国库供给党费。

四、政府一切机关，应发挥天下为公之精神，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尤以战时如然，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

五、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并严厉制止青年学生参加党派斗争以饬学风而固国家元气。

六、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等之自由。

七、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并禁止一切非法特殊处置，以减少无谓之猜嫌，使天下归心，共支危局，而臻国家于法治之常轨。

八、明令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以便凡热心之公正人士，均有机会参与地方政治，不受考试之限制。

九、实现经济民主化之原则，确定人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厘定人民平均合理之负担，并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

十、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藉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

提案人：张 澜 张一麟 张君劢
左舜生 罗隆基 李 璞
陈启天 常乃德 余家菊
梁实秋 董必武 光 升
副署人：沈钧儒 王造时 史 良

陶行知 冷 遇 黄炎培
江恒源 刘王立明 谢冰心
晏阳初 邓颖超

请政府恢复马寅初之职业 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

(1941年11月)

理由：

查去年九月，中央大学教授马寅初^[1]以讲演公债言语切直，竟至丧失其职业自由。在马寅初当时有慨于民困国贫，为感情所激，所言或不无过失，然安置偏方已逾一年，犹未获返，无怪忧时爱国之士，皆有多言不如默尔之戒惧。今日抗战局势已到最紧张关头，政府政治经济必如何改善，如何调整始能支持抗战。以达于最后的胜利自应广纳忠言，不厌闻过，以求措施之咸宜。马寅初为国内有名经济学者，当此国家经济财政困窘情形异常严重时期，尤不应使之投闲置散。应请政府迅予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并使忧时爱国之士，闻而自励，皆愿竭忠献党，拾遗补阙，以襄助抗战建国之成功。阿谀之风变，壅蔽之害除，其有利于国家，当非寻常使一能拔一士所可比拟也。

办法：

- 一、迅速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仍使担任大学教授。
- 二、凡有忠直利国之言，政府应虚怀采纳，即有不合，亦应大度涵容，不宜辄加严谴，致绝忠谏之路。

• 据《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

注 释：

[1]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抗战时期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40年12月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被捕入狱，1944年12月获释。建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著有《新人口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

说仁·说义

(1942年1月26日)

二十九年夏秋之间，余寓居建华中学，感于国家之阽危，政治之腐败，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所谓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嚣然成风，而恬不为怪。爰集经、子旧说，为诸生言仁义，考《春秋》之法，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故欲其毋自私自利，而能宏爱人利物之用也，则为之言仁；欲其有廉耻，有气节，而能严立身处世之则也，则为之言义。振末俗之衰颓，育真才于晦否，舍此无他道也。昨岁，客成渝，复取前稿，时加修改，又得邵明叔、蒙文通、熊十力诸先生之教正，文义既繁，非中学生所能尽喻，特复写存自励，并以励夫世之君子。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张澜识。

*原系铅印本。写成于1940—1942年间，引文间，有错讹，已核对原文，作了校正。《说仁》、《说义》对宋明理学心学中有关仁、义诸问题，做了正确的批判和继承。尤其是融通儒、墨，诠释仁、义，说解透彻。

说 仁

一、仁本于天命之性

仁者，稟于天而体之人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1〕天地之大德在能生生，生生不息即是大仁。此言圣人在位必体天地生生之德而行仁，以合天也。《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2〕有物，谓人生而为具有形气之物，然非顽然一物而已，必具有天则焉。天则者何？谓仁、义、礼、知、信，乃至万善，皆是此言。民之稟仁于天，而执持以为常道也。《书》曰：“惟皇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3〕降衷，谓天以至中之理降于民心，即仁、义、礼、知、信，五常之性也。此言能顺人之常性以立教，使民皆全其天理，乃是为君之道也。又曰：“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4〕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牧之民者。天所恤能敬，天方能仁民，此言天必于仁德之君，是眷民必以仁德之君为归也。天也，君也，民也，其关系皆不外乎仁。人能体此仁，即可合于天，天人之相与，固以一仁为之筦枢。而君能帅天下以仁，则民亦自从之也。此等大义，今人视若陈言，实则政体虽更，君主虽废，而为民群领袖主持大政者，要当深体古之君道，敬天畏民，本至仁以与兆庶相感召，然

后人极立，而化功成。

欲明仁之德，必先知性。《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5〕中者，至理也。（理之极至曰至理）至诚之理，动而昭显，则谓之气，故理气非二也。而又不得不分言之，人受气而成形，受理而成性，理气之浑然者，无稍欠缺。此理在人谓之性，若自其为天地万物之大原而言之，则亦谓之中，亦谓之道，亦谓之天。天之若主宰而流行者，则又谓之命。盖天也、理也、道也、中也、命也、性也，从言异路，所目则一。吾人苟反躬而求，则帝载之，无声无臭，万理咸备，而浑然在中，穆穆渊渊、浩浩者，皆默识而昭昭不爽者也。夫此理，乃为吾人所以生之理，故谓之性；以其主乎吾人之一身而言，则又谓之心；以其随处发现而各成其德，则又谓之仁义及礼知信，乃至万德。谓之德者，此粹然之善性，存于心，则为纯白之直心，本此直心而行著于身，则谓之德。故德之古文作惠，从直，从心，加彳者，示其行也。顾人之性无不善，而前儒或说本然之性善，而气质之性则有不善者，殊不知性即天理。《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6〕静者，未感于物也，本纯一不杂，安得有二。惟心则有人心、道心之分。道心由先天而来，即自然诚善之性；人心之发，易入于妄，则既生以后，气质之累为之，故可谓之气质之心，而不可谓之气质之性也。性之动为情，恻隐羞恶之心，皆情之发也。而孟子谓之仁义，则因用以著其本体，见情无不可以为善，则性之本善可知；其有为不善者，乃物欲陷溺而然，孟子以为非才之罪是也。

仁、义、礼、知、信五性，是谓五常之德，只言仁者，以仁为诸德之首而统之。《易》言：“乾，元亨利贞。”〔7〕而释之

曰：“元者，善之长也。”又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8]德在天谓之元，在人则谓之仁。元即是仁，天之德生生不息，故元为万善之长。仁亦生生不息，故仁首诸德而统之。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行仁德以法天之元德，故足以尊长于人而在上位，则仁之德为至大而至贵也。是故人之为人，必有此特具之善性；人而不仁，非人类也，此圣人之所大戚也。人类之生存与禽兽不同，禽兽生存于个体之爪牙，人类生存于大群之才智，使无心德爱理以为之结合，则各竭其才，各逞其智，以相争夺，相贼害，残忍之祸将百倍于鸷禽猛兽之攫搏吞噬，而天理灭，人类绝矣。古之先民有见于此，其造仁字，从人，从二，从人者，人有此身，即具有此心德爱理，而必不可缺。盖吾之本心之良，自与天地同体。然苟一念不仁，即一念入于禽兽，有人则有仁，无仁则非人。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人无有不善。”而仁之古文作惪，从干心，^[9]正明众心之所同也。从二者，以自对他，两相亲爱。由二以上至于千万，国家世界胥在此中，谓“仁无方”，即此义也。

由此观之，世界人类无一非爱之结合，即无一非仁之流行也。今日者，人道苦矣，战争历数年，死伤遍世界，国则友仇变于一旦，家则亲子散于四方。彼为暴者，但逞凶强，罔知正义，其性与虎狼何殊？茫茫宇宙，毫无生趣。有志救世者，其必体天地施生之德，而以存仁心，行仁政为急务，以求达世界之和平也。

二、仁统知勇而为行

《中庸》以知、仁、勇为三达德，而言：“好学近乎知，力

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仁之德，虽若与知、勇殊，然好学则知之明，而后处之当，知耻则起其懦，即以策其行，皆为力行之所赖。盖仁统知、勇而为行仁之体，本万德具备无有不知不勇者。然其发而施于事，则不能无所失，如父母之溺爱其子，则仁而陷于不知矣。又如宋仁宗之仁厚而为治，而至于委靡不振，则仁而陷于不勇矣。故知所以明此仁，勇所以强此仁者也。

就为人言之，孔子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10]愚谓可陷可罔之类，欲祛此蔽，必须好学，好学则足以破愚。故《中庸》云：“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先之以博学，复就所学而加以审问、慎思、明辨，以求其理之真，所以择善而为知也。笃行则本其所择之善，而行之不息，所以固执而为仁也。仁守之，必先知及之，故曰知所以明此仁者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1]弘毅，勇之大者也。士以仁为己任，必身体而力行之，则非弘不能胜其重；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则非毅无以致其远，故曰勇所以强此仁者也。

举事言之，则如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唯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此仁治也。然非有“闢四门，明四目，达四聪”^[12]之大知，则不能使其仁德广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13]，此仁心也。然非有“疏九河，决汝汉，排淮泗”^[14]之大勇，则不能使其仁功底成。知、勇虽与仁并称，实所以辅成仁之德。

盖仁为治天下之大本，而知、勇则治天下之大用也。若夫仁至于熟，则德无不实成。已自然成物，时措咸宜，而仁者无不知。

心无私累，见义必为，而仁者必有勇，则仁固兼知、勇而有之也。然仁固不能离知、勇，而知、勇尤不可以无仁。今使有知而无仁，则不过机变之巧。陆象山所谓“田地不净洁，若读书，只是假寇兵，资盗粮”〔15〕是也。使有勇而无仁，则必将为乱为盗。董仲舒所谓“不仁而有暴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16〕是也。不仁之祸，皆由挟知恃勇而生，知知、勇之不可以无仁，而诈愚苦怯之害，当可以渐息也。

三、孔子言仁只在反求之心

言仁之最备者，莫如孔子。孔子之言仁，皆就本心之德而言之。内外交修，体用兼至。其为之也，则主敬；其体之也，则存诚；其功化之极也，则参于天地。

顾其用力之要，则具于答颜渊、仲弓、司马牛之间仁。

颜渊问仁，告之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7〕颜渊好学，其于圣人，未达一间而已，故告之以此。曰克己复礼为仁者，仁乃生生之德，人之所以为人，全赖有此。尅指其体，即本然至善之性也。性原于天命，浑然粹然，本无不善。惟有生以后，气质拘，而七情扰，外则物感无穷，内则好恶无节，天理遂为人欲所障蔽，然而未尝或亡，必克胜己身之私欲，至于净尽，而使天理返乎性，始所有皆诚，是谓复礼，而仁之德以全也。不曰理，而曰礼者，礼为天理之节文，其见于百为而莫不当理，即礼也。此则内外兼尽，非专尚虚静如老子之观复也。夫致虚极，守静笃，而遗物以反真，屏事以抱朴者，是谓专内而遗外，非道也。道则通内外，而浑然为一者也。故恒虚静在

中，而亦恒酬酢万物万事，恒酬酢万物万事而毕竟恒虚静在中，此所以礼即理，而理即礼也，故云内外兼尽也。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者，所谓一日，乃仁熟之候；己克，则意必固，我之皆绝，而善无不明；礼复，则穷理尽性以至命，而身无不诚。至明至诚，肫肫渊渊，浩浩天下，万事万理，皆为吾心之仁所涵覆，而莫能外也。请问其目，则告以非礼勿视、听、言、动，盖示之以存诚，必当主敬也。非礼即是己勿，即是克。勿者，禁止之辞。必心能主敬，常自儆敕，始足以察其几，而致其决。己克则礼复，故礼之要，为毋不敬也。足以与此相发明者，莫如《中庸》。

《中庸》谓：“率性之谓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盖遏人欲于将萌，虽极之无所睹闻，亦不敢忽，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是谓慎独。慎独者，即克己时之功夫也。又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言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也。和者，言其应事接物，情得其正，而无所乖戾也。所谓中和，即复礼时之景象也。又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极吾心之正，而天地安其所；极吾心之爱，而万物遂其生，所谓位育即吾心之仁之涵覆万有而皆得其理，乃天下归仁之极化也。为仁之功尽于此矣。

仲弓问仁，告之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18]仲弓从政，而可使南面者也，故告之以此。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以持己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以及物也。敬是仁之存于中，恕是仁之形于外，能敬则本心之良常惺，能恕则天下之情皆顺，

而仁之为道尽是矣。邦家无怨，明施仁之效也。考孔子言仁之涉于政者，其要旨皆不外敬、恕二字。如子张问仁，而告之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19〕以恭为首，是为主敬。宽、信、敏、惠，则皆恕之推施也。樊迟问仁，而告之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0〕。曰恭，曰敬，是为主敬。忠者，恕之存主处；而恕者，忠之流行处也。子路问君子，而告之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1〕君子，即仁人也。修己必主于敬，安人，安百姓不离于修己，则本敬以行恕更为著明。又答子贡之问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2〕此亦指恕而言，盖不欲勿施，乃就恕之消极方面而言之；若扩充己之所欲而推及于人，以尽其量，使之同立同达，则正恕之积极方面之所表著也。凡此皆与答仲弓之问，大旨相同，尤以《大学》一书言之甚详。《大学》言仁，以尧、舜为极则。而其始必本于诚意，其终则极于平天下。意何以诚，不外于主敬；天下何以平，不外于行恕。观其言诚意之道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两言“君子必慎其独”，慎独之功，即主敬也。敬无一息不当然，故复举汤之日新，文王之敬止以明之。惟主敬，而后能诚其意也；其言平天下之道，以絜矩为最要。而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即行恕也，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诸人者，治国犹难，何况天下。惟行恕，而后能平天下也。孔子于仲弓之间仁，而举敬恕之道以告之，仲弓他日于南面之许，亦以居敬行简为言，此内圣外王之学也。

司马牛问仁，告之以“仁者其言也讱。”又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23] 司马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仁之为道，广大而精微，要在身体力行，非言所能袭取，故慎言所以顾行，默识所以体道。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其难其慎，则更教人以求仁之实也。所谓“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24] 即是此意。

观于孔子答三子之间仁，虽语有深浅，而旨实一贯。为颜渊言者，为仁之功也；为仲弓言者，施仁之道也；为司马牛言者，仁贵实践不在多言也，其要皆在此心之无一时一事而不敬。能敬，故所存皆诚；能诚，故所行常恕，斯能尽乎性之量，而与天地合德也。《论语》比而记之，他虽有言仁者，无能出乎此也。

然而人或不免以富贵、贫贱之殊，死生、危难之变，而摇动其本心之仁。故孔子又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5] 夫富贵贫贱，人情欲恶之大同，君子非却富贵而不居，以贫贱而骄世，盖有仁焉。自足于己，故无待于外。不辨礼义，而受虽万钟何加？能使性分常完，自慊无馁，虽穷居何损？孔子所以安饮水之乐，而抗浮云之志也。至若当宇宙殄灭，国家颠危之时，则又示之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6] 盖志士仁人，能实见理之是非，以为当死而求生，虽偷息百岁，内咎神明；当死而即死，虽致命一朝，长留正气。故如夷、齐不食周粟而饿死，则美其民到今称；童孺能执干戈以卫国，则许其勿殇为可。盖当死即死，所行能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皆无愧于成仁也。夫无终食之间违仁，可见其敬

之不懈，而诚之不息。至杀身以成仁，则尤敬之笃，而诚之坚，故能贯始终，常变不稍畏沮。观于孔子之言仁，学者当知所从事而勉强以行之也。

四、孟子言仁重在政

继孔子而言仁者为孟子。孟子言仁，亦常以心之存养为教。如云：“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7〕又云：“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28〕于是为之指出“平旦之气”。而曰：“得养则长，失养则消。”〔29〕盖心为物欲所蔽，或引而放，人能求其已放之良心，反入于内，存之而不使顷刻失其养，则神清气定，常如平旦之时，无适而非仁矣。此即克己复礼之意也。

孟子愿学孔子，其内圣之功，不外存仁，既如上述。其外王之道，虽经纬万端，其要只是仁政。孟子以为政之要，在仁民。而其推行，必先之以亲亲，后及于爱物。故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0〕盖由近以及远也。仁民必本于亲亲者，孝弟为行仁之本，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31〕是也。仁民而又必爱物者，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故虽鱼鳖草木，亦必加以爱育，所谓“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32〕是也。然而孟子所言仁民之政，非徒有善心而已，实具先王平治天下之大法。其告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33〕夫省刑罚，所以恤民命也；薄税敛，所以厚民生也；深耕易耨，俾足于养，所以致民力也；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则兴于教，所以尽民性也。仁政之要备于此矣。而此四者之中，则以教之以孝弟忠信为最重。当战国时，皆尚功利，讲攻战，其教民也不复注意德性之培养，六国之亡，与秦之骤兴而骤灭，非无故也，胥失其本也。孟子教育宗旨，首在孝弟忠信，所以复人性而养民德，真洞见本原，乃仁政之隆基也。今列强之教，亦不外功利与攻战，不仁而趋于自毁，至可悲矣，盍亦反诸吾孟子之道乎？

惟是民以食为天，使日困迫于饥寒，则礼义无暇讲求，而盗窃乱贼以作，故其教齐宣王以发政施仁。则曰：“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34〕盖民之为非，而罹于刑，由于失教而无恒心。而失教之原因，则由于无恒产，于是告以制民之产之法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35〕夫五亩之宅，既树以桑，又有鸡豚狗彘之畜，又耕百亩之田，则养无或匮也。衣食既足，即为之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则教无或疏也。惟其事，畜有资，饥寒无虑，率之以善教，民自易从，而为恶犯刑之事鲜矣。是则仁政之施，养急于教，而必先使天下之民皆有可常生之业也。夫所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皆井田之法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三代以来，能行井田，则均平而无贫，民皆得养，而天下安；反之，则民多失养，而天下不安。故滕文公使人问井

地，孟子告之以“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36〕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即行井田也。经界不正，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田既不均，又加之以重税，此所以民生穷困，室多悬磬之忧，邑有流亡之叹，盗贼蜂起，而天下靡宁也。于是复为详言井田形体之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37〕八家共一井，除公田外，一家数口，而自耕百亩之田，各有定分，则所以养生者无虞不足也。又告以分田制禄之法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38〕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行助法；国中乡遂之地，田不井授，但为沟洫，使什而自赋其一，则税不重，而民皆裕也。田既均，税又薄，家给人足，善心自生。于是为言井田风俗之美曰：“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39〕

盖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其时则里有序，乡有序，里序之中，则以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之师，教其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皆涵濡于善教，以故友助扶持，亲睦成风，亦即答为国之间。既行助法，则设庠序学校以教之，人伦明于上，而小民亲于下也。

综观孟子所言仁政，其要不外省刑、薄税、足养、兴教四端。四端之中，刚以教为重，以养为急，而能达成之者，厥惟实行井田。盖必能实行井田，则不相侵陵，而刑自省也；取有定制，而税常薄也；民有恒产，而养皆足也；人皆入学，而教大兴也。仁政如此，此三代之所以称盛治也。人而不欲平治天下则已，如欲平治天下，舍此奚由？

独是孟子生当战国，遭世之乱，所言仁政，罔克实行，而不仁之人与不仁之政，殆遍于天下。乃复就目击心悲之事，发为警世垂教之言，见乎有国者不能行先王之道以求治，而任用非人，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在位者妄行而犯义，在下者无惮而犯刑，危乱日至，国将不存。爰为之深警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40〕观乎此，则后世之秉国钧成者，诚不可不引为殷鉴也。

又见夫好战之君，争地争城以战，而至杀人盈于城野，尤为深恶痛绝。于是举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又驱其所爱子弟以殉，而严斥之曰：“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41〕观乎此，后世之蓄志侵略人国，残民以逞者，固在所必诛也。

又见夫国家当外患凭陵之时，正有赖于人民之群起御侮，乃有司惟知残下，只求仓库府库之充实，而不恤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于是因邹为鲁败，民皆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而警告邹君曰：“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42〕观乎此，则后世之抗强敌而保卫国家者，亦当知有所戒也。故述孟子者，可以明为政之道矣。

五、墨子言仁重在兼爱交利而达于大同

墨子之言仁，其所施更为博大。墨子之道，本于禹。禹形劳天下，以求中国之得食，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故墨者亦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泛爱兼利，而非斗以求天下之治。

孟子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43〕诚是也，而诋其“贼道”则非也。

墨子以为：“仁，爱也；义，利也。”〔44〕有仁必有义，爱、利不可分。仁义之于人，若左目出、右目入也。世未有不爱人而可谓之仁者，亦未有不利于人而可谓之爱人而可以为仁者。盖爱为仁之体，利则仁之用。爱之及于人有广狭，因而利之及于人即有广狭。自利者，由于自爱而不爱人；爱人者，必能利人而不自利。故墨子之言曰：“乱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45〕是则自利之为害于人，由于自爱而不爱人也，审矣。

然则将何以救其乱乎？墨子以为：“天下祸篡怨恨，起于不相爱，是以仁者非之。而易之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孝慈，兄弟相爱则调和。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故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46〕是知不相爱者，必

不能利人；兼相爱者，必能兼利人；能兼相爱交相利，而天下无不治也。

然而墨子犹恐人之相非也，更举天志以明之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顺天之意而得赏者，禹、汤、文、武是也。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反天意而得罚者，桀、纣、幽、厉是也。其事上诬天，中诬鬼，下贼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别而恶之；我所利，交而贼之；恶人者，此为之博也；贼人者，此为之厚也。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歿其世。”〔47〕是天之好仁而恶不仁，其事固彰彰明甚也。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天志。天志为人道之权衡，故人类必法天而为治，以跻乎大同之盛，郅治之休，其义至为闳邃，而非其他言仁者之所及。

《礼运》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为七十子后学所记，盖根据孔子《春秋》太平世之义而推衍之。孟子天下“定于一”之论，亦相冥符。墨子理想中之治道，亦不期而与《礼运》密合。

按《礼运》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即墨子之所称尚同。尚同之道，首在选贤与能，盖“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48〕下至于乡长、里长之选择，皆为仁人。皆以“爱利家，爱利国，爱利天下者为赏；恶贼家，恶贼国，恶贼天下者为罚。”

“壹同乡国天下之义，而上同于天”，〔49〕则公之至也。惟以尚同为政，故“去若不善言，而学乡长、国君、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而学乡长、国君、天子之善行”。〔50〕于是谈说皆有信，行习皆亲睦，而兼爱交利之道行也。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独亲己亲，不独子己子，则为主张兼爱者最明切之表示。曰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兼爱人亲、兼爱人子之事。墨子谓：“以兼为正，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持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51〕正与之同。盖不能出劳力以自为生者，必使之无一人不得其所也。曰壮有所用，即墨子所谓“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52〕曰男有分，女有归，即墨子所谓男女皆有“分事”，“各从事其能”。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墨子亦谓天下之乱，由“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53〕余力相劳，余财相分，其意略与《礼运》同。惟财产不为私有，劳作不为私利，则《礼运》之义为深；而必以良道相教，则墨子之义为备。人惟各竭其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共同从事于生产，并使教育普及，而后兼爱交利之理想可以实现于天下也。衣食足，礼让兴，天下太平。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即墨子所谓“视人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54〕斯兼相爱交相利之明效大验也。夫至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举家界、国界而尽破之，亦即《礼运》之所谓大同。考墨子之所言，

与《礼运》无不同者，其推极兼爱交利之功效，至于大同，盖兼近代之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而有之。如墨子之言仁，诚政治教化之极则也。

综观吾先哲之言治，如儒家之大同、太平诸义，墨氏之尚同、兼爱诸义，老庄主自由，除国界，并一切法制与所崇尚号召之具，（庄子剖斗折衡，一切法制不立也。老子薄仁义礼，非在仁义礼之本体上立论，乃取当时窃仁义礼之迹以为号召之具者，而痛诋之也。今列强所谓文明与正义，皆老子所必斥。）而皆抨击不遗余力。凡此皆陈义宏远，为今欧人所不能窥。但墨子言兼爱，必以交相利为征，最为切实。由墨氏之道，则世界经济问题必一以大公为原则，绝不许有以此侵彼，或以强侵弱之事，尽大地人类利用厚生之资，一切交相利，一切均平，则谓全世界为天国可也。斯仁道之极也。继今以往人类，如不自毁，其必由斯道也夫。

说　　义

一、义主制断

仁为天理万善之长也。自其一心之仁而推之，万事万物，处之咸宜，是谓义。义即天理之所宜，故曰“义者，宜也”。〔55〕前儒训义者，事之宜。而误解者或只在事上求宜，则大误。盖以纯乎天理之心，而酬酢万事万物之交，恰当其可，无一毫过不及处，故谓之宜。若舍此至仁或天理之心，而只于事上求宜，则无

有权度，无所取准，奚以得宜耶？

《礼运》以“仁为义之本，义为仁之节”，其言至为精当。盖义不本之于仁，则如果断者必少慈祥愷悌之意；仁不节之以义，则如宽柔者难期不流不倚之行。故义本之仁，则发无不善；仁节以义，则施无不宜也。行合于义，即行得其宜。顾行之宜不宜，必由内心加以裁断，而裁断得宜处，即为当然之法度，而不可易者。

古者书仪为义。仪，度也。度，法制也。因而义亦含有法制之意。故《表记》曰：“义者，天下之制也。”制谓以本乎天理之法度，而裁断于事，使物各得其宜也。当于法度则为之，不当于法度则不为。一言语，一举止，皆加之以裁断而不敢有丝毫之苟，义所以为天地严凝之气也。然何以能裁断靡失，则必由克己复礼而来。克己，则去私而无蔽，斯能明是非，决可否，而事得其宜。复礼，则循理而不忒，斯能无偏颇，无反侧，而行当于正。

惟仁熟而后义精也。人非明于义，则不可与立；非精于义，则不可与权。盖事无定形，而有定理。泥于形者，必悖于理。惟守有定之理，以应无定之形，则事无失而理皆得。故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56]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57]以其能合于权也。能立，则义之为道也正；能权，则义之为用也神。要皆一本于天理之所宜以为制断而已矣。

今则言非礼义而自暴者，与夫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而自弃者，比比然矣。自暴则卑俚无识，自弃则苟且偷安，而国家社会遂不堪问也。惟能一以天理为制断，恒怀自尊之心，达则立朝，咸仰

正色之风；穷则饿死不受嗟来之食，亦恒怀自强之心；常则日乾夕惕，而德益进；变则劫众沮兵，而守不更。能自尊，能自强，斯可与为义也。

二、义利之辨

《易》言：乾，元亨利贞。孔子释之曰：“利者，义之和。”^{〔58〕}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复申言之曰：“利物足以和义。”^{〔59〕}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以和合于义，而法天之利也。是利为天之德，义则事之宜，能利物，即和合于义。墨子云“义，利也”。直以义为利，其旨正与《易》同。

盖其所谓利，就交相利而言之，交相利即是义，以其周宜于人也。利即是义，除利之外别无义。利不利，即义不义之标准。此以道德与实利合而为一者也。两者实相成，而非相反。顾所谓利，全是利人，所以利即是义，亦即是以义为利。若不思利人，而惟知自利，则别于义，而仅谓之私利，以其与义相反，而常至害义也。

凡以利与义相对而言者，皆就自利之害义者而言之。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0〕}因所喻之不同，而君子小人于以分。其所谓利，正就自利之害义者而言也。孟子以“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为舜之徒；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为蹠之徒。^{〔61〕}善，即是义；其所谓利，亦就自利之害义者而言也。故董仲舒云：“正其谊不谋其利。”^{〔62〕}盖义心根于秉彝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在己无

损，而利及于人。故孔子勉人以“行义以达其道”；^[63]“见义不为，无勇也”。^[64]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故孔子儆人以“放于利，而行多怨”。^[65]孟子亦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66]是由义则正我，即以宜人；贪利则损人，终至害己，何去何从，厥道甚明。

顾义心为人所同具，所谓性善也。乃世有能守义而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昧义而计丰约于晏安之时者。孟子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乃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67]夫生为我所欲，即“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而为之子必不为，则天下不若身之贵”^[68]之说也。舍生而取义，即“争一言以相杀，是义贵于身”^[69]之说也。呼蹴之食，宁身死而不肯受，恶其不义也。乃为身外之物而受无礼义之万钟，是秉彝之良心蔽于物欲，因而为晏安所诱夺；贪利而忘义，所以有失其知是知非之皎然者也。

或以为生与义不可得兼，则舍生而取义，固善也。然而言生者必有欲于利，此人情之大同；如专言义，而遂以言利为大戒，则将何以使人养生送死无憾？且己身即可饿死，又将何以仰事俯畜？人既有生，何能去利耶？不知舍生取义，非不爱生，特生必合于义耳。生必合于义，生亦不能离乎利，特不能专为利而生

耳。合于义之生，是充实其精神生活者也；专为利而生，是陷溺于物质享受者也。偏于物质享受，而离弃精神道德，则嫉忌之心必生，争夺之祸必起。晏子云：“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70]言苟舍义而蓄利，必生妖害，是舍义而徒生于利者，终必害其生也，惟物质享受，能不离于道德标准。见利思义，无非分之得，无无限制之取。在己有苟完苟美之心，在人无不均不安之患，生于利即生于义，生于义即生于利，生与义利相调和，斯可谓善也。若只知贪利，罔克由义，而且藉辞于仰事俯畜之资，须知祀亲必求仁粟，以不义之财富供其父母，不可谓之孝；教子必以义方，以不义之财富遗其子孙，不可谓之慈。此尤今之世人所当深省而切戒也。

三、义必有耻

孟子云：“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71]非其有而取，是谓不廉，不廉即非义也。又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72]羞恶之心，是谓耻，耻即义之发见乎情者也。廉与耻皆义之一节，而有耻尤要，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曰：“耻之于人大矣！”^[73]夫人常易从恶，必有耻而后不肯为非；常自满足，必有耻而后恐不若人。故小之则行已有耻，始可谓士；大之则明耻教战，乃能强国。自古以来，未有无耻而能淑其身，善其事者。

顾世间可耻之事，最大者莫如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居尊处贵，但知食禄。孔子谓：“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74]即斥此种人也。其次，则凭藉权势，贪利无

厌，子弟悉居腴职，家人咸有市心，封靡于邦，罔恤物议。孟子谓：“贱丈夫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⁷⁵⁾即斥此种人也。又其次，贪禄固位，惟恐或失，近权贵则舐痔为荣，妒贤能则腐鼠相吓。孔子谓：“鄙夫患失，无所不至。”⁽⁷⁶⁾即斥此种人也。又其次，歆羨富贵，枉道以求，昏夜乞哀，骄人白日。孟子谓：“齐人乞余墦间归，而骄其妻妾，为妻妾所羞者。”⁽⁷⁷⁾即斥此种人也。是皆所行可耻而违义之甚者矣。

历观史籍，滔滔皆然，此世道日趋于衰微，而国家常即于乱亡也。然而天下可耻之事不独在于富贵利达之人，即一乡之士，曲巷之民，苟或细行不矜，终累大德。故如隐而为穿逾之事，微而受尔汝之称，人多以其事属细微，不加重视，不知今日不耻穿逾，将来必肆行杀越而靡惮；今日不耻尔汝，将来必甘为奴隶而不辞。人能以穿逾为耻，而不怀穿逾之心；以受尔汝为耻，而不为受尔汝之实，本此不为之心而达之，于其所为，即所谓义也。故孟子谓：“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⁷⁸⁾惟其有耻，是以有所不为，使皆能即此心而推之，充大其美，则明礼义，知廉耻，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古来俗清于下，虽上有乱政，国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正赖此也。又况羞恶之心，人所同有，彼贪位嗜利之徒，奴颜婢膝，媚事权势，以博富贵者，其固有之良知绝不可灭亡，苟能反求其羞恶之端，而扩充之，则未尝不能闻义而徙，以共尽力于颠危之扶持。故居今日，而欲转移风气，复兴国家，必以有耻为立教之先务也。

四、义必有节

古称节义，节者，制约于善，而守之勿失，使不陷于不义者也。顾有高峻之节者，必先有刚大之气。孟子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79]直即是义，以养此至大至刚之气，即以此气配合于道义而助之行。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80]者，此气为之也；所谓“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81]者，此气为之也；所谓“舍生而取义”^[82]者，此气为之也；所谓“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83]所谓“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84]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85]亦皆此气为之也。人生穷达夷险，遭遇无常，有此至大至刚之气，则行自立；无此至大至刚之气，则行必隳。未有气不养，而能坚其所守之节者，古来所以重气节之士也。

何谓有节？试举孟子所言以明之。

一曰不枉己。陈代尝以孟子不往见诸侯为小节，而劝以枉尺而直寻。孟子则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86]所谓枉己，进不以正也。士君子读书尚志，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有闭门不纳之人。不由道而自往于前，宁异逾墙相从之贱？今日不惜卑躬，将来何以率物，故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也。

二曰不辱己。万章以伊尹以割烹要汤为问，孟子则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非其义与道，大之则禄以天下而弗顾，系马千驷而弗视；小之则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三使往聘之，乃幡然以为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岂若于我之身亲见其道之行？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87]天下之所以无真功名者，由无真气节，而欲气节之立，先在安恬退而慎出处，而以世道人心为己任，不急急于一己之智勇，功名于是乃有真功名，乃能拨乱而返治，伊尹斯其人也。岂有屈身于主，不恤为卑贱之行？后之人虽志切救民，而出处大节，当一以道义而不苟，决不可稍漫其身也。

三曰不学妾妇之道。景春以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为大丈夫。孟子斥其以顺为正，为妾妇之道。而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88]所谓妾妇之道，以其阿谀苟容，窃取权势，有异于直道而行，浩然无累者也。若大丈夫，则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使其得富贵，则被袗鼓琴，若其固有，何论卿相之荣？处贫贱则动心忍性，益所不能，讵以劳饿为戚？遇威武则自反而缩，万人吾往，何有诸侯之严？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其德性之坚定为何如也。

四曰不震惊势位。孟子谓“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

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89]常见士之之高自矜许者，一旦进于王公大人之前，往往形容偏促，应对失常，察其原因，实由识与养之不足。盖瞻纷华而歆羨者，自必见尊贵而畏；无圣贤为模范者，自必为流俗所移。惟能抗心古哲，内重则外自轻，斯不震惊势位而丧所守也。

五曰不作乡原。万章问孔子以乡原为德之贼，何如斯可谓之乡原？孟子答以乡原之讥狂者曰：“何以是謬謬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又讥狷者曰：“行何为踽踽凉凉？”而已则“阉然媚于世，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90]所谓乡原，既非如狂者之可与进取，又非如狷者之有所不为，而阉然媚于世，同流合污，既伪为和，似忠似廉，又伪为介，常持两可之见，以求悦于众人，宜为圣人之所深恶。然若世之居可为之位，值当言之时，不能达贤纠恶，而但小心以自持，不能陈善闭邪，而反后言以示直，身虽立于朝廷，心实同于乡原，尤为有识者之所不取也。

凡此五者之不为，皆所以立身于平日，砺行于穷时。常具淡泊宁静之怀，不为利诱威胁所屈，古来圣贤罔不如此。若夫“顽顿亡耻，麋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91]此贾谊之所为长太息者也。无耻无节，而义亡矣。义亡而人皆惟利是图。徒震惊于势位，不惜枉已辱己，相率而为妾妇之道，为乡原，官邪日章，士气消沮，内政不修，外患未已，国家之危，殆哉！岌岌时至今日，直可为痛哭者也。

举世滔滔，则安得上为公忠自矢，下以名节相高？在朝无愚鄙污秽之人，在野皆忠厚清修之士，见之者谓其如竹筠松心，闻之者足以使顽廉懦立，能存天地之正气，即能保国家于永存，此则所殷切跂望者也。

注 释：

- [1] 《周易·系辞下》。
- [2] 《诗·大雅·烝民》。
- [3] 《尚书·汤浩》。
- [4] 《尚书·太甲下》
- [5] 《左传》成公13年。
- [6] 《礼记·乐记》。
- [7] 《周易·经上》乾卦辞。
- [8] [58] [59] 《周易·乾·文言》。
- [9] 《说文解字》人部。
- [10] [19] [76] 《论语·阳货》。
- [11] [81] 《论语·泰伯》。
- [12] 《尚书·尧典》。
- [13] [57] [77] 《孟子·离娄下》。
- [14] [36] [37] [38] [39] [85] 《孟子·滕文公上》
- [15] 《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
- [16] 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 [17] [18] [23] 《论语·颜渊》。
- [20] 《论语·子路》。
- [21] [74] 《论语·宪问》。
- [22] 《论语·雍也》。
- [24] [25] [56] [60] [65] 《论语·里仁》。
- [26] 《论语·卫灵公》。
- [27] [28] [29] [67] [82] 《孟子·告子上》。
- [30] [43] [61] [71] [73] [84] 《孟子·尽心上》。

- 〔31〕〔32〕〔33〕〔34〕〔35〕〔66〕《孟子·梁惠王上》。
〔40〕《孟子·离娄上》。
〔41〕〔78〕〔83〕〔89〕〔90〕《孟子·尽心下》。
〔42〕《孟子·梁惠王下》。
〔44〕《墨子·经说下》。
〔45〕〔54〕《墨子·兼爱上》。
〔46〕《墨子·兼爱中》。
〔47〕《墨子·天志上》。
〔48〕〔50〕〔53〕《墨子·尚同上》。
〔49〕《墨子·尚同下》。
〔51〕《墨子·兼爱下》。
〔52〕《墨子·非乐》。
〔55〕《礼记·中庸》。
〔62〕《汉书·董仲舒传》。
〔63〕《论语·季氏》。
〔64〕《论语·为政》。
〔68〕〔69〕《墨子·贵义》。
〔70〕《左传》昭公10年。
〔72〕〔79〕《孟子·公孙丑上》。
〔75〕《孟子·公孙丑下》。
〔80〕《论语·子罕》。
〔86〕〔88〕《孟子·滕文公下》。
〔87〕《孟子·万章上》。
〔91〕《汉书·贾谊传》。

附 录：

《说仁·说义》跋

右《说仁》、《说义》二篇，吾师南充张表方先生之作也。先

生亮节高风，嘉谟远猷，既已昭昭在人耳目，独义理之学所为，征诸心而验诸行事者。世或不能尽知，其常所从游者虽知之，而未必备详也。

今年春，门人因先生七十有一寿辰，谋所以称觞致祝，先生以寇难方深，峻辞不许。陈义之高，势难固请，然而弟子眷眷师门之意，亦何能无一遂而已。比获诵斯著，其说仁义，纲领昭畅，六通四辟，实可以窥先生立己达人之大节。征之群议，全以为能公之当代，传之不朽，将不仅并时人心之助，亦庶乎俟诸百世而不惑者，即门弟子所以寿先生，天下所期先生以难老者，未必不在是，是亦君子思济物之意也。先生以为可，遂录而付诸铅槧。

事起庆寿之资，因并列其七十照像及自传与及门颂祷之词于前，俾四方人士识与不识，以得知先生之矍铄康吉，洎平生行谊为快，倘可免荀卿所讥言不称师之叛，岂敢谓水深而回，通利而思，以无愧于在三之义哉？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夏月，门人寇华表、韩钟钦、林学诗、邓克明、姜友于、马玉泉等谨识。

自传(节录)

(1942年)

旧日学生值余年七十有一，欲知余生平行事，书此与之。

余少承父母之良训，研习经史，以气节自励。清末，办理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及顺庆府联合中学数年。

辛亥，川人因商办川汉铁路，集股出于田租，反对政府借外债收归官办，丧失国家路权，开股东大会，举余为副会长。时西充罗纶组织保路同志会，余领导股东大会，以与政府抗争，皆为总督赵尔丰所甚疾，捕禁数月。初捕时，诱至督署花厅，被捕者八人，皆背缚其手，独罗纶与余，前以一弁持枪抵胸，作欲放势，后以一弁，执马刀临于颈。被捕者相顾震栗。俄尔，丰出，余独与抗论。尔丰大声斥曰：“张澜太横强！”四川省独立后，成都兵变，人心浮动，乱将蔓延，乃任川北宣慰使，惩奸恶，制哥老，以遏乱萌。其时地方自卫，只有刀矛火枪，复遣散巡防军五百余人，以其后膛快枪分发各县作练团自卫之用，地方以宁。嗣被举为众议院议员。民国三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即回川。四年，袁氏称帝，蔡锷起义云南讨之。余旋与旅长钟体道在南充宣布独立，率川北各县响应讨袁。共和恢复，任嘉陵道尹，察吏甚勤，廉能

原系铅印本，仅有少量在四川流传。

必奖，贪巧必黜，征收之法，讼狱之费，皆与明白规定，简单贯彻。百余年来陋规积弊，为之剔除净尽，人皆称便。升任四川省长，未久，川滇战起，南北分争，七年二月，遂离川赴京。

九年，返南充，绝意再仕，倡导地方自治，任县立中学校长，分设农、蚕、染织、中医等班以发达地方生产，为四川有职业中学之始。十五年，任成都大学校长。成都大学原以高等师范学校改办，继而高师学生有复校之争，大学遂分立，一时校舍、经费皆无，经艰难缔造，规模渐宏。延聘省内外有名学者多人，教授风气为之一变。前后学生千数百人，学术思想任其研究自由，多能勤学砺行，一时称盛。二十年，辞职归里。成都大学旋改称为四川大学。

川省军人自民国七年后，分据分区，政令自专，征战频仍，征敛繁重，历十余年，人民痛苦甚。

二十七年，国民参政会设立，被选为参政员。数年以来，感于外患未已，国事日非，乃与国内名流，联合主张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民主政治，以消弭内争，发挥民力，而保国家之永存。今年已七十有一，惟始终以廉正自恃，志气弗衰。近作《说仁》、《说义》二篇，览之可见余之所勉与所怀也。

附 录：

黄任之先生诗

利病珍良苦，扶危仗后凋。

休休尊一老，谔谔耻群僚。

刚正由无欲，弥缝使弗浇。

只应仁者寿，元著拜超超。

表方先生年逾七十，以刚直震朝野，奉题其所著《说仁》。
《说义》兼为先生寿。

民纪三十一年七月 黄炎培 成都

四勉·一戒

(1942年11月5日)

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予也年逾七十，静坐自思，辄愧悔丛集。近读《论语》、《孟子》诸书，爰取其言，作《四勉》《一戒》，以期补过于桑榆。

民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 张 澜于成都

四 勉

自 爱

人之有美衣服，佳字画，必用箱箧善为收藏者，为爱之而恐其污损也。人于园庭之中，栽种花木，必善为培植，朝夕灌溉者，

* 据作者手稿，编者加以标点，并对引文出处作了注，引文的个别文字，查对原书后径于改正。

为爱之而使其生长也。乃人多只知爱物，而不知自爱，以至灵至贵之身，日污损于声色货利之私，而不知生长于天理民彝之正，是爱身不若爱物，其蔽实甚。

所谓自爱者何？即爱己之身不使其为恶所污损，而使之常生长于善也。欲其生长于善，必先求所以养之。孟子谓：“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1〕明爱其身者，必有以养其身，不知所以养之，即不得谓之爱也。然身非一体，爱之而不求所养之善，即无能生长于善，亦即无以成其爱。故孟子又谓：“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2〕“考其善不善者”，谓考其所养之得失也。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养小则害大，养贱则害贵，故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所谓养其大者，即养吾心仁义之良，静存动察，勿忘勿助，得而养则长，失养则消者也。盖养其小者，则徇人欲，而日趋于卑下，“饱食、暖衣、逸居、无教”，此其所养之不善，而流为小人，即不善自爱者也。养其大者，则存天理，而日进于高明，戴仁而行，抱义而处，此其所养之善，而成为大人，即善自爱者也。故真自爱者，必能养其仁义之良心，使之充足于中，而彰著于外，非系情口腹，徒愿乎膏粱之味与文绣也。

凡爱之深者，必有所欲，故曰爱之欲其生，又曰爱之欲其富。惟自爱者必养其仁义之良心，既不贪不义之生，亦不羨不仁之富，其有所欲，则欲己之立，欲己之达也。己立，是能得合理的生存，

而为善自乐；己达，是能受良好的教育，而行义咸宜。必己立、己达而后谓之能自爱，能自爱斯能爱人，故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立人者，使天下之人皆能得合理的生存，而民安也；达人者，使天下之人皆能受良好的教育，而俗美也。推己之所欲以及于人，是爱人必本于自爱。故孔子谓“仁者爱人”，而《法言》则以自爱为“仁之至也”〔4〕。

自 修

《大学》有言：“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前儒谓初习谓之学，重习谓之修，义殊未尽。学，觉也。如切如磋者，骨角脉理可寻，切磋主于剖析，故释之曰道学，言其能穷理也。修，治也。如琢如磨者，玉石浑坚难治，琢磨主于攻错，故释之曰自修，言其能去私也。

所谓自修者，就所学之已知已行者，而加以省察克治之功也。盖人之所知所行，恒因心为私欲所蔽，陷于一偏，而多所咎戾，故必随时加以省察克治，以求去吾之不善而进于善。师虽教，而不能代其行；友虽益，而不能助其心，所贵乎自修者，为仁由己，克念作圣，其机在我，非由人也。孔子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5〕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见善能徙，改过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而常以不能为己忧，即自修之功也。曾子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6〕日以不忠、不信、不习三事，省察吾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即自修之功也。孔子又谓：“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7〕此九思者，皆在目前，皆为作圣之基，无时而不以之自省察，则尤自修之功之至为详切者也。夫所谓德、义、忠、信、明、聪、温、恭、敬等。即孔子所言“不逾矩”之矩，《诗》所谓“有物有则”〔8〕之则是也。矩与则者，一定之法，而不易之理也。人之自修，即在矩、则上操存，而莫能外。然又必一主于敬，故曰“修己以敬”〔9〕，盖戒慎恐惧，无敢惰放，则天理以存，人欲以遏，斯可为君子也。

人能自修，则日进于圣贤；不能自修，则日流于非僻，此理之必然者。特是自修之要，在能自反，得一善，则拳拳弗失，即所谓见善修然，必有以自存也；见一过，则内自讼，即所谓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不能自反，则自满者常以为己之德与业皆无不足，自贤者又以为己之言与行皆无不是。无不足者不假修，无不是者不肯修，其为自修之阻，而有害于身心也甚大，故《礼》戒“自满”〔10〕，《诗》刺“予圣”〔11〕，诚不可不以之自儆也。蘧伯玉之使，谓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欲寡则不自是，未能则不自足，此为真能自反，而知自修之道者也。

自 尊

无廉耻，无气节，卑鄙龌龊，蝇营狗苟之人，固没有自尊心，即使读书颇能勤学，为人亦知自好，而仅志在温饱，以得富贵为目的，亦是没有自尊心。自尊是不安于凡陋，而以远大自期，即孟子之所谓“尚志”〔12〕，高尚其志，不肯同乎流俗，就是自尊。

然而尊人者必其人有可尊之实，自尊者亦必自己有可尊之实。

世之尊人者，多以其有爵而甚贵也。而在己之足以自尊者，则非公卿之人爵，而为仁、义、礼、智，乐善不倦之天爵，非赵孟之所贵，而为仁义是饱，令闻广誉，施身之良贵。曾子谓：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13]良以仁、义、礼、智皆为吾人性分之所固有，而非外铄，即在己之可尊之实也。故如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能志于道而取法乎古人，能爱其身而不屑于不洁，即是自尊。而生斯为斯，阉然媚世之乡原，则绝不能自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能不以富贵而荡其心，不以贫贱而变其节，不以威武而挫其志，即是自尊。而以顺为正，行同妾妇之衍、仪，则绝不能自尊。盖一则有可自尊之实，一则无可自尊之实也。且自尊者，非恃才傲物，如佛家之所谓我慢，乃人知之亦嚣器，人不知亦嚣器。自得无欲，不骄人，亦不畏人，而惟以德为尊，以义为乐，所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士得己，则在我者自足尊，民不失望，则天下皆将共尊之。若夫道理不明，德器无成，薄有才能，辄沾沾自喜，旁若无人，自尊云乎哉？徒为有识者之所嗤鄙耳。

古人之自尊者，如伊尹以天民之先觉自居，而谓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谓一夫不获为予辜，是何等自尊！但其躬耕之时，以道自乐，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其所以能特然自尊者，实由出处辞受，一以道义为准，所守正而所蕴闳也。

又如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4]要平治天下，而以名世自居，谓舍我其谁，是何等自尊！但其平时，内则浩然之

气充于体，至大至刚，何等存养。外则非仁不居，非义不由，何等行为！

其所以能矫然自尊者，实由所为必止于道义而养成之，浩气又能助其行也。自尊者，必先有可尊之实，观于伊尹、孟子而益明矣。要之，在己无可尊之实，无论以富贵骄人，贫贱骄人，均属于恶德。若在己有可尊之实，则以德；而谓千乘之君只能事我，奚足以与我友？固不嫌其自大；即式负版，拱荷篠，卑以自牧，愈见其谦光，吾侪当知所自励也。

自 强

自暴者不足与有言，自弃者不足与有为，此等人当然不能自强。好勇近于自强也，然非学以明理，则其蔽乱；进锐近于自强也，然非志以节气，则其退速。蔽乱非自强，退速尤非自强。

自强之要，在于为善，故必本于学，自强之功，在能不息，故必坚其志。

《中庸》谓：“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所学、问、思、辨与所行者，即天下之达道、达德与九经^[15]之事也。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尽百倍乎人之功。因而知，勉而行，以求明求强，为之必要其成。如此为善而不息，便是自强。

子夏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16]所谓好学，非徒为记问之学而已。天下之道理无穷，德业亦无穷，

未知、未行者是所亡，已知、已行者是所能。曰“日知其所亡”，见其急于求知；曰“月无忘其所能”，见其久而勿失。潜心于道理，操存于德业，与时而俱进，如此为善而不息，便是自强。

曾子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7]仁为人心之全德，政教之大本。士也志在淑身，尤期淑世，以仁为己任，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不独造次之迫，颠沛之变，必用力于是，不为事物所摇夺。曰“死而后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如此为善而不息，尤足见其自强。

盖人能自强，大之足以为圣贤，为豪杰，耀古今而盖天下，小之亦足为一乡一国之有德有为之人。

士诚有志于事功、节义，则自强之为贵也。然人能自胜，而后能自强，人能胜人，斯谓之强，而人之自强，在能自胜。《中庸》称君子“不流”、“不倚”、“不变”，而赞之以“强哉矫”。人之所以易流，易倚、易变者，人欲之私害之也。内则好恶无节，外则物感无穷，安得而不为所扰夺？能自胜其私，而矫之以正，择善而固守之，不流、不倚、不变，方是自强，方是真强，故曰自胜之谓强也。

又必知困而后能自强。俗子安常处顺，习于苟偷，一遇险艰，不胜沮丧，志卑行弱，直与草木同腐。惟知苟偷之堪危，悟沮丧之可耻，经忧患而生悔，处阨穷而思奋，所谓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者。吾人质非上智，不可不以之自勉，而求德业之有成。

一 戒

自 欺

治人者必开诚布公，治心者必去私存诚。诚与欺相反，诚者无妄，欺则妄，诚者无伪，欺则伪。故不开诚者必欺人，不存诚者必自欺。欺人者，人多知而相与恶之；自欺者，则恒习焉而不自察也。

何为欺人？行与言相违也。孟子言：“郑子产使校人畜生鱼于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18〕以为校人之能欺人，以其方也，盖言近理而行相违。世之欺人者，莫不如是，然而人固不能终欺也。人虽愚，有时而觉；术虽工，有时而穷，况人非愚，术非工，徒丧信败义，为世所鄙弃耳。

何为自欺？行与知相违也。《大学》言“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意为自修之首，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不可以自欺。自欺云者，知恶恶而不肯实去其恶，知好善而不肯实行其善，所行与所知相违，即自欺其本心之良知也。凡人念虑微起，良知即知，善与不善，一毫不能自掩。知善即实行其善，知恶即实去其恶，不昧所知，心方自慊；若知为善以去恶，而不肯实用其力，自知而自昧之，宁非自欺？一念之妄与伪，其几至微，苟纵任之而不知检，则其终必为无忌惮之小人。

欲毋自欺，必须慎独。独者，人所不知而已之所独知，即心初发时，皎然不昧者也。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掩其不善，则方为不善之时，是非固皎然于中。荀卿言：“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19〕意即皎然独知之地。慎其独，即所以诚其意也，顾人于独处时，群居时，初发念时，正应事时，俱有独知。惟能日乾夕惕，致慎于其不睹不闻，至隐至微之地，无一念一事之敢忽，以养长其良知，而使之即知即行。常兢兢，亦常惺惺，愈惺惺，亦愈兢兢。《中庸》谓“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为君子之所不可及。能慎独，则内省不疚也；能不自欺，则无恶于志也。

人不可以自欺，圣贤之立教，无不如此。孔子诲仲由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0〕，言不可自欺也。若强其所不知以为知，则是自欺。孟子谓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言不可自欺也。若知其不当为，不当欲，而竟为之，欲之，则是自欺。至若《诗》云：“上帝临汝，毋贰尔心”〔21〕，言不可自欺也。贰尔心者，意之不能诚，则是自欺。又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22〕，言不可自欺也。愧屋漏者，独之不能慎，则是自欺，而特儆之以帝临，惕之以相在，更凛凛乎其可畏也。

顾不自欺，虽仅属于一身，而其所及之影响实大。人惟不自欺而后可以明一己之明德，而推之以善天下；不自欺，而后可以扩仁、义、礼、智之端，而充之以保四海。苟不善养其自性本有之良，自知而自昧之，不能治心，安能治人？于是始而自欺，继而欺人，终则人不能欺，而只成为其自欺。欺人者，见恶于广众；自欺者，有愧于神明，俯仰皆怍，何以为人？尤当时时反省，而念念切戒者也。

注 释：

- 〔1〕〔2〕《孟子·告子上》。
- 〔3〕《论语·雍也》。
- 〔4〕《法言·君子》。
- 〔5〕《论语·述而》。
- 〔6〕《论语·学而》。
- 〔7〕《论语·季氏》。
- 〔8〕《诗·大雅·烝民》。
- 〔9〕《论语·宪问》。
- 〔10〕《礼记·曲礼上》曰：“志不可满”。
- 〔11〕《诗·小雅·正月》。
- 〔12〕《孟子·尽心上》。
- 〔13〕〔14〕《孟子·公孙丑下》。
- 〔15〕《礼记·中庸》。九经指：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
- 〔16〕《论语·子张》。
- 〔17〕《论语·泰伯》。
- 〔18〕《孟子·万章上》。
- 〔19〕《荀子·解蔽》。
- 〔20〕《论语·为政》。
- 〔21〕《诗·大雅·大明》。
- 〔22〕《诗·大雅·抑》。

谈慈惠堂工作

(1943年2月20日)

尹仲锡对于慈惠堂事业已奠定基础，我们定秉承尹先生遗志继续努力开拓，使慈惠堂事业光大。现在对于内部整理爬梳，加强工作效率，培根小学已易名为培根孤儿工读所。今后对普济院之老人、女婴所、培根孤儿工读所，不仅止于教养，而且还希望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并为社会中之生产者。简单说，慈惠堂今后务使女婴所每一个女婴，培根孤儿工读所每一个孤儿，普济院中每一个能工作的老人，都不是“吃饭不做事的闲人”，而是社会中的生产者。所以慈惠堂今后对于孤儿、女婴、老人是要使他们走到职业化、社会化的路。

*原载《新新新闻》（成都）1943年2月21日。成都慈惠堂始源于清雍正初期之慈善机构。1942年11月该堂理事长尹仲锡病故，在其遗嘱中提出，理事长一职必请张澜担任。张澜任职后，于1943年2月20日接见记者谈了办理方针，及对今后工作的设想。

致蒋介石书

(1943年7月6日)

年来盱衡时局，审度内外，觉国际战事，虽胜利可期，而国内政治情形，则忧危未已。举其大者言之，人才未能集中也，民意未能伸展也，党争未能消弭也。最高当局非不宵旰勤劳，而全国所需之团结，反日形失望。察其症结，皆在政治之未能实行民主。人群之有才智贤能，原以供国家之用，群策群力，乃能兴邦。现在政府之用人，既以一党为其范围，尤偏重特殊关系，使国内无数才智贤能之士，皆遭排弃，以国家有用之才，投置闲散，已深可惜，甚或逼之使为我敌，岂云得计？必须实行民主，一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只问才不才，不问党籍，举全国之才智贤能，共同尽力于国事，而后可以挽救危局，复兴国家。此其一。得民必由于得心，民之欲恶，是为民意。乃现在一切民意机关的代表，都是党部和政府指定和圈定，于是只有党意、官意，而无真正民意之表现。其在群众集会偶有批评政府指摘时弊之人，即被目为反动。法令纷繁苛扰，官吏敷衍，惟肆贪污，从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人民遭受压抑，痛苦百端，不能上达，厌恨之情到处可见。必须实行民主，首先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使人民各本所欲所恶，对政治可以自由批评讨论，舆论有监督之力，然后政治修明，人心悦服，然后民力始能发挥。此其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能否合作，实为国人之所深切关心。如非认真而且彻底做到政治民主，使军队国家化，专用之于国防，则此问题将无法解决。甲要一党专政，因而训练党军，以图巩固其政权，即不能禁乙之训练军队，与之对抗。必须实行民主，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则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本有相同之点。国共合作，已往之历史亦非无可循。设以建立真正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为目的，正应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此其三。今国民政府已有宪政实施之筹备，宪法草案亦在各地研究讨论之中，如能及此时机，加强实行民主，则人才可以集中，民意可以伸展，竞争可以消弭，上下一心，团结奋斗。目前艰危之局势，固可以支持，即战事结束之后，国内统一，国际平等，亦可以顺至。如或昧于大势，迁延不决，徒貌民主之名，而不践民主之实，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重于盟邦，则国家前途，必更有陷于不幸之境者。

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

(1943年9月18日)

一、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

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余年，和爆发的初期，有些人因为被轴心国表面上短期的军事声势和军事胜利，所震撼迷惑，遂认为民主政治已届没落的时期，以为独裁政治行将成为今后世界政治演进的一种合理新形态，于是相率效尤，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张甚一时。年来保障人类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声势日振，正义日张，民主政治乃为世界各国所重新认识。加强重视，均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战争，也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和奴役压迫侵略的战争。近来在意大利创行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始祖墨索里尼，迫于大势，骤然坍台，其所领导的法西斯党，也就随之解散，而意大利终于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招待记者席上，曾

* 据内部铅印稿。1943年，张澜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所造成的弊端与危害，写成了这篇著名论文。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不敢发表，乃由他原成都大学的学生秘密石印成册，于“九·一八”十二周年时散发。尔后，此书在延安、重庆、成都、昆明、广州等十几个城市风行一时，人民争相传阅。1944年2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对该文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评价。

说“墨索里尼统治，及时而合宜之结束，为彻底摧毁及根绝各国或国际法西斯主义痕迹之首要步骤”。美总统罗斯福更对全美广播说：“吾人在任何方面，均不致与法西斯主义谈商，吾人绝不容法西斯主义有丝毫残留。”故一般人均认为墨索里尼之坍台，所影响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性，将较其影响于欧洲战事者为多，从此独裁政治，将日渐趋于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唯一极则。

中国在本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开会，蒋主席训词特云：“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在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宪政实施以后，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尽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本党虽退处于平民的地位，但本党同志，更是要继续我们过去一贯的努力，贯彻我们实现三民主义保育中华民国的使命”。这一次的训词，宣明国民党的民主精神，昭告世人中国之必为民主国家，读了令人钦佩，令人庆幸。于是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遂有“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之决议案公布全国，愈足证明同盟国的民主政治，是日渐光大了。

二、什么叫民主政治

什么叫民主政治呢？人处社会，是不能离群索居的，所以亚里斯多德曾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孙中山先生有云：“管理众人的事，就叫做政治。”又说：“凡是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

就叫做民。”主字当然就是主权的意思，自然也含有主动的意思，这就是说人类求生存求繁荣的权利，是任何一个人的天然权利，是与生俱生的，是自动的，自主的，不是他人授予的。所以民主政治的意义，简单言之，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也就是国由民治。凡是管理众人的事，要以主权在民的真精神和好方法来管理，才叫做真正的民主政治。如其以一个人一群人一党人的意思，不依全民共立、全民共守的法律，来管理众人的事，把持政权，独裁专制，任意扩大统治者的权力，并不容许全国人民发表不同的意见，得到各种的自由，不顾全国人民的主权，那就决不是民主政治，只可称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党霸政治。因为他不以主权在民的真精神和好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纵然有时也号称民主国家，实际上与民主无干的。

真正的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的几个必要条件：

一、政治的主权，一定是要在全体国民的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在一个党的手里。

二、众人的公事，应由全体民众来直接讨论处理，此谓直接民主政治。假若这个做不到，至少也应由全体民众直接推选代表，来组织议政机关，讨论国事，监督政府，以实行所谓间接民主政治。

三、民众代表，应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使人照名单推选，或加倍推选，再由党和政府圈定。

四、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决不可剥减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

五、一个国家，应有其根本大法，即早日颁行其有关于人民权利义务与政府组织权责的民主宪法。宪法之制成，应由国民代表推举若干人参加议订，再开国民大会决定而颁布之。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一国之元首，亦应严为遵守，不得以己意变更法律。

实行民主政治，因为有次列各项优点，所以当前和未来的界政治，都要以民主政治为最高原则。

一、民主政治，不应有男女和种族的差别，只有使社会爱国分子能有均等的机会，充分发展各人的才能。

二、民主政治，主权在民，人人有独立的人格，人人有共守的宪章。因此一般政治社会，平均发展，继续进步，自可以免除因压迫不平，而使国内发生革命流血的祸变。

三、民主政治，人人自爱，人人互尊，所受之教育，所得之享受，皆期趋于平等。货取于地，而不必藏已，力出于身，而不必为己。将来因社会财富之增加，人类皆富，人类皆乐，各遂其生，共享和平，以到达世界大同，是为民主政治之极则。

或有谓：“民主政治，必须人民经过若干时期的训练，俟其到达某种程度，然后实行，乃可望收到好效果。”其言似是而非。试思实行民主政治，要经过一年又延一年的训政时期，与满清末年的立宪要预备九年者何殊。必如所言，则所谓某种程度，将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各有不同，是将永无适合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只有永远维持专制政体，独裁权力，而供野心者之所利用。且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初无绝对标准，民主政治乃是合于人道最合于时代的理想政治，能做一分，便算一分，天下事根本上便没有一蹴而就的自然事件。纵或实行时发生弊病，自可随时改正，此乃方法问题，而非原则问题。况天下事根本上便没有十

全十美有利无害的事，只须利害相权，看其孰大孰小，孰轻孰重而定其取舍。民主政治，实在是人类进化的最合理的政治，已为世人所公认，在今天是亟应使其实现的。

或又谓：“民主政治，类皆议事迂回，行动迟缓，遇有国家事变，不能应时趁机，以挽救危亡，实行独裁政治，正所以矫救此弊。”不知一人知识有限，天下义理无穷。凡事集众思，则可广思益，既少专断偏见之弊，更可顾及远者大者。惟其实行民主政治，而后执行治权之人，乃可不至劫持政权，坏法乱纪；人民依法应有的自由，乃可得有保障，不遭摧毁；能维持法治的精神，乃能长保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国家即遇事变，人人自爱，人人爱国，人人爱护其政府，更可以集中意志与力量，以共赴国难。临时加强统制与战时指挥机构，固足以应付变乱而有余，此次同盟国家如英、美、苏等之转危为安，实由于此。

三、什么叫党治

实行直接民主政治，所谓纯粹民主政治，即是聚一国或一地方的全体人民于一所，直接讨论众人的事，处理众人的事。惟因人口增加，地域辽阔，社会组织复杂，经济生活差异，直接民主政治，在事实上难以普遍实行，故每采民主代议制，以实行间接民主政治。此种办法，乃是实行直接民主政治的过渡办法。代议制为全体国民选举其代表，经过议会而间接参与国事之政治组织形态。是以议会即为实行代议制的中枢机关，故又称议会政治。

在此种情形下，因人民代表的政见，有相同者，有不相同者。

其相同的遂自然而然地结合为一种组织，以图实现其政治主张。于是乃有政治党团的产生，称为政党。间接或直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指导民众，于是政党便直接影响或控制代议制的人民代表。因此民主政治的实施，每因政党的集团活动，而受到或利或害的影响，甚至形成政党政治的趋向。但因一国之内，政党不限于一个，其政治主张，有进步与保守，若是为民族国家社会的福利，就绝对不是为其党或少数党阀的利益，任所欲为，所以就是政党政治，也仍是以民主政治为本位而互不相妨。即或另易一党秉政，也只是为欲遂行该党之政策而努力。一切遵守宪法，现行法治，进退得失，公诸舆论，既不能劫持政权，来压迫其他党派，妨害其公开活动；对于全国官吏军队警察学生，以及办理地方自治人员，均一律的尊视他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更无强迫其全体入党之事。

什么叫党治？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他是不愿意有他党存在，而且是否认他党存在的。他是某一党获得政权之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之所私有。于是把国家的官吏军队和警察，迫其变为党的官吏军队和警察；把国家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加之以利诱、威胁，而变为党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因此机关有党部，军队有党部，警察有党部，学校有党部。还要使他能够普遍，能够融合。于是“党化”这一名词，在国内是到处可以听到的。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而且党权竟至超过国权。党权如果与国权发生冲突，党总有最后的决定权。如法西斯主义各国，都是把主权在民的民治一变而为主权在党的党治，甚且有唱为“无党则无国”之论。党即国家，与所谓朕即国家，毫无二致。故凡在厉行党治的国家里，党高于一切，把持专恣。人民

当受压迫，是没有自由的，全处被动，是没有主权的。

欲贯彻一党专政的党治，必先强化其党，统一其党。由是唯一之党魁，便应运而生，当政的党魁，既具备独裁者的资格，当然就会变为政治上的独裁者。于是党治便自然而然的成为独裁政治。党既以国家为其一党之私，独裁者更以党与国家为其一人之私。党治行，民治亡，殆为必然的结果。

因一党专政而成为党治，因党治而成为独裁政治，到了独裁政治，他有两种不可避免的弊害：

大凡要实行独裁，必先由他的党徒，把他的智识和才能，言语和行动，崇拜成为惟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之人，独裁者习而安之，亦以为唯我独尊，唯我独智；于是其左右亲信之人，伺意承颜，群相蒙蔽，言莫之违，阙莫之补，形同孤立，无法洞悉国事民情之利弊原委。方自以为国已强，民已安，政令则纷乱苛扰，而不知改良；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能惩止。所有政也党也，一切形成腐化，终至全国怨毒，皆集于独裁者的一身，而无法挽救。此其弊害之一。

独裁者必为多敌之人。对外不能不求明晰敌国之虚实与动向，对内更要防制异己者，不容其有反对的言论和行为，甚且及于其思想。他的办法，必定要布置耳目网，即是组织一群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的特务人员，秘密分布各地，来专负对外对内的侦察工作，以至于其他的工作。但是法西斯主义各国做侦察工作的人，多半偏于对内：或则捕风捉影，捏造情报；或则藉事邀功，小题大做；或则利用职权，阴行敲诈；或则摧残自由，制造恐怖。弄得国内本来团结的，反而不团结，地方本来安定的，反而不安定。其结果松懈了对敌人汉奸的侦察，只是增加政治上的黑暗。

此其弊害之二。

报载英国首相邱吉尔出席下院报告，严斥一党专政之罪恶，有云：“一党专政之极权制度，以秘密侦察为其爪牙，取政府之一切官职，虽至微官胥吏而垄断之，举凡地方民政官与法庭，均在行政首长控制之下，国内外皆布有最完整之间谍网。此种制度，行之过久，则彼广大群众，对其国家生命，即毫无左右之权。舍官吏阶级而外，别无独立人物。余意以为此乃意大利人民呼吁之理由，亦即任何民族，不愿听其自由与固有权利旁落者，一种申辩之理由也。”邱氏所言，极为深切，固所以警告其他各国之一党专政者。

四、训政与宪政

我们中国的宪政之实施，是要经过训政时期，然后入于宪政的。照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在训政时期，中央统治权，固然是由国民党行使。所谓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政权，照训政纲领一、二两条，亦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的名义，而以之付托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政权治权，归于一党，党治的造成，固然是时势使之然。但是最紧要的，就是在训政时期，必定要训练国民使用政权，所以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工作进程之总报告书曾说：“本党之历史使命，在于建立民国，而其中心任务，则在负责训政。”训些什么呢？建国大纲载第三为民权曾说：“对于人民之政治智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免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又训政纲领第三条：“依照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

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行使，以立宪政之基础。”又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一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而约法的冠首数言，谓：“既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尤宜公布约法，共同遵守，以期促成宪政，授政于民选之政府”。至再至三昭示国民，不外在宪政施行以前，必须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训国民使其能知，导国民使其能行。至宪政开始，即须还政于民，完成人民政治。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工作进程之总报告，所谓：“宪政为训政之最高目的，而训政乃宪政之实践方法。”即说明训政为必经之程序而不可少。总报告更谓：“国民党宪政之实施，不以召开形式会议，颁布空洞宪章而已足，而特致力于训练人民有切实应用普通行使民权之充分能力与实际经验，庶不至徒托空言，重蹈已往宪政失败之覆辙。”对于必须经过训政而后入于宪政之理由，尤其说得明白。不过按之事实，则大不然。数年以来，中央及各省所办的各种训练团，或训练班，继续不断。除了一部分是训练行政官吏，一部分是训练党团人员而外，从未闻有过一次国民使用政权的训练。即以县地方来论，乡镇长要受训，保长要受训，乡镇队附保队附也要受训，国民学校教师都要受训，也从未闻有一人受过四权使用的训练。并且从前的乡长保长，是由乡民保民推举，近年都变成委任了。训政的精义，既然在训练人民有切实应用普通行使民权之充分能力与实际经验，乃就这各种训练的内容，一加考察，却与民权的行使，并不相干。训政自训政，人民自人民，试问一般国民，从何处养成行使民权的充分能力？又从何处得着行使民权的实际经验？！前面已经说过，民主政治，乃是最合于人道最合于时代的理想政治，能做一分，便算一分，在今天是亟应使

其实现的。我希望执政当权的党，在此国民大会未开，宪政尚未实施，这一时期内，要一面认真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来训导人民，使他有应用普通行使民权的能力与经验，一面则应从速准备实施宪政，其应该提早实行的是：

一、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之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外人士，共同审查宪草，促进宪政。

二、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

三、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

四、在宪政实施前，各级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等，应即具有审核各该同级政府之预决算，与弹劾其同级政府不法行政官吏之权。

必须如此，方足以表示准备实施宪政之确有诚意，并非空言。否则徒有训政之名，不见民权之实。纵使十一中全会有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并定实施日期的决议案，难免一般人不认为仍是画饼充饥。

五、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

我们中国早经是民主国家，为甚么说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呢？因为民主政治一词，有形态，有实质，有精神。假如行民主政治，而只做到民主的形态，甚至连民主的形态亦残缺不完，最重要的民主的实质，民主的精神，则一概弃置，此种民主政治，只是虚伪的民主招牌，而决非真正民主政治。真正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的政治，蒋主席在《中国之命运》一书里说：“今后的

政治建设，应以国民奋发其自主自动的真精神为基础”。政治的建设，做到国民自主自动，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此次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已经议决实施宪政了。实施宪政，当然是实行民主政治。但要实行民主政治，则舍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外，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将永远无从谈起。盖党治与民主政治，党化与民主化，一党专政与民主政治，根本上便是相反的东西，是不能同时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国今天是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的，其要点如下：

一、抗战已经到了七年，而党政方面，均未能深入民间，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为鼓励与警惕之宣传。加以党员官僚化，官吏商人化，更增加民众心理的不满。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才可以激发全国人民自作主人共同利害的责任心爱国心与同仇敌忾心，要能够加强国人的抗战情绪，才可望迅速确实地把握着胜利。

二、年来言政治，则官吏公开贪污，上行下效，法令皆成具文。言财政，则专卖统制与其各种收税机关，繁重苛扰，结果是政府受怨，民众受困，大利归于中饱。言粮政，则无谷者必须缴谷。言役政，则有人者不肯出人。不平的现象，到处皆有。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使人民有权来监督政府。纠弹官吏，并协助政府办理各事，政治才可望合理改善，挽回颓势。

三、自一党专政以来，党外人才，多遭摈弃；而党外的各党派更受压迫，不容其公开活动，许多智能之士，咸怀不平，尤以共产党军队数十万，散布六七省，常有再发生内战之虞，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使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之人士，皆得自由生存发展于宪法范围之内。要能够真正实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才可望精诚团结，共图努力建成复兴的大业。

四、英美友邦人士，对于中国这个民主国家，认为不是行的民主政治，所以颇多评诋。在此抗战紧急关头，竟有人主张不必积极援助中国。近就罗斯福、赫尔、邱吉尔诸人的谈话观察，彼等国策，实已决定彻底根除国际任何一国之一党专政的法西斯主义；则其将来对于中国，亦自不愿诚意支持或援助名为民主国家，而实际则施行反民主的一党专政的党治政府。中国今日虽与同盟各国并肩作战，但舍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外，无论战时或战后，在国际上确均难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与独立，此则尤为中国之命运所关，而为有识人士之所深忧切盼者。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

附 录：

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 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 民 主 政 治

《解放日报》1944年2月22日

本报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澜氏于去年“九·一八”十二

周年纪念日，在成都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书，发行以来，风行一时，对各方影响甚大。该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叙述最近十余年来，直至这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有一部分人惑于法西斯国家表面的声势，遂认为民主政治将要没落，于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甚极一时。年来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大家对于民主政治乃有新的认识。以后墨索里尼垮台，法西斯解散，意大利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此世界独裁政治日趋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的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势的唯一准则。中国在今年九月（按指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也有了实施宪政，并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

第二章中著者说明：真正的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几个主要条件：（一）政治的主权一定要在全体国民的手里。（二）众人的公事应由全体人民来处理。（三）民众代表应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选举，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四）地方人民及其代表参预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职权，决不可消灭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五）一个国家应有根本的大法，即早日颁行有关人民权利义务与政府组织权责的民主宪法。这里著者对于“实行民主必须对人民经过若干时期训练”以及“民主政治议事迂回，行动迟缓”等谬论，加以严正的驳斥。

在第三章中，著者对于党治作了猛力的抨击。他说：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它是不愿意有多党存在，而且是否认多党存在的。它是某一党获得政权之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之私有，于是把国家的官吏、军队和警察，把国家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加以利诱、威胁，变而为党的青年大中

小学生，因此机关有党部，警察有党部，学校有党部，于是“党化”这一名词在国内到处可以听到。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而且党权竟高于国权，如法西斯主义各国都是把主权在民的民治一变而为主权在党的党治，甚且是唱无党则无国家之论。这样党治便自然的变为独裁政治。到了独裁政治，它有两种不可避免的弊害？第一，凡是实行独裁政治的人，必先由其党徒把他的知识才能、言语和行动奉成为唯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之人。结果政令则纷扰而不知改良，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知惩止。第二，独裁者必然为多敌之人，为防止异己，他的办法则是组成一群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的特务人员，秘密分布各地进行侦察工作。他们或捕风捉影，捏造情报，或则利用职权阴谋欺诈，或则摧毁自由制造恐怖，弄得国内本来团结的反而不团结，地方本来安定的反而不安定，其结果松懈了对敌人汉奸的侦察，只是增加了政治上的黑暗。

第四章论训政与宪政。著作指出，按照建国大纲规定，所谓训政就是训练国民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以立宪政的基础。但近数年来，各种训练班、训练团继续不断，却从未听说有一人受过四权使用的训练。著者说：我希望执政当权的党在此国民大会未开，宪治尚未实施这一期间内，应从速准备实施宪政，其应该首先实行的是：（一）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之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以外人士共同审议宪草，促进宪政。（二）立即宣布人民之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三）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四）在宪政实施前，各级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等应即具有审核各该同级政府之预算与弹劾其同级政府

不法行政官吏之权，必须如此施政，以表示准备施宪政之确有诚意，并非宣言，否则徒有训政之名，不见民权之实，纵使十一中全会有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并决定实施日期的决议案，难免一般人不认为仍是画饼充饥。

第五章，著者要求中国今日必须从速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说：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抗战虽已七年，但以言政治则官吏公开贪污，法令皆成一纸空文；以言财政，则专制统制，收税机关层出不穷，结果政府受怨，民众受困；以言粮政，则无谷者必须交谷，以言役政，则有人者不肯出人。而且党外人士大遭摈弃，而党外的各党派人士多受压迫，不容其公开活动，许多智能之士心怀不平。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真正实行天下为公与选贤任能，才可能精诚团结，共图努力建国大业。

最后著者指出，英、美等友邦人士，认为中国不是行的民主政治，所以颇多评论，正在此抗战紧急关头，竟有人主张不必积极援助中国。由罗斯福、赫尔利、邱吉尔诸人的谈话观察，英美国政府实已决定，彻底根除国际任何一国一党专政的法西斯主义，则其将来对中国自不愿支持或援助。名为民主国家，而实际则施行反民主的一党专政的党治政府。中国今天虽与各同盟国并肩作战，但除其从速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外，无论战时或战后国际地位上确均难得真正的自由、平等与独立。此则尤为中国之命运所关，而有识人士所诚意切盼者。

与《华西晚报》记者 谈国民参政会

(1944年8月17日)

记者问：您何时前往参加九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

张答：还没有决定是否出席。记得民国三十年，本人同张一麐、张君劢等十余人，提了一个关于实现民主、加强团结、贯彻抗战案，并附有办法十条，诸如要求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办报、旅行等自由，及禁止一切非法的处置都在内，但此案大会未经审查，亦未提出讨论，后来本人要求印成油印，普遍发给各参政员。从此，我对参政会表示灰心了。三十一、三十二年，我都没有出席开会。去年，张主席⁽¹⁾邀我出席，并问我不出席的理由。我向张主席说明：“第一，参政会不够一个民意机关，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人参加太少；第二，我的提案政府不采纳，甚至不许提出讨论，我还开什么会呢？”

注 释：

[1] 张主席 即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今属双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1945年曾任参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

• 根据《解放日报》1944年9月16日有关新闻报道整理。

关于民主的谈话^{（节录）}

（1944年8月28日）

中国没有民主，就永远没有办法。中国今天需要的是真正民主，今天中国假如还不实现真正民主。第一，起码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而单凭少数“天才”是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第二，没有民主政治，民权就不能伸张；第三，由于民主不能伸张，人民受到了压迫，试问人民的力量是怎么能够发挥出来呢？

用磕头的办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同时，民主不是少数人包办得了的，果真包办出来了，那个政治就不能算做民主。

* 根据《新华日报》1944年9月16日有关新闻报道整理。这是张澜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前夕，在成都接受记者采访所发表的谈话。《新华日报》报道了这次谈话。誉为“精辟言论”。

关于当前政治问题的谈话

(1944年9月5日)

政治问题是整个的，要是枝枝节节地说，枝枝节节地去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乃是应付的态度。这种态度，应为我们所不取，因为这只是枉费精力。

今天国际形势确实好，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很高。但是倘若因此而懈怠了去把我们的外交办好，把内政革新，把民主实行，那时时机是不等人的。国际地位要靠自己的努力才撑得住。我们哪里能够把一切问题都等到战后去解决？

今天的问题在于：（一）如何集中全国人才。要政治清白有为，必须集中全国英才，不存党派畛域。（二）民意必须自由反映。今天多的还是党意与官意，民意太微弱了。（三）党争必须和平解决。所有这三点，归根结蒂，关键是在民主。只有民主是中国唯一的道路，只有实行民主才是国家人民之福。

* 这是张澜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期间的谈话。根据《新华日报》1944年9月5日有关报道整理。

和成都各报记者 谈民主运动(节录)

(1944年9月27日)

记者问：张先生此行看见了些什么？

张答：我没有看见什么。所有的不良现象在过去就看熟了，而新的却一点没有。

问：这次参政会的成就怎么样？

答：这事你顶好问问别的参政员，因为参政会我只去过三次，总计在那里坐了八点钟。在这八点钟里，只有冠冕堂皇的报告，这些报告，全国报纸都载过了。

问：请谈谈重庆的民主运动情况。

答：参政会闭幕后，参政员们和其他要求民主的人士开了一次座谈会，到会的人有四五百，会场挤满了人，会场外的窗口处也挤了很多人，发言人之多，会场的热烈情绪，在重庆简直是空前未有的现象，讨论的主题是民主。以“中国需要民主”作题的发言者，除开有慷慨激昂的外，甚至有痛苦流涕的。有人提出了

* 据1944年9月29日《华西晚报》整理。9月2日，张澜与邵从恩等自成都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9月26日飞返成都，第二天，张澜接受成都各记者采访。

正当的要求，就是要求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个经过，你们如果看了本月二十五号的重庆报纸，就可以完全知道。

问：座谈之后，是否还有什么决定呢？

答：有，产生了一个“民主促进会”，推选了九个负责人，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国民党员，如刘文岛，屈武，王昆仑等。由此看来，国民党人也是如全国人民一样的迫切需要民主。

问：据张先生如此说来，民主运动显然是在展开中了，但在这一个发展开的阶段，究竟应该怎样作呢？

答：跟言论自由的尺度放宽一样，刚开放这么一点，你们作新闻记者的是会觉得满足的。因此，民主运动的现阶段，还说不上如何作，而是应该尽量说的时候，重庆宪政座谈会上可以衷心说出需要召开国事会议，需要组织联合政府，别的地方当然也应该说出重量相等的话。

在成都华西坝五大学 十二个学会主持的国是 座谈会上的演说(节录)

(1944年10月7日)

你们不是受着种种的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谈国事吗（笑声）？你们提出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你们会提出这样许多问题来呢？反面就是不民主（鼓掌）。在这里我们要问何以政治腐败到这种程度？何以时局危险到如此境地？这十几年来，我们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一党专政的党治，因此就生出种种困难，并使时局成为如此危险（鼓掌）。参政员只是政府指定或圈定。政府机关的官吏，或乡镇保甲长，非党员不用，因此民意不能表现，舆论不能伸张，所以官吏贪污，法令繁多而扰民，民不聊生，财归私人（大鼓掌）。军队没有不吃空额，前方如此，后方也如此，兵到哪里去了，军官把它吃了（掌声笑声杂作）。情况非常严重，壮丁变成瘦丁，瘦丁变

* 据1944年10月30日《解放日报》，并参考〔加拿大〕文忠志《文幼章传》中记载的张澜在五大学国是座谈会讲演词整理。1944年10月7日午后3时五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十二个学会主持的国是座谈会在华大体育馆举行，参加学生达二千余人，留蓉参政员张澜、李璜、刘王立明、吴贻芳等出席。会场贴满了责问国民党之标语，张澜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发表了讲话。

成病丁，病丁变成死丁。一般中国士兵如果不带上枪，会被看作路边乞丐。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讲一天也讲不完。中国危险到了如此地步，是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为抗战救亡计，实行民主才能全国团结，人才才能集中，政治才能革新，扫除一党专治腐化的政治，才能够挽救国家的危局。

（说到国共团结问题）今天国家要达到真正的统一，必须先要团结，要团结就只有民主。

现在是要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国家的事，要以真正大多数的民意为依归，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至于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你们知识分子就起来喊！喊！喊！那么它的内容是自然有了（大鼓掌）。

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

主张与目的(节录)

(1945年2月26日)

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张，是要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实行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真民主政治。内以求国家之统一，外以得国际盟邦之平等。

当二十九年冬间，国民党与共产党因新四军案件而起纠纷，其时国民参政会各小党派及无党派之参政员十数人，联合出面调解，向蒋委员长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种主张。以为唯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才能解决国共两党纠纷问题，得到全国政令军令之统一。虽未见采纳，然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遂为民主同盟之基本主张，而今未稍改变。

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并使于抗战期中与抗战军事结束后，均不至再发生内战，损害国家元气，益陷于不易恢复之境。此种动机，亦至今未稍改变。

• 原载《华西晚报》1945年2月26日。

到了三十三年秋间，因国势的阽危，已到了极严重关头。而在一党专政的党治之下，则政治军事日益败坏，则财政经济日益匮乏，人心亦日益离散，非立即实行真民主政治不能振奋人心，团结全国，内以改新庶政，外以加强战力，而获得最后胜利。然欲促成真民主的实行，仅限于党派结合之政团，其力量实嫌不足，必须扩大到国内一般要求民主，赞成民主的各界人士都来参加，群起响应，共同努力，始能促成真民主政治之实现。于是把“民主政团同盟”的“政团”二字取消，改称民主同盟，以期全国之一致。

民主同盟，目前对于国共两党之态度，是极其公正明白的。

国民党能实行真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藉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合作。民主同盟的主张，始终是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是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应尽忠于国家，而彻底取消军队内任何党的组织，全国任何方面再不许有党军与私人武力。政治民主化的目的，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期建设一个政治自由、经济平等的新民主国家，而走上安全繁荣之路。

更有言者，民主同盟基于国共以外各党派之结合，而此结合，总有其共同的正确主张，与共同的远大目的，绝不会受他方面之威胁或利诱而改变、而分化。不过各党派虽加入民主同盟，民主同盟不能拘束各党派之一切行为，各党派亦不能以其一切行为单独代表民主同盟。

民主同盟是始终站在国家的立场，谋各方之团结，以实行真民主，以此救国，以此建国。乃近来常有自私自利的反民主的

人，因见民主同盟主张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公开政权，遂诋为受共产党利用。民主同盟是否受共产党利用，自有事实证明。试问三民主义是不是进步的十足的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即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当然要取消党治，公开政权。所可惜者，三民主义未见实行，而使民主同盟起而要求，并让共产党得而利用，这是国民党人应该自己反省的。

谈 赴 渝 任 务

(1945年7月4日)

本人此次来渝，任务有二：一为促进国内民主团结，一为商讨同盟盟务。德国的被击溃，是表现民主力量战胜了法西斯，最近旧金山会议^[1]的举行，更是充分表现出民主世界共求的目标。今日德国虽然被击溃了，但是东方的敌寇还是在作最后的挣扎，假使不能彻底击溃日本，便是民主势力未能获得胜利。目前中国唯一的任务便是怎样加强自己的准备，配合盟军登陆，实行反攻。要是今日国内还不一致，各地的□□时有发生，我们如欲在这次战争中获得真正的胜利，必须根绝分裂现象，国内团结一致。如欲国内团结，则非立即废除党治，实行民主不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以来，为争求民主奋斗，不遗余力。最近黄炎培、左舜生^[2]、章伯钧^[3]、冷御秋、傅斯年^[4]、褚辅成诸位先生应邀赴延安，为民主团结就商于共产党，这是表示国内问题亟须解决，更是迫不容缓。此事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甚大，本人应本同盟同仁之约特来重庆，以便就地与各方民主人士随时商讨，有所推行。关于国内立即实行民主之道，本同盟早有主张宣之于社会，但希望目前当局对于诸多不民主的现象予以澄清，如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释放

* 原载《新华日报》1945年7月6日

全国□□犯，取消□务，保障人权等，俾团结协商能顺利的进行。其次同盟总部设于重庆，本人离渝已久，盟务诸多问题尚待商讨，以便加强推进。

注 释：

[1] 旧金山会议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议由中、苏、美、英四国发起，邀请《联合国宣言》的签字国和参加国参加，有5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公约》。

[2] 左舜生（1893—1969） 湖南长沙人。1918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历任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委员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长。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军事顾问。

[3] 章伯钧（1895—1969） 安徽桐城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起义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底脱党。1930年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参与组织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1947年组织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4]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曾留学英国、德国。历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校长、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与邵力子谈^[1] 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

(1945年7月8日)

好几年我都没有出席。去年到重庆系同盟改组，这次来重庆系加强盟务。只要国民党有诚意民主团结，那么我当竭力促成；我希望国民党顾到国内外的局面，不要在十一月开国民大会，要在党派会议上，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注 释：

[1]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同盟会员。西安事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参加国共庐山谈判。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定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党政府。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 根据《新华日报》1945年7月10日有关报道整理。是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为抵制建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将再次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张澜与中共参政员共进退，拒绝出席会议。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亲往特园请张澜赴会，张对邵发表了以上谈话。

致 蒋 介 石[•]

(1945年7月14日)

介公主席赐鉴：

澜以衰耄，冒暑长征，苟利国家，敢为身计。窃谓今日之事，胜利第一，欲致胜利，首当团结，此为常识，无须深论。惟谋团结，必对事实。吾国不能离开中共以言统一，犹之世界不能离开苏联以言团结，理势则一也。比年以来，集结同人，调协国共之争，心力所逮，劳怨未辞。议者不察，或疑偏袒，殆有所蔽，未足深较，一笑置之耳。倾读公“有容乃大，必忍始济”之讲词，知公亦深以澜等平日之主张为然矣。六参政员延安之行，澜知结果尚佳，转捩之点，既在政治会议之重开，甚望早为决定，澜因乐观厥成。兹更敬陈两义，惟公察之。为政之道，宜占机先。故曰“焦头烂额，不如曲突徙薪”，远虑深谋，正所以争取主动也。国家前途，必行民主，沛然洪流，谁复能御？是则所以促进民主者，政府允宜先机立断，尽量推行，不必待国际牵引，群情迫求，而后点滴为之。果如是，则人失藉口之资。公居领掣之

• 据家藏稿。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阴谋消灭共产党，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准备发动内战。张澜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并致书蒋介石。

首，国家人民之福，抑公之利也，所以行之，则贵乎诚。此公学说，冀能实践。此其一。就澜所知，公于事亦常能英断，即如往岁日寇屡屡诱惑，公固毅然不为之动，始跻国家于今日光明坦途，此觉深佩。然亦闻有时为求融和部属纷歧之见，往往所为决定，因掺和修改，而致根本异质。于是乎公之初心，不必为人共谅，而祇替众人丛诟于一身。偶一念之，未尝不为公太息也！澜以为主持大计，必求太阿自主，不失均衡，理之所在，毅然赴之。曾国藩所谓“千夫非之不为动，山震岳撼不可夺”。必如斯，始有济。所以行之，则在乎明。此其二。惟诚与明，秉国者必具之德性。冀公更于百尺竿头进一步也。澜于国有责任感，于公尤寄殷切之望。用敢直陈，祈鉴为幸，专此敬颂
勋祺。

张 澜

为韬奋^[1]先生逝世 一周年题词

(1945年7月19日)

为争民主而断送了“生活”！
为争自由而终得到“解放”。
是将曙时的一颗晨星，
是浊流中的一股激浪。
怀志士之苦心，
耀光芒于万丈。
死者已矣！
吾人愿继先生遗志，
努力以追求其想望！

张 澜敬题 七月十九日

注 释：

[1] 韬奋 即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长乐县。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出版家。抗战前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

• 原载《新华日报》1945年7月24日第4版

导工作。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期间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斗争。皖南事变后，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到苏北解放区。1944年7月24日因病逝世。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主要著作编为《韬奋文集》。

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 的 谈 话

(1945年8月3日)

诸位先生：

今天本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邀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谈，承诸位惠然驾临，实在感谢得很。

本人一向居住成都，很少机会来到重庆。今天能得在此与诸位先生聚会一堂，尤感欣幸。

中国民主同盟过去经过历来发表的纲领与主张，以及最近发表的宣言，想诸位先生大致都已晓得。现在只简单地再向诸位报告几点。

第一点先讲成立经过。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三月在重庆正式成立的。它本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外的若干党派的一种结合（包括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我们一些发起人当时都是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会员。因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新四军纠纷的事件，深深感到为促进抗战胜利，实有全国团结的必要。但要推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进全国团结，各党派不可不先自行团结。同时又感到政治不民主，全国团结，抗战胜利，必无可能。因此经过多度商讨多次筹备之后，乃有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本同盟成立以来，实受了不少的压迫。为扩大基础，加强力量，去年九月曾经决议改组，把民主政团同盟改称民主同盟了。从那时起，同盟中不属任何其它党派的盟员就更加多起来了。

其次讲到同盟的主张。我们的中心主张，如前所述，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

民主同盟的产生本是一方应乎中国人民的需要，一方由于世界潮流的推动。我愿意借此郑重告诉诸位：我们同盟的立场，不但一向是以国家民族为立场，也将永远以国家民族为立场；我们同盟的主张，不但一向有其超然独立的主张，也将永远有其超然独立的主张。同盟的以民主、团结、抗战为中心主张，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除了原则以外，我们同盟目前的具体主张，也可向诸位先生分别说明几点。这应该分两方面来讲。

先从消极方面来讲。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我们绝对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间发生内战。我们这个反对的主要理由，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三点：

A. 假使内战扩大，试问对日战争将变成何种景象？就令日本最后总是要打败的，但是不是要延长了时日？这岂但是中国的损失，增加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岂不也是盟国的损失，也增加了

盟国人民的牺牲？

B. 假使内战扩大，必非短时所能收拾。其势必至影响全世界的和平。即以一般生活而论，在此世界大通之日，一地如发生严重事变，它地也必无不受到间接影响之理。

C. 中国抗战今已八年，尤未能胜利结束，人民困苦久已不堪言状。今又加以内战，人民更何能堪？国家元气的断丧，更将伊于胡底？兵连祸结，国家政治要哪天才能走上正常轨道？

至于如何达到我们这个反对内战的目的，我们当一面唤起全国人民的认识与力量，一面向内战的双方有力者陈说利害。同时我们也希望盟邦友人了解中国的内情，能援助中国使此不幸事件得以消除。

第二，对于足堪引起内战或使扩大，甚至造成国内分裂的所谓将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同样坚决反对。我们这个反对的理由，本久已有所声明。但似乎还未全为各方人士所了解。现在也愿再择要简单解说几句。

对于所谓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民主同盟当然不但并非在原则上反对，而且在原则上并是所久愿促其实现。但为求有利无害，对于所谓国民大会，却不能不问其真不真，却不能不问其能不能代表全国民意，它所决定是不是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接受。我们相信，所有这些，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必都是作不到的。从今日中国实情而论，将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国民大会一定不会是真的国民大会，一定不能代表全国民意。其所决定一定不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接受，其所谓还政于民之民，一定不会是全国大多数人民或全国大多数人民代表。召集这样的国民大会，岂不将制造纠纷，而大害于国家？我们同盟既以国

家民族为立场，对于大有害于国家的举动，如何能不坚决予以反对？

试拿国民大会代表来看，假使承认十年前所选的代表仍然有效，试问他如何能代表经过八年抗战的今日的民意？十年前因未到年龄而无选举权被选举的人，今日大半已到年龄，试问对于这些人的选举被选举权，今日是否可以完全抹杀不管？而况十年前的选举本是国民党一党所包办，其它党派都无合法地位，决无自由竞选的机会。这种选举当然非今日在野党派所能承认，又照原选举法所规定，所有国民党中央委员都为当然代表。诸位先生都是欧美先进民主国的人士，试问那一种民主国家有这样专擅的制度？

假使不承认旧代表继续有效，重行办理选举，或于旧代表之外，加以补充，但在今日事实上又何能许可？今天，国土大半犹陷敌手，离十一月十二日，为时又仅有三月，在地区上，在时间上，如何能办到全国普选？尤其人民基本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身体、居住、通讯等自由，都还没有获得；所有在野党派也都仍没争到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自由竞选；人民不能普遍自由竞选的产生代表，怎能是代表全国民意的代表？以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怎能是真的国民大会？由不是真的国民大会而讲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怎能不被人疑为是有意的欺骗？目的所在，只在党权专政的合法化。

因此种种，所以我们民主同盟，不能不唤起国民注意，促请当局觉悟，勿徒制造纷乱，遗大害于国家，自伤民族元气。应即停止召集名实不副的国民大会，应即采行切实可行的过渡办法。

这种切实可行的过渡办法，也就是我们民主同盟对于目前政

局的积极具体主张，根据我们的宣言，我愿意总括举出以下五点。

第一、即行容许人民享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身体、职业、居住、迁徙、通讯、教育、讲学等项自由权利，废除一切现行妨碍人民此等自由权利的法令与设施。

第二、即行容许各抗战的政治党派合法存在，公开活动，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

第三、召集包括各党派代表以及无党派的有力人士的政治会议，协商国家大计，制定临时施政纲领。

第四、改组政府为举国一致的临时性质的民主联合政府，执行由政治会议拟定的施政纲领，筹备真正的国民大会的召集。

第五、加速集结全国力量，配合盟邦军队，积极对敌反攻，非至收复一切国土、迫敌人无条件投降，抗战军事决不停止。

这五点都是除了在消极方面立即停止内战，进而积极加强团结以外，目前政局上应行而且可行的救急办法，万不容缓的。至于民主同盟关于将来战后立国的国策，除了实施进步的民主政治，保持世界的和平安全以外，我愿意藉此机会更提出两个根本原则来，告诉诸位。那就是：

一、对社会各阶层都保障其应得权益，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而求社会的和平顺遂地发展。

二、切实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准、文化水准，以打破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落后状态。

今天我因为感到诸位的亲切，很是高兴，话说得太多了，耗了诸位许多时间，很觉抱歉。诸位先生一定有许多高见，还请赐教。诸位先生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同人也当竭诚奉答。

最后还有一句话，过去诸位先生中有许多位对我们同盟，特别在消息报道上，有许多帮忙，我们总是衷心感谢的。以后仍望对我们不断的帮助。这不独帮助了中国真民主的实现，并且会有大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谢谢！

对抗战胜利结束 发表的谈话

(1945年8月11日)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邦投降，真是天大的喜事。残酷的世界大战结束了。从此以后，整个世界是进入了另一大时代中了。尤其中国，每一个人民得着这个喜讯，更有着逾越恒情以外的欢欣。在中国，更是进入了另一个大的时代了。

从甲午^[1]年起，中国被日本欺压了五十二年。日本的暴戾猖狂，且敢于向世界挑衅，其野心无厌，也正是从甲午年起。逐渐地到了“九·一八”，不惜悍然成为这次大战的首祸。“七七”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又已经过八年又三十三天。这若干年来，中国人民的牺牲，真是不可估计。今天，中国是胜利了，这胜利是中国上千万人的血泪汗换来的。我想无论在朝在野的人士，得到这胜利的消息，痛定思痛，在万分欢欣之余，必都有一种沉痛的回味，这胜利真来得不容易啊！

现在国人唯一的希望，也正是唯一的责任，就是要怎样保持这经过数十年艰苦沉痛才换得的胜利的成果。回想过去日本，是骤然强盛。我们的国家，则日在腐败因循、分崩离析之中，才使

• 原载《新华日报》1945年8月12日，《华西晚报》1945年8月28日。

得日本的野心日盛一日。我们自己受了沉重的欺压，不必说了。结果乃使世界和平，也得不到保障。无疑的，这是我们自己未尽到最大的最善的努力所致。我们今后，真要痛切的改弦更张，把责任自己担负起来——实行民主，就是尽责。必这样，才能发挥力量，保持自己艰苦得来的胜利，保证世界永远的和平。我们试看，盟邦的美英苏他们能够获致史无前例的胜利，最主要的力量，正是民主的力量呀！

抗战是胜利的结束了。我们试沉心静虑一想，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太多了，也太繁重了。政治与经济的复员，这不是简单的事。军队的复员，更不简单。而相连而至的一大串问题，东四省^[2]的问题，台湾、琉球等地的问题，救济沦陷区人民的问题，今后中央与地方间的一切问题，乃至国共两党及各党各派间的问题，一切一切的严重而繁难的问题，都随胜利以俱来。这些这些，必要每一件事，都能得到好的解决，然后才能保持胜利的成果，也才对得住上千万同胞在很长时间内所牺牲的血泪汗使其能得有代价。

于是，我们感到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了。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这所谓民主，绝不是形式的，而是要有充分的诚实的事实表现。即如以往大家争执的国民代表大会，在今后已收复了沦陷区域，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沦陷区中艰难沉

痛的人民的选权抹煞，而不另举行普选呢？况且在这划时代的大局面上，我们有什么理由还能坚持以十年前的旧代表来开会呢？今后正该在这件事上来作划时代的表现，这是执政党唯一的责任，我们希望有正确明朗的措施。现已进入平时，我们更要求政府立刻予人民以民主的基本自由，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决不放弃的。目前最紧的，更是希望国共两党军队赶快停止各地足以促成大规模内战的一切摩擦，并立刻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以使内部的政治纠纷能迅速而彻底的得到总解决。我们的胜利，是上千万同胞以无数的血、泪、汗换来的，来得不容易。内战足以毁灭一切成果。我们大声疾呼，我们是坚决反对。我们希望今天负责的各方面，一切要自动的向着人民的要求做去。大家牺牲成见，顾全国家。我们民主同盟，愿以最大努力协助其有所成功。我们认为只有停止内战，立刻团结，才能统一建国，保持胜利成果。舍此之外，别无途径可寻。这希望负责当局要切实考虑，赶快进行。更希望全国人民，不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要切实的监督政府及国共两党，向着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途上走去。这是最要紧的事。任何人都不要忘了过去流血流泪流汗的痛楚，而把这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机会抛弃了。

我们民主同盟，将有更具体的明朗的有力的主张，我们希望全国人士，立刻觉醒起来，协助我们促其实现，这也正是各人尽自己的大责任的唯一机会。我们全国人士，必要以争取抗战胜利的精神，来争取民主建国的胜利。

注 释：

〔1〕甲午年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日本侵略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

的甲午战争。

〔2〕东四省 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四省。热河省于1956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1945年9月10日)

介公主席勋鉴：
润之先生

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自润之先生来渝双方商谈已逾十日，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亦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中国民主同盟在最近四年间曾不断以民主、团结号召国人。对于如何消弭内争一点，更本其一贯主张，随时有所贡献。窃意目前为国家团结统一之绝好时机，国家一切问题应乘此时机求彻底之解决，更应求全盘之解决。惟其如此，则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纵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论，但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争一点，窃恐贡献无多。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根据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诸公留意者一。目前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确保国家之自由、独立；消极须着眼于化除

• 据1945年9月18日重庆《新民报》。

畛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以言国防，须陆、海、空三方面并重，更须植基于科学与工业。吾国海、空军之建设尚未着手，陆军装备尤至窳陋。天相中国，强敌克摧，此正国人加强警觉之时，决不应以伟胜而稍萌骄矜之念。今日全国兵力，合各方计之，当不少于三百师。如能操用全盘统筹之编遣计划，以目前养三百个师之物力，移用于极少量之常备军，而此种常备军，绝对超越党派关系，绝对遵守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之原则，则不惟中国陆军可渐进于现代化，且于实力亦可远驾三百师而上之。一旦元气渐复，国库见充，且可进一步规划海、空军之建设，期以二十年，然后所谓现代化国防始能庶几有望。如仍欲维持旧日之观念，谓兵贵多而不贵精，则纵令多所保留，除从事内争以外，试问更有何用？况经过此次世界大战，举世疮痍，人心思治。吾国对于国防虽不可忽，但遭受外国侵略之危机，实已大大减轻。不作根本之计，而多养无用之兵，以今日凋残之民力，实期期以为不可也！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此应请诸公留意者二。

凡上所陈，以公等谋国之忠，当早已计及，以正值双方商谈之际，又事关国家、民族之前途，故不敢缄然不言，直率贡其一得。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各方之新兴政团。公等即以此诚，作为一部分国人之公意，用资参考，或于问题之解决，亦不无裨益也。专此敬颂勋安。

张 澜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

对中国民主运动目前 阶段的五点意见

(节录)
(1945年10月1日)

一、中国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全部胜利，虽然还没有获得，但抗战的阶段总算结束了，此后将是和平建设的阶段。和平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条件，是在抗战过程中尽了力的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二、就目前中国现实条件来说，中国人民的民主生活，实现，仍需要争取，而且民主的道路，还是很曲折的。质言之，今后对于民主的争取，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艰辛；三、不论是民主生活的争取也罢，实现也罢，乃至民主生活的保障也罢，都要切实依靠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本身力量。捆绑在身上的锁链，只有自己能打碎，堵在嘴上的封条，只有自己能撕毁；四、所谓在抗战中尽了力的各阶层的人民，所谓要求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就是把反动买办资产阶级、少数大地主阶级除外的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无论争取民主，实现民主，保障民主，都需要发动广大农民起来，自然并不是忽视迫切要求民主的工商业

• 原载重庆《民主星期刊》第一期（1945年10月1日），《解放日报》1945年10月27日。

家，及小市民与广大的工人力力量；五、一个民主的刊物，不仅是要反映、宣达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意见，而且是要组织体现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力量，使它集中起来，步调一致起来，为争取、实现、保障民主而奋斗。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 代表问题的谈话(节录)

(1945年10月22日)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之代表应为国内外知名之士，确孚众望，且能代表多数人之意见。该会议将决定建国大计，而建国大计应由各方面参加拟定，始能顾到各方面的权益，反映各方面的意见。所以代表名额，应包罗各方面，除各党各派外，无党无派中尤应包罗产业界、文化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参加，如此政治协商会议才有力量。该会议本无法律约束力，假使此次会议能由各方面参加，则协议事项，今后也可能由社会力量、舆论力量去监督实行。

参加会议重在解决国事问题，而且要向全国人民负责。各党派参加是在提高政治影响，而且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由各方面协议得出公平合理的一致意见，使之早日实现，才是政治会议上的任务，并不是如一般的说法，只在借此争取公开与合法地位。至于个人是否参加，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尚未加考虑。

注 释：

[1] 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国民党、共产派、民主同盟、青

• 原载《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3日。题为编者所拟。

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这些协议不久即被蒋介石撕毁。

致国共代表函

(1945年10月28日)

邵力子、张岳军、王雪艇^[1]、周恩来、王若飞^[2]先生勋右：

国事至今必不容因仍敷衍，就消极言，如何建立大计，澜以为舍政治协商会议外，其道莫由。故于此会姑无论成果如何，实不能不寄予殷切之期待。因之代表人选，澜以为第一宜孚中外人望，第二宜顾到各方。如是始能反映各方意见，求得全国人士之拥护，即使议而不行，亦可得全国人士之督策，庶几收共济和衷、集思广益之效，而后有济于国家。两次承岳军先生询及同盟方面所推代表，澜均提出曾（慕韩）^[3]左（舜生）李（幼椿）^[4]三君。虽青年党之代表提名系直接交涉，同盟尊重其党的立场，不便越俎代庖，强相干预。且所提名，自系知名之士，必克胜任而愉快。然澜当时所以提名曾君等三位，实就同盟立场而言，盖以曾君等均为同盟重要分子，且均负时望。而曾君身陷敌伪，大节凛然，时誉归之。左则调停国共屡年不懈，且曾亲赴延安，实为事中之人。李更与张君劢先生同以各党派身份代表国家出席联合国会议，今有君劢，讵能无幼椿？今闻代表中只有曾君，而独无左、李，如是决定，在政治会议之本身，实为一缺憾！澜甚以为不可，用特函达左右，务盼加入左、李两君。澜之此举，非阿其所私，

• 原载《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8日。

亦初无党派彼此名额多寡之见，只求有裨益于会议与国家前途耳。此意尤望察之，专此奉达，即颂台祺。

张 澜

注 释：

〔1〕王雪艇（1891—1981） 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人。中国宪法学家。192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教育部长、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2〕王若飞（1896—1946） 贵州安顺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11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出狱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中共代表。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3〕曾琦（1892—1951） 字慕韩，四川隆昌人。1923年与李璜等发起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4年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6年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抗日战争时期与汪伪政权勾搭。抗战胜利后任青年党主席，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任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资政。

〔4〕李璜（1895—？） 字幼椿，四川成都人。中国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武昌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的谈话

(1945年12月1日)

中国民主同盟举行外籍记者招待会。由张澜主席亲自主持，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1]、沈钧儒^[2]、章伯钧、梁漱溟等出席。

席间各外籍记者纷纷提出若干问题，答复如下：

(一) 关于马歇尔将军使华的意义，民盟方面表示欢迎，此证明美国对华外交之重视，并希望马歇尔将军特注重促进中国之和平民主统一。

(二) 关于东北问题，民盟方面主张在政治上成立东北的地方联合政府，赞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事上希望双方都不驻军，由警察维持治安，成为和平民主的实验区。

(三) 关于华北问题，民盟主张县由地方选举，省由各党派协商，成立地方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

(四) 关于驻华美军的撤退问题，民盟主张中国事情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军帮助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

(五) 关于东北苏军缓期撤退问题，民盟认为在原则上任何一国都不应参与中国内战，但这次东北苏军缓撤，系应中央政府

• 原载《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日第二版。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5—1949)。

的请求，故仍属在履行中苏条约范围之内。

(六) 关于联合政府的产生问题，民盟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协议，成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仍系临时性的，由联合政府才能过渡到宪政的实施，因在联合政府中才能够监督进行公平的选举。

注 释：

[1] 罗隆基（1898—1965） 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46年任《民主报》社社长。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2] 沈钧儒（1875—1963） 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1905年赴日留学，习法政。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7年冬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卫同盟。1936年与宋庆龄等主持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后出狱，继续领导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1949年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致国共双方请速即停止内战函

(1945年12月30日)

岳军、雪艇、力子、恩来、若飞、剑英先生惠鉴：

政治协商会议举行在即，值岁序之方新，应与民以更始，至希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于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全国人心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双方既经迭次会商停战，际此履端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至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予鉴纳施行，是为至盼，祗颂新年迪吉

张 澜

十二月三十日

• 原载《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1日。

附 录：

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复 张澜主席函

(1945年12月31日)

表方先生惠鉴：

接奉赐书。祇悉一是，所示明岁元旦国共双方下令所属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恩来等完全同意。此次恩来等代表敝党与国民党张、王、邵诸先生于本月二十七日重开谈判，首先提出双方应立即下令所属部队，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恢复交通运兵等等，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为了保证上述办法之彻底实行，并提议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地区，进行实际考察，随时将事实真象提出报告，公诸国人评断。自此意见提出以后，迄今未见政府方面具体答复，现正催促当局，速求实现。际此献岁发春，百象更始，尤宜改弦易辙，以达民主和平，此实全国人民之公愿也。谨此肃复，即祈鉴察，并颂年禧！

周恩来 王若飞 叶剑英 谨启

十二月三十一日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挽昆明“一二·一”死难者

(1945年12月)

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

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

张澜 梁漱溟 张东荪^[1] 敬挽

注 释：

[1] 张东荪（1886—1973） 字圣心，浙江杭州（一说江苏吴县）人，中国学者。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任光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1934年与张君劢等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盟中央常委。著作主要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等。

• 据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大委员会合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表面不得不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但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11月25日昆明六千余名大中学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压迫捣乱。随后昆明三万多学生举行总罢课，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暴徒冲进西南联大等校进行镇压，致使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 幕式上的致词

(1946年1月10日)

主席、各位代表：

今天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这不只是全国人民注意的一件事，这是全世界人士注意的一件事。这个会议的成功或失败，不只关系国家的命运，的确可以影响到全世界的前途。我们想我们今天到会的全体会员，必定一致感觉我们今天的责任是十分重大。我首先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全体出席会员向会议表示，愿以真诚坦白的态度，至公无私的决定，和衷共济的精神，来与诸位会员共同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

这个会议虽然是以党派的代表占多数，我相信各位代表都承认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党派的利益，而是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具体些说，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怎样谋取国家自身的和平，以保障远东以及世界的和平；怎样建立中国国内的民主，以奠定远东及全世界的民主。今日在座全体会员，尽管在政治主张各有不同，但我们的目的，我们求国内的和平、求政治的民主，这目的都是相同的。因为在大目的相同之下，仍有见解的不同，所以这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这篇致词系由沈钧儒代读。

个会议才有它的需要与功用。因为只有政治见解的差别，而大目的仍旧一致，所以我们又相信这个会议决定有其光明的前途。

这次会议的目的，既然是国家和平与民主，我就愿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的出席会员，在这个目标上向会议贡献几点意见。和平与民主是相辅而行相依为命的两件事，但在步骤上，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今天主席在致词中，首先宣布和平谈判已告成功，这真是举国欢迎的消息。我们相信这不是暂时的和平，而是中国永久的和平。和平是会议成功的先决条件，永久的和平是中国建国的先决条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请求。至于谈到民主，我们今天没有过高过远的希望，我们认为今天全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只是那些做人的起码的各项基本自由权利，不过老百姓要的不是字面上与纸面上的自由权利，他们要的是事实上真实的自由。今天听到主席在致词后的负责声明，知道最近政府既已有所决定，这是我们要致无限的欢欣的。我们相信今后人民的自由，必可得到切实的保障，以副我们人民的要求。

其次，经过这八年的抗战，老百姓是颠沛流离，是家破人亡，全国大多数的人民，今天是无饭可吃，无衣可穿，无家可归。这些问题不力求解决，我们却从事政争党争，这无论是当权或在野的党派，内心都应感觉罪过。我们认为当前复员与救济这些问题，比较制宪行宪问题还要迫切，我们愿与会员诸公共同先来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实行开放政权，制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等等问题，当然是国家走上民主正轨的许多立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对这些问题有一贯的主张，却没有任何的成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着重这几点：

第一，不能违反人民的普遍愿望；
第二，不可辜负盟友协助的好意；
第三，方案实行的时候，必出之以至诚，守之以自信。

关于解决上列问题的详细办法，我们愿本互让的原则，在会议中求得公平合理的结果。

总之，今天我们出席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不止应该向全国国民负责，而且应该向八年抗战的死难先烈负责。先烈们用鲜血性命换来的抗战胜利，换来的民族生存，换来的国家独立，我们没有摧毁它、破坏它的权利。今天我们只有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才对得起死难的先烈，对得起全国的人民。今天我们就本着这样的责任心，追随主席及会员诸公，共同努力，以求会议的成功。

附 录：

政协会议前夕答《新民报》 记者浦熙修^[1]·

(1945年12月6日)

政治协商会议中，民主同盟参加的代表将是九人，记者昨日前往访问了该同盟主席张澜先生。他那坚定而坦白的态度，确称

• 原载重庆《新民报·晚刊》1945年12月6日。

得起为第三方面的领导人物。他说抗战以来和蒋主席谈过十次上下，因为他自己谈话直憨，有时不免使对方脸红筋涨，但蒋主席始终容忍，这就是不愧为政治家风度。

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真能达到怎样理想的结果很难说。该会议原定只谈和平建国方案及国大问题，对目前最尖锐的内争问题不愿说。在上月十一日的晚间，同盟邀请国共双方代表，催促召开会议认为与其双方面秘密商谈军队、地区问题，商量到明年还是达不到结果的。不如公开谈，或者可以达到反内争的效果，于是双方都赞成迅速召开。

假若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停止战争，这决议案就比各方发表的停止内争的宣言影响要大，这决议案将为国际国内观感所系，双方都将有所顾忌。

“但究竟能不能停止呢？”记者问。

“要看后台导演者。”一个星期以前同盟曾经给在美的张君劢先生打过电报，催他回来开会，同时要他先去会会马歇尔将军。前天已经来了回电，张先生已经见到了马将军，马歇尔表示：“来华将着重中国团结。”所以我想美国或修正赫尔利的做法。一方面，政治协商会议议决停止内战，同时双方也不愿扩大延长，那么战争就可以停止了。他上个星期还和何应钦将军单独谈过，他认为中国今日不该打，也不能打，说到痛心处，何氏也顿首赞诺。

第三者的力量，当然如众所知，是十分微弱的。但我们能够发动舆论的力量，使双方都有所顾忌。

张老先生又说：“共产党八年血战，解放区遍十二三省，要不给他一两个区域受降是不公平的。政府也该结束训政重新来通

盘筹划，惟有在联合政府中，才能缩编军队，民选政府，实施地方自治，但这也非要舆论的进一步的鼓吹，才能达到目的。”

张老先生更认为假若一切实际问题不谈，而专谈《和平建国方案》，条文再多么美丽，是要落空的。假若成立了联合政府，国民大会是可以普选的，但他老先生自己并不准备参加会议，打算让个位子出来给同盟的其他人士。（熙）

注 释：

[1] 浦熙修（1910—1970）女，江苏嘉定人，曾任《新民报》记者及采访部主任。

关于实现军队国家化 并大量裁兵案

(1946年1月16日)

同人主张：本会议为奠定国家统一，并树立现代国防起见，应通过下列两大原则：

一、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

二、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为实现上列第一原则及第二原则大量裁兵之一点，应即成立一整军计划委员会，此委员会以委员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包括下列三种人员：

- (1) 国共两党之军事人员；
- (2) 非两党之军事人员；
- (3) 非军事人员。

同时并聘请美国军事专家一人至三人，为此委员会之顾问，必要时，得被邀列席会议，或受委托，而协助计划工作，限期一个月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此系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等九人提交的提案。梁漱溟还在会上就此提案作了说明，“说明”载同日《新华日报》。

内制订切实可行之具体计划，此计划一面要达成军队统一国家之目标，一面要裁减常备军额至可能之最少限度，但无妨于两年内分期完成。

上项计划，由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核通过后，经由国民政府执行之。在执行时，仍由该委员会负责监督考核之责，直至任务完成为止。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请大会公决。

提案人：张 澜、梁漱溟、罗隆基
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
张东荪、张君劢、章伯钧

为暴徒捣毁《民主报》及 《新华日报》致蒋介石书

(1946年2月23日)

介公主席钧鉴：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中，始而发生特务在沧白纪念堂连日捣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会场事件，继而发生特务宪兵警察联合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事件，各方已认为遗憾。不意政协会议议决五大方案方公布于国人，重庆忽又发生特务人员在较场口破坏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血案^[1]，李公朴^[2]、施复亮^[3]以及政协代表郭沫若诸人，俱遭毒打。此案发生，尚在我公赴京之前一日，其经过情形，谅有所闻。嗣经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会同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无党派代表李烛尘诸先生，亲访吴秘书长铁城，请求政府惩办祸首，迄今仍无结果。讵料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重庆学生爱国游行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2月25日。《民主报》是中国同盟在重庆创办的机关报，1946年2月1日创刊，发行人张澜，社长罗隆基，总编辑马哲民。创刊不到一个月，2月22日即被坏人捣毁，仍继续出版，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合法斗争。《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统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正式出版，同年11月25日移至重庆发行。社长为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章汉夫等。1947年2月、3月，《新华日报》和《民主报》在国民党压迫下先后停刊。

大队已过民生路二十余分钟，突来特务暴徒多人，利用学生游行机会，先将《新华日报》营业部全部捣毁并殴伤职员数人。复将中国民主同盟所办之《民主报》营业部捣毁。自我公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初，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首为保障人民的自由，全国人民无不额手欢慰，乃反动阴谋分子在辇毂之下，制造不幸事件，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显为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之成功。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得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专此上陈，敬祈

钧察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张澜谨上

二月二十三日

注 释：

〔1〕较场口血案 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协议。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人。

〔2〕李公朴（1900—1946） 原籍江苏扬州，生于镇江。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九一八事变后，致力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被推为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同沈钧儒、邹韬奋等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战后获释。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爱国民主斗争。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3〕施复亮（1890—1970） 原名存统，浙江金华人。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历任北平师范大学等校教授。1945年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劳动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

就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 发表谈话

(1946年3月21日)

政治协商会议会期中，就政府改组问题争执最久，各党派坚持最烈者为：（一）各党派自行提出国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选任，不能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二）国府委员会必须有决策权与用人权，久经协商始获得国民党代表的尊重，而达成协议。这次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把第一点全部推翻，不仅决定各党派所提国府委员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任，并且还通过“如各党派人选在二中全会闭会前，不能提出名单，则由国府主席提请常委会选任之。”第二点也是加以混淆。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暂时最高决策与用人机关，其权利移交国府委员会，正是政协各党派力争的结果。此点，阅吴铁城先生昨日谈话，亦已承认，但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中：“战事业已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应即撤消，恢复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本党对于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其行文明明以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代国防最高委员会，任何人读其原文，只能有此解释。此中文字最少也表示有意含糊混

•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3月23日第一版。

清而其目的无非在维持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所以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

慰问马来亚侨胞电

(1946年3月28日)

星加坡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1〕先生转 马来亚〔2〕全体华侨公鉴：

诸君对祖国抗战，出钱出力，功勋卓著。太平洋大战的爆发，诸君不畏强敌，冒矢当坚，配合盟军，壮烈搏斗，不独为全国同胞所颂扬，且为世界人所钦佩。现抗战胜利，敌人屈膝，而诸君仍在水深火热之患难中，澜等远望南天，曷胜惓念，除电请美洲侨胞团体急筹粮食、药材、旧衣运交阁下，急谋救助，并由参政会提案，请政府一面向英交涉改良待遇，一面切实救济外，谨专电慰问，至希鉴纳悃诚，为国珍摄。

张 澜

三月二十八日

注 释：

〔1〕陈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人。爱国华侨领袖，著名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积极支持国内的抗战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2〕马来亚 今马来西亚旧称。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刊印。

复李璜函

(1946年4月13日)

幼椿先生大鉴：

林可玑^[1]君转到四月八日手书敬悉。一是同盟与青年党^[2]从来相处并无间，然自慕韩归，情势一变，当时即颇费调处，以为互有责任，及台端回国，又趋好转，澜深引为幸，以为努力消灭过去痕迹大有可能。成渝两地同澜意，而相与从事于此者亦非无人，不料政协会后又造成不快情绪，自争执国府名额之事变生，曾、余两君均为同盟中委而发表谈话，乃以同盟为争执对象，向日不快之情，至此而趋于表面化矣。当时澜在成都，初无所闻，返渝后闻君劝言，曾因此事之发生，而与慕韩诸君讨论到贵党与同盟之根本关系问题，明白提出“界限划清，另定合作办法”之主张，慕韩、启天^[3]极表赞同，君劝即告知同盟各负责人，于是分家合作之说，渐为人知。并无如来信所谓“公开令中青脱离民盟”之决定。但根据“界限划清，另定合作办法”之含意协定，同盟座谈会曾作“请有青年党籍之盟员自动退盟，并盼盟外合作”之决定。此二月初旬之事。因当时澜在成都，虽有该项决定，尚未有何行动，澜返渝后，即予搁压未行，盖澜以为党派关系之须调整者，当不止贵党，而此又为必须调整之事，故

• 据家藏稿。

主张并同意调整党派方案时商讨，然迄今未有任何决定。澜盼先生早归，亦正为国事多艰，在野各党必须力求合作。党派事小，国家事大，不能以小而忘大也。此外《新中国日报》以往之态度实有改正之必要，澜曾屡为先生言之，如强分同盟政协代表，如各单位之立场，因而引起伯钧向新民报记者之谈话，加以声明。去年昆明、成都学生运动之被破坏，评中共之被称“共匪”，此当为以往之事，近来之拥护所谓“国权运动”与强调反苏，尤其戴笠〔4〕死耗，以重要地位登载中央社恭维之报道，凡此皆足引起批评，贻人口实。同盟对青年党之政策，实有不敢苟同之处。澜常思先生如不去旧金山，必不有今日之情趋，当台端归国之后，青年党曾余诸君不再在言论上刺激同盟，亦或可望渐灭过去痕迹，又或者先生与舜生仍如过去数年情形，直接任事，政治上可收调协之效，亦不致如今日之有许多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然均未能如愿。于是乎有一义不得不为先生告，个人意识在某种情势下，实不易左右群众意识，若不从事事实上求所以转变群众心里之道，一二人难竭尽其力，随时调处，而收效殊微，感此痛苦非澜一人，此则有望于先生更加努力者也。

张澜拜启

注 释：

〔1〕林可玑 福建省厦门人。1947年3月增补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年7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2〕青年党 中国青年党的简称，1923年在法国成立，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主要发起人有曾琦、李璜等。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9年定名为中国青年党。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解放战争时期依附国民党反动派，脱

离民盟。后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

〔3〕陈启天（1893—1984） 湖北黄陂人。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4年与人创办《醒狮》杂志，宣传国家主义。中国青年党领导人之一。曾任四川大学、中华大学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1949年去台。

〔4〕戴笠（1896—1946） 字雨农，浙江江山人。国民党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积极发展特务势力，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46年3月从北平飞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亡。

致中共中央悼“四·八烈士”⁽¹⁾电

(1946年4月13日)

延安毛泽东先生转中共中央诸先生：

报闻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李少华诸先生专机赴延安失踪消息后，正焦念间，昨闻该机确已失事，全机烧毁，现王先生等均惨烈牺牲，同人惊悉之余，无不痛悼。王先生等为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坚决奋斗，历尽艰辛，此次同机赴延，或商讨宪草修改，或为协商军队统编，关系国家前途尤为巨重。今竟遭此不测，此不仅为贵党之重大损失，亦为国家民族之损失，值兹时局艰危之际，本同盟除向在渝贵党暨王先生等家属致悼唁外，尚希先生等为国节哀，加强领导，以促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早日实现，则王先生等虽死犹生矣。

张 澜 沈钧儒 黄炎培 张君劢
张东荪 梁漱溟 章伯钧 罗隆基
中国民主同盟 张申府 朱蕴山 陶行知 周鲸文
蒋匀田 史 良 周新民叩

四月十三日

*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4月14日。

注 释：

[1] 四八烈士 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烈士的概称。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破坏《国共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央汇报请示。于4月8日和新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当日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赵登俊、魏万吉等。

致美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 吁请重视中国严重局势函

(1946年4月18日)

美国

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萨柏司、伊塞克、贝菜、奥特兰、柯菲、爱柏哈特、鲍威尔、海利、萨凡奇、台拉西、马坎顿尼西诸位议员先生：

我们，下列签字者，欣闻美国人民代表诸先生最近组织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我们认为这不仅关系贵国和平民主的外交政策，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幸福生活将有巨大贡献。我们对于这一非常适时的运动，深为注意，并赞同你们的全部主张。

世界和平，为今日全世界人民所必需，世界和平之获得，端赖于美苏两大国家之合作，中美中苏之合作具有美苏合作之桥梁作用，关系至大。先生等揭举六大原则，正义之音，举世共仰。特如谓“赞成提供所有盟邦以大量贷款，但反对以武器与军备给予盟邦使其进行内战或对付殖民地人民”。我们对此尤具深切之同感。惟此种原则如何体现于贵国对中国当前外交上，却不能不予以注意。当前中国政情复杂，和平已受威胁，国内团结尚未巩固，

*原文载《新华日报》1946年4月18日第二版，此函由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75人共同署名。

人民尚未获得民主生活。在此情况下，贵国对中国之帮助，虽盛情可感，理无可让，惟实际效用，则适得其反。如对日作战剩余之贵国武器与装备，已对中国当前和平问题起了不幸作用。如魏德迈将军指挥下之美军司令部，为中国运兵运械前赴东北，亦已显成东北军事冲突局势，当为始料所不及。又如中美借款，在原则上，为友邦帮助中国建设，吾人甚表感谢；但在中国政府没有改组为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之民主政府以前，任何贷款，都会发生非常不良后果，徒增中国人民之负担与灾难。故我们不能不为诸先生进此一言。

总之，中美两国素具深长友谊，中国人民本希望获得伟大美国友邦之帮助，使有利于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道路。中国人民现在有最大决心与力量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我们坚信，中美两国人民将并肩为世界和平民主共同奋斗。

敬致

民主和平敬礼

签名者：（七十五人，名略）

挽“四·八烈士”

(1946年4月19日)

题词

为民主、和平、团结而牺牲是国家、人民的损失!

挽联

为人民事业牺牲，闻耗万家齐悲泪；
嗟革命前途多阻，伤心陇上赋招魂。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4月19日，系张澜为《若飞、邦宪、希夷、邓发、齐生诸先生纪念特刊》题词。挽联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4月20日，据《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1946年4月19日，陪都各界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张澜主祭并送了挽联，周恩来报告烈士生平事迹，董必武致谢词。

致李公朴夫人

张曼筠女士（节录）^{*}

（1946年7月16日）

李公朴先生夫人张曼筠女士青鉴：

公朴被害消息传来，为之惊愤不已！即已飞函南京总部，扩大向中外控诉，并向政府严重抗议，总部当已负责进行。兹托潘大逵〔1〕先生代表澜个人，致最诚挚之慰问，尚望夫人勉节哀思，处理善后。公朴先生早为抗日救国而入狱，更为庆祝政协成功而遭殴击，今更为民主运动而遭枪杀。好恶符于人心，言行合乎正义。热情勇气，足以廉顽立懦，其死也非一家之私恸！惟望夫人善自保重，有以继公朴先生未竟之志，斯有以副同仁及全国同胞关切期望之忱！

张澜拜启

七月十六日

注 释：

〔1〕潘大逵（1902—1991） 四川开县人。1942年以后，任云南大学教授。1943年在昆明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闻一多、楚图南负责领导云南盟务，1945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解放后曾任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名誉院长、省政协副主席。

* 原载《华西日报》1946年7月17日第一版。

致闻一多夫人 高真女士

(1946年7月17日)

闻一多^[1]先生夫人青鉴：

报载一多先生被害，且波及长公子情形，愤慨万端，莫可名言。卑劣残酷，至于此极，尚复为人世耶！澜除飞函总部切实向政府抗议外，并已专函蒋主席切致责问。同仁等对此事中发生，已万难再事容忍矣。所望夫人勉抑哀思，尽其未死之责，俾世兄辈能承先人遗志，国家光明之一日，一多先生当含笑地下矣。余托潘大逵先生代为致达。尚祈

礼祺！

张澜拜启

七月十七日

注 释：

[1]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是著名的诗人学者。抗日战争期间，痛恨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反对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场身死，子立鹤重伤后死亡。

• 原载《华西晚报》1946年7月19日第一版。

致潘大達（节录）

（1946年7月17日）

大達先生：

前托慰问公朴夫人一函，度达。见报闻一多先生继之被害，极卑劣丑恶之能事，几使人疑心非人世间事矣！愤慨万端，莫可名言，除告总部向政府严重抗议外，澜并专函蒋主席切致责问。事至今日，盖已万难忍受，惟昆明治安当局，岂能袖手熟视。望支部同仁切实交涉，务求得真相，捕获凶手，公诸于世，并保证不再有相类之事发生。昆明经此恐怖，同仁近况，良为悬念，尤望转达鄙怀。吾人诚宜益加激励，奋斗到底，曙前一霎黑暗，惟有冒万险撑耐过去，始可见光明之来临。盼此意尤望转告在昆全体同志为要。兹致闻夫人慰函，并请先生代表澜恳切慰唁，亲为致送。关于善后一切办法及李、闻夫人今后生计居住诸事，统望详以见示。

张澜拜启

七月十七日

• 原载《华西晚报》1946年7月20日第一版。

致 蒋 介 石

(1946年7月18日)

南京民盟总部速转国民政府蒋介石勋鉴：

同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两君相继被害，全国惴惴，舆论哗然，莫不曰此顽固分子反民主、反和平，有计划之阴谋，而此阴谋之发动者实遍国中。民主同盟自抗战胜利之以后，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之主张，始终只为此而努力。政协决议原符斯旨，全国之人，万引之以为庆幸，不料较场口事件后，情势日非，人心转趋忧虑，主席保障人权之四项诺言，不独未见实现，今且变本加厉，相反而行。即单以民主同盟言，西安李敷仁⁽¹⁾、王任⁽²⁾之被诬杀不及百日，昆明李、闻两君又被暗害。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心，不将使天下之人以为政府之志，必在不民主不和平，此岂为国人所望于政府者耶？近来一切镇压威胁之措施，已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人心愈丧，隐患潜滋，逼至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时，国家之事尚可问耶？此不特为民主同盟所寒心，全国同胞所危惧，亦岂为政府及主席之所利？见报知主席对昆明之事，亦表关怀，且以令缉凶。惟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纵指使，必有背景。主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席于事先，似不应该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敢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特务行动，自由如斯，所谓纪律者又安在？是则星星之火，不特可以燎原，势亦可以焚身，则天下人对政府及主席之统制能力，讵敢相赖？夫谋国在诚，驭众在信，使天下人对政府信赖之念，已启动摇，即在专制之时，人心动摇，且难施其统制，民主国家之政府，能如是耶？是以澜甚为政府及主席虑矣。窃思所以致此之由，澜以为不在人而在制度。特务机关之于民主政府，实如水火之不相容，既为全国人民所深恶，亦且为不利于政府及主席，其应废除，不待筮龟，保障人权，为民主是同盟唯一之使命，亦主席亲口之诺言，用是敢以三事相请：

（一）请断然决定对全国特务机关及制度，立予彻底废除，民主前途，庶几有望。

（二）请对昆明李、闻两君之事，及西安李、王两君之事，务严令负责机关必获主凶依法惩治，人权保障，庶非空言。

（三）请明令全国各地方治安机关，务保证今后不再有类此之事发生，否则无论何人，认真从严惩处，已丧人心，庶可挽回。

凡此三事，务盼立予施行，以慰群情，以正视听，懇直陈言，惟祈谅察。

张 澜

注 释：

[1]李敷仁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西北通俗文学家。1946年在陕西省立民教馆主编《民众导报》。5月1日被国民党特务主使的暴徒架上汽车，在咸阳杀害。

[1]王任 律师。1946年3月起，相继发生西安《秦风日报》（发行人为中国民主同盟常委杜斌丞）被国民党特务指使暴徒捣毁、纵火等事件。王任受聘为该报法律顾问，竭力保护该报。4月9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诬为烟犯被枪决。

就国民党当局破坏民盟 发表谈话

(1946年7月21日)

民盟自始即主张中国需要民主，需要和平统一，不愿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主张民主，当然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因为主张和平统一，当然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以政治协商来解决所争执的问题。恰恰共产党的要求与民盟主张一样，也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并要求长期停战，用协商来解决军事政治各问题，这本是极正确的。国民党人不自觉悟其非，反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国民党当权派既坚持一党专政为他们不可损失的权利，主战派坚持获得美国援助，企图在短期内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于是反民主、反和平、反共产党，并总想破坏民盟，打击民盟。

从去年九月以来，对于民盟不是用利诱来分化，便是用威胁来打击。例如政府要人告黄任之^[1]先生称：“政府帮助某党经费数千万元。任它扩大其党员，以之鼓励黄任之先生，而黄不为所动。”又政府某某要人劝张君劢^[2]先生，谓：“政府一切协助，专以帮助某党团”，君劢先生亦不为之动。这是用利诱以图分化民盟的。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事证。又如在政协会议期中，陪都军警特务突去搜查任之先生的卧室，较场口庆祝政协会上，特务流氓又去打李公朴先生等。前月底，此间张志和^[3]先生住宅之被特务监视，并称一俟讨伐令下，即荡然清除异党，予民盟以重大打击。尤其是目前两月，特务已在西安前后杀害了本盟同志王任、李敷仁。本月昆明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亦相继被特务暗杀。这都是用威胁打击民盟的事证。

我们站在民盟的立场，对于国共两党仍然是确定中立，站在国家立场，对于国共两党的行动，则必须明辨是非。任他如何利诱，如何威胁，我们为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之能实现，只坚守八个字：“再接再厉，不屈不挠”。

注 释：

[1] 黄炎培（1878—1965） 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讨袁运动。1917年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董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访问延安，同年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主任委员。

[2] 张君劢（1887—1969） 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宣传君主立宪。1934年与张东荪等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历任国社党中央总务委员会总秘书、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盟中央常委。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年8月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民主社会党，即退出民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1947年任民社党中央主席。1949年去国外。

就孙中原被特务绑架事

致梁漱溟（节录）

（1946年7月30日）

〔衔略〕

……昆明血案，悲愤无已；北平市委孙中原，又遭绑架，特务暴行，曷有止境？昆案已向政府提出抗议，尚希继续催促，务须彻底查究，对于孙案总部需应再提抗议，请政府饬北平治安当局，限期破案，早释孙君，并查究凶徒主谋，以申纲纪。

• 节录自《华西晚报》1946年7月31日第一版。报称：民主同盟北平市委孙中原，被特务绑架去后，虽经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东荪等向北平治安当局提出抗议，迄今仍无下落。民盟总部主席张澜昨曾一面致函张东荪、一面又函总部秘书长梁漱溟，向政府再提正式抗议。

哀挽李公朴闻一多先生

(1946年8月18日)

挽 联

昆池为热泪流积，所悲国家人才，连遭毒手
历史是鲜血造成，要争政治民主，岂惮杀身

哀 词

惨案可悲，人才当惜

• 原载1946年8月18日《华西晚报·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追悼大会特刊》。

分函答谢各方慰问（节录）

（1946年8月）

（一）致中共四川省委函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台鉴：

李、闻追悼会中，澜被特务击伤，远承电慰，感荷莫名。此次之事固非打击私人故，澜伤虽不重而意义则甚重，然亦何损于民主之进行，徒使人对法西斯特务益增厌恶耳。专复致谢。

张 澜

蓉 健〔1〕

（二）致吴玉章同志函

玉章先生惠鉴：

李、闻两先生追悼会中，澜为特务击伤，伤虽不重而意义则甚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9月2日第三版。1946年8月18日，成都各界人士在蓉光电影院举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张澜代表民盟及李、闻家属致答谢词。散会时，张澜在蓉光电影院门前被国民党特务袭击，头部受伤。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曾致电慰问。

重，然亦何伤于民主之进行，徒使人为政府惋惜而更加强民主运动之力量而已，远承慰问，感荷莫名，创伤渐愈，祈释廑念，专复志谢。即颂台祺！

张澜拜启

八月二十七日

(三) 致民盟渝支部函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鉴：

澜被特务击伤，伤并不太重，而意义则甚重，然亦何伤于民主之进行。惟有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使一切威胁利诱皆无效，而后真正之民主政治可以实现，而人权乃获保障，此则愿与诸同志共勉之。四亿同胞，方陷水火，勿徒以澜个人为念也。专复致谢。

张 澜

蓉 健〔1〕

注 释：

〔1〕 健 28日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 为召开国民大会事 致蒋介石电

(1946年9月30日)

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

接读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张厉生主任九月二十三日函，催将民主同盟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于本月底以前送交政府。查国民大会代表增加之人数及其分配，尚未经政协会最后决定，今催各党派开送名单，究以何项名额为依据，此实令人大惑不解。然此其小焉者也。窃以召开国民大会之唯一目的，乃在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以奠定中华民国民主统一之基础。然此种大业，必于全国人民全国党派精诚团结之环境中，始克完成。今者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按照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召开。但国民党反动派违反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一手包办国民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拒绝参加。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当日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除青年党、民社党的一些政客及极少数“社会贤达”参加外，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

国共两党正在进行中国历史上空前激烈之内战，一地之争，杀人盈野。一城之争，杀人盈城。烽火遍天地，膏血涂原野，虽历年内战，无此规范，更无此残酷。在此兵连祸结之情形下，犹谓国共双方代表能平心静气，共聚一堂，以讨论国家基本大法，宁非幻想。若谓国民大会之举行，不求全国各党派之全数参加与合作，而以当权在位之国民党单独为之，一党专政之局不改，全国统一之局不成，则宪法之尊严何在，宪法之效能何在？且事推演所及，万一党派各召会议，各制宪法，各建政府，各成国家，使此十一月十二日之国民大会，陷国家于长期分裂，永久内战之境地，国命民命，万劫不复，此为同人栗栗危惧宁死不愿见者，又岂我公领导建国之本衷耶？中华民国之产生，已三十余年于兹矣。内战相循，民无宁息。其主要原因即过去当权负责者始终未能用政治解决内争，始终陷于武力统一之错误途径。因此过去亦曾一再举行所谓制宪会议或国民大会，亦曾一再公布宪法，然此又何补于过去分裂内战之局？宪法之效力，宪政之推行，须有人民一致之拥护。此则在领导者之诚信，不在武力也。自今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以后，国家实已得到空前未有之和平统一机会。不幸协议各端，未能立即实施，此实全国人民痛心之事也。今者国不堪再乱，民不堪再苦。同人以为时至今日，国家必须立即终止内战，立即恢复和平，而后举行全国拥护之国民大会，制定真正民主之宪法，以实现国家之和平统一民主。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倘各党派能及此推诚相与，则十一月十二日之国民大会，犹可为转祸为福之枢纽。凡足以促进国家和平统一民主者，同人当全力追随，共襄大业。反之凡陷，国家于长期分裂、永久之内战之举措，见绝于国人，贻祸于子孙，同人不止不敢冒昧从事，且将呼

吁国人共起反对而制止之。直率陈词，幸垂察焉！

张 澜 沈钧儒 黄炎培 张君劢
张东荪 张申府 章伯钧 梁漱溟
罗隆基

同 印

在渝与记者就时局发表谈话

(1946年10月14日)

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对记者就当前时局发表谈话，大要如次：

“国民党占张家口，下国大召集令，依我看来，不会有什
么效果”。

“《政协决议》，是要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完成宪草才能
召开国大。开国大的意义，是通过宪草，现在内战没有停下来，
国民党的所谓扩大政府基础，也只是请客，不是联合政府。政协
决议要的宪法，是民主宪法，不是《五五宪草》。国民党以一个
‘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
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不仅
我们，中共当然不参加，青年党亦不至参加，国民党如一定要一
党召开，让他开去。中国宪法已通过两次了，人民不同意，还得
再来。民盟没有考虑的余地”。

“民盟不愿叫内战发展下去，要全面停战！我们一贯主张：
和平、民主达到统一。和平，不能打；民主，即是要打破一党独
裁，实现联合政府；不和平、不民主，不能统一。国民党如不能
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与其他的人合作。我们为人民，为国家，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5日。

也是为正义，为公道，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和平、民主，达到统一”。

“国民党占了张家口，马上下国大召集令，显然不顾一切了，好象张家口一拿下，全国就没有事了。其实，是错了的，这个仗是打不彻底的！国共双方现在谁也打不倒谁。中共武装虽不及国民党，但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还有广大的民兵，其力量不可侮。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还得必走政治协商的路。和平民主战线上的同志和朋友，还要本着和平、民主、达到统一的一贯主张，坚持斗争。我们不悲观，但我们也看不出是短期能达到目的的。”

“据我们的经验，国民党目前虽气焰万丈，但或将临岸回头的。这样的事已不只一次了”。

“如国民党硬要一意孤行下去，他的政治、经济、财政、教育，一切不能改良，人民的痛苦一天天加深，这对他是异常不利，我一直劝国民党改良，不是要革命，但我们要不折不扣坚持我们的一贯主张的”！

在重庆四个团体欢迎 会上的讲话*

(1946年10月25日)

此次国大召集令，由国民党一党单独颁布，这表明国民党完全推翻政协决议。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促成召开政协会议，可是军事方面一面调处，一面助长中国内战。目前全国人民对重要的内战问题至为忧戚，各方面人士均集中力量如何扑灭此战火。中国民主同盟本公正的态度，明辨是非，再三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

远在民国二十九年新四军事件，当时有十一位参政员（大多数是现在民盟重要负责人）为了促进国内各党派团结一致抗日，调解国共纠纷，提出方案四条，其中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三十年下期，我在参政会上提出“实行民主”一案，内有十条，重要的也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最后六条是军队取消党部，取消特务组织，国民党党费不能由国库开支，国民党不能利用政权强迫公务人员入党等。当时蒋主席拒不接受。民主政团时代提出对国是如此主张之理由，主张军队国家化是防止内战，反对内战；主张政治民主化是反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民盟自

*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政团时代迄今仍本此一贯主张。立场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主张是实现和平。无论国民党政府如何摧残同盟，打杀、逮捕、拘禁、造谣、诬蔑，我们不屈不挠，坚持我们的一贯主张。

中国要由和平民主才能达到统一，我们始终要促进国共的团结，不使国家造成南北分裂的局面。

现在内战不息，始终边打边谈，最近虽然和平之门重开，可是一面又在开军事会议，调动军队，不管怎么打，打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不能彻底打下去，国内国际的形势所不允许，国共双方彼此都知道。

目前时局的症结有两点：

(一) 互不信任。我认为国共内战，并不是主义之争。中共在解放区的措施相当右倾，而国民党所颁布的政纲政策还相当左倾（事实上又非常顽固保守反动）。既不是主义之争，便应当互让，今天互不相让，原因系在互不信任。本月十六日蒋主席对时局之声明所提出的八项具体办法，并没有让步之形迹可寻，正如报载的某政治评论家所说：“综观蒋主席的意见，即政府打到手的东西政府要，中共答应让的东西政府要，过去协定中与政府有利的政府要”。蒋主席一再强调说：“余负政府之重责，自当采取必要之措置，以保障国家之和平，与人民之安全”。声明中所说的必要之措置，就是主张要用武力解决问题非常明确。中共对时局声明，在军事上坚持一月十三日以前的军事位置。中共之所以不让，声明中说明自双十协定政协闭幕以来，国民党把承认的一切诺言保证完全撕毁了！

双方都不相信，怎么能自动放下武力。

(二) 蒋主席被国民党实权派、好战派所包围。中国目前的

内战本质上系民主与反民主之战，我们要认清此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是政治自由的民主；民生主义是经济平等的民主，可是自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厉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而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不得不匿迹消声，国民党内的当权者多半是法西斯、残余的军阀、封建的官僚的混合体，而决定国民党政治路线是当权派和好战派。当权派代表大地主、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在工商界、银行界独占，同好战派勾结起来，在内战下维持一党独裁，蒋主席就被这两个集团包围。

在今天蒋主席正被这两个集团包围很紧之际，而欲真正停战，和平有结果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们第三方面人士以及广大的人民，要如何使国共双方能互信，蒋主席走向民主。过去是我们第三方面的力量太小了。我们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及广大民众，要扩大范围加强团结，再与国际上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携手，造成国际国内公正而普遍的舆论力量，作国共政治解决的保证，谁是谁非，予以公正而强有力地的舆论制裁。打破蒋主席被自私、顽固、反动、反民主的分子的包围，使蒋主席能实行民主。

我们面对目前严重的时局，不必乐观也不必悲观，更要加紧团结全国各阶层的广大人民一致奋起，反对内战，力争民主，前途总是光明的。本人愿追随诸君之后，为促成民主和平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与记者谈民盟对一党 国大的态度

(1946年11月14日)

国民党所下停战令，不但是单方面的停战令，而且是半停战的。所谓停战令、非正式综合小组、国大延期三日，其目的是要换取第三方面这一国大代表名单。民盟立场是要调和国共关系，争取和平、民主，达到统一。目前即是第三方面提了国大代表名单，不特不能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相反，更会造成纠纷，使得将来连第三方面也没有了。不管内战再怎么打下去，中国终究必走和平、民主、统一的道路。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调人态度，实现和平、民主、统一。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5日。

赴上海前在重庆机场

答记者问（节录）*

（1946年12月12日）

问：对打开和谈僵局有没有把握？

答：（摇头）还不到时间。政府说是要派人去延安，是和平攻势。你看他“国大”又开得这样！从前是边打边谈，如果再来边打边开边谈，就更麻烦了。

问：以后准备怎样打开这个僵局？

答：很难说。

问：政协以来，和谈无结果，是由于不守信用。以后怎样才能使得不守信用的守信用？

答：现在第三方面只剩下民盟了。政府又在对民盟施压力，分化民盟。民盟靠舆论监督不守信用的守信用。如今舆论力量还不够大。不过，到了岩边要掉下去的时候，是要回头的。

问：什么时候民盟开中全会？

答：在中常会才能决定。

问：中全会要讨论些什么？

答：确定政策。民盟今后的任务是扩大第三方面的力量，把全中国爱好民主的人团结起来。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12月13日，第二版。原系署名“H”的记者写的新闻报道。此为其中张澜答记者问部分。

抵沪时在轮船上 发表的书面谈话

(1946年12月18日)

在民盟总部迁京之后，早该东下。两个月前，即由蓉到渝，当时本欲一直东来，乃到渝即知“国大”召集令已下，且适患病，遂暂滞留渝□。此次来沪，系照原定计划，并非临时决定。民盟不愿参加分裂国大，余在渝时曾同南京总部通过电话，得知民盟中央及各地同志亦一致如是主张，闻之甚慰。至民盟何以不参加“国大”，及对时局意见，在上月二十四日，民盟在京招待记者时，已有书面谈话，余自极端同意。今后民盟当一本初衷，拥护政协，反对内战，力求和平、民主、统一之实现。对调解武力之争，尤当保持超然独立之第三者立场，继续尽其最大之努力，更愿联络真正第三方面之人士，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之人群，相与努力。至于参加政府与否，在内战未停止，政协未实现之前，民盟根本不考虑此事。现在召开之“国大”，一切情形根本不欲加以批评。目前中国老百姓所迫切需要的，是不打仗，要不打仗，才能生活得下去；否则，全中国人民无论农工商学眼看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12月19日第二版。12月18日晨7时，张澜抵上海，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华岗、王炳南、陈家康等及报社记者百余人登轮欢迎，张澜在轮船上发表此书面谈话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就只有同归一尽之一途。抗战结束已达一年，还要叫老百姓担负战争的痛苦，真是太不成话了。关于民社党与民盟今后之关系，应俟民盟二中全会决定，惟无论如何，对于争取民主，彼此意见当无异致。今后不论盟内、盟外，自须通力合作。民盟二中全会开会日期及地点须俟常会开后，始能决定。张东荪先生可能到沪出席，梁漱溟先生暂不东下，但他并不消极，对国事及盟务曾屡次与余研讨，意见都甚相同。

谈民社党（节录）

（1946年12月20日）

民社党与民盟之关系，尚未决定。民社党^[1]参加“国大”及张君劢之举措，系属憾事，极表惋惜。闻民社党内近日争执颇烈，若干党员及干部有退党与改组之酝酿。

注 释：

[1] 民社党 民主社会党的简称。前身是国家社会党，1934年成立，发起人张君劢。1946年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民主社会党。主要成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依附国民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11月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1日第二版。本文摘自该版的一篇报道，报称：“张澜抵沪后，曾访李济深、黄炎培等，张君劢约晤张澜，尚未延见。民盟留沪全体中委，曾欢宴张澜、鲜特生两氏，张君劢未到。张澜今晨（12月20日一编者）语记者...”本文即为“语记者”内容。

在沪十一个民主团体 欢迎会上的讲话*

(1946年12月23日)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承各位这样盛大的欢迎，使本人感到至高的光荣，同时，也发生无穷的感想。

中华民国的招牌，已挂了三十五年，人民却还在迫切的要求民主。抗战的胜利，是中国经过八年长时间的艰苦撑持，付了几千万人以上的血换来的。现在抗战胜利已逾一年，而全中国人民却直接间接仍还被逼担负着不光荣的战争的牺牲和痛苦。今天，全中国人民不但并未得到民主，简直更是被逼到死亡线上挣扎，要想生活下去也不可得了。回想这三十五年来，尤其是近八年来历史，岂不令人痛心。

各位人民团体的领袖，是深能反应人民的心意，一定知道人民在今天想的是什么？要的又是什么？本人从四川来，四川在目前还算是比较安定的地方，也是比较容易生活的地方，但已经是民不聊生危机四伏，已够使人忧虑和痛苦的了。到了上海一看，更使人立刻感到经济的危机真已到了尖端，如果内战还是无限期的扩大延展下去，那就只有把国家打亡，人民打光。而且依我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看，这时间并不远，人民真已到了不能忍耐的时候了！

我们民主同盟，远在六年以前新四军事变时，便结合同志从事于调解国共两党的争执。那时我们是怕影响了抗战，在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又怕因内战而影响了建国。我们首先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八个字的口号。意思就是要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来完成建国。我们认为中国只有这样一条路，才是光明坦途；而我们的原则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我们的办法，则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并且由改组后的政府来担任一面从事制宪，一面执行整军的工作。要这样，一切复兴计划才能奠立起基础，才能保持八年光荣抗战的战果。我们相信，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意思，是全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和要求。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而这中间却需要大家都能有真诚谋国的心理，和衷共济风度的。

因为有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杜鲁门总统声明，及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三国外长公报，继之以马歇尔特使的来华，算是产生了政治协商会议。其实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正是我们积年来所主张的党派会议（我们所主张的党派会议，是以党派为中心而包括社会贤达共同参加，这是几年以来，屡有宣言的）。在这会议中，我们所主张的原则“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也就是和平建国的必要条件，是订入了纲领。改组政府及对以后建国的方法及步骤，也都有了具体的协议。所以，我们是非常兴奋的参加了这个会议，完成了各种决议案。在当时，全中国的人民是如何的兴奋，又是如何的以为从此就有了前途，哪知在人民庆祝政协成功的第一天，我们的同志李公朴首先挨了打。当时我们还以为这不过是独裁作风的尾声，今天想来，那知竟是撕毁政协的序

幕。从此以后，打风四起，由李公朴的挨打到马叙伦等几位先生及我们同志叶笃义在下关的被打，直到李公朴、闻一多同志的被杀，这象征了政协光采渐渐的在褪色。一党国大召开之日，政协的精神更算是完全消灭了。

说到这里，我得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参加现在开会的这个国大的缘故。我们既然是参加政协，我们当然有拥护政协的义务。政协的精神，就在这个“协”字。而我们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之间，我们又是超然独立的第三者的调人身份。所以，凡是片面的，不合政协精神的，无论政府也好，会议也好，参加只有促成分裂。我们抱促成团结的愿望，而又出以促成分裂的行动，这是绝对不应该的。正唯其我们是超然的独立的第三者，我们就真无参加这个分裂的国大的理由。我们坚决相信，人民的希望，国家的前途，只有和平、团结、民主。便替国共两党着想，也只有和平、团结、民主，才是他们的出路。我们之所以不参加这个分裂的国大，是要保持着我们超然独立的立场，及调人的身份，才好对调解武力党争继续尽其最大之努力。这不但是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和平前途保留一点转圜的机会，也可以说正是为他们两党着想，不致使他们陷入僵局，因此，就永远的打下去，直打到失尽人心，自己也同归于尽而后已。

说千说万，我们只有努力促成和平。和平才是全中国人民的需要。不过今天的形势，显然是愈走愈僵，愈来愈坏。何以致之？这中间的是非曲直全国人都知道，用不着深说。但是，很显然的，今后争取和平的工作，比以前是愈感棘手了。因之，我们愿意大声疾呼全中国人民必须自己起来，扩大争取和平民主的阵线。我们愿意联络全中国争取和平民主的每一个人都在同一道路

中共同努力。谁要致国家于分裂，我们反对。谁要独裁专政，我们反对。换句话说，我们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拥护政协决议这个宪章，拥护以民主的方式来求统一，以和平的方法来求得完成建国的这个主张。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对国家民族所负的义务。我们全中国人民表现自己意志，行使自己主权，这就是民主。谁不照着人民的意志做，谁不要人民行使主权，谁就是反民主，谁就是国家的反叛，人民的罪人。

我们这样主张，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我们将以十万分诚恳的心情，伸出合作之手，愿与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携手合作，共同来完成这个艰难而又巨大的任务。

自从有了民主同盟以来，尤其在一年以来，我们自己虽然努力保持超然独立的第三者立场，然而，向我们利诱的，向我们威胁的，向我们施以迫害、分化，企图摧垮我们的，已经是应有尽有，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我们是屹然不动，我们仍当一本初衷尽其应尽之责。今后我们更愿坚定立场贯彻主张，更希望世人尊重我们这个独立的立场，不要再存妄想运用阴谋来利用或控制这个第三者。须知道，向称为第三者的党派或个人，如果因利诱或威胁而终于偏在一边去了，这只有把国家的事越弄越僵，越弄越坏，结果是毁了别人而又无益于自己。我们希望世人尊重我们的独立立场，我们更希望世人以同样心情尊重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团体的独立立场。尤其希望各团体相互之间一样彼此尊重。大家在和平民主的运动上多多用力，才能收众志成城之效，显示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来。

总而言之，联络争取和平民主的团体，扩大和平民主的运

动，以达成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目的，这是我们今后唯一的希望和任务。还望各位多多予我们的指教，多多予我们的帮助。

为外资和官僚资本 压迫民族工业发表演说*

(1946年12月27日)

一般的说法，都认为中国是地大、物博、人多。过去一百年来，因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变成次殖民地的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人多，而只辗转挣扎于经济侵略之下，一切无从建树。

凭理想，抗战胜利了，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又订了外貌看来似乎平等的国际条约了，中国的前途，尤其是经济上，应当是可以自己发展和繁荣了。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多的条件，又配以国际的帮助，在生产工具和技术上，在管理上都猛锐的改进，把一个被侵略的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进步的国家，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一年以来种种事实观察，距离我们的愿望，实在是越走越远。很显然的，可以得一个结论，那就是政治不民主的缘故。政治不民主，那就一切都说不上，而且会越搞越坏。所以中国今天即使有了新的技术，有了机器和动力的生产工具，又有了

* 据《中国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这是张澜在上海星五聚餐会上对民族工商业家发表的演说。

科学管理，而在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未得解决，那些技术、机器、科学，只会帮助垄断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发达，老百姓是一点也得不到好处。中国的“地”仍然是殖民地，中国的“物”也只是仍然被掠夺；中国的“人”，无疑的仍是压榨的对象。看一年来垄断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勾结，凭藉了政治力量，所有一切措施，哪一件事，不是可以促成中国的经济更趋危险呢？尤其是最近垄断资本与官僚资本之结合作祟，而使得外贸涌进，把一切民族工业压得奄奄一息。这样搞下去，中国的社会经济，必然的将会萎靡而到崩溃。

中国人，谁不关心自己国家民族的事。诸位都是工商界金融界的巨子，我敢相信，谁都有很高深的学问，宝贵的好经验，更有很高热忱，想要把中国的事弄好，尤其是建立中国工业基础，安定中国金融，使中国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事，都是在劳神焦思，有很好办法。然而这些办法在政治上也许只能得着限制，而绝对得不着帮助。可有什么办法？所以归根到底，只有政治民主，一切才有办法，一切希望和计划才不落空。

在目前，更迫切的要求，尤在不打仗。不光荣的内战，可以把一切打光。只有和平才是利国福民之道，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可以致和平，化干戈为玉帛。和平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我们屡年来所主张的和平民主，是建国的必要条件。总归一句话，政治不民主，在经济上就有好的计划或政策，也是无从实现。所以根本还在争民主政治，希望大家予我们主张以有力支持及帮助。

在中国民主同盟 一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 开幕词

(1947年1月6日)

各位同志：我们的二中全会在很久以前就决定要召开，以种种原因，迁延到今天才开幕，距第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是整整一年又三个月了。在这一年又三个月中，中国的形势变迁非常之大，全中国人民痛苦到了极点。以往我们“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曾一度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争到了若干的成就，如果政协决议逐步实现，本可奠定一个民主的初基，不幸是转眼之间，都成泡影。就使得中国的事，愈来愈坏，各方对此都表示惋惜，这证明我们一向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所欢迎的。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组织国家的唯一目的，只在谋全体人民的福利。所以在一个国家，倘使政治是一人或一部分人的专制独裁，经济是一人或一部分人的独享独占，就失去了民主的

• 原载《民主报》1947年1月12日。

意义。民主的政治经济，必定是全体人民的政治，全体人民的经济。”这些话，是见于我们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的。这就是我同志们所要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此外我们明白规定，对于政治制度是主张行普选制度的议会制，而且我们主张两院制。对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则采内阁制。我们更主张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但我们并不认为有了宪法，就算宪政。更不承认假“法治”之名，以行“专制”。所以更主张“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的地位”。这些，也都见于我们纲领中的。而我们最根本一点，还是在争取人权自由。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们纲领上的这些主张，得着全国人民的支持，本已相当的为全国人民争得到了一些。但直到今天，我们替人民所争得的自由民主这张“支票”，政府却未兑现。当权党仍是处于“超法律”地位。凭藉这种“超法律”的权力，就撕毁了政协决议，更片面的制定了所谓“宪法”，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这是谁也知道的事。我们站在坚决拥护政协的立场，毅然拒绝了参加所谓“国大”。因为我们所要的民主，是和平的、团结的、统一的真民主；而不是战争的、分裂的假民主。我们将为真的民主而继续努力。至低限度，我们要争取到不折不扣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政协纲领及决议，我们决不让政协纲领及决议这一张“支票”不能兑现，我们就有代表人民拿着这张“支票”向政府“采券责偿”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二中全会，对于如何完成这个使命，正是我们这个会中最主要的课题。要为这个课题作答案，我们认为有两件事，我们应该注意：

第一、是迎取同情。我们的根本态度，是拥护政协。为了使力量加强，更容易达到目的，我们就得更广泛的号召全中国人民，了解我们的主张。我们一贯的主张，在谋全体人民的福利，前面已说过，本是应该博得全社会同情的。我们就要用切实而灵活的方法向广大的人民中去宣传、去迎取，使得大家都直接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加强力量，共同努力。

第二、是加强组织。我们民主同盟，是一个永恒性、独立性的政治团体。我们有纲领、有政策、有机构、有规程，并且对国家一切的问题，我们有独立自主的主张。但无可讳言的，过去我们在组织上还不够坚强，不够严谨，不够扩大。虽然我们的主张，能博得多数人的同情，而在组织上所反映出来的力量，还不够大。今后，我们必须在组织上建立起广大而坚实的基础，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我们的力量，迅速的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这个有永恒性、独立性的政治团体，凡能接受我们的纲领，服从我们的决议，坚决信仰民主主义的份子，不论其有无其他政治团体的关系，我们概欢迎其入盟。假如说我们民主同盟是在演进生长期中的政党，很明显的，我们民主同盟是一个有永恒性、独立性而绝无排他性的政党，是民主宪政国家的通常政党。我们所包含的份子，并不限于某一个阶层，我们的基础要建筑在全民的上面。

如何迎取同情？如何加强组织？这是此次开会对我们的课题作答案应注意的具体内容。

此外更有一点意思要向各位同志说：我们必须把握自己的独立性，无论从主张上说，从组织上说，我们首先要自己立得住脚。必须自己立得住，才会有人跟着走。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务要求异于人，而是说，我们不能随便抛了自己的主张，而随

声附和，勉强从同，尤其重要的，我们决不可被人利诱、威胁以至于自己放弃了立场，只为一时苟且因应之计，而忽略长久远大之图。我们虽然是一个政治团体，但是，在我们的主张不能实现之时，我们并不炫惑于政权的取得，我们必须有“淡泊宁静”的胸襟，而后才能担当起“任重致远”的责任，所以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而断不可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要有这样精神，而后我们的团体才有光明、坚固、远大的前途，我们这次会中，对课题拟议答案时，一切研究更应以此为出发点。

各位同志本素来的抱负，及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体验和研究，我相信，对以上所说的问题，必能各自发挥宝贵的意见，使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样必然使这个会议有丰硕的收获。

在中国民主同盟 一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 闭幕词

(1947年1月10日)

各位同志：

今天我们的二中全会，是圆满闭幕了。这次全会，收到各地方组织的建议案及各中委的提案，共有八十余件。因为会前开了很多次预备会，把所有案件，都经过一番分类整理工作，在分组审查时，又相当周密，所以节省了大会时间，能在预定时期内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在大会中听到华北、东北、西北、南方等总支部，以及四川、云南、重庆、湖北、南京、上海、港九等支部负责同志的盟务报告，交换了许多针对现实的宝贵经验与教训，以为整理盟务的依据。又决定今后入盟以个人身份参加，并议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时期，政治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办法，使盟务的开展，更进了一步，此外通过全会的政治报告，指示了我们今后对国事努力的方针。这些，都是这次全会许多重要议案中甚为珍贵的收获。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各位同志从预备会起，始终精神一贯，在检讨工作及讨论提案时，虽各有不同的意见，而确确实实能和衷共济，表现出民主的风范，这是最值得引为欣慰的。

许多案件，是决议了。剩下只是做的问题。第二届全代会距今不到半年，那时我们将再作总的检讨。这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在各地方负责的同志，特别注意和努力，希望在那时能够向全代会做很切实的报告，以显示出这一届有更好的成绩。

今天是一月十日，是去年政协开幕的日期。这一年中，我们为和平、团结、民主而努力的经过，在大会政治报告中，已有很详尽的说明。但今天和平、团结、民主，仍然是水月镜花，毫无着落。我们恰巧在今天这个饶有意义的日期，完成我们的全会，这是值得我们提醒警觉性的。我们为全中国人民争和平、团结、民主，我们负着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要从今天起，一定要把已被蹂躏的政协精神，使他复活。我们坚决继续为政协精神而奋斗，这是我们同志间的唯一责任和努力方向！

为《新华日报》 创刊九周年题词

(1947年1月11日)

新华日报九周年纪念

新的中华民国，必须在真正的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

张 澜 题

• 原载《新华日报》1947年1月11日，第4版。

对莫斯科会议的意见

(1947年3月12日)

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1〕，已于三月十日在莫斯科开幕。这一会议虽以讨论德奥和约问题为主，但亦可能正式或非正式地讨论到中国问题，对于今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可能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最有力量的国共两党，对于这一点已经各自表明他们的态度。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着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亦不能不坦白明确地表示我们对于这一会议的意见和期望。

首先，我们承认中国和平与世界和平具有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中国内战已因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必将更加扩大残酷，如果继续进行下去，难免要危害整个世界的和平。同时我们亦愿对全世界人士声明：中国人民除了极少数的好战分子，几乎可以说一致反对内战。自从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中国人民更积极地不断进行反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希望用人民自己的力量在国内建设起和平民主的新秩序；一面亦期待各先进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够对于我们这种运动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我们深知：在整个世界奔向和平民主的时候，在中国亦必须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只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这个“意见”由张澜等56位民主人士共同署名。

有和平民主的中国，才能协助建设和平民主的世界。所以我们的努力，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且还符合整个世界和平的要求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劝告中国“迅速停止内战”，“扩大政府基础”，使各党派都能有“公平而有力的代表”参加。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又发表联合公告，希望“有一团结和平民主的中国”出现，力言“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的广泛参与及内部冲突的停止均属必要”，“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事务的政策”。当时中国人民，对于杜鲁门总统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这种善意公正的劝告，不但不曾表示过反对，而且还表示过相当满意的欢迎。前年十二月马歇尔将军被派来华调解中国内战，帮助中国内战的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及整军方案，帮助中国各党派成立政协的五项决议，中国人民还曾经对他个人表示过热烈的欢迎和异常的感谢。这些事实，充分地证明：中国人民决不盲目地拒绝外国的善意公正的调解。但是倘若有人要假借调解之名而行其偏袒之实，帮助中国扩大并延长内战，以增加中国人民的痛苦，损害中国的独立和荣誉，那就必然要遭遇中国人民的极度憎恨和坚强反对。

一年多来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所进行的事实，根据去年十月十八日美国援助远东民主委员会在纽约所发表的报告，就可以说明了“在战胜日本之后，美国乃训练和武装国民党军队”；“除了武装和训练国民党陆军，美国尚训练和武装国民党海军和空军”。从前年九月起到去年六月止，“国民党军队被美军运送到华北、东北”的共有三十七个师，四十七万三千七百人；在前年八九月间，单用飞机便“运送国民党军队十四万名到华北”。据杜鲁门

总统的报告，“只就空运四个国民党军的消费已值美金三万万元。‘自从日本投降日起，美国政府已经援助国民党军事财政两项合计美金三十万万元，这笔款多于在大战时援助中国的数目’；另据‘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美国民族杂志的估计……其总数合计美金四十万万元’。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宣称：“驻华美国海军有海军船只一百三十六艘，海军人员一万五千名，海军陆战队三万五千名，这个数目并不包括海军飞机队、陆军飞机队和地面陆军以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人数”；“青岛事实上已变成美国陆军根据地”。单看这些事实，就可以明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前后距离相差甚远。中国人民极愿与美国人民保持并增进传统的友谊，亦愿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以图增进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坚决要求美国政府重新改正现行的对华政策。我们认为一切违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政策，不论出于一国或数国，都是不友好的对华干涉，都要遭受中国人民的坚强反对。

根据上述的认识的态度，我们希望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第一，要一致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约束，特别要纠正美国政府一年多来违反这一约束的种种国际行为，首先要督促美国政府立即撤退一切驻华的军队（包括军事顾问团在内）；倘使苏联在大连还有未撤的军队，也要同时撤退。第二，要尊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同情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运动，在包括全国真正的民主统一联合政府成立以前，任何国家都要停止一切财政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以免扩大并延长中国内战。我们要对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严正地声明：倘使你们能根据前年十二月三外长会议的基础，给予我们以善意公正的调解，使中国

内战从早结束，中国人民自然不会加以反对，如其不能，那就请你们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张澜等五十六人签名略〕

七十六岁自勉集语

(1947年4月)

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仁爱群，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乐善之人得众，故其心休休，乃能有容。逆耳之言利行，故一士谔谔，胜于千诺。益壮益坚，乃珍穷老。患得患失，勿效鄙夫。

• 据周善培所书条幅。

为中央社发表所谓 《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 致行政院长函

(1947年5月8日)

岳军院长勋鉴：

四月间本盟曾推章伯钧、罗隆基两同志赴京，关于本盟盟员杜斌丞〔1〕等无端被捕事，拟向政府有所接洽。阁下未暇接见，本盟颇以为憾。今者，政府为多党参加之政府，且为行政院负责制。此次新政府成立，当权者复以依据政协决议，结束一党训政，准备实施宪政标榜于国人。诚如是者，则阁下今日出长行政院，其地位、其职责、固非往昔之行政院长可比。凡合法在野政团，遇有重大事件，欲与政府洽商者，进而就教于行政院长，实为唯一正当合理之途径。自新政府成立后，当权党对付在野民主政团之政策，更令国人惶惑不安。举例言之，四月二十二日南京《中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国民党当局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联合会、农工民主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

央日报》发表社论，公开对本盟加以诬蔑，且公然倡导否认本盟合法平等地位。此项谬论，突然发见于政府所在地之官报，已令人疑及政府即以此为打击压迫民盟之先声。果于五月三日，中央社发表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竟谓中共“经常派遣代表列席民盟干部会议”。该项文件，对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联合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团体亦诬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此项文件，社会均疑其为捏造诬陷之阴谋，而同日该中央社又发表所谓某政治观察家谈话，妄指“民盟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又谓“民盟及各民主政团，目前倡组中之民主统一战线，亦为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云云。试问民盟何种行动，是“循中共意旨”，何种行动是“受中共之命”，“准备暴乱”云云？竟以莫须有之词肆意诬蔑，乃自行证实一般社会对此项文件认为捏造诬陷之猜疑。中央社此种举动，实已构成犯法行为，应负法律上之责任。又中央社及中央日报今日名义上虽为国民党机关，实际仍系政府宣传机关，则该社与该报此项言论，政府亦不能辞其责也。至于本盟今日为独立的和平的公开的在野政团，此种立场，在三月二十七日及四月二十五日曾先后发表正式谈话与宣言，向国人一再声明。本盟行动，遵循民主轨道，采取合法手段，乃举世共知之事实。至于本盟之合法平等地位，在去年参加政协会议之日，即已确定。今日新政之产生，自身既以依据政协决议为标榜，又何能抹煞参加政协之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更有进者，政府既已准备宪政为号召，且一再命令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似此，则人民中一切公开和平之政治组织，均为合法平等之政团，而政府自有依法保障之义务也。时至今日，人民已陷绝境，国事已到穷途，

非和平团结，无以自救。倘朝野各党派，至此尤不能深自内疚，毅然悔悟，尤复继续延长党派成见与权位之斗争，此不止无以见谅于今日之国人，亦且将为万世之罪人矣。本同盟有感于此，今日依然愿以其在野身份，准备与政府遇事商谈，以求得党派间合理之谅解，减少党派间无谓之磨擦，而本盟被捕盟员之恢复自由，被禁刊物之恢复出版等，均愿与政府坦白商讨，以求获得妥善合理之解决。阁下素以促进民主宪政为职志，今既任行政院长，对调整朝野党派关系一事，不只权有所属，实亦责有所归。如荷同意，本盟愿即推选代表与阁下晤商。如何之处，敬候明教，端肃。敬颂勋安。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张 澜 谨启

注 释：

[1] 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因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1947年3月20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0月7日在西安被害。参见本书《对杜斌丞被杀害案的声明》。

向国民参政会提出 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

(1947年5月23日)

抗日苦战历八年之久，不料在胜利结束之后，继以内战，由间歇性而持续性，由局部战而全面战，到今亦已逾年。此时中国人民，正在遭受历史上空未有之惨痛，已成任何人不能否认之事实。分别说来，物价上涨，至本年四月底止，比战前已及二万八千倍。通货发行愈多，物价愈涨。物价愈涨，愈不得不增加通货发行，实已陷入恶性循环，此不是内战之赐而谁赐？因物价飞涨，而使全国公教人员无法生活，不得已要求增加待遇。待遇愈增加，通货发行愈增加，而物价愈飞涨，而公教人员仍不能生活，又已陷入恶性循环，此不是内战之赐是谁赐？全国学生，因物价飞涨，而起恐慌，试以上海数校为例，本年四月份每生饭费八九万元，至五月一跃而为十七万元（此尚据五月十日米价计算，今上海米价又涨，草此提案时，已涨至每市石三十六万元）。其他费用，可以类推。公费生且不了，私费生更不了。饥火中烧，则忿火外泄，奔走呼号，实有由来，决非强力抑止所能平息，此不是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这是由张澜领衔，同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等民主同盟代表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议案。

内战之赐是谁赐？工人因生活指数冻结，而起恐慌，工厂暂时得了，而工人不得了。一经解冻，工人暂时得了，而工厂又不得了。商店亦然，店员待遇暂不增加，店方暂时得了，而店员不得了。迨待遇增加，店员暂时得了，而店方又不得了。又已陷入恶性循环，此不是内战之赐而谁赐？接近战区之农村，在双方拉锯作战之下，惟有驱人民于死路而已。行数百里路，不见一个壮丁，并一个中年妇女而无之。“四月南风大麦黄”，乃迄今而麦子尤未下种，非无田也，盖无人也（此根据华北参政员报告）。此时粮食尚是贵贱问题，今后不将成有无问题乎？此时尚在啼饥，今后不将尽成饿殍乎？其在战区以外之农村，下令征兵，额征一人，而浮征数倍。征者一人，而逃者百人，则人力尽矣。因征兵而壮丁一空，因征粮征实而蓄藏又一空，被征者一家，而被索贿者百家，征一分而索贿百分，则物力尽矣。人民早拼一死，不知人力既尽，物力又尽，今后国将何恃以为国？双方正规非正规兵员合计，殆不下八九百万人，集八九百万壮丁于战场，而驱使互相歼灭（华北参政员报告，有父子两人，各被拉为兵，猝然相见于双方战场，乃先大哭相对自杀），苟有人心，闻之能无下泪。内战之惨，一至于此。至今日通都大邑，连续发生抢米风潮，虽地方民性夙号驯良，如苏州、杭州者，而亦大闹抢米矣。上海为全国惟一繁荣之都市，善堂统计，每日收敛弃尸数百具，四月某日多至二千余具。闻其中大部分为弃婴，此可怜可爱之第二代国民，乃被充为内战牺牲的先锋队，须知上海尚有统计可稽，推之全国岂堪设想？哀哉中华，殆将无噍类矣。更观全国报纸，几乎每天充满着人民因饥饿而欺诈、偷窃、抢劫、杀人、自杀，种种怪新闻。在饥饿线上，尚忍课以道德，绳以法律乎？上所云

云，自不免偏指着中央政府管理区域，其在中共区域，无法详知，其人民所受痛苦，殆大率类是。一切一切，不是内战之赐而又谁之赐耶？

吾人追究此至惨极恶之内战因何构成其不能中止的缘故，无非是武力解决党争之一种错误观念。去年一月间，国共两党会同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开幕之日，双方报告业已下令全国停止武力冲突。在此会议中，成立了五项决议，至二月二十五日，双方又签定了整军统编方案，规定在十八个月内，中央军队缩编成五十个师，中共十个师，此何等可喜可慰。所谓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实已显露出万丈曙光，且可以说双方和平合作团结统一的初基，建筑得相当坚实。谓双方心理绝不能相忍谅耶？何以有此良好之开始？然谓双方心理真能相忍相谅，共同趋向和平合作，团结统一之康庄大道矣。又何以有今日至惨至恶之内战？至本年三月，中共代表团接受政府命令，退出京沪平渝各地，双方关系从此断绝，国家又完全恢复到十年前武力解决党争的错误途径。

“要吃饭，要和平”，已成为各地各阶层民众一致之呼声。中华的国运与全国人民的生命，到今日已面临着死亡灭绝的最大危机。“国民政府施政方针”虽在第一条说明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准绳，第四条说明中共问题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而仍提出铁路交通完全恢复作为和平条件。如解释为必待全国交通完全恢复，始能进行和谈，此不免使武力解决党争的错误依然存在。吾人主张，既求政治解决，只有政治解决，凡国内一切政治问题所构成的党派纠纷，必须在和谐融洽之空气中，用协商方式，本着相忍相谅之精神，以寻得结果，此是一年以前双方所曾经走过

的老路，实亦完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最高使命，以达成全国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事急矣，战火还在一步一步延烧着，战线还在一日千里地展开着。此无情的内战，直将遍使全国人人都无生路，万万不得再拖，万万不得再搁，吾人为了国家与人民的自救，谨建议下列各点：

（一）确定政治解决党争的大原则，依据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及路线，重新举行和平会议，以达到全国统一的最高目的。

（二）迅速恢复国共间联系，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谈的具体方案。

（三）政府先命令停止征兵与征粮征实，以为倡导和平之表示，以减轻人民负担。

（四）政府严饬各地方文武官吏，切实尊重人权，保障自由。迅速释放一切政治性被逮捕被拘禁的人民，恢复政治性被封闭被查禁之刊物，并停止一切有名无名的特务非法恐怖行为。

张 澜 黄炎培 梁漱溟

章伯钧 韩兆鹗

对国民党政府颁布总动员令 及蒋介石七月七日广播演说 发表的书面谈话

(1947年7月8日)

吾民盟同人，本着一点爱国愚诚，不忍见国家分裂与战争，数年以来，追随国人之后，竭尽绵力，奔走呼号；同时忍莫大的耻辱，蒙无名的谤毁和迫胁，不敢求谅于各方，而只求和平统一之终得一日实现。不意在政协决议已告成立之后，始则一面和谈，一面战争，继则撇去和谈，由局部战而演成全面战。至今日而政府下总动员令矣。同人痛心之下，复有何言。所望垂念中华民国为四亿七千万人托命之国家，此予遗之民为对日苦战八年仅存之生命，不论前方后方，对此弥留之国家元气，苟有一分可保存者，则保存之；残余之人民生命，苟有一分可维护者，则维护之。阅读蒋主席“七七”广播，一面动员，一面实施宪政。

* 原载《大公报》1947年7月9日，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1964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协会议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为了摆脱困境，蒋介石于1947年7月4日颁布“全国动员方案”，发布“戡乱动员令”，力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

之大本大原，不外乎保障人权，尊重舆论，此则同人于惨痛之余，仍愿竭诚献议者。否极必复，史事昭然，匹夫天职，何敢不尽。同人一日为中华民国之民，矢愿一日为民主和平统一而努力！

致范朴斋（节录）[•]

（1947年7月12日）

朴斋〔1〕兄：

日前曾复志和〔2〕一函，不知见到否？总动员令下，形势更恶，不准呼吁和平，有反对内战即是反对政府，不容其存在。我于九日特发表谈话（上海有五个报南京有两个报登载），以表示民盟之主张与态度，而暂作静观。寄剪报二纸，可交给志望诸位一阅，此时以能忍耐能冷静能团结为要。

澜启

七月十二日

注 释：

〔1〕朴斋，即范朴斋，当时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

〔2〕志和，即张志和。

• 据手稿。

为民盟盟员被捕事件 致行政院长张群函

(1947年8月24日)

岳军院长勋鉴：

本盟半年来陕、沈、蓉、渝等地盟员，无端被捕者，迄今多未省释，而桂林、南宁、八步等地，七月间又有百余人被捕，内有本盟盟员杨荣国、张毕来等均同时被捕。似此政府对于本盟盟员，显系有计划、有组织加以压迫与打击。蒋主席在“七七”十周年纪念演词中，曾以实现民主宪政号召国人，而现政府之施政方针，亦有保障人民基本自由之条文。诚如此，即应尊重人民集会结社之权利，同时尊重在野反对党之合法地位，固不可任意加以摧残侵犯也。本盟一向主张以和平方式争取和平，以民主方式争取民主，此为举世共闻共见之事实。今政府对本盟盟员不断加以违法之逮捕拘禁，将使所谓实施宪政、实现民主将何以取信于国人？为此特再请政府严令各地官吏，立即制止一切非法压迫在野合法党派行为，并将桂林、南宁、八步等处以及其他各地被捕之盟员，立即一律予以释放，以重法治而保人权为荷。专此函达，敬颂勋安

张 澜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为促释放民盟盟员 再致张群函

(1947年9月1日)

岳军先生大鉴：

民主同盟为桂林支部人员被捕事，曾致函左右，谅已鉴察。章伯钧兄日前赴京曾向郑介民^[1]先生当面交涉释放本盟各地被捕人员，昨日据称：郑君曾经表示蓉渝两地被捕人员只需执事向地方当局致一电令，彼负责各该人员可立即释放。郑君既有如是之言，川省为吾兄旧治之区，重以桑梓之谊，固不宜使无辜被捕人士久失自由，且当目前艰难之局，执政者尤当以宽宏大度挽回人心。即如近日上海各大中学校临开学之日，乃每称奉部令解聘教授开除学生，此等狭隘苛刻之举措，徒益增人反感耳。敬颂勋绥

张 澜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注 释：

[1] 郑介民（1898—1959年） 海南文昌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曾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为促释放民盟盟员

三致张群函

(1947年9月13日)

岳军院长吾兄勋鉴：

日前为蓉、渝、桂等地盟员被捕事曾两函左右，请分令各地地方官吏予以释放，谅邀鉴察。兹据成都盟员专函报告：“八月十九日四川省政府召开专员会议，在会议上，特委会书记徐中齐报告中央对于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民主义民主同志联合会等，均认为反动集团，应严拿究办。对于民主同盟上层虚与委蛇，系为对付国际观听。六一处置中央认为最有成绩者为成都重庆两地，已通令嘉奖，刻当剿匪戡乱之际，望各专员勿稍瞻循”等语。查政府对于民盟早有孤立上层，打击下层之传言，今得成都盟员报告，已可证传言之非无因也。国事如此艰危，人心正待收拾。今日报载蒋主席通令所属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内称：“凡非司法机关，及非依法赋与司法警察职权之机关，绝对不得逮捕人民，尤其不得有其他法外侵扰人民自由之行为”。深盼言出法随，今后人民自由，得享切实保障。但以前遭受法外侵扰之无辜，自应即时释放，以示平等，并昭大信。政府对于民盟若仍目为反动集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6）。

团，采取对上敷衍，对下压迫办法，一任各种特务之胡行，则所有实施宪政保障民权之诺言，何能取信于人？蓉、渝、桂等地盟员被捕久未获释，特请黄任之先生代表趋洽，务祈迅予分饬各地官吏一律释放，而重人权，无任感荷。专此函达

敬颂

勋安

张 澜

九月十三日

致函民盟马来亚支部 代表大会⁽¹⁾

(1947年9月19日)

九月八日来函及附件均悉。全马代表大会订于九月二十七日在星开幕，成立马来亚支部，远道闻讯，毋任欣慰。澜以道路遥远，时间匆促，未能推派代表到会，深以为歉。特将本盟最近决策，函向大会报告：

(一) 自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以后，所有政协（即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悉已被其撕毁无余。本盟为维护政协精神，不仅反对其所谓国大与宪法，并已拒绝参加政府与选举。今后无论环境如何困难，本盟仍坚持此种立场，以求贯彻主张。

(二) 总动员令颁布以后，本盟各地盟员多陆续无端被捕，即一般民主人士与自由分子（如教授学生等）亦遭重大非法打击。本盟本诸人民应有的权利，与现政府当局“七七”十周年的演词，已一再要求政府尊重人民身体、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以及在野反对党的合法公开地位。此项要求，在今日实质上仍属一党专政之下，虽无法可以实现，然本盟本诸“以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民主方式争取民主”的原则，仍将继续向现政府坚决要求，不达目的不止。

(三) 本盟外交政策一向主张与英美苏建立平衡友好关系。任何友邦，凡严格尊重我国之独立自主而不助长中国之内战与分裂者，吾人必继续与之保持友好关系。总之，国家应求独立，外交应自主而不可放弃自己的立场，甘作外人的附属，而使堂堂大国沦于殖民地的地位。年来现政府对外政策，始而联美反苏，近又扬言欲联苏制美。似此忽略本国利益，完全仰人鼻息，举棋不定，前后矛盾，本盟自当坚决反对。

(四) 八年抗战，创痕未复，战后的日本，已在美国直接卵翼之下，积极复兴，又将威胁我国。吾人在此时不但应坚决反对开放对日贸易，并应致力反对美国单独召开对日和会。开放对日贸易，势必供日本战后的工商业迅速繁荣，中国残余的工商业完全摧毁。对日和约应尊重波茨坦协议，中美英苏四强先行草拟。任何方式之对日和会，倘非中美英苏四强同时参加者，中国应拒绝参加。同时中国必应保存对和会之否决权，如此对日和会始可成功，远东和平亦始获保障。

兹当全马代表聚集于一堂，对于国事及盟务当有充分讨论与具体决议，盼将结果早日函告，以备参考。端复顺祝大会成功！

张 澜

九月十九日

注 释：

〔1〕1945年10月15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决定，设置西南、

西北、东南、南方、东北、华北及海外七个总支部，从1946年到1947年先后在香港、九龙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地建立了海外各支部及其他基层组织，在团结华侨、支援祖国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港九和海外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贺民盟马来亚支部 代表大会召开电

(1947年9月23日)

新加坡 中国民主同盟驻星办事处胡愈之〔1〕先生：顷悉
感〔2〕召开全马代表大会，群英齐集，贡献必多。除皓函〔3〕
说明本盟最近态度外，特电致敬，期共为民主努力。

张 澜

九月二十三日

注 释：

〔1〕胡愈之（1889—1986）浙江上虞人。皖南事变后，由党组织安排，出走南洋，在新加坡办《华商日报》。民盟一大后，他与沈兹九在南洋一带为发展民盟组织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任第五、六届人大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感 27日，指大会将于27日召开。

〔3〕皓函 指张澜于9月19日致民盟马来亚支部代表大会函。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对杜斌丞被枪杀案 的 声 明

(1947年10月7日)

对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先生本月七日在西安无辜被害一事，本人极端愤慨，同时亦极感悲痛。这不只是对被难者自身损失及民盟重大损失的悲痛，我对国家法治与民主的前途更感悲痛。

地方军政机关可以这样任意违法杀人，国家还有什么法治与民主的前途可言。杜先生惨案，给于民盟重大打击远在旧年李、闻惨案之上。昆明惨案实行违法杀人者，表面上尚谈为暴徒分子的狙击行为，西安惨案却是陕西戒严总司令部用“判处死刑”的公开杀人手段残害在野党派的领导负责人。

自旧年政协会闭幕后，杜斌丞先生即受民盟总部之命，赴西安主持西北盟务。不幸即因此种公开合法之工作，杜先生立即受到地方当局的监视而实际失去自由。旧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社曾发表杜先生批评共党之言论，今年三月二十日杜先生又突然以“贩卖毒品”的诬陷罪名而被捕。最足使人惊异者，即前此中央社代为宣传反共之人，竟于本月七日被陕西戒严司令部以“现充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共匪关中地委会负责人勾结匪军密谋暴动”的罪名而被枪决。从旧年十二月杜先生被监视之日起，民盟即以其安全为虑，故在南京即一再向政府进行交涉，请其准许杜先生离陕来京，以保安全。今年三月杜先生被诬被捕以后，民盟又一再向政府严重交涉，请将杜先生依法释放，以尊重人权，或依法交法庭审判，以求昭雪。不幸民盟无数次的抗议与交涉，政府竟置之不理。最后地方军政机关竟将民盟负责人无辜加以杀害。

杜斌丞先生今年已六十一岁，其立身行事与其思想主张不正西北人民所共仰，实亦全国人士所共知，他毕生的文化教育事业之成绩，昭昭在人耳目。他笃信民主和平，而近年来努力促进国家之民主、和平亦为事实。惟以禁在囹圄早失自由之人，今天竟指其有“勾结匪军阴谋暴动”之行为，且以此定罪行刑，则所谓“贩卖毒品”等等诬陷，实不值一辩了。此次杜案，政府始终拒绝民盟依法处理之请求，竟不经过正当司法手续，突然由地方军事机关将杜斌丞先生执行枪决，此实违背政府历来公布保障人权之法令，且根本破坏国家之司法独立。近来各地政府机关对一切逮捕枪杀之行为，动辄冠以某种嫌疑之罪名，且不需确切证据，仿佛有此嫌疑即可抹杀一切法律与人权。似此，则国家又成何国家。我民主同盟为一和平而无武力的在野政团，本身绝无武力亦绝对不依靠武力以保障生存。政府对如此和平的在野政团果欲凭其权势及武力加以摧毁以达根绝在野党派之目的，则政府今日自可如愿以偿。惟绝对不容许在野党派存在的国家，尚何民主之可言？关于杜先生的无辜被害，民盟除正式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谨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

注 释：

〔1〕杜斌丞（1888—1947） 陕西米脂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1947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当月在西安被害。

在民盟总部解散后 的 声 明

(1947年11月7日)

余迫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1947年10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应“严加取缔”，强制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当时，其他民主党派也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张澜发表此项声明，仅上海《正言报》《时代日报》有所披露。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

墨子贵义

(1948年)

数年来喜读《墨子》，深悉墨子的思想行为，全以义为主。他那义的内容，就是兼相爱交相利。惟兼爱交利可以使天下富而无贫，所以墨子之言经济是要民用皆给；惟兼爱交利可以使天下治而不乱，所以墨子之言政治是要一义上同。这是他的创说。后来因被儒家排斥，又为封建君主所不容，遂隐而不显，毁墨颂墨者皆多误解。今当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之时，爰研考旧文，写成《墨子贵义》一篇，以阐明墨之本旨。如有不合之处，其望时贤予以教正。

墨子旧文之有错讹者，多依孙诒让《墨子间诂》改正。

张 澜

第一 墨子之为义

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际，目睹天下之人，“别相恶，交相

•此篇据内部铅印稿本，其中偶有误字，查核原书后作了校正。解放初张澜曾将此文敬呈毛泽东，并致函云：“毛先生：澜近年常阅《墨子》，对其兼爱交利尚同一义之说，辄联想起于社会主义。两年来，亲见新民主主义之施行，益了然于兼爱交利尚同一义的真理，古今不异。兹将所写《墨子贵义》一篇敬呈。”最后，他希望毛泽东“能于万几之暇赐以教正，至为企盼”。

贼”〔1〕，征战频仍，刑政敝乱，尤其阶级显分，造成社会的贫富不均的恶劣现状。一方则“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作欺愚”〔2〕，亏夺民财以供少数人奢侈逸乐。一方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3〕，普遍地民不聊生。他志切救世，常仰慕古圣大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不惮形劳天下的盛德。于是拿出他的“贵义”主张，劳身苦志，毅然以“为义”来改造社会，“求之不得，虽枯槁不舍也”〔4〕。他说：“万事莫贵于义”〔5〕。又说：“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6〕又说：“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7〕他认为“义利，不义害”〔8〕，义是利人，不义则害人。义于国家人民非常重要，只有“为义”才能够“与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他当“天下莫为义”之时，“独自苦而为义”〔9〕，更不断地迫切地“教天下以义”〔10〕。他是要消除天下之人“别相恶交相贼”，致陷于征战贫乱的悲境，改造成为博爱平等互助和平的新社会。他所言的义，就是他持以改造社会，而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治天下的一大原则。惟兼相爱，乃能人人平等，而阶级之分可泯，惟交相利，乃能人人互助，而贫寡之患可除。墨子之为义，就是要发展人类的博爱心理，而使世界得到持久和平。

第二 义之实为兼爱交利

墨子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害何用生，以不相爱生”〔11〕，是必相爱而后能利天下之人也。墨子以为能爱人即能利人，不能爱人而只知自爱，即必不能

利人而只图自利。他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12〕他以为人皆自爱自利，则别相恶交相贼，而天下乱。人皆爱人利人，则兼相爱交相利，而天下治。所以他说：“凡天下祸篡怨恨之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又说：“今天下之君子，中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13〕墨子目睹当时社会的贫乱交加，民生痛苦，就不能自己的想要改造社会。爱人是改造社会的动力，利人是新社会成立的根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14〕惟能兼相爱，交相利，而后可以使天下富而无贫，治而不乱。

何为义？《经上云》：“仁、体爱也，义、利也。”以爱利分释仁义，盖分言之：则爱生于心，利资于物。合言之：则爱与利互相成而为义之实施。详言之：爱人利人，亦即为仁之全体大用。特是儒家重在言仁，以为“爱有差等”〔15〕；又反对言利，以为“喻于利为小人”，谓“放于利而行多怨。”〔16〕。又谓：“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17〕，此单就亏人而自利者言之，故《大取篇》云：“圣人有爱而无利，儒者之言也”。墨子重在言义，其义以兼爱交利为主，天下无人不爱，无爱不利，乃是人与人间博爱平等互助和平的实现，所以能合天下之万民而上同也。何以知墨子以兼爱交利为义？《经说上》释义、利也，云：“义、志以天下为芬，（孙诒让云：芬、篆文作𠂔，与恣形近，疑当为恣之误。（恣，古爱字。）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志以天下为芬，即志以天下为爱，必以天下为爱，是谓兼相爱。盖墨子理想的社会，视人若己，无国与家与身之别，只有人类，只有天下。故《小取篇》云：“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周爱人，谓必尽天下之人而爱之，即是兼爱，兼是就整个的总体言也。能利之，或释为善利之，非也；能、即尽所能。《公孟篇》：“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即尽其力之所能以从事于生产也。利即得所需，《经上》：“利所得而喜也。”《经说》云：“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利资于物，

生产的物品为人所必需，得是而喜，即得所需而喜也。“能能利之”者，我爱人而又必能尽力之所能以利人，使人得所需而喜也。一夫不耕，必有受之饥者，一妇不织，必有受之寒者，人必彼此各尽所能而后彼此皆得所需，是谓交相利。故《节葬篇》谓：“生者必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交是就相对的个体言也，能兼相爱交相利，义之德用乃全。“不必用”者，言义之爱人利人，一本于人道之当然，非将有所驱使而示之以爱利也。与《经说》“仁爱民者，非为用民也”同意。能兼相爱，交相利斯谓之义。所以《非命上》言：“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万民被其大利。”即举“汤封于毫，文王封于岐周，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移之言羨也）则分，而王天下，政诸侯。”以证义人在上，所行之义，即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是也。

爱利虽有兼交之异，然而爱利不可分，无利则不能实成其爱。墨子重兼爱，其实即是兼利，所以屡言“兼而爱之，兼而利之”^[18]；又言“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19]；利必切于天下万民之所需，惟能兼利天下，使皆得其所需，所谓兼爱乃是真爱乃为天下之大利。今观墨子所言兼利天下，大之则凿山洒河，以周利华夏夷貉之民；小之则人与人间必须做到互助互利。他尝说：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汎注后之邸、磝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为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20]爱利能兼，固不有民族之歧视也。他又说：“今吾将求兴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

强，相为动举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持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毋语词）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21]。曰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以股肱毕强，相为动举，即《天志》所谓“欲人之有力相营”，《尚贤》所谓“有力者疾以助人”。凡天下之百工农夫妇人皆以生产为事，“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22]此以相助生产为兼利者也。曰有道肆相教诲，肆，力也，言勤力相教诲，即《尚贤》所谓“有道者劝以教人”。《经说下》云：“智少而不学，功必寡，智多而不教，功适息，苟我有知而不以告人，则功息绝”。此以相助教育为兼利者也。生产与教育皆为天下万民之所必需，能共同生产，普及教育，以实现天下之兼利，自能使老独者有所终，幼孤者有所长，虽不能劳动生产之人，亦皆各得其所，而无失养之虞；故曰以兼为正，即若其利。盖墨子所言之义为天下无人不爱，无爱不利，事苟当为，无论大小，必全心全力而为之。他常说：“仁者之为天下度也，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知，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23]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天下为之，即人必全心全力而为天下之人民服务，以实行兼爱交利之道也。

孟子斥“墨子兼爱是无父”，不知墨子之兼爱，以为“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24]，投桃报李，此“交孝子”者，正所以增加吾亲之爱利也；以兼爱为无父固非，单言兼爱而不言交利者亦失。详考墨子之为义，重在爱人，而尤重在利人。观《经上》以利释义，而继之云：“忠、以为利

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可见利是形成各种道德的实质，而利民乃是利的标准，故言利民才可谓之功，功以利民，有所用其力，必为天下万民之利而为之，固与世之“以功为己”，而只图自利者大异。不独人之所行，必能利民而后可以为功，即人之所言，亦必能利民而后可以为表。他说“言有三表，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25]可见墨子之为义，急于利天下之人民，行必以此为功，言必以此为表。尤足称者，墨子生当乱世，但求利人，不避艰险。他尝说：“圣人恶疾病，不恶危难，正体不动，欲人之利也，非恶人之害也。”^[26]恶疾病者，言自重其身，不恶危难者，言为人则不避艰险；若其为利天下之故，而有危难将及于身，则正体不动，顺受之而已。欲人之利，非恶人之害者；中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恶人之以危难害己也。他又说：“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27]盖杀一无罪之人以存天下，于天下虽利，而于此一人则害，不能害人以利人也；杀己以存天下，害在己而利在人，则不妨损己以利人也。此种只求为义以利人，而不避艰险的伟大精神，更非趋利避害自矜明哲保身者所能比拟。孟子又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28]，此则深知墨子之言。墨子之摩顶放踵，不恶危难，乃求所以利天下，能利天下即兼爱之实行。

或问兼爱是尽天下之人而爱之，今使有盗窃乱贼之人在此，亦将为同一之爱乎？曰：否。墨子固尝举盗言之以明其别，以为“虽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29]盖盗窃乱贼为害于国家人民之人，只能名之为盗窃乱贼，轻则加以刑罚，重则杀之，必除去为害于国家人民之

人，而后兼爱交利之大道乃能推行无阻。

爱与利兼施而为义之实。何以言？“义自天出”^[30]。又曰：“天欲义而恶其不义”^[31]。又曰：“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32]。又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33]是墨子的为义，全本于天的意志，天有意志，固以天为有人格的神，岂不是导人迷信？其实墨子的尊天，是他一种手段。当时是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天能赏善罚恶，本为当时社会尤其是大多数劳动民众的信仰，墨家团体正是“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34]的劳动团体，他要改革社会，既不能得位行权，即必须凭藉大多数劳动民众的势力，所以标举天志以激励民众。他屡说“置立天志，以为仪法”。^[35]所谓法仪，即义是也。天志由他置立以为仪法，实即企图用自己的兼爱交利的理则，来范围天下，改造社会，教人法天，即使人行义，特托之天志以坚人信从耳。

第三 不义之害，莫大于国家务夺侵凌，故必非攻

墨子倡兼爱交利之说，以义教天下，固欲人与人不相贼，家与家不相篡，国与国不相攻，以求天下之和平。乃日见当时诸侯国君，“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都则伐小都”^[36]，徒“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37]而不顾民生痛苦，尤不知其为不义。于是先为言好攻战之不利于民，一则夺民时，他说：“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38]又曰：“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

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39]再则竭民财，他说：“今尝计军出，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拔、劙，往而靡弊聃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其矛、戟、戈、剑、乘车，往则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40]三则贼灭万民之生命，他说：“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千万，寡必数千百，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41]又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饮食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42]攻战之不利于民若此，故“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然而“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43]墨子以为义者、利人，亏人自利则非义，好攻伐之君，其为亏人而自利也特甚。于是为举攘夺之事以明之，曰：“今有一人，入人园囿，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囿，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具不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无辜人也，拋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44]亏人自利固非

义，而好攻伐之君，其杀不辜人尤不可胜计。更为举“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45]以明之，曰“杀一不辜人者，王公大人必加之罚，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则岂有以异是哉”（“（哉读若棼）黑白甘苦之辩者哉？”）^[46]对于攻伐人国者拟以盗贼攘夺之恶行，声其杀不辜人之重罪，其为不义甚明，人固非巧言饰说所能欺也。墨子之非攻，盖反大国之弃信灭义，而恃强侵略，以扩张霸权。所以特举吴夫差败齐攻越，而国卒以亡；智伯并三家以为一家，而终于大败以示儆。他的非攻，是反侵略。而在战争原因未消除以前，即兼爱交利的理则未畅行于天下之时，他仍不忘备战，故主守。如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诸篇，详言守城之法，并尝使其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47]，正所以抵抗侵略。他认为诸侯国君当内治其国，外善其邻，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来诸侯，不应侵凌攻伐人国。他常告人以“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48]诚以兼爱乃能使天下达到真正和平，而侵凌攻伐为害于国家人民者甚大。他尝语公输子云：“我义之钩拒，贤于子舟战之钩拒。我钩拒、我钩之以爱，拒之以攻。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拒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钩，交相距，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拒，贤于舟战之钩拒。”^[49]盖和平为天下万国之人民所共同期望。战则害人，以战而求致和平，则和平愈见其渺茫；义则爱利人，以义而求致和平，则天下万国之和平可能实现，而战争将永久消灭。兼爱则必非攻，此墨子之所以“教天下以义”也。

如桀、纣之逆天虐民，而汤、武伐之，皆立为圣王，则以汤、武能顺天应人而行革命之事。墨子特明其故云：“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50]攻战无罪之国，是为不义，而诛讨有罪之独夫，正所以利天下万民也。

第四 兼爱交利之经济实现条件

一 上下同劳苦，自强而不怠，故必非乐、非命

《乐记》云：“乐者为同，同则相亲。”又云：“乐文同，而上下和。”乐所以与民同乐，而得上下之和亲，乐固国家人民之所重。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交，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其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乃当时“王公大人，其造为乐器，则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其养舞人，则“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曰：饮食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不足观也”。此其不中民之利，而为天下之害也实甚。尤其王公大人士君子农夫妇人，以悦听乐之故，而不能各尽其所应尽之职事。他说：“姑尝数天下分事，而观乐之害。王公大人，早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库、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同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绢布、缣（读如绡）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早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

不能竭股肱之力，宣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绢布、繆；是故，布繆不兴。曰：孰为而废大人之听治，贱人之从事？曰：乐也。”〔51〕当天下方忧不足之时，既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又以“说听乐，废君子听治，与贱人之从事”，则政愈乱，而民愈贫，故墨子必非乐。

他又非命。他说：“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虽强劲何益哉？”〔52〕他认为命者，乃“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术同述）〔53〕，“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能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畋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54〕此信有命，而怠倦不自强者也。他认为“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其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亦岂可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其力也。”〔55〕

“节遇之谓命”^[56]，力则自强不息。人能努力与空间时间合成的环境奋斗而自强不息，自然使天下有治而无乱，有富而无贫。惟力足以胜命，故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57]。又曰：“圣王无冻馁之民者，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58]故墨子必非命。非乐、非命，是要人人皆能劳动自强，尽其分事，则天下自无不足之民也。

二 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弗為，故必節用、節葬

墨子之所謂愛，是以實利為標準。他以為人類之生存，其經濟當能維持生命所必需之限度；乃大多數的人民，終歲勞苦，猶為飢寒貧乏所困，不易生存；而少數富貴階級的人，方恣為奢侈逸樂。墨子以為這種奢侈逸樂，是由亏奪民財而來，既不愛人，尤其不利人。他嘗說：“當今之王，其為宮室，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其為衣服，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彩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 “其為食，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刍豢蒸炙魚鱉，前方丈”。 “其為舟車，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59]。是富貴階級的奢侈逸樂，皆由亏奪民財而來。所以他嚴重為之示儆曰：“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冻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60]這種勞民費財，損不足以奉有餘的弊害，必須予以消除。他以為聖王為政，全在利民。“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无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得不勞，其興利多矣”^[61]。又說“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62]不加用而為，便是無用之費，也即是加費不加於民利，所以墨子主張節用。他說：“古者聖王制為節

用之法：凡天下群百工，轮、车、轤、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63]此言节用之法，必当限制一部分富贵阶级的奢侈逸乐，使无侵害别人的生存；所以凡是费财劳力，徒供少数人的奢侈逸乐，不加于民利者则不应为；如加费而能中民之利则必为之。他说：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资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64]正如近代发明汽车以代牛马之车，虽加费而却加利，以其更速故也。至于群百工既限制奢侈品之制造，同时移此制造之劳动力于其他有用之处，增加生产，以求加利于众民。故言各从事其所能，即就生产事业，“各为其所能也”。言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凡是饮食衣服舟车宫室的制作，都以奉给民用为止，即皆得其所需，无不足亦无过分也。各为其所能，而民不伤劳；皆得其所需，而财无浪费；此正兼爱交利之实行也。墨子尝言以孝利亲，而又主张节葬。他说：“计厚葬，为多埋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挟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65]盖多埋赋财，即使人不能得其所需；久禁从事，更使人不能为其所能。他说：“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66]所以要节葬。生则节用，死则节葬，皆为利天下之民也。

荀子谓：“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67]荀子习于儒家贵贱等级之文饰，而以墨子欲使上下勤力，为蔽于用而非之。他说：“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

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68]不知墨子之为天下忧不足，他对于天下人民的财用，是以兼爱交利为大原则，而不许有富贵贫贱阶级之分。所以非乐、非命、节用、节葬，正是勤劳与俭约并行：一面增产，一面节约，以求得天下之万民财用皆足为先务。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墨者俭而难遵。然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69]强本，是要加强劳动，以增进社会大众的生产；节用，是要厉行节约，以防止富贵阶级的浪费。要使天下之万民先做到人给家足，则不可不强本节用，正足以说明墨子兼爱交利的新社会经济政策之要旨。

第五 兼爱交利之政治实现条件

一 尚贤则举义不辟贫贱疏远，而尤重视工农

墨子说：“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是其故何也？曰：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70]盖封建政治时代，天下为家，爵土世袭，其所尊尚而任使之人，大都党父兄，偏富贵，嬖颜色，不肖者举而上之以为官长，贤者抑而废之以为徒役，贤良之士不得为政，所以国家多乱，而天下之民咸受其害也。欲求有以治国家，利天下，则为政不可不尚贤。他又说：“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71]言有力相助，有财相分，有道相教，即义之兼相爱交相利也。贤者必为义，用贤者即必举义。他说：“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

言曰：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不义。是以国之富貴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避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宿卫宫中之官），国中之众，四鄙之萌（萌同氓）人闻之，皆竞为义。”^[72]能为义始得为贤，举义则不避贫贱疏远，“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73]墨子之尚贤，盖不为封建社会中富貴贫贱亲疏远近的差等所拘限，而是以平等视人；尤特别注意从事生产，而又历来遭受压迫的工农劳动大众。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貴，而民无终贱。”^[74]复历举“舜之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反（反者叛之假字）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伊尹为莘氏女师僕（僕与媵同），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臚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皆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75]又云：“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76]以证明工农劳动大众中，不少圣智贤能，起而治国家、利天下，惟能尚贤以为政，举义不避贫贱疏远，则人竞为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77]，而后兼爱交利一同天下之义的新社会可以实现。

二 尚同唯能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治

墨子的尚同一义政治，是要革除亏人自利，怨恶争夺的旧社会，改造成为兼爱交利、民主和平的新社会，是整个的计划，也是特殊的主张。他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滋众，其所谓义者亦滋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78〕天下之人异义，故交相非。内则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是不能兼相爱也；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是不能交相利也。不能兼相爱必相恶，不能交相利必相贼，天下安得不乱？天下之乱，由于不能以兼爱交利上同一义而为政也。他又说：“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情，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历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情，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逮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天下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

之。尚同乎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长固乡之贤者也，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读为又）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国君固国之贤者也，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79]其所谓义，即兼相爱交相利是也。察其能一同天下之义以为政，其重要之点有三：（一）天下至大，万民至众，必使义人在上以领导而督率之，所以上自天子三公国君左右将军大夫以逮至乎乡里之长，皆必出于选择。必为能从事乎一同天下与其国其乡之义之人，以为之正长，“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以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80]，足见其组织之完善。（二）发政施教于天下之百姓，曰：凡闻见善者与不善者皆必以告其上。即“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81]曰：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一方面为学上之善言善行，一方面即“使人之吻助己言谈，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82]曰：下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即“使人之心助己思虑，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

速得矣。”〔83〕谋定即行，更“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84〕惟其兼爱交利，尚同一义以为政，得道多助，是故上下情通。（三）一同天下之义必自下而上，里长既一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乡长能一同其乡之义，乡既已治，又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国君能一同其国之义，国既已治，又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天子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发政施教虽由于天子，实行则重在人民，兼爱交利政教的基础，确然建立于由里而乡、而国、而天下之万民，足见其化行而俗美。唯其能合天下万国之君民尚同一义以为政，其正长之领导皆贤，既组织完善，政教之施行多助，又上下情通，兆庶从风，人竞为义，自然化行而俗美，天下之人皆兼相爱交相利，安得不富而无贫，治而不乱。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说：“上同而不下比，是叫人民跟着皇帝走，是主张绝对的干涉政治；非惟不许人民行动言论之自由，乃并其意念之自由而干涉之。”梁氏习闻欧美旧民主之尚谈自由，而未深解墨义。所谓上同而不下比者，即“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是也。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遂指责墨子的主张会流于君主专制，诃其片言，而昧其全体，胡不观《尚同下》云：“家君发宪布令其家，曰：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家以告，亦犹爱利家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家不以告，亦犹恶贼家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曰：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国以告者，亦犹爱利国者也，上

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曰：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所发之宪，即为政者必以兼相爱交相利的义为天下共循之大法也。所布之令，即其人而爱利家国天下者则谓之善，其人而恶贼家国天下者则为不善。若见爱利家国天下者必以告，即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也。若见恶贼家国天下者亦必以告，即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也。以爱利家国天下之人告者，上得者赏之；不以恶贼家国天下之人告者，上得则罚之。是上之所是，为爱利家国天下之人，上之所非，为恶贼家国天下之人。故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这不是叫人民跟着皇帝走，而是要人民循着兼相爱交相利的义走，所谓天子不过是一个领导者而已。又况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下情通，惟善是从，必须使天下同一于兼相爱交相利的之义，以实现人类新社会之博爱平等互助和平。这样的上同，绝不会成为封建政治的君主专制，使天下受其害；更绝无有如荀子所言：“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85]之虑。所谓下比，与《论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之比同。盖“阿党为比”^[86]。《管子·小匡篇》云：“公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燥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韩非子·难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此

直毁罚之所及也。”与墨子之言下比同。盖下与作奸非者比而掩盖之，是谓下比。亦即何晏所谓“相助匿非曰党”〔87〕。故墨子复言“义不同者有党。则上之赏誉不足以劝善，其毁罚不足以沮暴”〔88〕；欲求天下之治，安可得乎？必以兼相爱交相利，一同天下之义以为政，上同乎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故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89〕，殆同于今世实行社会主义以通向共产主义的国家所标举的一个真理。惟其尚同一义以为政，乃能使天下治而不乱。

尚同之治，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这种君主选举制度，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由何人选？以何法选？墨子未之言。或以为墨子卒后，全国墨者就公推一墨教总统，名曰巨子，这一制度，就是他们将尚贤尚同主义作小规模的试验，亦是一种推想。考之《经上》云：“君臣萌（萌同氓）通约也。”所谓通约，当是天下之万民所共约，同忧同乐并同劳苦。仅因其分事之异，而有不同之名，非君有特权，而臣民皆侪于奴隶，尊卑上下相县隔也。乃荀子以“尚功用，大俭约，而曼差等，不足以容辩异，县君臣”〔90〕非之，实不知墨子者也。惟杨倞注云“曼差等，欲使君臣上下同劳苦也，上下同等，则其中不容分别而县隔君臣也。”则正墨之本义。因其君臣民是通约，故上下同等，不容分别而县隔君臣。君臣民既是通约的关系，故天子以及三公诸侯卿大夫以逮至乎乡里之长，皆出于选择。他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君臣民共循之大法，一同天下之义，而必做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91〕，以实现博爱平等互助和平的新社会。

第六 墨子为中国古代一伟大理想家

一 墨子之理想与儒家大同学说

儒墨皆为世之显学^[92]，而“墨家非儒，儒家非墨”^[93]不，相服也。平心论之，两家各有所长。儒家之言，较为平实可行，而墨家则理想伟大，门风高峻。理想既为人世所重，儒家子游弟子作《礼运》，乃援墨入儒，谓孔子亦有此说，托为观上之叹，别为大同世小康世，谓时机未至，当先行小康之治，以徐企于大同。其所言大同，如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公犹共也，天下为公，言天下为人民所共有。选贤与能，即正长必出于选举，不私传天位，亦不世袭爵土也。墨子谓“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94]，讲信修睦，即兼爱非攻之大原则也。如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兼相爱之实现也。如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即交相利之实现也。惟财产不为私有，劳作不为私利，则似儒家弟子所言之义又进一层矣。如曰：“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即“视人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95]之实现也。总结之曰：“是谓大同”。同犹和也平也，大同者天下大和平也，惟其能行兼爱交利之大道，尚同一义，乃能达到天下大和平。儒家大同学说，其为本于墨家思想殆不难见。

二 墨子之理想与今世社会主义

或问墨子所言之义，即是兼相爱交相利。所谓交相利，又是彼此各尽所能，彼此皆得所需，此种新社会，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岂不是相同？曰：理想相近，制度不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其生产资料，是公共所有制，而非私人所有制。社会主义之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共产主义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虽分配方式不同，盖由生产力之增高，尚有等差于其间，但其生产资料归公，公众合起来以行生产，却并无二致。墨子之言，一则曰：“有财相分。”^[96]再则曰：“有财者勉以分人。”^[97]三则曰：“腐朽余财不以相分。”^[98]其于生产资料，可见尚系私人所有制，此其所以为不同也。惟是墨子所言兼爱交利尚同一义，在二千数百年前，乃有此伟大理想，实不可及。墨子当时颇致慨于“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99]，不能达其目的。其实当人类社会发展史之一科学未曾出现时，社会必循夫生产力之增高，而渐次以进之义未明，一切有伟大理想的人，均不免于是空想，此固不独墨子为然，后之人正不必以此致其不满，而当钦敬吾先民所抱理想之伟大，尤当学习其忠于自己理想，而力行不怠之精神，用以创造吾人未来之共产社会也。

注 释：

- [1] [33] 《墨子·天志上》。
- [2] [11] [13] [14] [20] [99] 《墨子·兼爱中》。
- [3] [51] [57] [58] [64] 《墨子·非乐上》。
- [4] [34] 《庄子·天下》。
- [5] [9] 《墨子·贵义》。
- [6] [39] 《墨子·耕柱》。
- [7] [25] [52] 《墨子·非命上》。
- [8] [26] [27] 《墨子·大取》。

- [10] [48] [49] [94] 《墨子·鲁问》。
- [12] [95] 《墨子·兼爱上》。
- [15] 《孟子·滕文公上》。
- [16] 《论语·里仁》。
- [17] 《孟子·梁惠王上》。
- [18] [32] 《墨子·法仪》
- [19] [21][24] 《墨子·兼爱下》。
- [22] [79] [81] [82] [83] [84] [98] 《墨子·尚同中》。
- [23] [65] [66] 《墨子·节葬下》。
- [28] 《孟子·尽心上》。
- [29] 《墨子·小取》。
- [30] [36] [91] [96] 《墨子·天志中》。
- [31] [35] [46] 《墨子·天志下》。
- [37] [38] [40] [41] [42] 《墨子·非攻中》。
- [43] [50] 《墨子·非攻下》。
- [44] [45] 《墨子·非攻上》。
- [47] 《墨子·公输》。
- [53] [54] [55] 《墨子·非命下》。
- [56] 《荀子·正名》。
- [59] [60] 《墨子·辞过》。
- [61] [62] 《墨子·节用上》。
- [63] 《墨子·节用中》。
- [67] 《荀子·解蔽》。
- [68] 《荀子·富国》。
- [69] 《史记·太史公自序》。
- [70] [72] [74] [76] [77] [89] 《墨子·尚贤上》。
- [71] [73] [75] [97] 《墨子·尚贤下》。
- [78] [80] 《墨子·尚同上》。
- [85] 《荀子·成相》。
- [86] 何晏《论语集解》、《为政》注。
- [87] 同上书《述而》“君子不党”注。
- [88] 《墨子·尚同下》。
- [90] 《荀子·非十二子》。

[92] 《韩非子·显学》。

[93] 《论衡·薄葬》。

附 录：

张表方《墨子贵义》序

周善培 [1]

古之人，书不欲苟著也，必有救于其时，墨子则然。今之人，书不欲苟读也，必有救于今之时。表方读墨子则然。墨子之为书，当好战崇奢，敢为不义之时，其言非攻也，兼爱也，所以救战也；其言节用也，节葬也，非乐也，所以救奢也；其言贵义也，所以救不义也。表方所遭之时，不幸亦如墨子所遭之时，故嗜孔子、孟子，尤嗜墨子，取墨子，尤取其《非攻》、《兼爱》、《节用》、《节葬》、《非乐》、《贵义》诸篇。表方之深恫乎今，亦犹墨子之深恫乎古也，恫而思所以救之。墨子既独自苦而为天下所莫为之义矣，表方者尤苦焉。辛亥，为争四川铁路之义，几死于赵尔丰。其时年猷壮，气宜盛也。己丑，则既七十八之年，又不屈于蒋中正而几于死。耄矣，而气弥壮，盖于墨子之外，复有得于孟子之说。苟无直养之道，徒识先民数言，年少于表方，而淫于富贵，移于贫贱，不待威武之加而自屈者，固十百其人也。悬以为鹄，而望天下之矢皆集焉，愿志宏矣。直养则其本固，而非旦夕所能几，尤非人人所能至也。将取墨子以为药，“赖其力者生，

不赖其力者不生”之两语，其起阳之乌头乎？不赖其力而资人之力以生，其病若仅为惰。然忽流人之血不自流其血以战，若蒋中正者，亦惟不赖其力而赖人之力以生之一念所扩而充之耳。耕者有其田，所以儆惰农，纠乡村之法也。惰莫炽于都市，力者有其食，授食之多少，必以力之多少为衡，则纠都市之法。或谓惰之久而年已过壮者，强之力，或远于人情，是泥乌头杀人之说。然至阳将绝而无以起之，强之服不犹愈于听其死耶？况所谓力者，不限于筋骨乎。吾少表方六岁耳，日必作字一小时，读书四小时以上，苟有法焉。七十以上人，日必以五小时手眼之力，施之公众，而报以相当之食，吾必先奉法以为群七十老人之倡也。衍不生之义，直谓不赖其力者可听其死耳。墨子岂远于人情哉？儆不赖其力者以不生，实望其赖其力以生。若疾情人，实爱惰人也。杀之祸，自蒋中正启之。惰之习，则千年之所积，非姑息苟且所能矫。丙午，吾管成都警察，一日拘乞丐二千七百余，而强迫之劳作，不数月，皆积资各还其乡，盖奉墨子之教于四十年之前，表方宜闻之矣。己丑五月周善培。

注 释：

[1] 周善培（1875—1958） 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少有文才，但屡试不第，暂不再应科举。从1899年起，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并带学生留学。曾任四川警察局总办，商务局、劝工局总办等职。1912年离川赴沪从事著述。抗日战争爆发，拒绝充当汉奸，闲居上海，处理民生轮船公司事务。解放初被推为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任全国政协委员，著作有《说文》、《大众易说》等。

评蒋介石元旦文告（节录）^{*}

（1949年1月6日）

谁都要和平，这是很明白的，但是蒋介石曾经破坏了结束内战的机会。和平是人人所愿望的，但据我看，和平的希望不大，因为显然蒋介石不愿意和。特别是蒋介石所提出的两条件，不仅中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关于保持法统与保障国民党军队这两点。这两个条件是人民所不愿接受的。而且在文告的末段，蒋强调如有必要，他将继续作战。这表示他并不真正要和平。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全线崩溃，蒋介石遭受内部和外部压力下，不得不在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张澜在被监视的情况下，不顾自身的安危，于1月6日接见记者发表这篇谈话，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和谈条件。

关于上海解放的声明

(1949年5月28日)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人民解放军在横渡长江之后，很快进展到了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已经解放了。上海开始一页新的历史，上海六百万人民有了新的光明和新的生命。我们站在各民主党派的立场，谨先向可敬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们向领导这个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表示热诚的庆贺。

上海是全世界工商业重心之一，因此我们相信今天上海的解放，必定引起了全世界人士的特殊注意。我们愿就这个机会唤起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及人民，切实认识这次中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开宗明义的说，这是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目标，对内是推翻封建独裁，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绝无疑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各民主党派所共同参加的人民革命，这是中国全体人民整个民族彻底翻身、彻底解放的

* 原载《解放日报》1949年5月30日。国民党当局于5月10日，在上海捕逮了张澜，经中国共产党的营救，张澜于5月24日脱险。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次日，陈毅代表党中央亲自慰问张澜。张澜随即与罗隆基、史良等联名发表这个声明，祝贺上海解放。

革命。我们要切实遵行毛泽东先生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这次革命将迅速建立中国人民的民主政权。要实现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联合政府，以争取人民的真自由真平等，以达到中国真民主真和平的目的。这种革命的性质不容误会，这种革命的意义不许曲解。

上海如今已经解放了，上海六百万中外市民每个人都有亲身经历这个伟大革命的经验。从这个经验中，我们愿意提出下面这两点意见：第一、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代表的残余力量失败到了尽头，上海战事确切证明这种残余力量已经完全崩溃瓦解了。因此我们愿严重警告被蒋介石抛弃在上海及其他地区的残余军人、特工人员等等，你们不要执迷不悟，再做个人的奴才走狗，再继续做人民的敌人，你们应立即大彻大悟，弃暗投明，将功赎罪，以避免本身无意义的毁灭。第二、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入上海，这说明中国人民革命已按预定计划，从农村扩展到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

人民革命的目标不只不做无意义的破坏，而且要做有步骤有计划的建设。过去反动派伪政府所散布的恶意宣传，污蔑人民解放军到处无端没收私产，到处任意破坏生产等等，而今证明了这只是欺骗人民的大谎，大家已经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是爱护人民的。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保障并增加人民的利益，人民革命的力量既已到了上海，今后的努力是要把上海从安定中谋建设。

我们要把一个帝国主义支配、畸形发展的上海，改造建立成为现代化工商业的民主的都市。我们更要珍惜上海这一点工商业的基础，来建设现代工业化的新中国；因此，上海市民应彻底认识，我们人人有尽自己的力量来安定与保障上海的责任。在这个

革命过程中，上海工商业人士，在消极方面，应各守岗位，各守本业，以维持本市的秩序；在积极方面，且应人人尽其才智，竭其真诚，以加速整个上海、整个国家的工商业的建设事业的发展，使中国工商业的现代化得以迅速成功。

上海如今已经解放了，我们坚决相信上海解放的光荣日期是蒋介石及其匪帮集团残余力量最后埋藏的时候。蒋介石全盘军事失败并辞去伪总统职位后〔1〕，依然梦想利用上海人力物力为困兽之斗，以作中国法西斯起死回生的企图；他用尽世间最残忍、最酷刻、最凶暴、最卑鄙下贱的一切手段，杀戮屠害人民，以支持他的残余生命。突击检查，集体逮捕，连保连坐，格杀勿论，种种不人道反人道的杀人办法，凡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专制帝王无道暴君所用的一切屠杀人民的方法，蒋帮在上海最后挣扎的时期，均已全盘实行了。这种疯狂的倒行逆施，充分证明蒋帮的日暮途穷。这类行为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加速了反动者的灭亡。因此，我们很坦白的劝告中国南部一切未解放的各省市的伪政权组织及军事力量，应彻底觉悟，今后对人民革命的任何抵抗是毫无效用的，今后任何负隅顽抗只是愚蠢的行为。一切屠杀摧残人民的暴行，这在人民方面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损害；这在蒋匪仅有的残余力量本身来说，不止是当前的自掘坟墓，并且是千古不赦的罪行。时局演变到了今天，你们已经民心丧失干净，武力溃败无余，今后任何苟延残喘的阴谋计划，例如所谓东南自保，所谓西南联防，甚至企图以台湾孤岛作为流亡伪政府的巢窟，都不过是全盘的幻想。人民解放军铁骑所在，你们这些幻想都将迅速陷于破灭。你们应该知道，人民的愿望是不可违背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抵抗的，人民革命的成功是绝对无法延缓

的。你们应该有勇气承认你们的失败，你们更应该有胆量来向中国人民投降。你们应该争取这个最后的时机，将功赎罪，以利我国迅速完成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伟大的人民革命。

最后我们愿向全世界的人士做一个严正的声明：中国人民的革命乃中国全体人民整个民族的解放与复兴，同时，这也是我们为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努力。中国人民愿与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拥护和平的人民亲善合作。凡尊重中国主权及人民利益，遵守中国法律，在平等互惠之原则，中国人民愿意与之贸易，共图繁荣。若有任何国家的政府或党派，仍然企图支持中国的残余反动力量以遂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因而损害中国人民之共同利益者，中国人民必视之为公敌。

张 澜 罗隆基 史 良 郭春涛
陈铭枢 闵刚侯 连瑞琦 杨卫玉 等

注 释：

〔1〕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蒋介石下野后，前往浙江奉化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

致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董必武电*

(1949年5月29日)

毛主席润之、朱总司令玉阶、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勋鉴：

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时仅一月，南京及苏、浙、赣、鄂、陕五省会相继解放，近则上海亦全部解放。蒋军到处崩溃，人民咸庆来苏。人民解放军得到如此光荣胜利，谨为诸公庆贺。上海为东亚著名大都市，国际及国内人材多集于此，今后工商业之新发展，尤为新民主国家所利赖。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1〕聆教。

张 澜 叩艳〔2〕

注 释：

〔1〕平 即北京。

〔2〕艳 29日。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张澜于1949年5月27日在上海脱险后，于5月29日致电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即在原电报上起草了回电。

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董必武复电

(1949年6月1日)

表方先生：

艳电敬悉。革命军事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在建设，亟盼告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董必武

六月一日

为祝贺上海解放 致毛泽东朱德电

(1949年5月31日)

毛主席润之、朱总司令玉阶勋鉴：

我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蒋匪反动集团全面土崩瓦解，望风披靡。今我人民解放军又以迅速敏捷行动，解放东亚工商业最大都市上海，使六百万市民大旱得见云霓，黑暗重睹光明，诚堪庆贺。此次蒋匪反动集团妄冀以上海之人力物力，为彼辈临死前最后挣扎之牺牲品，抢劫财物，屠杀人民，甚至以连保连坐、格杀勿论野蛮手段，杀害无数民主人士，凡强盗土匪所羞耻而不肯为者，蒋匪帮竟敢一一为之。而我解放军则义旗所指，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秩序井然，充分发扬救国爱民之精神，万民腾欢，举世赞誉。此种仁爱与残暴、光明与黑暗之对照，实为人民革命史上光荣胜利之伟大奇迹。同人鼓舞欢欣之余，谨电致贺。

张 澜 史 良 罗隆基 郭春涛
陈铭枢 闵刚侯 连瑞琦 杨卫玉 等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复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电

(1949年6月1日)

沈衡山、黄任之、章伯钧兄转民盟临工会公鉴：

各电敬悉。盟员中有数人遭难，弟等平安脱险。

澜、努、良^{〔1〕}、沉同叩

六月一日

注 释：

〔1〕史良（1900—1985）女，江苏常州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7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1935年参加上海妇女救国会，任常委。1936年任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常委，同年，因领导抗日救亡活动，同沈钧儒、邹韬奋等被国民党逮捕。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建国后，曾任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第二、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央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本文系张澜、罗隆基、史良与郭则沉四人的复电。

附 录：

沈钧儒等致张澜电

(1949年5月31日)

上海市政府潘副市长转

张主席表方暨罗隆基、史良、郭则沉诸同志：

世〔1〕电谅达。诸同志久困沪滨，领导盟务，殊为敬佩。上海现告解放，请即联袂北来，主持四中全会，商订本盟今后决策。特电欢迎，并盼告行期。

沈钧儒 章伯钧 黄炎培 张东荪 周新民

暨临工会全体同志

注 释：

〔1〕世 31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 的讲话

(1949年9月21日)

毛主席、诸位代表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今天正式宣告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人民觉悟了，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到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伟

* 原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代表，工人阶级、农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聚一堂，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今天我站在这个讲演台上，看到这个庄严伟大的会议局面，我立即发生了一个感想。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应首先感谢他们。我个人今天愿首先向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对今天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想在座诸位代表一定和我的感想一样，都认为这个会议有了绝对成功的把握。三个月的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三个完善的草案。第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草案，经过这次会议的通过，就要成为正式的法案。根据这几个法案，中国政治将来就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

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在这里，我要赞许那个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他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有了“革命到底”的大方针，他有了稳步建设的大原则。他的内容丰富，他的文字质朴。中国今天应做的，要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标举出来了。中国将来应做的，要做的，但今日事实上还不能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不说。他没有高调，他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

我可以想像得到，这样一个共同纲领在这次大会中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通过。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责任。我们要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他成为具体实行的事实。

今天我更愿坦白的说几句话，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同时，我们又知道，中国今天还有国内国外的敌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中国有了二十余年的历史。这三个恶势力是三位一体，是狼狈为奸，要彻底地肃清、扫荡、消灭这些恶势力的残余，还须要相当的时间。他们今天还要做困兽犹

斗的迷梦；他们还在进行死灰复燃的阴谋。我相信在座诸位代表没有人会忽略这个事实。我们应唤起全体人民，共同警惕，共同戒备。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开幕词中说得十分正确，他说：“谁要放松了这项警惕，谁就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变成被动。”全国人民应把这几句话，牢牢记在心头。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是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

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阵线。将来的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有了真正的团结，“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才有了真正的保证。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今天正式开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时代今天亦开幕了！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过程，是走到无阶级社会，走到大同世界的正当途径。我们大家努力吧！我们今天是自己的主人了！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我们努力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在中苏友好协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9年10月5日)

主席、各位先生：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成立，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次日，苏联政府就首先与我人民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政府是苏联人民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政府。两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表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更进一步的亲密结合。

远溯到三十年前，苏联伟大革命成功之后，首先就以平等待我，自动废除了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从那时起，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便已建立起来了。

苏联革命的伟大成功，给中国人民极大的启示和鼓舞，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革命的正确理论与革命的正确道路。经过三十年来的奋斗，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得到了胜利。中国人民自己站立起来，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从革命的意义说，中苏两国人民革命的

• 据手稿，

意志是相同的。

在苏联与我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那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所召开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正好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及其他国际朋友参加了这个会。这个会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未来和平生活与和平建设，更是为了全世界人类的和平生活与和平建设而召开。中苏两国人民都正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我们两国人民对世界人类的道义感和责任感是相同的。

于此，我们知道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用中国的老话说，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是泛泛之交，我们两国人民不止是为友好而友好，而是为了使世界上一切善良人类都能得到和平、民主、进步的幸福而携手合作。由于两国人民这种志同道合的友谊，我们将伸出和平友好的手，与世界上一切善良人类讲朋友，我们从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基础上，扩展起来，达到“四海皆兄弟，天下为一家”的世界大同目的。敬祝中苏人民友好万岁！

庆祝苏联十月革命 三十二周年

(1949年11月7日)

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距今已三十二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今日的苏联，不但是世界的和平堡垒，也是引导世界人类走向光明的灯塔。

但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后曾经过许许多多的艰苦奋斗，始收获到成果的，而且那些奋斗之所以获致成功，更不能不推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见，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英明领导。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革命政权，现已建立起来了，虽然我们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并未明白写出“社会主义”字样，但毫无疑义，我们要引导全国人民由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对于苏联的建国经验，实应该引为鉴照。那些经验，都是宝贵而成熟的经验，是中国建国的指南针，我们要走向光明之路，就应该真真实实地向苏联学习。

原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7日。

针对现实为人民 解决问 题

(1949年12月5日)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一九五〇年的财政概算，是一件大事，同时通过发行胜利折实公债，这充分表示了政府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通货膨胀并不讳言，对于困难亦不掩饰。正惟其不隐讳，不掩饰，更见得政府是针对现实为人民解决问题的。毛主席所说“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既说出了困难，又规定了克服困难的办法，自然就有了绝对的希望。政府对人民如此坦诚，我相信人民对政府也必是信之不疑而愿竭全力以支持政府的，这与以前反动政府对人民，及人民对反动政府的情形，恰恰相反，这件事是充分表现了人民政府的精神。

* 原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5日。

在民盟四中全会上 的讲话

(1949年12月7日)

各位同志：

我们的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人民首都北京召开，尤其是在本盟参加人民政协，参加政府之后召开，象这样在自由空气中，聚集了各地代表，来会议盟务，在本盟是第一次。这象征着本盟已进入了新的时代，担任了新的任务。这次的会议，在本盟是划时代的大事。

追溯本盟的发生，远在一九四一年，那时，以蒋匪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不抵抗日寇而发动内战，大家知道的所谓新四军事件就是在那年发生的。当时各党派爱国分子，为了团结抗日力量，为了反对蒋匪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于是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提出十项主张，其后由民主政团同盟，发展为民主同盟，仍始终一贯是向蒋匪介石争民主，尤其主要的是号召国人作正义的主张，以打击蒋介石凭借武力、排除异己的阴谋，即是妄想消灭共产党的阴谋。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参加了旧政协，但自从民主政团同

• 原载《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

盟成立的时候起，我们一贯就是与中共密切配合，时时协商，尤其是在大关节处，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比如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旧政协闭幕后，需要组织联合政府，所有国府委员四十名，我们同中共主张，必须合占十四名，保有否决权。国民党反动政权想孤立中共，对我们竭尽利诱威胁，而我们始终保持立场，不为所动摇。又如同年，蒋介石要召开伪国大，要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意在窃盗民意，使反动政权合法化。我们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并严正声明不承认他的伪宪法。这是我们与中共紧密配合的两件具体事实。我们盟内曾先后有违反我们的主张投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团体及个人，我们已一律予以清洗。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反抗的精神，是始终坚持着的。

因之，在一九四七年，本盟就受到了反动政权的最大迫害。许多同志被捕，一部分领导同志，在本盟被迫公布解散之后，到了香港并且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重新健全了领导中枢。三中全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是随时代的进展，又向进步方向发展了一步。从这时起，本盟的任务更明确了。而斗争的方法，由和平合法的斗争转变为革命的斗争。

今后，本盟又已随时代的进展而有着新的任务了。我们怎样在革命新形势下，在统一联合战线中，来实现共同纲领，来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正是我们的时代任务。要使这一任务能够彻底完成，于是本盟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有即时检讨改进的必要，这次四中全会扩大会议的召开，主要意义便在此。

就本盟的性质说，乃是以进步的知识分子为骨干，广泛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

主义革命。

于此，本人有一点贡献，说团结，先得自身团结，说进步，先得从自我进步作起，不但反人民的思想应当清洗，一切由个人出发的想法看法，也都得彻底加以检讨改正。然后始能有利于团结，始能使本盟大大扩展，始能担负起时代的任务。本人首先愿努力于此，更愿与各位同志相互策勉。

由于这次会议的预备会议开得很好，大会一定有很好的收获，这是各位同志辛苦得来的成果。更足见各位同志对革命任务负责的态度，这是最值得欣幸的事，祝大会成功！祝各位同志健康！

致张乔啬

(1949年12月14日)

乔啬〔1〕：

重庆解放时，你同华芳、幼芳、振华他们都安好吗？晓岩留在重庆的儿女念晖、强华等亦俱安好吗？你今后打算做甚么工作？仍然留在重庆？抑或是来到北京？你学铁道工程，办过机械厂，来到北京是可以有工作的。但是，要晓得今天的政治，不是形式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实际上变了质。第一，要把思想搞清楚。今天是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再走上共产主义。决不再走英美帝国资本主义的民主的路。正确的思想，就是事事为人民服务来建设新社会、新国家。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更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归结点。第二，要改变作风。要谦虚，不可矜骄自以为是；要谨慎，不可粗心大意，随便行动；要勤劳，不可偷闲倦怠；要节俭，不可奢侈浪费。谦虚、谨慎、勤劳、节俭，是共产党普遍遵循的作风。总之，人人要劳动，事事为利人，而不是只图自利。你来北京或是不来北京，家里旧有的生活习惯必须改变。华芳也须自寻工作，或是学习手工业、或是找书教，今后要有独立生活的技能，才能在新社会立脚。进人和他家属都好否？

• 据手稿。

此信可以交他一看。

父亲书

十二月十四日

注 释：

[1] 张乔齋 张澜之长子，1902年11月生于南充。1926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解放后任铁道科学院研究员，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

致王恩洋蒙文通

(1950年2月10日)

恩洋老棣〔1〕 同鉴：
文通世讲〔2〕

接奉一月十五日邮书，诵悉种切。新政府成立后，关于文化教育政策，除在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大原则外，所有详细办法，尚在陆续审议及计划中。至于对新解放区之私立学校，暂取放任态度，惟就中课程与教法，如有与新民主主义不相容者，都非迅予改正不可。足下等热心教育，极可佩慰。谓佛儒两家，关系固有文化，亦中肯綮。鄙意儒说之可贵，系在大无畏、大慈悲、大智慧，系在救人救世。其末流之弊，趋于消极，乃至逃世遁世，则与时代精神相违。至讲国学，首须识时，所有旧的话说，均须按照新的意义，重加分析。切不可效俗儒之所为，因袭故套，专事寻章摘句，流为封建残余而不觉。当前我们的敌人，因为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而封建残渣，蕴藏内心深处，尤为大敌。窃料随解放军入川，必有许多新的书籍，欲望贵校多多购置，领导学生虚心学习。澜在此亦系取学习态度，盖深知惟有学习才能养成新的人生观，惟有学习，

• 据手稿。

才能使全国之人，燃起已将熄灭的火炬，奔向历史的黎明。坦率奉复，即致敬礼！

张 澜

二月十日

注 释：

〔1〕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县人。一生主要从事佛教研究与活动。解放初，任川北行署、政协顾问。棣通“弟”。

〔2〕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述有《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越史丛考》等。世讲，指朋友的后辈，或老师称学生。

致伍非百等

(1950年2月10日)

非百〔¹〕及列位董事先生钧鉴：

邮书敬悉。公等于川省解放之际，筹建大学，热诚原极可佩。惟教育部之全国会议，前月方始毕事，关于高等教育，不久当有整个计划颁行。南充目前似不必多议更张。至董事长一职，似更未宜遥领。现政府之基本精神，即在实事求是，无其实而居其名，在曩昔容有此例，在今后则当引为规戒也，知我者当能体谅及之。即致

敬礼！

张 澜

二月十日

注 释：

〔¹〕伍非百 四川蓬安县人，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民初因不满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曾返家乡，潜心从事《墨子》研究。后被聘为成都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和四川大学等校教授。抗日战争后，居南充治学。解放初，拟在南充创办川北文学院，以振兴川北文化。

• 据手稿。

致王兆荣

(1950年2月10日)

兆荣〔1〕老棣：

书来极慰远念。吾川解放，地方人士第一须着力者，即在提高文化水平，勉与新政令相配合。吾棣代理川北大学校务，并已与政府取得联系，甚善甚善。今后擘划，度驻校代表当有指示，所望精诚合作，频频接受新的理论，勉维现状，徐图发展。澜在此，与中共首脑人物，不时往返，觉得他们最不可及者，即是谦虚、谨慎、勤劳、节俭数点。此数美德，说来仿佛老生常谈，若真个躬身实践，则博大精深，无微不至，并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愿吾棣台善体此意，敬恭职事，勿见异思迁，勿舍近图远，守定岗位，虚心学习，积而久之则信誉日隆，前途固未可量也。

专此奉复。即颂

幸福不尽！

张 澜

二月十日

注 释：

〔1〕王兆荣 字宏实，时任川北大学代理校长。

• 据手稿。

致 鲜 特 生

(1950年2月11日)

特生〔¹〕老弟：

一月二十日、二十五日两函，先后入悉。漱溟先生亦曾暗及。渝城初解放所发生之误会，事成过去，大可不必介之。恒侄婚事完成，盼即摒挡前途，勿再躊躇。来书所谓“行情不悉，错误实所不免”真是快人快语，故为认清行情计，亦以速作此游为是也。

谈到行情，须知这不仅仅是政权的变更，而是整个社会的大转变。这里面包括一切文化类型。推想将来，愈是旧式的缙绅之家，愈将感觉动辄得咎，这便需要从思想上、生活习惯上、作风上痛下功夫，彻底改变。切望在启程前，多多向家人训教，启发他们的新机，至所祷盼。

此致

敬礼

张 澜

二月十一日

• 据手稿。

注 释：

鲜特生（1885—1968） 又名鲜英，四川西充人。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学堂。1912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鲜特生任使署支队（相当于团）支队长，刘湘、杨森均在支队内供职。1913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1920年后，历任刘湘部师长、参谋长，《新蜀报》社、重庆《民生报》社社长等职。1941年与张澜、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在重庆的住所“特园”是1945年毛泽东赴渝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对外活动的场所，也是民主人士活动的场所，曾被誉为“民主之家”。建国后，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委员。

致王泽丰

(1950年2月11日)

泽丰〔1〕世侄：

接阅你的一月二十三日详函，使我悲喜交集，我在最近三个月，均系闹着这样情绪。解放军很快的解放川省各地，这当然是可喜。但同时听着许多好朋友，在变动时期，为蒋匪帮所残害，却又平添无限伤感。

汝父为国家为事业而牺牲，这种精神，是可以永垂不朽的。今阅汝函，条理明晰，可谓故人有后。所望益自策励，多阅新书，多接新人，刻意学习，蔚成抱负，继述汝父未竟之志，完成汝父未竟之功，即以汝父做人做事的精神，作为新生命之资本，则汝父真个不死。勉之勉之，书不尽意！即祝
礼佳

张 澜

二月十一日

注 释：

〔1〕王泽丰 王干青之子。

• 据手稿。

致蒲跃文

(1950年2月12日)

跃文〔1〕世侄足下：

书来，以嘱荐爱莫能助，未即答。兹仔细寻绎书中旨趋，觉有与时代精神未能配合者数点。吾爱青年，吾爱后一代，矧在世交，不能不坦怀相告。记得左宗棠有这样两句话，“纨袴气不可有，孩子气不可无。”这就是说做人要留得青春常驻，要保持蓬蓬勃勃气象。尤其当此社会大转变的时候，理应兴高采烈，而来书则意态萧索，满纸牢骚，是何为者？此其一。新社会的最要条件，即在集团生活与合作精神，来书一开口即说：“生性鲁直，不善接物”。这完全是旧的名士习气，只讲孤高自赏，不讲分工合作。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处今之世，殊不相宜。此其二。解放军所到之地，第一即为青年学子及学有专长者筹出路。如拟用其所学，应即就近打听，或报名登记，或参加短期训练，均系最好方法。小女茂延、淑延自参加此间革命大学后，布衣短服，吃苦耐劳，已完全成为新人。舍此不图，嘱望于人情上之推荐，即是失算。此其三。新政府之作风，最注意者是组织，是学习，决不容许突如其来请托与说项。故我在此，决不轻易荐人，即

• 据手稿。

荐亦不生效。即生效如果他本人的实际生活和人家配合不上，亦不旋踵即遭摒弃，此等事例不谓胜举。须知好的道路，系自家走出来的，此其四。一生自问并无特长，惟对人说话，从不稍涉诳骗。今之所言，当邀谅解。就中关于新社会新政治之趋势，尤望向熟人中多多传达，使认识不够者，勿复绕歪曲圈子，共同打起精神，推动历史前进，实为至幸。即祝

进步！

张 澜

二月十二日

注 释：

[1] 蒲叔文 蒲殿俊之子。

就签订中苏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发表的谈话·

(1950年2月16日)

本月十四日，中苏两大盟邦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及关于长春铁路、旅大、贷款等协定。这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不只是真正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且苏联对新中国作了更有利的帮助，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空前的，使我们感到莫大的兴奋、欢快。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对于新条约和协定，是竭诚拥护的。

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一直地是关切援助。中苏两大国的人民，多少年来始终是亲切地友爱、团结。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蒋介石反动集团，过去千方百计的造谣、挑拨、离间，期图破坏两大国人民的友爱、团结。但相反的两大国人民的友爱团结，是日益地深切、加强起来。这次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是表现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友爱、团结更密切更巩固了。这是彻底地粉碎了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期图破坏中苏两大盟国团结的一切阴谋诡计。

·原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17日第二版。

百余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一直地压迫、侵略中国，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一直地破坏打击，而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苏联盟邦协助下，坚强地团结在一起，消灭了反动的统治，赶走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势力，建立起人民的政权。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是不会中止的。今天美帝国主义者不是在远东以至全世界积极地布置其侵略的阴谋吗？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正是答复了这个问题。从今以后，中苏两大盟国，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了更伟大的防御力量。我们与苏联紧密地靠在一起。两大盟国共同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两大盟国共同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两大盟国“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及措施”。这说明了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彻底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者在远东以至全世界的侵略阴谋，巩固了远东的和平基础，加强了以苏联为领导的全世界人民民主和平的阵线，削弱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势力。

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两个协定，规定苏联将把长春铁路交还中国，旅大移交中国，而又对新中国建设方面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苏联盟邦所给予我们的的确是更有利更有利的帮助，这表现苏联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怎样竭诚地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在历史上遇到过这样亲切的兄弟之邦吗？这也彻底地消除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对苏联种种造谣毁谤的诬蔑，使全世界的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有更正确的认识。

中国人民对于中苏两大盟国新条约及协定的签订，应该大大地庆祝，应该广泛地宣传，让每一个人民都了解苏联是我们真正

的友邦。毛主席所号召一面倒的政策是伟大而正确的。我要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因为他们对于新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贡献。同样地，我们要感谢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的人民。

欢迎毛泽东周恩来 访苏归来发表的谈话

(1950年3月6日)

毛主席、周总理这一次回国〔1〕，带来了七万万人民〔2〕紧密结合的坚定意志和空前无比的强大力量。这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各项协定的签订，不但巩固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促进了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速度，同时奠定了东方人民民主和平的基础，加强了全世界人民民主和平的力量。并且给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彻底的打击！而帝国主义者过去千方百计的造谣、挑拨、离间，企图破坏中苏两大盟国人民的友爱、团结的阴谋诡计，完全被粉碎了。

这一次的条约，就其内容说，不只是在平等的、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的，而且苏联对中国给了更有利的帮助。同时这一条约是防御性的，是建设性的，不只表示了苏联对新中国是赤诚的帮助，而且表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更加紧密。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对苏联这种伟大的友谊，致万分的谢意，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人民而辛勤劳苦，表示诚恳的慰问。

• 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3月6日第一版。

注 释：

〔1〕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就中苏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同斯大林 举行了多次会谈。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返 抵北京。

〔2〕七万万人民 指中苏西国当时人口总和。

致郑定竹

(1950年3月28日)

定竹〔1〕先生惠鉴：

上年在虹桥疗养院时，备荷关注，尤其值上海解放前夕，谋者作难，赖先生挺身以全家保证，俾得安居。侠义高情，溥未曾有，每一念及，辄深神往。

最近阅锦文来京，询及尊况，知已离开虹桥，另辟诊所。以先生造诣、行见，发挥救人宏愿，功同良相，不胜钦迟。谨藉寸楮，敬候兴居。诸惟霁察不具。

张 澜

三月廿八日

注 释：

〔1〕郑定竹：肺科名医，从1944年起，任上海虹桥疗养院副院长。

• 据手稿。

发挥高度积极性与 共产党员团结合作

(1950年3月29日)

我读了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加强与非党群众及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文告以后，有下列两点感想：

一、由于部分的党员犯有关门主义的毛病，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因此而使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害”起见，就公开发布指示，要求党员“克服”这种“缺点”，并特地重新发表斯大林大元帅和毛泽东主席论此问题的文件，要求犯有这种毛病的党员“认真地加以学习，并据以进行检讨”，这种勇于正视现实的光明磊落品质，真是古人所谓“如日月之蚀”。这种对革命对人民负责的严肃态度，值得每一位党外人士尤其是民主人士学习，并应奋起看齐！

二、所谓“党外群众”，当然是指共同纲领中的四友，而非反动三敌。对于三敌，他们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根本失却了被团结合作的权利。因此，我们居于朋友地位的应该反省：我们够

• 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3月29日第一版。本文是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25日发布了“要求全党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文件”。张澜读了此文件后写的。

不够作一个好朋友？我们的思想意识与作风能否与这位好友相配合？换言之，我们尽了作朋友的义务与责任没有？毛主席谆谆告戒共产党员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我们党外人士应该作自我检讨：我们对民族对人民的利益，是否也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我们曾否主动地以对国事负责的态度来与共产党员实行“民主合作”？我们是否犯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毛病：“不愿或不善于”与共产党员进行“亲密团结”？

我相信这一重要文告，不但对共产党员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不但对国事能起良好的政治影响，同时也能使党外人士获得一定的启示和感召，对于整个人民事业的前程，实有重大的裨益。

附录：

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学习 《斯大林毛泽东论共 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 众团结合作》的文件

(1950年3月25日)

各级党委及全体共产党员同志们！

我们在这里特地重新发表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两段文章，作为当前全体党员学习的一种材料。这两段文字是说明共产党员为什么应当与非党员亲密团结，和怎样与非党员达到亲密团结的。我们的党，在与非党员亲密团结这一工作上，是有很大成绩的，没有绝大多数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指示，团结着千百万非党员在一道工作，要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应该指出，在各地党的组织里，有一部分党员，特别是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党员，仍然犯着向党外群众摆党员架子，摆革命老资格，

• 据《光明日报》1950年3月26日第一版。

不愿或不善于和党外群众与民主人士合作的关门主义的毛病，并因此而使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害。现在我们把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两段文章重行发表，目的就是要全党同志特别是犯有关门主义毛病的同志，认真地加以学习，并据以进行检讨，以便克服我们党员和党外群众团结合作中的缺点，并把这一合作加强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谈话

(1950年4月12日)

中苏新约之签订对于中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和平民主事业有极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周恩来外长和苏联的维辛斯基外长在签字式上已说得很明白。

周外长说：“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对于东方与世界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将不可免的形成重大的影响和结果。”

维辛斯基外长说：“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表现出了我们两国人民对于我们两个国家的永久的友好与合作，以及对于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所抱的愿望……对于巩固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的事业是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这两段话的真实性，在条约签订迄今的两个月内，从中苏两国和全世界酷爱和平的人民对于中苏条约一致拥护的舆论中，完全证明了。甚至帝国主义者抱着诽谤诬蔑的目的而发言时他们也不能不先承认中苏新约是平等的条约。这更是有力的旁证。

• 原载《人民日报》1950年4月14日第一版。

中苏新约既是中苏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致公认的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能巩固全世界和平的条约。这个条约及其附带的协定换文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批准，相信大家必将一致的引为荣幸，同时且必将获得全世界和平爱好者的拥护。

最后我还想申说一点，就是：中苏新约之所以能够签订，主因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英勇战斗，在中国大陆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的革命推进到当前的阶段，苏联无论如何同情中国的革命，对签订这样的新约，也还是要延缓的。所以我们在订立了这新约之后，应当一面感谢苏联对我们的深挚友好，同时也更应发奋自励，加紧努力为消灭残匪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在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只有我们表现出来更伟大的成就时，苏联的友好协助才能更有效！更进一步！

致 郑 兴 亚

(1950年4月20日)

兴亚〔1〕世讲：

来书已悉。你对新政局，既有相当体认，应知现在任何人，均养不起私人。任何机关，均不能随便荐人。青年的出路，首须建立劳动观点，力求向工农看齐，并为工农服务。如怕思想一时搞不通，则迅速参加革命大学一类的学校，从事锻炼，即是最好方法。开诚相告。即问

近好！

张 澜

四月二十日

注 释：

〔1〕郑兴亚 南充人，曾是曾张澜的学生。

• 据手稿。

致胡子昂·

(1950年4月20日)

予昂〔1〕先生：

你的三月十八日来书，早经收阅。你对川局诸所论列，均能见其大。所谓争取前进的，改造落后的，打击反动的，尤中肯綮。经持付恩来总理一阅，同以为慰。川事多艰，所望邀集同志，多多致力。历史新页，今方开端，难在认识清楚，尤难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愿益加励，为吾川光。专此布意，即致
敬礼！

张 澜

四月廿日

注 释：

〔1〕胡子昂（1897—1991） 四川重庆人。1923年北京农业大学经济系毕业。1935年担任重庆华西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1939年任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建国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 据手稿。

给川康朋友们的 一封公开信

(1950年5月18日)

亲爱的朋友们、同胞们！

光阴真快，我同你们握别已经五年了。在这艰苦的岁月中，我是一刻也没有忘记你们的。川康解放后，先后接到你们来信二百多封，有询问国际情势，有希望明瞭国内情况的，有陈述地方疾苦，希望解脱的，有关切我个人健康的。情意恳挚，责望尤殷，兹谨就愚所及，略陈梗概，藉伸积愫，尚乞鉴教。

一、关于国际情势

世界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就分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和平两大阵营。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德、意法西斯蒂帝国主义阵营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英、美的民主和平阵线所战败。这说明反动的帝国主义无论怎样强大，终归要为正义的、真正为人类谋幸福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所打败。

• 据手稿

不幸的是法西斯蒂的魔鬼，在战后又附在美、英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的身上而借尸还魂了。他们现在正积极地阴谋破坏世界和平，企图奴役全世界人民，所以尽力援助反动统治。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西欧军事联盟、东南亚经济会议、军事经济援助蒋介石匪帮等等。这一系列的庞大侵略策划，正是法西斯蒂复活的表现。而这些策划，却没有一样不是为谋华尔街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牺牲无量数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这无疑义是必然得不到人民大众的拥护，而终要归于失败。不信，请看美国今年的生产额不是比去年萎缩得多吗？经济危机、失业人数、不是日益加甚和加多吗？反之，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和平阵营，无论是苏联也好，中欧、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也好，亚洲的中国、北朝鲜、越南也好，战后的生产无不超过战前水准，或正在治好战争的创伤。总之、是日益走向富强康乐的途上。两相比较，是哪一个有前途呢？不待说，是后者有前途。

更重要的是，国际间民主和平的阵营日益壮大起来。假使美英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敢于不顾人心向背，而发动世界第三次大战，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必定像日、德、意法西斯蒂各国一样，自掘坟墓，自寻毁灭，赢得失败的结局。因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连美、英帝国主义的人民在内，已是日益壮大起来，这是无可战胜的力量呵！

美、英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发动世界大战都要失败，仰赖美帝鼻息为生的蒋介石匪帮，还能以残余武力苟延幸存于台湾吗？海南岛、舟山群岛已经解放，人民解放军已有渡海登陆的经验，台湾不久也会解放的。那些幻想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可以挽救蒋介石于灭亡的人们，可以觉醒了。同胞们！不要再为蒋介石匪帮欺

骗宣传所蒙蔽，无论如何，美帝是无法保障蒋介石残余匪帮的继续生存的。

二、关于国内情况

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渡江进军以来，时间仅仅八个月，即将蒋介石匪帮几百万大军完全消灭。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完全解放。这样的胜利进军，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这种胜利，对外取消了帝国主义百多年来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我们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国家；对内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逐步地可以走上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房子住，有工作干，而且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提高，文化水准一天比一天向上的境地。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美好的前途，能够身逢这样历史上的伟大变革，可以说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同广大人民一致努力奋斗而来。我们愿向他们致最崇高的敬礼和深挚的感谢！

不仅仅军事上的胜利，就是政治上、经济上也是胜利的。我们试看，中央人民政府从去年十月一日成立至今，为时不过八个月，就替人民办了不少的好事就可知道。例如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的接近平衡，金融物价的已趋稳定，灾荒的救济，生产建设的逐步发展，哪一样是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府能够办到的？尤其重要的是，世界和平堡垒的苏联已经与我们缔约成为同盟国。它不但同我们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要尽力维持世界持久和平，还能切切实实地，兄弟一样友爱地协助我们从事一切

生产建设，医治我们十二年的战争创伤，提高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保证我们能够实现新民主主义，达到富强康乐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不是人民政府怎能办到？这是值得我们大家高兴的。

亲爱的朋友们、同胞们！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样全心全力、诚心诚意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我们人民服务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来替我们解决困难，谋求幸福，可以说是从来所没有见过的。古人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了这样的人还有办不好的事吗？我们国家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一定是幸福的。但是，这不是等于说没有丝毫困难。困难是有的，而且会时时都要过着的，不过任何困难相信我们是一定能够克服的。毛主席说得好：“我们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因为我们的困难是进步中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同时，我们还有马列主义的武器，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英勇无比、耐劳吃苦的广大工农群众作基础，有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且我们有能够计划出合理办法的政府机构。亲爱的朋友们、同胞们！大家共同一致，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吧！我们是有希望的，而且希望很大。

三、关于陈述地方疾苦

你们来信所陈述的疾苦，大概不外由：（一）征收公粮，（二）劝募公债，（三）土匪横行，这几件事所发生的吧？这些事可由两方面来解决，首先是应该自我检讨，其次才检讨政府工

作干部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对于这些事先自己认识清楚。

政府该不该征收公粮、劝募公债咧？

要明白政府该不该征收公粮、劝募公债，应该先要明了政府为什么要征收公粮、劝募公债。

政府要征收公粮、劝募公债，是因为政府要替人民办事。如果不征粮，不募债，拿什么来用呢？我们既要政府工作人员替我们办很多的事，对于他们的最低生活费用和所办的事必需的费用，我们当然应该负责。如果要他们替我们办事，又不养活他们，并且不给他们生产事业必需的费用，这样无米为炊，巧妇也难办到，这合理吗？我想大家一定也认为是不合理的。既是应该养活他们，并且要给他们必需的事业费用，那末除了征收公粮、劝募公债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说，政府征收公粮、劝募公债，在当前实在是不得已的，是必须的，是应该的，是合理的。

既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总觉得不应该呢？

这是由于有一些人遭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二十二年长期反动统治的压榨剥削已经到了精疲力竭几乎换不过气来的时候，满以为一经解放就可以过那休养生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毫无负担的惬意生活。那知解放以后，人民政府还是要征收公粮，并且要劝募公债，就觉得人民政府依然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样，

“天下老鸦一般黑”，没有分别。因而原来热烈拥护的心情马上变为失望，从前希望有好大，现在失望也有好大。这是由于原来的希望提得太高，不切实际的关系；加以某些人本身经济能力也确是虚有其表，真正困难，又遇着某些工作干部的某些偏差和错误的作风，遂由失望进一步变而为怨望。有了这一客观怨望的存

在，再经匪特、地下潜藏反动份子的欺骗、歪曲宣传，或威胁利诱，强迫服从，于是有集体从事反抗者，有武装啸聚起来争城夺地者，有袖手旁观、无言抗议者，总之，表示反对，不合作。这一反对，不合作，对吗？我敢说是错误的。

为什么错误呢？是由于认识不清国民党向人民征粮派债，人民政府也向人民征粮派债，从表面上看仿佛是一样没有分别。其实内容是大不相同的。国民党征粮派债是为塞饱四大家族的私囊，是牺牲多数人以利少数人，是愈压榨愈痛苦愈没有前途；而人民政府征粮募债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牺牲少数人以利多数人，是有光明幸福的前途的。这在实质上是同国民党的征粮派债迥然不同，这是我们应该首先认识清楚的。请看政府的工作干部，尤其是共产党党员在政府中工作的，今年仍然实行供给制，很多连父母都供养不起，仍然在忍苦耐劳地为人民工作。共产党所以有此决定，是怕改为薪给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样自己刻苦的作风与国民党统治时代那些“黄马褂”相较，这该是迥然不同嘛！

只要我们认识清楚这点以后，我相信，我们大家会老老实实地就各人能力所及，尽量缴纳公粮，认购公债。政府有了办事的经费、生产建设的款项，政府是可以代替我们解决许多困难，谋求许多幸福的。我们的粮和公债决不会是白出的。现在国家收支的接近平衡，钞票的停印，金融物价的稳定，这都是于我们全体人民有利的。这是国民党二十二年统治期中没有办到过的，国民党政府不能办到，而人民政府能够办到，正是由征粮募债换得来的。假使不征粮，不募债，那就只有像国民党那样膨胀通货，滥发钞票，来维持过活。滥发钞票的结果，是使每一个人都陷于穷

困，这是我们大家身受过来的。我们愿意政府滥发钞票吗？不待说，是不愿意的，既不愿意滥发钞票，当然只有征粮征税和劝募公债了。况且，今天征粮募债只是有田有钱的人才负担，才稍微感觉不惯和不便，没有田没有钱的人就不负担，这不是合理得多吗？凡是合理而有利于人民的事，我们就该诚心诚意地去做。征粮募债既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就应该毫无保留地，就吾人能力所及地去缴粮认债。我们能够这样认清问题，不但不感觉丝毫苦闷和痛楚，而且觉得轻松愉快。

还有些人认为，在一九五〇年春季就征收一九五〇年的公粮，是还没有到秋收就预先征粮，这叫预征。预征是没有收获到手就要先垫付出来，当然要比已经收到了才交付出来困难些。如果是征收一九四九年的粮（成都军管会初先的命令是征收一九五〇年公粮，随后才改为征收一九四九年的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早已征收去了，尽管不一定各县都已完全征完。总之田里一年只生产一次，怎么能够一年上两次粮呢？要征只能追收尾欠，不能重征。预征、重征都是军阀割据时代军阀们干的，解放军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为什么也和军阀一样要预征、重征呢？

站在地主富农个人的利害立场来看这问题，在平常时期是有理由的。但是站在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立场来说，当此非常时期，就不是这样的。政府所以要在一九五〇年春季征收一九四九年的公粮，是因为川康解放后，起义投降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七十万，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的公教人员有三四十万，加上解放军几十万，总计不下二百万人之多。这么多人，如果不拿饭给他们吃，不把他们供养起来，完全由他们各自去想法谋生，试问将要紊乱成什么光景？恐怕叫苦的人比今天还要多，遭受的损失要

比今天还要大。人民政府为减轻多数人的损害，为稳定地方安宁秩序，不能不立刻征集大量公粮，以供日食必需和生产建设的费用。假使国民党征收过了就不再征，试问这二百万人拿什么来过活呢？又拿什么来作生产建设的费用呢？假使秋收以后才能征，试问这两百万人能够束紧肚皮等到秋收再吃吗？政府能够白白地把这大半年光阴虚掷过去而一件事都不做吗？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要政府实事求是地替我们办事，能够这样不负责任地只说风凉话，而不替他解决实际问题吗？两百万人要饭吃，生产建设要费用，不征粮怎么办？不征粮只有发钞票，滥发钞票的害处是每一个人都身受过来的。我们还是赞成只是有田有地的少数发财人来负担公粮，觉得较为合理咧？还是我们赞成滥发钞票，使每一个人无论贫富都受害为合理咧？我想大家只要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观点，而是站在福利大家的立场，我相信一定是赞成征粮，而不赞成滥发钞票。既是赞成征粮，认为征粮是目前政府替人民办事所必需，也就是为我们自己克服困难，谋求幸福所必要，那末，我们大家就该衷心地提倡、拥护，带头来踊跃缴纳公粮，决不应该站在那里袖手旁观，甚至表示反对。

至于征收公粮、劝募公债过程中所发生的某些偏向和错误，那是很难免的。因为胜利很快，有经验的干部不够，同时地方具体情形也不很熟悉，但是这种偏向和错误是很容易纠正，而且政府方面也在力求纠正，尤其我们的领导党中央和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一贯是“知过必改”，力求与人民大家密切联系的。只要大家的意见是有利于人民的，有利于国家的，政府是没有不虚心接受，马上采行的。二月二十八日政务院关于征收公粮的指示，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团结非党群众的指示，四月十九日中共

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哪一点不是想把人民的事办得非常之好的证明。政府的领袖既是这样的虚怀若谷，谦虚真诚，亲爱的朋友们、同胞们！你们有好的意见尽管尽情尽理地毫无保留地向各级人民政府或中央人民政府领袖提出吧，抑或在人民代表会议时提出具体意见，请求改正亦可。总之，万不要因不满于少数干部执行时作风的偏向和错误，遂连征粮募债也一齐根本反对，或作壁上观而不竭力协助。须知办事手续可以协商，变更征粮募债万不可以根本反对。这点希望大家要切实地把握着，万勿稍微有点偏激为要。

我们只要把征粮募债的认识弄正确了，一切问题便容易解决，所以我们特别提出这点来同大家商讨。亲爱的朋友们、同胞们！你们以为怎样？

土匪横行，扰乱治安，不待说这是大家所不愿见的。我们要怎样去消灭它咧？要消灭它，首先要明了它是怎样产生的？产生的原因有好几种：一种是国民党匪帮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的。伪中央军校所办几期游干班，几乎把每一个县的袍哥、匪首、土豪、恶霸都召集去，予以反苏反共的训练，最后还发给了他们以美式武器。一种是各县的乡镇保、甲长，平日与贪官污吏互相勾结，欺压良民，把经手征收的粮谷任意盗卖，以供挥霍。现在人民政府认真清算，要他们颗粒归公，他们无法缴还，只有铤而走险，希图幸存。一种是无知落后群众，受了妖魔邪道、灵符、咒水的麻醉宣传，认为刀枪水火不能进身，而去杀人、放火、抢人为生的。一种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豪绅地主的压榨剥削，无以为生，迫不得已而去打家劫舍的。无论哪种土匪，都应当设法警告他们，使他们知道当土匪无论如何是

没有出路的。蒋介石几百万美械装备的大军都要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何况区区几千万土匪能够做什么呢？台湾不久就会解放，蒋介石很快就要走投无路。他们替蒋介石当工具，扰乱自己家乡，杀害自己同胞，有什么结果，有什么代价，有什么出路？执迷不悟，终归白白送掉自己宝贵的生命。已当土匪的，还想当土匪的，都赶快觉悟回头，缴械投降，各人回家。做庄稼的做庄稼，做手艺的做手艺，劳动可以创造世界，每个人都从事农业、工业的生产，就可以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准。只要把这短短的艰苦的年月，节衣缩食地、忍苦耐劳地度过去了，我们大家的生活一定会改善的，幸福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不信请看看东北吧，东北在一九四七年，销售的布匹是八十万匹，一九四八年是一百二十万匹，一九五〇年预计可以达到九百万匹，一九五〇年第一季度已经销售了二百五十万匹，这就是说明东北在土地改革后，生产增加，生活改善，购买力大大提高，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大为扩大，尤其说明东北人民生活的改善系由人民政府领导而来。我们应该相信人民政府，服从人民政府，在他领导之下，老老实实地劳动生产，我们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会提高的。这点道理，只要我们随时随地尽量地、不断地向大家宣传教育，身体力行，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我相信所有土匪都可以无形消灭的。同时还要向政府建议，起用地方开明人士，迅速建立人民自卫武力，革命的社会秩序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四、关于我个人健康

我已蠢长了七十九年了，虽是饮食起居一如往昔，究竟精力

差了。本想退休山林，藉保余年，怎奈生性憨直，初则不满于蒋介石之自私自利，帝制自为；同时不忍见我四万万同胞之受苦受难，思有以拯救之。解放后，小病时发，尝想乞假休养，又以目睹中共领导党人无一不以人民疾苦为念，而忘却个人安乐，日以继夜，为人民服务之精神所感召，不能不勉以衰老之身竭其诚悃，尽其绵力，以服务于人民。

辱承垂询，谨以奉闻。亲爱的朋友们、同胞们！尚望不遗在远，时时予我以指导，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我当全力以赴之，藉答你们的雅望。翘首云天无任缱绻。敬祝你们健康。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 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1950年6月17日)

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同志：

在这几天的会议中，我们听到了中央人民政府许多位负责同志的工作报告。从这些报告中，我们知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这短短的八个月中，我们的国家确确实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人民政府的工作，表现了具体的成绩。今天人民解放战争，在大陆上已经基本结束了。今天中国，在财政经济上已经有了统一管理统一领导的制度。我们制止了通货膨胀，我们稳定了物价。我们做了救济灾民和失业工人工作。我们与苏联、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今天我们已可拿具体事实证明给全世界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站住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稳固了！这是中国全国人民最欢迎的并且最拥护的一种成绩。今天我们有这样良好的成绩，我相信到会各委员，和中国的全体人民，都有一个同样的感想，那就是我们应该感谢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原载《人民日报》1950年6月20日，第二版。

在这次会议中，听完了各项报告以后，我们还要讨论政府今后的工作计划。在这方面，毛主席在开会词中已经指示了我们，“土地改革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关于这个议题，领导的共产党已经提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刘少奇副主席已经向大会做过了一次《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我今天愿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对这个问题贡献一点简单的意见。

毫无疑义，土地改革，是今天中国人民完成革命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亦是中国人民起手建设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新国家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我们革命目的之一，是消灭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国过去的土地制度，是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地主阶级，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的统治历史。这等于说，这个地主阶级，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的罪恶，这个制度的存在，真是中国一切封建思想和一切封建制度的基础。打倒地主阶级，废除地主阶级，消灭地主阶级，掘了地主阶级的根，这才真是中国人民彻底的革命。铲除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根基，才奠定了中国人民真自由、真平等、真民主的永远的基础。

对这次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土地改革法草案，我们认定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应事先特别唤起中国人民注意的。第一、这个草案一方面要坚决的彻底的废除地主阶级，同时却保留了地主个人从劳动中改造自己，使地主个人有一个做新人的机会。根据这个草案，将来实行土地改革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多余的粮食，并不没收地主的其他财产。政府并且仍分给地主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这说明这个新草案与以往的土地法大纲比较起来，实在有了宽大的精神。

第二、这个草案明确规定“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这完全是土地改革上的一个重要决定。这次土改时，政府一定要切实执行这个决定。对这点毛主席指示得十分清楚。中国今天的革命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天中国的环境，已经和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环境不同了。今天是战争渐次结束的时期。今天是争取国家财经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时期。新环境中要有这个新的决定来解决问题。正如毛主席所指示，今天实行保存富农的经济的政策，可以早日恢复农村经济，可以增加农村生产，可以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也可以利于孤立地主，中立富农，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

我今天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完全拥护这个土地改革草案。我们不只要使它成为人民政府土地改革的正式法案，并且要号召全体盟员和全国人民来拥护这个新的法案，使它能够圆满的完成中国土地革命的任务。

最后，今天我还向全国人民，向新解放区的人民，特别向西南区的人民说几句话。近来在新解放区，特别在解放较晚的西南区，常常听到“人民负担过重无法生存”的叫喊。在我看来，这种叫喊的来源，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蒋匪帮残余挑拨离间的阴谋。其次，这种叫喊是大部分来自地主阶级。对这种反动恶意的叫喊，应该加以警惕，并且不要轻于置信。

同时，我还要指出在这个革命时期中，一般人民暂时负担稍重，亦是事实。人民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政府，也就是向人民负责的政府。今天毛主席正在领导政府努力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希望能够渐次做到减轻人民的负担。举个实例来说，今年夏征总额不超过夏征正产物的百分之十三，这比较去年秋征税率已

减少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这一个例子，就说明今天的政府，是正在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的负责政府。

不过我们相信人民也一定了解，今天人民政府负有许多重大的责任。台湾、西藏必须解放。几百万公家人员必须供给。经济上重点恢复的工作必须进行。对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必须警惕，并巩固我们的国防。人民政府既负了这样重大的责任，当然就要暂时的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我们毛主席指示得明白，要中国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还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这半年来人民政府在财经方面具体成绩的表现，我们相信伟大的毛主席，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克服革命胜利中的财经方面暂时的困难，走向光明灿烂富强康乐的前途。

在北京各界庆祝 “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 台湾朝鲜示威大会上 的演词

(1950年8月1日)

主席、各位同胞：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二十三周年的纪念日。有了人民解放军，中国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了人民解放军，中国才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这种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有了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今天才有这个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光荣的事迹，写成了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年来光荣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光荣的八一纪念日，我谨代表民主同盟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致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庆贺。

今天中国人民可以大胆的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有了真实

• 原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2日第二版。

的人民革命武力了。这个坚强伟大的人民革命武力，是真正由中国人民组成的，是完全属于中国全体人民的，是永远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这个人民革命的武力，在二十三年的斗争历史中，是经过了火与血的考验和锻炼的。这个从人民中间成长起来的队伍，这支从三万人发展到了五百万人的人民革命队伍，他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他绝对有力量保护这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这个坚强伟大的人民革命武力，永远是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保卫者，也即是保卫远东和平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民解放军已经过了二十三年的战争，终于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建立了中国的和平。我们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愿意在和平中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但如果战争贩子们，敢于侵犯我们的和平，我们中国人民坚决与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为保卫中国和平而战斗。

在今天这个八一节，我们要特别唤醒美帝国主义注意，从一九四五年起，美国政府是全力支持着中国的反动力量，破坏中国的革命，阻碍中国的进步。五年以来，曾经供给蒋匪帮六十亿以上的美元，大量的飞机、炸弹、坦克、枪炮、无数的军事参谋和间谍，他们帮助蒋匪帮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来屠杀中国的老百姓，如今蒋匪帮已经被中国人民的力量打垮了，美国政府使中国殖民地化的阴谋，是彻底失败了。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今天不知改悔，反而野心勃发，竟于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调动第七舰队，用美国的武力，直接来阻挠我们解放台湾。用美国的武力，直接来干涉我们中国的内政。杜鲁门撕毁了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联合国的宪章。他并且翻悔了他自己在今年一月五日关于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声明。杜鲁门这种破坏法

律，违背信义的侵略行为，是存心向我中国人民挑衅，所以今天我要严重的警告美国总统杜鲁门，他应担负这种侵略行为的一切责任。中国人民是不受威吓，不怕强权的，今天中国坚强伟大的人民武装队伍，绝对有了保卫祖国的信心与力量。

我们坚强伟大的人民革命武力，是从残酷的战争烈火中锻炼出来的。他们一贯为着保卫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而战斗。他们一贯为着保卫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他们随时准备着痛击冒险侵略者，以保卫我们的祖国，以保障世界的和平。

这是我今天贡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诚恳祝词，这就是我今天给予美帝国主义的严重警告。

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 代表会议开幕典礼上 的讲词

(1950年9月25日)

亲爱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同志们、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同志们：

本人今天参加这个代表会议开幕典礼，和你们热烈的见面，实在感觉无上的光荣、无限的兴奋。

各位代表，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使中国人民从蒋介石匪帮统治下获得解放，使中国由战争创伤中得以迅速医治恢复，早日开始建设事业。在您们的身上，是象征着从军事战线上、从生产战线上取得光辉胜利的一面旗帜；在你们的身上，永远是标志着胜利和光辉。您们所以有了这种胜利和光辉，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是和新中国的建立、新时代的到来分不开的。回想过去在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劳动人民是只有做牛马的痛苦，是

• 原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6日第二版

不让我们成为英雄、成为模范的，哪里还有像今天这样的光荣。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一切人们，都可在为革命为群众的事业中，尽量发挥自己的天才知识和创造性，获得伟大的成就，使自己成为英雄，成为模范，被人民敬佩，被人民表扬。

在今天举行的这个盛大的空前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里，固然是来表扬军事战线上和生产战线上的英雄和模范，并且是要“为了鼓励前线部队彻底歼灭残余匪帮，和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开展生产运动；为了鼓励全国工人发扬新的劳动态度，克服困难，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了鼓励全国农民实行生产互助，改进技术，深耕细作，增加农业生产，扩大耕地面积”；来交换和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今后把巩固国防事业和发展经济事业更提高一步。各位代表同志们来出席这个会议，真正是全国各地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胜利大会师，是显示了新中国人民的力量，具有无比的英勇的战斗精神和伟大辛勤的劳动态度。真正是新中国开国功臣、建国功臣的大会合。

我谨以无限的兴奋心情，向你们高呼：

劳动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国庆题词

(1950年10月1日)

新中国人民，正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旗帜下，热烈展开新经济建设和新文化建设的高潮。加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反对美帝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 原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第一版。

庆祝国庆

(1950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今天全国人民必定用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这个伟大的国庆。因为人民自己的政权已经巩固了，人民自己的国家已经生长起来了！

一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在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紧密团结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之下，政府的工作，的确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首先，就军事方面说：这一年中，我们顺利地解放了华南、西南、西北和海南岛。除了台湾、西藏正在积极准备予以解放外，大陆上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在这一年中，各地的残余土匪、特务武装，也已次第基本肃清。因此全国的社会秩序也迅速地安定了。

其次，就政治方面说：我们已经努力推进了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若干地区的人民代表会议，已开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有些地区且已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选举自己的政府。广大人民都已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体验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管理国事的权

* 原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第二版。

利。同时，政府且切实执行了共同纲领上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都能享受真正平等参加政权的权利。政府且已组成了西南和西北访问团，进行对各民族的团结工作，使全国各民族真正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此外，政府又公布了工会法、婚姻法，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等等。树立了法治国家的初基，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其次，就财经方面说：在短短一年中，我们已经建立起财经的统一管理制度，得到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政府已经减轻了工商业税和农业税，从事调整工商业及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政府已经认真地解决了救灾问题，并且正在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救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为了铲除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根基，打下人民民主制度的物质基础，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在今年六月正式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并决定从今冬起，在二三年内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再其次，就外交方面来说：一年以来，我们已与伟大的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的邦交，分别签订了贸易协定，商讨了文化交流工作，与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这个新国家在国际上已经确立了中国空前未有的平等自由的地位。整个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已因新中国的诞生而益加壮大巩固。在争取人民民主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新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一员。

这些成绩是值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的。不过我们不应满足于这些成绩，我们更应团结努力，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与进步。

在国庆的今天，我愿特别唤醒全国人民，我们“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未全部完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对中国的独立自主是要来捣乱的；对世界的民主和平是要加以破坏的。美帝国主义已经用武力来干涉我们解放台湾，并且数度用飞机侵入我们的领空，进行挑衅的行为。美帝在朝鲜发动了血腥的侵略战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我们在国防上的责任和保卫世界和平的责任是十分艰巨的。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严重的，横梗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是很多的。我们丝毫也不能因为有了过去一年来的成绩而过分乐观自满，相反地，为了解放全部国土，为了巩固中国的国防，为了制止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加倍努力，向我们前途的困难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中国民主同盟，自建立以来，就始终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作艰苦的斗争。这一年来我们在组织机构和盟员数量上，都有了相当的改进与发展。现在，我们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在政府中我们负担了一部分责任。今后，我全体盟员自愿以更坚强的信心，更整齐的步伐，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一道，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奋斗。

在中国民主同盟 一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 的讲话

(1950年11月21日)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在新中国建立刚满一周年的今天，在全国人民热烈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时候，本盟举行第六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意义显然非常重大。

一年以来，本盟在新中国的革命建设奋斗中，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对于共同纲领的实施，对于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曾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的盟务，在这一年来的革命建设进程中，也迅速地走上了健全发展之路。我们已把各地组织，有步骤的有计划的整理恢复、建立和发展起来，由一年前的三十二个组织单位，增加到七十七个组织单位，分布在全国各大地区各大城市及海外各地。我们的新旧盟员，经过一年来的组织教育，对于革命工作也都有了基本的认识并且都相当的努力，希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9—1988年）。

望能够把自己再提高一步，更多的为人民服务。本盟在过去一年中能获得这些成就，当然是全盟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我们的热诚帮助和指导，和其他民主党派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诚挚的愿意跟我们团结、合作。

目前由于美帝国主义者疯狂的发动了侵朝战争，袭用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后侵略中国的故技，我们的国防安全已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的和平建设已受到严重的危害。我们从血的教训中，认定“救邻即是自救”，所以在本年11月4日曾和各民主党派发表庄严的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的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这一新的局势给了我们以新的战斗任务。我们的六中全会，就是针对着当前的战斗任务来举行的。我们在这一次会议中应该讨论的中心问题为以下两点：

(一) 我们民盟，既是签名于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一个党派，在全国人民热烈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我们更有责任来坚持、贯彻和扩大这个神圣运动，以打击美帝的侵朝行动。是以我们今后应如何运用民盟的组织力量，号召广大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工商业者和海内外的民主人士，彻底的认识这个神圣运动的真实意义，拿出一切的力量，积极的参加行动，争取这个神圣斗争的胜利，应是这次会议所要展开讨论的第一个中心问题。

(二) 我们民盟，要在这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能够对充实后方支援前线多尽些力量，多起些作用，首先本身应加强团结，发展组织。本盟这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团结虽有进步，组织虽有发展，但是还都作的不够，必须在现在的基础上更加团结，要求发展，才可完成历史上的艰巨任务。我们民盟是以

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联盟，要想吸收广大的知识分子到盟内来，必须纠正关门主义的倾向，并防止无原则的开门倾向，有计划有重点的结合各种工作各种运动，争取文教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参加民盟。然后通过他们，团结和教育广大的中间阶层，以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来和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作持久斗争。是以我们今后如何完成这一工作，应是这会议所要讨论的第二个中心问题。

对于这两个中心问题，希望各位同志多提意见，多加讨论，并分别定出具体方案，带到各地方去实施。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我们才能够担负起目前的局势所给予我们的新的战斗任务。

同志们！为了巩固和发展新中国的人民胜利，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奋斗。

致邵慈云

(1951年2月22日)

慈云^[1]贤侄女礼鉴：

接读来函已多日，只因对于亡友的伤感，对于你们种种善后和出路，每一念及，怅触万端，不欲以寻常唁慰之辞相关问，遂稽裁答。吾常对人言，吾川绅耆中，最有风度，最富正义感，当惟汝父为第一。今果以抗颜力争，从而致疾，竟以身殉。吾想“和平老人”一名词，将与人民共和国之开国史，同垂不朽，这是值得我们引为荣誉的。吾侄于如何踵事述志、具有很大愿望，但于字里行间流露着不少的彷徨与疑虑，似犹未建立中心思想，未审努力方向。须知人民世纪，做人第一要务，便是人民民主主义的学习。中共能够打倒反动派，唯一武器就在此。今后每一个人民，真能自力更生，真能把祖国搞好，亦在此。老解放区的学习气氛，几已弥漫任何机关，任何角落，无职业者要学习，有职业者更要学习，青年要学习，老年亦要学习，吾在此亦系取学习态度。茂、淑二女，自入此间革命大学学习后，布衣短服，吃苦耐劳，已完全变成了一个人。茂女刻已由革命大学调至劳动部服务，并未经过任何人推荐。中共系讲组织不讲说情的。经过学习阶

• 据手稿。

段，自然有事做，未经学习阶段，虽有大力推荐，亦等于零。新社会一切作风，与旧社会完全两样，推想嗣此的新旧斗争将从各种各样的社会至于每个人的内心，斗争愈剧烈，愈有进步，而所以领导这种斗争，协调这种斗争者，全仗学习。学习有如黑暗中的光，我们想把室中黑暗赶走，只有将光线放进去。愿吾侄深深理解并把握这一点，则一切彷徨与忧虑自会消失。成都如有类于革命大学的新机构，可速报名参加。否则将家事稍稍摒当，即速来京，我当在此设法保送。这是青年唯一的出路，也是整个国家唯一的生机。以你的聪明，加以学习，将来成就，决不逊于茂、淑二妹。勉之勉之，吾言不尽。

即问

近好

张 澜

二月二十二日

注 释：

①邵慈云 邵从恩之三女。

在中央人民政府 祝寿会上的谢词

(1951年3月31日)

刘副主席，诸位同志：

今天诸位聚集在这里来为我祝寿，这真叫我高兴得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示感谢。

中国以往有句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在中国这个国家里，长寿虽然是件很难而可贵的事，但一个人的价值，亦不是以寿的长短来计算。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中国估计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这才算得是有价值的人生。在这方面，我今天虽然八十岁了，我却很惭愧。我没有成绩可言，要和在座诸位比较起来，我更惭愧，我年龄比诸位都大，成绩比诸位都小。不过，我今天心里有件最高兴最快乐的事，我也要和诸位说说我今天的确很快乐，我能活到八十岁。因为，我活到了八十岁，我才看到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成功。我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看到了全中国劳动人民的大翻身。尤其是中国被帝国主义者压迫有一百一十年了，在这段国家被压迫的历史中我就活了七十余年，我真是幸运，我

* 据手稿。 1951年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由刘少奇主持宴会为张澜祝寿。张澜作此热情的讲话，以示谢意。

活到了八十。我亲眼看见中国人民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驱逐出去了。我亲眼看见中国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国。我还看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伟大神圣的反侵略运动，我相信我还要看到世界帝国主义的总崩溃。

就我一生所看到的来说，今天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国家的进步的确是很快的。不过国家进步愈快，老年的人愈赶不上，愈感落伍，听周总理说过，中国进步很快，这些年来都是青年人教育老年人，这是事实。今天我愈是年老，愈感觉什么都不够，什么都要学习，都要向毛主席学习，向今天在座诸位学习，向一班年轻的人学习。我今天八十岁了，我还有一个要好好学习的决心。十八岁的青年朋友应该说学到老，我这个八十岁的老人今天是老要学。

我今天真高兴，因为我活到了八十岁，居然看到了我们的国家改革进步，有这样光明灿烂的前途。我要借诸位为我祝寿的日子，举杯为诸位祝贺。

祝刘副主席和在座诸位的健康，共享高龄！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劳动人民的健康，同登寿域！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致沈自强

(1951年6月30日)

自强〔1〕同志：

收到八月二十六日的来信，知道你有志于参加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我很高兴。作为一个革命志士，应该及早把自己交给党的组织，才能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为此，希望你按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入党。

关于你在解放前的一切情况，你可向了解你的人请求证明，这将对你的要求更有帮助。

此致

敬礼

张 澜

注 释：

〔1〕沈自强 解放前曾任张澜秘书。

——
• 据手稿。

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三十周年纪念*

(1951年7月1日)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以最兴奋最愉快的热情来迎接中国历史上这个最伟大的纪念日。我今天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谨向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谨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伟大的政党，致以热烈的庆贺和崇高的敬意。

封建制度统治了中国四千余年。帝国主义者压迫了中国一百余年。世界上历史最长，人口最多，土地最广的伟大中国竟沦落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最近这百余年来的历史上，爱国的中国人民摸索过各种救国的道路，考验不少的革命事业的领导者，毕竟国家没有抬头，人民没有翻身。

今天不同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被中国人民推翻了。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中国人民驱逐出去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统一团结的新国家，今天的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光荣、幸福的新国家。

* 原载《人民日报》1951年7月1日第七版

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胜利和成就是怎样得来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长期流血流汗的斗争所得到的伟大胜利和光荣的成绩。

现在事实证明了毛泽东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可信赖的领导者，毛泽东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是中国人民解放自己建设国家最正确的道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主席旗帜下的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目前中国的革命还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还只是万里长征走了一步。中国人民还要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稳步地和有计划地进入到社会主义。今天中国有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有了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并且有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坚强的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必定能扫除一切障碍，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地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在全世界人类解放运动所发生的影响，必定如苏联十月革命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上所发生的影响一样。毛泽东主席曾经预言过：“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侵略台湾侵略朝鲜的战争，又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科学预见。

今天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必然死亡与社会主义必然兴盛的时代。今天的世界上有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先进国家苏联，有了许多新民主主义的新兴国家。今天的中国又有了伟大的毛泽东主席，有了伟大的共产党正确领导下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我们必定能够粉碎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

中国人民必定能够胜利地担任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任务！

最后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的地位，还要说几句话。中国民主同盟今天只有十年的历史。在这十年的革命运动中，倘使我们没有得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我们也决不能保证我们不走上错路，保证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

在举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的今天，让我再说一次：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的正确！祝贺我们中国人民伟大而光荣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万岁！

国庆日致词

(1951年10月1日)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两周年纪念日。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大喜事。当两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曾说过我们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经过这两年来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话是英明的正确的。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自由参与政治。我们中国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享受到这样高的国际荣誉。不管帝国主义者、蒋介石匪帮怎样用一切办法来增加我们建设的困难，用一切无耻的语言来诽谤我们的成功，但他们的阴谋是徒然的，我们必定继续前进，我们必定获得更伟大更光荣的胜利。

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曾留下了给我们不少的困难，但就这短短的两年的时间中，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逐步的克服了困难，在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政治上，我们巩固了人民民主的建政工作，在全国各县，普遍的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基本上肃清了土匪，镇压了特务、匪首、恶霸等反革命分子；和平解决了西藏问题，大大的巩固了西南各民族的团结和友谊。尤其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正在各地继续彻底进行，预计到了明年，除少数民族地区外，我们就将在全国

• 原载《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日第二版。

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和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将是全中国人民划时代的胜利。再就是由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爱国主义的教育已正在深入到全国广大的群众当中。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已大大的提高了。

至于在经济方面，我们同样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制止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多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加强了国营企业在生产上的领导地位，促进了城乡物质的交流。由于土地改革的成功，国家实行了扶助农业的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量也大大的增加了。而在工厂里，一般的生产率也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水平。至于修建铁路，兴建农田水利的事业，国家的投资更是超出国民党统治的任何时期。今年治淮工作已有了很大的成绩。以上这些工作，显然都是只有在新政权底下才有可能完成的。

现在我们必须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克服这样多的困难，获得这样大的胜利的原因。这里，我们首先就得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得感谢那些在前线，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得感谢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忘我地工作着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就得感谢成千上万的在生产战线上努力奋斗的劳动人民。

但是，对于过去两年来的成绩，我们还是不能自满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克服困难，加强巩固过去的成绩，加速发展我们的事业。我们必须紧记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和蒋匪手中。我们必须紧记着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还未停止。我们必须紧记着，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还无时无刻不在想武装干涉我们，破坏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破坏我们

的生产建设。最近美英帝国主义更不惜撕毁国际协定，无视我中央人民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声明和抗议，公然与日本单独媾和，重新武装日本军阀。显然的，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侵略朝鲜和中国，就是要把日本变成它的殖民地，要奴役整个亚洲的人民，要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完全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后必须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各党派间，各阶级间，各民族间，党和非党之间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不让敌人有任何机会离间我们，分化我们。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力量，我们要有现代化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动员更多的青年去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使得我们有充分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疆土、自己的人民。让帝国主义者知道，新中国的人民是不可侵犯的。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对特务、匪首、恶霸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肃清潜伏在国内的特务匪徒。我们必须继续展开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对于任何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都必须加以揭露和打击。在过去两年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曾获得了许多巨大的成就。我们相信，今后我们仍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在伟大的友邦苏联以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友邦的帮助下，继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我们是有力量来建立起独立、自由、繁荣、幸福的新中国，我们是有力量来保卫世界和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苏联十月革命 三十四周年致词

(1951年11月7日)

苏联的十月革命给人类历史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十月革命不仅解放了苏联的人民，而且也给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照明了一条光荣幸福的道路。

正是遵循着这条道路，我们中国人民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建立了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新国家。

在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的今天，回顾一下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感谢苏联人民的协助和他们的天才政治家列宁、斯大林的远见。展望一下中国和世界的将来，我们今天更感觉有无限的兴奋和快乐。因为中国人民接受了十月革命的传统，寻到了解放的途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正和十月革命一样，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他改变了世界上和平与侵略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他更有力的唤醒了和鼓舞了整个东方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伟大的苏联的确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当苏联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不久，他就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而那时国际帝国主义正利用不平等条约来加紧压迫束缚中国人民。在

• 据手稿。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苏联帮助了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当美帝以大量废铁〔1〕运往日本帮助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苏联首先以飞机大炮援助我们的抗战。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也是苏联首先承认了我们，并和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使得帝国主义不敢贸然向中国伸出侵略的魔手，因而也就使得我们有了和平保障来从事于生产建设。这个条约增加了东方的和平力量，给予那些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东方人民以光明的希望。这个条约团结了东方和西方，使欧洲和亚洲的人民，在争取和平的阵线上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

在生产建设的意义上说，苏联也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朋友，近百年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中国人民得寸进尺的侵略以及反动派的破坏，我们在生产工业化方面的确是落后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大力从事于生产建设。而苏联也正是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们。他们物质上帮助我们，技术上帮助我们。他们把他们的经验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们，以建设他们自己祖国的热情来协助我们。如果我们想起帝国主义这时正企图以经济封锁来扼杀我们的建设事业，那我们就会了解苏联对于我们的经济帮助，具有如何巨大的意义了。

再从发展的前途说，我们今天所走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也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所以苏联不仅是我们的朋友，而且也是我们的先进。我们要踏着苏联走过的足迹，最后走到我们中国过去许多哲人所梦想过的无阶级的社会去。尤其苏联战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巨大的水电站的建设，运河网的建立，变沙漠为田园的计划，这些人类奇迹般的成绩兴奋了我

们。因为这不仅是苏联人民的成功，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成功。苏联人民这些宝贵的建设经验将无疑地减少我们在建设中的困难，缩短我们建设的行程。

当然中苏人民紧密的团结，对于帝国主义者们是不利的。他们不惜用一切谣言来离间中苏两国人民的感情，他们甚至还幻想中国有铁托这样人物出现。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绝非帝国主义者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所能破坏的，我坚决相信中苏两国人民必定为建设我们各自的祖国，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永远站在一起。

当美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各地疯狂地建立军事基地，企图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看见和平中心堡垒的苏联正日益强大起来，而苏联领导的世界和平阵营的力量，亦日益强大起来，这使得我们非常的高兴。在苏联十月革命国庆的今天，我愿意代表中国人民向苏联人民及其领袖斯大林致敬，并申祝贺之忱。

注 释：

[1] 废铁是钢铁工业、军火工业的重要原料。

在民盟全国组织 宣传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951年11月13日)

各位同志：

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现在正式开幕了。我代表本盟总部，向全国各地出席会议的代表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志们，这一次总部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爱国运动获得了伟大胜利的条件之下来召开的，是在我盟的组织随着这三大运动而日益发展和巩固的基础上来召开的。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这是表示我盟将进入团结、发展、进步的一个新阶段。

六中全会闭幕以来，到今天不到一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民盟的进步是不小的。盟员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盟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盟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性也有了显著的进步。由于全体盟员同志积极参加三大爱国运动，在许多场合起了群众中的带头作用，民盟在社会上的威信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9—1988)。

提高了。这些进步和成绩的获得，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我盟六中全会所决定的抗美援朝和发展巩固组织的两大任务方针，同时也应归功于从总部到地方的全体同志们的努力工作。

自然，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有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缺点还是很多。我们虽然在各个方面有了一些成就，跟客观形势所要求于我们的相比较，实在还不够。在我们的工作中，特别是我们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中，现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我们来商讨和解决；存在着一些缺点，有待我们来努力加以克服。但是我深深地相信，开动着在座的代表同志们的脑筋，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和克服这些缺点，一定是能够达到目的的。

毛主席在最近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指出，过去一年来我国人民在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与文化教育事业中的伟大成就，在国内“是倚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才获得的。从一点来说，过去一年来我们民盟内部团结是更加巩固了，民盟对于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我们还做得不够。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加强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完成当前的任务。

这一次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做出了重大的决议，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报告的内容，团结广大人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

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我现在要号召本盟全体同志，切实遵照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决议，热烈响应全国委员会的这种伟大号召，用再接再厉的实际行动，来展开我们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盟的组织才会进一步地扩大和巩固，只有这样，我们盟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才会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完成国家和人民所赋予我们的当前历史的任务。

最后，敬祝大会成功，敬祝全体代表同志们健康！

致张默生

(1952年1月3日)

烈侄：^[1]

前月曾邮寄毛泽东选集二十册交你，收到后展开学习为要。兹由邮汇人民币三十万元^[2]回来，以二十万元给吴五娘，以十万元给杨么娘，于腊月或正月间觅妥人交去或派人送去更好，路费若干告知我即补汇回来。近日北京各机关团体开会动员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反贪污、反浪费，若共产党员有犯贪污者亦必惩罚，不知川中情形若何？

表方手书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

释：

[1]烈侄 张澜侄子张烈，即张默生。

[2]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 据手稿。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订二周年致词

(1952年2月12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签订了两个周年了。这个条约是毛主席的“一边倒”的政策的具体表现。这个条约对帝国主义是很不利的，但对于中国人民却极为有利。如果没有它，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一定早就来侵略我们了。有了这个条约，美帝国主义要来侵略我们就要有所顾忌。所以这个条约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它是东方和平的堡垒。

我们中国过去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订了不少的条约。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有强烈的侵略性，而我们中国过去的政府又是压迫人民的反动政府，因此每签订一次条约，我们中国就必然损失若干的国土、若干的主权或若干的利益。但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是如此。我们的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而我们的政府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因此这个条约乃是真正站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签订的。它是完全适合今天我们中国人民的需要的、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精神的。这一个合乎中苏两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而同时又合乎国际主义精神的条约，的确可以为全

• 原载《人民日报》1952年2月12日。

东方人民打开眼界。替东方苦于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人民指出了一条道路，那就是他们如果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那他们就惟有像中国人民一样，用自己的手来解放自己，并紧密的和苏联站在一起。

中苏两国人民一向都有很深厚的友谊，尽管过去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曾痛恨这种友谊，常常想破坏这种友谊。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以后，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立即签订了这个条约，以国家条约的形式，把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的友谊更加巩固起来，这对于全世界说来都具有伟大的意义。从签订条约的时候起，东方和西方是联结起来了，欧洲和亚洲是联结起来了，中苏两国的人民就有七亿人口再加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一亿人口，我们在大陆上有八亿人口。以这样众多的人口，加上无限的资源和高度的工业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拥护，和平的力量就变成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和平而且要极力争取和平，但如果战争贩子妄想作战争的冒险，那么他们就注定要失败。

最近，美帝国主义又指使仆从国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台湾残匪的所谓“控苏案”，这完全是一种诽谤！这对中苏两国人民都是一种侮辱。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是非任何离间和挑拨所能破坏的。我们深知，为了要获得和平，为了使我们中国人民所已获得的自由能得到保证，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更加团结。国际上的“第三条路线”、“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现在苏联人民正在联苏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奋斗，而我们中国人民则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盟邦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帮助下，为建设新民主

主义的社会而努力。两年来我们两国的力量是大大增强了。中苏两国人民建设的目标相同，方向相同，因此我们间的团结和合作是有着坚实的基础的。在这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的时候，我号召全国人民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阴谋，并为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团结和友谊而努力。

致 贾 子 群

(1952年4月15日)

子群同志〔1〕：

苏联名哲学家尤金博士所作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体现着马列主义理论，生动地、翔实地提供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兹寄上三十册，即希分赠南充各级学校及有关方面，悉心研读，使其了解新中国的建设前途，能更好的为革命事业而斗争。

再者，《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虽已出版，惟购者踊跃，特规定按前发“购书证”号码发售。复查前次购赠该书第一卷五十册的原“购书证”，已有二十张散失，故目前凭证仅能购买该书第二卷三十册，俟发售号码轮到时，即行购买寄上。仍希分赠各方藉供学习。并希与卢子鹤、张默生等同志，商同当地统战部，尽速组成“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认真学习，深入钻研，切实展开当地的思想改造运动。此致

敬礼

张 澜

四月十五日

注 释：

〔1〕贾子群 南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成都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 据手稿。

致李正鼎李正立

(1952年4月15日)

正鼎先生:^[1]
正立

郑志钊先生来信与所附李正恩烈士事略及其遗像已收到。正恩烈士早已壮烈牺牲，使我悼念不已！你们要求以正恩烈士的名字作为新设县的名称，实际上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无数先烈的英勇牺牲，才换来了革命的胜利的，正恩烈士的光荣，将为全国人民所尊敬而永垂不朽！你们身为革命烈士的家属，是非常荣誉的！你们珍惜烈士的光荣历史，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值得表扬的，最好希望你们努力生产，争取丰收。同时，用功学习文化，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来发扬正恩烈士的革命精神！此致
敬礼！

张 澜

四月十五日

注 释：

[1]李正鼎、李正立系革命烈士李正恩之弟。李正恩，四川宣汉人，1906年生。1926年任中共成都大学支部书记，并被推选为成都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参加领导成都的学生运动。1928年在成都“二·一六”惨案”中被害。

* 据手稿。

致邓小平

(1952年)

小平同志：

近两年来西南建设突飞猛进，尤以成渝铁路进展之迅速，不仅西南人民欢欣鼓舞，而全国视线亦多西移，海外侨胞更表示关切。此固群策群力，共同奋斗之结果。而同志苦心筹划，精确督导，坚毅勤劳，厥功甚伟。澜因冬季天寒，遵医嘱多在家休养，常约何北衡同志来家面谈，询问其关于川省经济建设之意见，深觉其颇多可以参考采纳之处，尤以一九五二年成渝铁路全线完成后，必将移其人力财力物力于其他可能即行兴办之生产建设。兹特抄附其意见请备查阅，并交西南工业、水利两部予以研究。因北衡在川服务时久，经验尚多，现已服务中央水利部，正致力于华北、西北及有关水土保持之研究、试验推广等工作。但对川省生产事业亦极热烈赞助也。

此致

敬礼

张 澜

• 据手稿。

庆祝成渝铁路通车

(1952年7月2日)

西南的成渝铁路，已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胜利完工，在七月一日举行通车典礼。这是西南人民在人民民主政权领导下，努力新中国建设的一大成功。我是西南人民，成渝铁路通车，使我欢欣，使我振奋，又不能不使我回想起四十年前亲自参加的川汉铁路风潮。

川汉铁路风潮发生于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那一年。当时四川人民因商办川汉铁路的集股，是出于四川农民田粮的附加，筹款两年，正谋修筑，满清政府复主张收归官办，以向英国抵借外债。川人以其丧失国家路权，使外国势力侵入腹地，群起反对，召开股东大会于成都，举我为副会长。当时罗纶为省议会副议长，组织川西各县保路同志会，与我所领导的股东大会互相呼应，以与满清政府抗争。成都市民并罢市声援。事为总督赵尔丰所甚疾，一日，诱请我及罗纶、蒲殿俊等八人至督署花厅，突皆背缚其手。独我与罗纶面前，有一弁以枪口抵胸，作欲放势，背后有一弁执马刀临颈、作欲砍势。其他被捕者相顾震栗。俄尔丰出，严责川人争路之非。我独与抗论。尔丰词屈，拍案厉声呵斥：“张澜太横

* 原载《人民日报》1952年7月2日第三版。

强”。命即将我们拘禁。成都市民听说我们被捕，立即群集督署，要求释放，卫兵竟开枪驱逐，死伤二十余人。我们被拘禁三个多月。而川西各县人民保路同志会，纷起以武装反抗政府。直至四川省宣布独立乃止。此为川人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对于川汉铁路修筑之争的一段历史。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相继掌握政权近四十年，政乱民困。蜀道之难，丝毫未改。今则西南解放才两年有半，成渝千里，铁路修筑竟已通车，于七月一日举行通车典礼。成渝铁路既已完成，由成都而继续向北伸长，是为“天成铁路”，现已开工，将直达天水，并在宝鸡与陇海铁路衔接。将来再由重庆继续向南伸长，修通“川黔铁路”，使与都匀铁路衔接，便可直通“湘桂铁路”。是成渝铁路之完成，实为沟通我国大西南、大西北和华南、中原地区的主要干线。

成渝铁路通车，顿使蜀道改观，山川无阻。广大地域的物产与文化加速交流。人民建设力量之伟大，使我今天能亲见其成，实感到无限欣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一周年纪念日。成渝铁路择定七月一日举行通车典礼，是有重大意义的。我遥为四川人民贺喜，更应向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共产党和毛主席，致其庆祝与拥护之忱。

更广泛地把和平的力量 团结起来

(1952年9月7日)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不久就要在北京召开了。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们将聚首一堂，讨论关于十六亿人民寻求自由幸福，增进友好关系，避免战争灾难的各项迫切问题。这是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各国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都要求独立自主，反对奴役和侵略，都要求在经济上、文化上互相交流，反对歧视和干涉。这是十六亿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很久以来，代表美国独占资本家利益的美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区域里面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却是直接地向各国人民的生存利益进攻。它甚至公开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使用细菌武器，公开违背了波茨坦公告和其它国际协议的约束，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样，就使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安全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区域里面的二十个国家的人民代表，在今年六月间先后到北京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 原载《人民日报》1952年9月7日第四版。

的筹备会议，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宣言。他们回国以后，在国内大规模地展开了关于参加这个会议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各国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都热烈地表示拥护，并选出了他们出席会议的代表。筹备会议的号召已获得了普遍的响应，形成广泛的群众性运动。这表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各国人民是如何深切地关心这个区域的和平安全和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

我们主张一切国际纠纷必须用和平协商和大国协议的办法来解决，武装侵略和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的行为必须立刻制止，民族独立和平等的原则绝对不容侵犯，各国人民有权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我们认为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国际经济和文化关系，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因此，我们竭诚欢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我国首都正式召开，并完全赞同这次大会以下列几项问题作为中心议题：

(一) 保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的独立、自由与和平，反对扩军备战。禁止关于战争的叫嚣及种族仇恨的宣传；取消一切对和平宣传的压制，要求和平运动的自由。禁止使用原子的、细菌的及化学的武器；反对对于非战斗人员及和平居民的轰炸与屠杀——加强对于国际法的遵守。

(二) 发展平等互利的正当国际经济关系与文化交流，反对封锁和禁运，改善人民生活，增进妇女儿童的福利。

(三) 反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反对将日本作为侵略基地，以消除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的严重威胁。

(四) 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合理地解决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包括越南、寮国^[2]、高棉^[3]、马来亚等地在内）一切有关和平的问题。

我们相信，只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十六亿人民，不分政治见解、宗教信仰、民族差别和职业种类，能够更广泛地团结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就能够形成保卫和平的巨大力量。可以打退战争的威胁，保证各民族的独立，终止扩军备战所招致的灾难。这就是说，和平虽然受着严重的威胁，但是，和平是完全可以拯救的。这里我们要告诉美国人民：美国政府目前所执行的侵略战争政策决不能代表你们的利益和意志，这种侵略战争政策只是给你们带来了日益加重的税收，日益高涨的物价，日益下降的生活水平，家庭离散，和你们的亲人在炮火下的死亡。因此，和我们一样，你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维护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在你们国度内，只有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和战争贩子在施行侵略，制造战争，破坏世界和平，威胁人类文明，以便利用侵略战争来大发其财。所以，和平的敌人不仅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我热诚地希望你们——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在你们国内展开更广泛的和平运动，并选出你们的代表来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来和我们一起为维护和平这一崇高事业而共同奋斗。

和平不能等待，需要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这次会议就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为争取亚洲、太平洋以至全世界和平的重要会议。中国人民将以积极的行动和实际的工作来支持这次会议，为实现十六亿人民和全人类的崇高目标而努力。

注 释：

[1]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美国侵略朝鲜战争期间，由宋庆龄、郭沫若等人联名邀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和平人士共同发起会议，于1952年10月2日至13日

在北京召开，有37个国家的367名代表参加。会议谴责了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提出了制止帝国主义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侵略战争的任务，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等11个文件。

[2] 寮国 即老挝。

[3] 高棉 即柬埔寨

继续加强中苏两国人民 的友好团结

(1952年11月3日)

自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就建立了伟大的友谊。在三十几年中，苏联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最真诚的朋友，曾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给予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苏联的这种援助，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特别是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和破坏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进一步合作。直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解放战争，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以后，形势才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统一团结的国家，政权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这才使中苏两国人民有了真诚合

• 原载《人民日报》1952年11月3日第一版。

作的可能。经过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已由于一九五〇年二月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而永久地确定和巩固下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再也不可能损害或破坏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了。

三年来，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根据苏维埃国家的立国原则，根据中苏友好同盟的伟大精神，在各方面给予了我国以大公无私的援助。首先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国际斗争中，我们获得苏联的最有力的支持。不久以前，为了防止日本以及与之相勾结的其它国家重新进行侵略，苏联政府又同意我国政府的建议，延长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期限。这对于加强我国的安全和巩固革命的胜利，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时，苏联的援助对于我国的建设，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应该着重指出，苏联的援助，不论是经济方面的，或是技术方面的，都是完全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都是完全兄弟般的、真诚的、国际主义的援助。我们所以能够在短短三年内，顺利地、迅速地完成经济恢复和改革工作，是跟苏联的这种无私援助分不开的。因此，在全世界人民热烈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国人民尤其要向苏联政府和人民，向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苏联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最近三年来对新中国建设的援助，完全证实了毛主席英明的论断：“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国即将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需要继续取得苏联的更大的援助。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但是，美国侵略者还在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阴谋扩大侵朝战争，仍然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并明目张胆地实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策。亚洲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仍然受到极大的威胁。为了防止新战争的危险，为了保证我国建设的成功，必须继续加强中苏友好合作互助同盟，继续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这是我国人民坚定不移的共同意志。

大家知道，中苏两国七万万人民之间的团结，是以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因而是没有人能够分离的，是不可能被战胜的。让我们在这个伟大友谊的基础上，为中苏两大国进一步的繁荣而奋斗！为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而奋斗！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悼斯大林

(1953年3月10日)

我们的伟大盟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导师、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斯大林主席不幸逝世了。这是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可补偿的损失。中国民主同盟全体盟员和个人以最沉痛的心情表示哀悼！

三十多年来，斯大林主席在革命的道路上指导我们，鼓舞我们。我们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斯大林主席所指示的道路，取得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胜利。斯大林主席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导师。

斯大林主席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上关心我们、支持我们。每当中国人民遭遇困难的时候，斯大林主席就来帮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主席更在各方面给我们慷慨无私的援助，使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能有辉煌的成就。斯大林主席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最亲密、最忠诚的朋友。

现在斯大林主席不幸逝世了，但是斯大林的学说，斯大林的事业，斯大林的精神，斯大林的光辉，永远引导着、照耀着我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胜利前进的道路。

• 原载《人民日报》1953年3月10日第二版。

致 张 志 和

(1953年3月26日)

志和〔1〕同志：

来信收到，昨日《人民日报》社论《王振海犯罪事件给我们的教训》一文，我已阅过。对于中共处理此反党事件的严肃和负责，岂止“值得高级领导同志细细参考”，即任何忠于革命的同志，亦当由此接受教训，特别对少数轻视组织纪律、不向坏人坏事作斗争，而一味作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者，更值得猛省。

年来，我因体力不支，对于民盟盟务，未能切实领导，深引为憾。所幸者，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盟内向来欢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者。倘有压制民主、违法乱纪情事，一经发觉，自当予以处理。如有所见闻，希将人与事明白告我。此复并致
敬礼

张 澜

三月廿六日

注 释：

〔1〕张志和（1894—1975） 四川邛崃人。解放初任政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

• 据手稿。

就周恩来总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的谈话

(1953年4月3日)

周恩来总理于三月三十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一个重要的声明。这个声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本着两国政府一贯维护及巩固和平的政策，本着中朝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殷切愿望而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新建议。这个建议是完全以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规定的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的精神为基础的。为解决朝鲜战争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而消除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周总理提出来的新方案，是最公平合理的。这个声明完全符合朝鲜战争双方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更符合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和平愿望。这是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促成朝鲜停战与争取远东及世界和平又一次的重大努力。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全体盟员热烈地拥护和支持这个声明。

对我周总理的新建议，诚如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所说：“毫无疑问，全世界的人民和真诚希望结束朝鲜战争和促进远东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之巩固的人民，将以热烈的同情欢迎这个建议，并给它以充分的支持。”而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8—1988年）。

政府已发表声明认为我周总理的新建议“是完全公正的，并表示愿意尽力促其实现。”这充分说明我周总理的新建议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热烈的欢迎并有力的支持。

我周总理的新建议是对美国政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一个具体而切实的考验。美国如果有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当然应该接受中朝两国政府这个公平合理的建议，立即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倘美国政府依然使用故技，节外生枝地来假借题目，妄图拖延或扩大战争，那末，美国应完全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它必将遭受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自取毁灭。

在民盟中央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上 的开幕词

（1953年5月27日）

各位同志、各位来宾：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现在开幕了。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谨向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我们的领导党——中国共产党，致最崇高的敬礼！

请允许我向各民主党派，我们敬爱的朋友，在座的各位来宾致敬。

请允许我向各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地方组织代表，特邀代表和全体同志们致敬。

这一次会议，是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以来，民盟所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过去三年半以来，由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获得辉煌的胜利和成就。我们民

• 据手稿。

盟光荣地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社会改革、民主改革运动，对国家人民曾有了一定的贡献。

今年，国家已进入了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一面继续加强抗美援朝，争取和平；一面开始进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文教建设的伟大事业。今年我们还要进行普选，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民主同盟必须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完成国家的三大中心任务而努力工作。我们民盟负有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盟员大多数是文教工作人员。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参加国家文教建设，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材，这是我们现在的中心工作。此外，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同志，也同样应当遵守国家纪律、加紧学习，努力做好岗位工作，完成国家赋予我们的任务。

我们民盟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党，我们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并向社会主义前进而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组织。为了搞好工作，我要加强团结，加强领导，并健全组织机构。这就是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

同志们！我们民盟在最近几年以来，虽然不断进步，我们还是有缺点的。我们的政治思想领导还比较弱，我们盟内团结还不够紧密，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对于民盟这一些缺点，首先应当由我负责。希望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中积极地发扬民主精神，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要使我们民盟能够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工作，全盟同志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共求进步。必须做到一切从工作出发，不争个人名位，不争党派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我们要建立集体领导，民主集中的制度，

并按照分工负责，分层负责的原则办事。这样，我们才能够加强工作，加强团结，更好地、更有效地来建设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

最后，让我们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就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 书面谈话

(1953年7月28日)

全世界所渴望的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了。这是朝鲜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伟大胜利，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我国各民族党派发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宣言中，曾经指出：“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同时也指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侵略，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问题”。两年多以来，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不只是将侵略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制止了侵略；并在战场上严重地打击了敌人，使他们吞并整个朝鲜、进一步侵犯中国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使他们终于接受了由苏联的倡议，也是朝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开始进行了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由于敌人方面缺乏和平诚意，

• 据《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9—1988年）。

迭次破坏阻挠，谈判多次停顿拖延。但是朝鲜和中国方面，却以极大的耐心，坚持以协商方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经过了迂回曲折的过程，使敌人终于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定。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与两年多的停战谈判，已经使全世界人民认清谁是侵略者，谁是真正的和平保卫者。毕竟人民的力量是决定一切的。人民赢得战争，亦要赢得和平，是再一次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了。

现在停战协定虽已签订，但是受美国反动派所纵容的李承晚匪帮还在叫嚣反对停战，而这种叫嚣且正受着美国一部分好战分子包括杜勒斯在内的鼓励。停战协定的实施，是否会遭受破坏，仍有待于事实的证明。正如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在本月十九日声明中所说的：“如果联合国军对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的这种纵容政策继续下去，则不论在停战前后，朝鲜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均有继续遭受破坏的可能。”我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时刻注意局势的发展，决不容许敌人方面破坏经双方庄严签订的协定。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停战协定的签订，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我全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一起，在已经获得的胜利基础上，更进一步展开争取和平与巩固和平的斗争，坚持以协商方式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反对一切干涉他国人民独立的战争和侵略行为。

我全国人民一致坚决拥护朝鲜停战协定，并当为其彻底实现以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目的而奋斗。同时更要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积极努力于国家有计划的建设，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时刻提高警惕，继续反对侵略，为争取远东及世界持久和平的实现而努力。

为完成伟大的国家建设计划 继续深入抗美援朝 保卫和平而奋斗

(1953年10月1日)

我们以无限欢乐的心情来庆祝一九五三年的国庆节！庆贺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国内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和成就。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年来，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兄弟国家在一起，在制止新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运动中有了伟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了三年，击退了美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军，终于迫使他们签订了朝鲜军事停战协定。这不只是我们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要求“以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一主张的伟大胜利。这是今年国庆节我们应当热烈庆贺的一件大事。

四年以来，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进行

• 原载《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日第三版。

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及各项社会改革运动，进行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工作，都得到了极大的成就。在这些胜利的基础上，在伟大的盟邦苏联大公无私的援助下，今年我们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我们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所追求的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富强、光辉灿烂的工业国家的理想，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将会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是今年国庆节我们应当热烈庆贺的另一件大事。

我全国人民在欢欣鼓舞庆祝国庆的同时，绝不可松懈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高度警惕，更不可放松了对于国家过渡时期的伟大建设工作所应贡献的最大努力！

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在被迫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后，不甘心所遭遇的失败，目前仍在续续着侵略的“冷战”挑衅政策，阻挠世界和平反对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和发展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及经济文化关系。为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防止他们的侵略阴谋。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大力援助朝鲜人民的恢复工作，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一起不懈地斗争，以争取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争取政治会议顺利召开并获致成果，争取进一步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为期达成上述目的，除了加强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合作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力量。我们一面

要继续深入抗美援朝运动，一面要为实现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而奋斗。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这是我们当前努力的方向！

在今年国庆节庆祝我们的伟大辉煌胜利的同时，全国人民一定要认识为了完成建设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循着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总路线，以稳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应更加努力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伟大的国家建设计划而奋斗！

示 张 晓 岩^{〔1〕}

(1953年10月24日)

我们今天的国家人民，要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为人做事，必当随时随地加强学习。学是党所未知，习是为之不已，所学即所习，就是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学要虚心才能多受教益，习要小心，才能少犯错误。

表方手示

十月二十四日

注 释：

〔1〕张晓岩 张澜第三子。

• 据手稿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草案会上的发言

(1954年6月14日)

今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要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草案，并加以公布，我感到无限兴奋。

中国人民要求立宪行宪已经有五六十年了。但是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民主的宪法。从满清到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宪法，都是由少数人钦定的，只是为了巩固反动政权，维护少数人利益，和大多数人民毫不相干。只有现在我们的宪法草案，才是真正按照国家的需要，保证人民应享受的权利来制定的，是符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和全国人民共同愿望的。这个宪法将要保证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和平的道路，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宪法颁布以后，将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彻底实施，使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成为统一、富强、繁荣的大国。这就是我国人民多年来流血奋斗所寻求的目的，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就要如愿以偿了。

• 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

为祝贺印度支那问题 达成协议的讲话

(1954年7月25日)

日内瓦会议〔1〕的辉煌成就，是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一次巨大的成就，是和平民主力量的最大胜利。参加会议的九个国家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所取得的协议，扑灭了在这地区绵延八年的战火，把和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持久和平是可以争取的，战争挑拨者的阴谋是枉然的。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及其经过，使全世界更清楚地认识了，谁是爱好和平，谁是主张战争。美国统治集团顽固地实行它的敌视和平的政策，已使它在国际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对于此次达成协议所作的巨大贡献，生动地说明了我们保卫和平、争取以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不懈努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具体建议，得到中、苏代表团的全力支持，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提供了切实的基础，博得了世界舆论的赞扬。

正如周总理在七月二十一日的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为了维护亚洲的集体和平，我们认为，亚洲国家彼此之间

•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7月25日第二版。

应该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同时，我们并愿与抱着同一目的的亚洲以外的国家共同努力维护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印度支那三个国家在协议中规定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并不容许任何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就体现了这种精神，这个规定将成为保障东南亚和平的有力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之一的身份，与各大国一起协商重大国际问题，在这一会议中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全世界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的具体表现。我国人民对于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的我国代表团的努力和成就，感到极大的兴奋和光荣，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 释：

[1] 日内瓦会议 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会议，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参加朝鲜问题讨论的有朝、中、苏三国及以美国为首的15个侵朝国家和南朝鲜。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拒绝朝、中等国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等方案，讨论中断。参加印度支那问题讨论的有中、苏、美、英、法以及越南、柬埔寨、老挝和南越。会议在法国承认印度支那各国民族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但美国拒绝签字。

拥护周总理兼外长的 外交报告的书面谈话

(1954年8月15日)

对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我完全同意并热诚拥护。首先，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周总理对于和平外交的巨大贡献，我表示衷心的敬意。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我国代表团由于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终于在日内瓦会议中取得了和平战胜战争的辉煌成就，达成了印度支那恢复和平的协议，结束了已打了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代表我国在这一时期所作的对外活动，说明了我国愿以和平协商的精神来谋求国际争端的解决，说明了我国愿以五项原则为基础与亚洲及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而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

美国侵略集团和我们走的正是相反的道路，他们一贯执行的是扩军备战的实力政策，在国际间制造紧张局势，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就侵占了台湾，妄想支持蒋介石卖国

• 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15日，第二版。

集团进攻我大陆。侵朝战争失败后他们就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在日内瓦会议以后，又加紧策划组织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太平洋军事同盟，并采取各种的侵略挑衅行为。其结果是使美国侵略集团日益孤立，它的制造紧张局势的冷战政策，日益不得人心，它的一切阴谋破坏活动都遭受到惨败。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甲午战争以后，五十年来，中国人民没有一天不在为收复台湾而奋斗。一九四三年开罗宣言〔1〕，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公告〔2〕，都曾经重申台湾为中国领土。美国侵略集团竟背信弃义不顾它曾在上述宣言、公告中签字的事实，最近又策划与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妄想把台湾作为它进攻中国的跳板，进一步的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这些行为，不只是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干涉我国内政，并且破坏了亚洲和平，增加了对全世界的战争威胁。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也是爱好和平的各国政府和人民所反对的。正如周总理所说：“中国没有侵略别国领土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侵略中国的领土。……中国没有干涉别国内政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为了完成我国的解放事业，也就是保卫世界的和平。如果美国好战分子敢于阻挡我国人民解放台湾，那就是侵犯我国领土，干涉我国内政，破坏世界和平，它就要承担它自己的罪恶行为的严重的后果！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我们早已光荣地解放了中国大陆。但是台湾一日不解放，我们的解放事业就不能算是完成。解放台湾，完成全中国解放事业，是我全国人民的光荣历

史任务。我完全相信这一任务是一定会胜利地完成的。

我们号召全国人民更牢固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更进一步地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生产建设，全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完成解放台湾的光荣历史任务。

注 释：

〔1〕开罗宣言 中、美、英三国于1943年12月1日在开罗发表。主要内容有：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它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使朝鲜自由独立；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等等。

〔2〕波茨坦公告 即《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美、英三国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过程中发表，苏联于同年8月8日加入。主要内容：盟国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军队要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等等。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次会议上关于宪法 草案和报告的发言*

(1954年9月16日)

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刘少奇委员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六十年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就我自己的经验，过去反动统治者所谓宪政，从制宪的过程到“宪法”的内容，都是骗人的，因而都是为人民所蔑视和反对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走上了光明幸福的大道，今天才有了这个真正民主的宪法。这个宪法是用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到全国每个角落，经过了许多次的讨论，吸收了一切好的意见，真正做到了字斟句酌，尽善尽美。所以这个宪法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为全国人民所一致赞成和热烈拥护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17日第二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得来是不容易的，有了这个宪法以后，全国人民必须作更大的努力，才能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社会。

为了彻底实施这个宪法，必须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首先，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关于宪法的宣传、学习，务求做到家喻户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人民，都要切实遵行，共同信守。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亲自参加了这个庄严的制宪会议，更应当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宪法，并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重大责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都要共同负责，以保证宪法的彻底实施。

五年以来，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应当承认，在我们的各种工作中还存在着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正是因为这样，几年来，我们曾经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现象作不断的斗争。现在宪法颁布以后，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以宪法为准绳，克服这些缺点和错误，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当全国人民热烈庆祝宪法颁布的时候，我特别想起台湾同胞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全国人民一定要更坚强地团结起来，解放台湾，消灭蒋匪，保卫国土完整，断不容许美国侵略集团的干涉！

青年们，迈开矫健的步伐 勇往直前吧

(1954年9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九月十五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了。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都热烈欢迎这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这个八十三岁的老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走出来，今天在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为迎接这个伟大会议而欢呼的时候，我的感想是特别多的，我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

从一八九八年满清时代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的宪政运动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接受了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但他们变法的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改良和加强旧政权。他们的意愿是在“保皇”。这样，自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以致一遇到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击，结果就只能是以完全失败的悲剧而告终。

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斗争，却愈演愈烈了。满清皇朝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宣布“预备”

• 原载《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

立宪。可是从光绪丙午（一九〇六）年发布的预备立宪诏书起，要“预备”九年，还没有“预备”完毕清朝就灭亡了。预备立宪的诏书里面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说到“大权统于朝廷”，倒是一点也不假，翻破了“钦定宪法大纲”，只见“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等等，满纸规定一切立法、司法、军事、外交、行政大权，统统由皇帝独裁。说到“庶政公诸舆论”，却是弥天大谎，正是为了要求“庶政公诸舆论”，我曾经亲身经受过生命的危险：

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四川人民根据清皇朝“铁路准归商办”的“上谕”，准备修筑一条从四川成都到湖北汉口的川汉铁路，并且在田粮附加和捐税抽收方面，已经筹集了两年路款。一九一一年（辛亥）五月，宣布“铁路准归商办”的清皇朝却又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强取豪夺地要把川汉铁路抵押给英国。四川人民为了争取路权，阻止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腹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同年九月初，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召开，举我为副会长，联同“保路同志会”的罗纶、蒲殿俊等，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愿。成都市民也罢市声援。九月八日，赵尔丰将我们八人诱到督署花厅，反缚住双手逮捕起来，特别在我和罗纶的颈上架着大马刀，胸膛抵着洋枪。这杀气腾腾的场面并没有吓倒我，我反而向赵尔丰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地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赵尔丰无词答辩，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

横！”随即将我们囚禁起来。群集督署要求释放我们的成都市民，竟遭卫兵开枪驱逐，死伤二十余人。这样残民以逞的清皇朝，怎能不被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推翻掉！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组织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致使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袁世凯掌握了国家大权。所谓“临时约法”也就成了废纸一张。

袁世凯把政府从南京搬到他的势力范围北京，在一九一三年率性撕毁“临时约法”，指使喽啰们编造“天坛宪法草案”〔1〕，其中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抛弃了“临时约法”所有的进步精神，公开恢复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我当时在北京任众议院议员，亲眼看到袁世凯攫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又处心积虑地玩弄“宪政”，以逐步实现窃国的阴谋。袁世凯就是这样“行宪”的：当国会不选举他作正式大总统时，他就指派喽啰们包围会场，叫嚣：“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于是议员们从上午八时直到下午十时，挨了一天饿，投了三次票，才被迫把他“选”成了大总统。袁世凯为了便于放手窃国，便解散了国会。我也就回到了四川。第二年袁世凯居然穿起龙袍，称起“洪宪皇帝”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我就联合四川旅长钟体道，以及川北全部、川西一大部的武装民团响应讨袁，并在南充宣布独立。全国各地起义的炮火，不久就轰垮了这个窃国大盗的“宝位”。

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大军阀曹锟，在一九二三年曾经公布过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实际上只不过是“天坛宪法草案”的翻版。此后，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公布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

法”，在一九三六年公布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亦即所谓“五五宪草”〔2〕，最后在一九四六年又由伪国民大会通过一个“中华民国宪法”。所有这些少数人“钦定”的伪宪法，都是用来奴役和压迫我国人民，巩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些遗臭万年的伪宪法，不但与民主毫不相关，恰巧是强奸民意，只有给我国人民带来重重的灾难。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仍然原封未动。所不同的，就是从清皇朝一脉相承的反动统治，到了蒋介石这个徒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蒋介石一面狺狺不休地嚷着“民主”，一面却廉价地拍卖祖国利益给美帝国主义，凶残地向祖国人民开刀。蒋介石带给人民的灾难，实在是罄竹难书。蒋记“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全国人民是领教得不少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写过《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戳穿了假民主的把戏，这小册子就被禁止发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要通过蒋记“宪法”。前一天的晚上，我在重庆打长途电话给南京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全部实现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民盟终于拒绝了参加御用的伪国民大会。后来蒋介石竟抛开“民主”的遮羞布，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禁止民盟活动，逮捕和屠杀民盟盟员。那时我在上海一个医院里养病，蒋介石终于派军警把我在医院中监视起来。当时要不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营救和解放军的到来，我是活不到今天，看不到全国解放，更参加不了这个为我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为了达到立宪、行宪的要求和愿望，我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颁布真正民主的、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我强忍着兴奋的热泪欢呼伟大的愿望实现了！我国人民万分感激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劳苦功高的毛主席！我们要更坚强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和学习，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把祖国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国人民要求宪政的长期斗争的年代中，我从青年变成了胡须皓白的老人。幸而在垂老之年，我还能同青年们一道共享民主幸福，我的心情怎能不感到“返老还童”了啊！现在摆在青年们面前的是康庄大道，有共产党、青年团的引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照耀着前进的方向，而且在宪法（草案）中更明确规定：“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真是万事俱备，只待青年们努力前进了。亲爱的青年朋友们！要在你们的手上把祖国建成瑰丽的花园，要把你们的歌声唱到共产主义社会，迈开矫健的步伐，勇往直前吧！

注 释：

〔1〕天坛宪法草案 原名《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人称“天坛宪法草案”。

〔2〕五五宪草 颁布于1936年5月5日，故名。

庆祝建国五周年

(1954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了，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最值得纪念和庆祝的伟大节日。今年的国庆节，标志着我国将更胜利地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五年以来，我们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获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庄严地通过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人民的宪法，并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这样，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就会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更迅速的往前发展，我国人民生活就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善，因而使人民群众更能充分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国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胜利的保证。全国人民都为我们这个日益昌盛的祖国感觉光荣和兴奋！

今年的国庆节标志着我国将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世界和平上，作出更多的贡献。我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

• 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日第五版。

人民的友谊也日见增进。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和我国已建立或正在建立外交关系的已有二十五国，且同另外一些国家发生了事务性的关系。今天，有成千的、来自全世界的外国朋友参加我国的国庆观礼，我国人民十分愿意通过这些尊敬的朋友进一步发展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酷爱和平的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已为世界所公认。我们和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促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使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同时给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指出了和平共处的道路，证明以协商方式可以解决任何国际争端。我国所提出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已博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声称赞和信赖。今后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将更会增加各国的互相了解，增进国际间的合作。

当我们充满胜利的喜悦指出辉煌成就的时候，自然不应该忘记我们面前还有遥远的道路，还有曲折和困难。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新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不能有丝毫的骄傲自满，全国人民必须更坚强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继续努力。

现在，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的宪法已经颁布了，我国人民已有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指针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保证。对于这个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字一句，我们都要尽一切努力促其实现。首先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关于宪法的宣传、学习，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以身作则，自觉地严格地遵守宪法和其他一切法律。全国人民都应该毫

无例外地遵守宪法，身体力行。我们必须随时以宪法的社会主义精神来衡量和检查我们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崇高的目的。

此外，当我们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他们至今仍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法西斯统治下，美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且妄想以台湾为跳板来使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反动统治在我国复辟，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解放台湾完成我全国的完全统一，拯救台湾同胞于水火之中，是我国人民责无旁贷的责任。为了保障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全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让我们遵循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勤勤恳恳地为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解放台湾，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事业而奋斗！

拥护周外长《关于美蒋 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 的 谈 话

(1954年12月11日)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外交部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谁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和维护领土完整的神圣责任。美帝国主义背弃国际信义，破坏它自己签过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妄想通过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缔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来“无限期”地霸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它敌视中国人民、准备扩大侵略战争的最露骨最无耻的表现。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的失败，采取了一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侵略政策。几年来，它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干涉印度支

• 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1日，第二版。

那的殖民战争，妄想从这三个战线上包围我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区地拼凑侵略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力图重新武装日本，使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局势日益紧张。只是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和苏联以及其他各国的共同努力，遏阻了美国侵略者的凶焰，才使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战争得以和平解决，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并未接受失败的教训，仍一贯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破坏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的贯彻实施，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加紧对我国进行战争活动。现在更进一步不顾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公愤，明目张胆地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台湾的霸占“合法化”，用武力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进犯大陆的罪恶行动，并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这显然使远东局势更形紧张。这说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公开挑衅，它不仅威胁到远东的和平，同时也威胁到世界的和平。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决不害怕战争。为了保卫和平，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中国人民是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去争取的。美帝国主义者妄想用战争来威吓我们，它没有料到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决不是战争所能吓倒的。周恩来外长声明中说得好：“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 “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这一义正辞严的声明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支持的，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坚强意志决不会因美帝国主义这一狂妄的侵略行动而有丝毫的动摇，它只有促进我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一致，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而加倍努力！

附 录：

张澜生平活动大事年表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

4月2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张澜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张观沟。

1894年——1899年（清光绪二十年——二十五年）

1894年，张澜应试科举，中秀才，1897年补廪生。1899年赴广安州（今广安县）紫荆书院任教。

1900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七年）

1900年秋，张澜因父逝世从广安返回家乡，随后继承父业，在私馆教学。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张澜被选调成都尊经书院深造。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张澜由官费派遣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张澜从日本卒业归国，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

1905年——1910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宣统二年）

1906年，张澜赴成都，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907

年下年返回南充，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并先后创立初、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塾。1910年，张澜应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聘，任学堂修身教习兼斋务长，是年冬返南充。

1911年（清宣统三年）

5月，四川保路风潮掀起，张澜前往成都。

8月，张澜当选四川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副会长，参予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

9月7日，张澜与蒲殿俊等保路运动领导人被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囚禁中，他不为威武所屈、生死所动，写有古风诗《田家乐》一首。

10月1日，张澜被释放，随后参予四川独立事。

1912年（民国元年）

张澜以川北宣慰使职驻节南充，竭力稳定川北地方秩序，改良地方政治。

1913年（民国二年）

3月，张澜被推为众议院议员，赴京出席北京政府召开的第一届国会，积极参政议政。

1914年（民国三年）

张澜因袁世凯解散国会离京返回南充，与地方人士创办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为家乡培养人材。

1915年——1916年（民国四年——五年）

1915年，袁世凯决定恢复帝制，年底，张澜积极与云南联系，准备武力倒袁。

1916年3月28日，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在南充成立，张澜任政务长，宣布南充独立。8月14日，张澜受命为嘉陵道道尹。

1917年（民国六年）

在四川的滇、黔、川各路军阀混战，张澜多方调处无效。8月24日，张澜被任命代理四川省省长，张澜婉辞未允，10月9日离开南充经渝赴蓉，20日正式任命为四川省长。

1918年（民国七年）

川乱继续，2月，张澜致电各方，表示愿与西南一致拥护《临时约法》。19日，张澜因战事退出成都。后北上赴京，5月初抵北京，在京设“四川省长行署”。

1919年——1920年（民国八年——九年）

张澜以省长职主持北京《晨钟报》，支持四川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支持“五四”爱国反帝运动，探索中国的出路。

1920年8月22日，张澜母亲在南充逝世。9月，张澜奔丧返南充，随后主持南充地方事业，参加地方自治活动。12月30日，北京政府免去张澜省长职。

1921年——1925年（民国十年——十四年）

张澜在家乡倡导地方自治，呼吁裁兵。1921年4月中旬，张澜被选为“川北善后会议”会长，全力发展地方实业。

1922年，张澜复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兼任端明女子中学校长，兴办职业教育。

1924年，张澜写成《南充之实业自治》。

1925年，张澜支持南充八县民众反对南充驻军何光烈创设的“典当捐”。是年底，张澜出席在成都召开的四川善后会议。

1926年——1930年（民国十五年——十九年）

1926年2月，四川善后会议赞成创立成都大学。4月初，张

澜被省长公署委任为成都大学校长，6日正式就职。

1928年2月，成都军阀以“杨廷铨案”逮捕和屠杀革命学生，张澜愤而辞成都大学校长职；因师生挽留，暂负校长职责。

1929年，张澜在成都大学发表《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怎样研究经济学》、《中国学生的出路》等文章。

1930年，张澜为筹措成都大学经费离校返南充，随后转赴重庆。10月，成都国民党当局借故逮捕张澜秘书杜象谷，张澜决意自动离职。

1931年（民国二十年）

1月29日，回南充，复任南充中学校长。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3月下旬——8月，张澜受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委托，率领四川“教育、实业、地方自治考察团”出川了解国内外形势，寻求抗日反蒋力量。主要路线是重庆、上海、香港、广州、南宁、柳州。拜访了沈钧儒、史量才、黄炎培、章伯钧、张东荪、周善培、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等各界知名人士。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8月，闻杨森密谋诱歼红军于蓬安县境，派校工袁义和给仪陇马鞍场红军指挥部送去密信，使红军有所戒备，转危为安。杨森为此欲加害张澜，张澜与奚致和赴成都暂避。

10月17日，张澜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副会长。他说，安抚会是非官方的性质，目的是为了救济乡亲难民，对人民有利。不久，张澜专返南充主持救济，促进生产尽速恢复。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春，协助共产党员张曙时做刘湘的统战工作，使刘湘的抗日

反蒋主张逐渐明朗化。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秋，张澜次子张嶧受中共中央电召，由苏联归国，被派至张澜身边工作。

12月10日，应《新民报》邀请，撰写论述抗日战争问题的文章，题为《抗日救亡之壮丁训练及外交联合问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张澜与唐宗尧、邵石痴、于渊、王干青等列名发起组建“华北抗战四川民众后援会”，成立大会上，张澜被推为会长。

9月5日，出席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的“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日将士大会”，他在致词中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情况后，提出坚持长期抗战的观点。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各界知名人士200人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张澜被遴选。

7月，赴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会议期间，他分别拜会了共产党人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周恩来。周恩来希望张澜能在西南地区协助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1月4日，与黄炎培梁漱溟等在重庆、《新蜀报》发表《讨汪通电》，即“艳电”。主要内容为反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并指出：“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11月23日，张澜与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30多位国民参政员，在重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会议公推黄炎培为主席。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团结，共同抗日，实施宪政。主张对各抗日党派，应一律承认其平等合法地位；在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或宣布无效。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4月，国民党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杀害共产党员朱亚凡，并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军委书记车耀先。张澜受董必武托付多方营救，均无效，于是写信给蒋介石，诚以勿破坏团结，动摇后方，危害国本。

1941年（民国三十年）

3月19日，在特园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17人出席。会上，推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主席。

8月19日，黄炎培因赴南洋劝募公债，辞去民主政团同盟主席。10月，张澜在周恩来的勉励和帮助下，不顾个人处境困难，毅然出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

11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加入提案签名或副署者共23人，共产党人董必武、邓颖超也署名表示完全支持。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4月，张澜70寿辰，好友及学生在成都为其祝寿，并集资铅印张澜近著《说仁》、《说义》二篇，文前载有张澜《自传》以及黄炎培题《说仁·说义》诗。

11月5日，完成论著《四勉·一戒》。篇首《自序》云：“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9月18日，发表著名政论文章《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虽被蒋介石列为禁书，但在成都、昆明、广州等十几个城市被秘密翻印。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2月13日，张澜与邵从恩、李璜等人联名发起组织成立“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被推为临时主席。

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和改组问题。根据国内外形势，通过决议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吸收无党派人士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张澜当选为民盟主席。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8月28日，张澜与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前往重庆九龙坡飞机场，迎接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在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偕周恩来先后三次访晤张澜，作长谈。

10月1日至12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张澜被选连任主席。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1月10日，张澜与沈钧儒、黄炎培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8月18日，出席在成都举行的四川各界人士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张澜在会上发表演说：“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会后，张澜突遭特务袭击致伤。

12月12日的张澜在鲜特生、范朴斋的陪同下，离渝赴沪主持全国盟务。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10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应“严加取缔”。当时其他民主党派也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张澜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于11月7日发表声明，号召盟员继续为国家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

这以后，张澜与沈钧儒、罗隆基等常常在一起商谈时局，筹划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和恢复民盟总部活动等问题。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张澜通过不同途径做西南地方实力派邓锡侯、刘光辉、潘文华的工作，希望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派，为人民立新功。

是年，张澜写《墨子贵义》一文。

1949年

张澜被监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国民党反动派计划于5月24日晚将张转移出去抛入江中。在党的地下组织营救下，安全脱险。

6月15日，离沪去北平。

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出席

开国大典。

12月20日，民盟召开五中全会，张澜被选连任主席。

1951年

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设宴，为张澜祝寿。宴会由刘少奇主持，他在讲话中称颂了张澜的革命业绩。张澜致谢词。

1955年

2月9日，张澜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83岁。

后记

张澜（1872—1955年），字表方，四川南充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人民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我国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自清末保路运动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发表了许多演讲，撰写了不少著述、函札、文电及公牍。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爱国忧民、追求真理的一生，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对于我们研究张澜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历史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1990年10月，“张澜生平与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四川省南充市召开。与会领导和学者们认为，张澜的著述散失较大，现存者亦流散各地，查找极为不便，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大家强烈呼吁编辑《张澜文集》。鉴于四川师范学院近几年来对张澜的资料作了一些搜集和整理，大会遂决定将此任务委托该院完成。学院领导对编辑《张澜文集》非常重视，随即成立了《张澜文集》编辑组，由历史学教授龙显昭副院长为主编、历史系副教授谢增寿、历史系副主任康大寿、图书馆长胡孝章副教授为副主编，共同负责编辑工作。

几年来，我们除去全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报刊和档案

资料外，还派员到张澜的亲属和故旧等处访寻，尽可能地收集到张澜现存的全部著述，包括各种不同的版本和文字记载，然后再进行选择与整理。在整理中，我们对传世的各种版本，必先求其祖本；遇有手稿或墨本，则以手稿墨本为据。在文字上，诸本对勘，择善而从，力求忠实于原著原意。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四川省政协、民盟四川省委、中共南充地市委，南充地区行署、政协南充地工委、南充地区志办、政协南充市委、民盟南充地市委、张澜纪念室、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以及有关图书馆、档案馆，都给予了很大支持。我们也得到张澜的亲属张乔啬、张茂延以及全国政协吕光光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谢忱。

《张澜文集》的面世，全赖四川教育出版社的鼎力相助，这里特向他们表示敬意。

由于张澜一生的时间跨度大，其文稿发表的或未发表的甚多，流播各地，网罗不易。本文集所收难免有遗漏，所选亦未必当，编订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海内外的读者不吝指正。

《张澜文集》编辑组

1991年12月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AyODgyNzcudXZ6",  
  "filename_decoded": "10288277.uvz",  
  "filesize": 27450408,  
  "md5": "996bd667c6b2943c7bf5d412b47ec34c",  
  "header_md5": "083ef642619c2aff6e169a5c8309c865",  
  "sha1": "9a57a9e6f32df2ed09055e6578badf51db8b5d8a",  
  "sha256": "9d16795d9ac968a0c55f830e5b1006100de296b21120f5bf24047bb9a98bbe09",  
  "crc32": 3348684116,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8686",  
  "uncompressed_size": 28568329,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500,  
  "pdg_main_pages_max": 500,  
  "total_pages": 523,  
  "total_pixels": 209209778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